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王阳明

Wang Yangming
De Shenghuo Shijie

的生活世界

董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王阳明

Wang Yangming
De Shenghuo Shijie

的生活世界

董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阳明的生活世界/董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阳明学研究丛书/吴光主编)
ISBN 978-7-300-11273-2

I. 王…
II. 董…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9) -生平事迹②王守仁 (1472—1529) -哲学思想
IV. 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901 号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 光 主编
王阳明的生活世界
董 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5.7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9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暨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并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出版资助，特致谢忱！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一

刘述先*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回到故乡，自此广收门徒。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收徒首先在浙中，然后是江右（指江西，《止修学案》括入）、南中（指江苏，《泰州学案》括入）、楚中、北方、粤闽。浙中人数不多，但钱绪山、王龙溪影响深远。梨洲对江右评价特高，竟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但江右虽人才众多，却并无统一观点，梨洲特别表扬聂双江、罗念庵，显然别具用心，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需要考察。泰州派的问题更大。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归根结底，不外蕺山所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很明显，由蕺山的观点来看，泰州是“参之以情识”，龙溪是“荡之以玄虚”；蕺山之学则乘王学之流弊而起，这便是梨洲写《明儒学案》的背景。至于楚中，梨洲以楚学之盛，

* 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 年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学士、哲学硕士，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讲师、副教授，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1974—1981），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81—1999），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讲座教授（1999—2004）。现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等职。著作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等 20 余种，并有英文论文 60 余篇及著作多种。

唯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评价不高。王门在北方与粤闽则缺少发展，可以从略。

有了以上的背景，我们乃可以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来看吴光教授策划与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其内容包括专著十部，论文集一部。自1981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国际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镇。^①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套丛书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专著十部，首先是董平著《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从对阳明生平的阐述中，展示阳明生活世界的变化与思想世界的演进。接着钱明著《浙中王学研究》，徐儒宗著《江右王学通论》，吴震著《泰州学派研究》，对王门的三个重要流派作出了深入的省察。然后是何俊、尹晓宁合著的《刘宗周与蕺山学派》，由此可以看到梨洲虽对蕺山之学大行于世抱有很高的期望，结果却事与愿违。到了清初，发生典范的转移，梨洲成为心学的殿军，不期而然促成了“达情遂欲”、“力行实学”、“文献考据”的转向。吴光著《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探讨了梨洲的学术成就，从而肯定了他之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然而丛书并不局限于儒家的视域。朱晓鹏著《王阳明与道家道教》，陈永革著《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爬梳了史料，揭示了阳明学与道家道教以及晚明佛教（包括“狂禅”）的关系。同时阳明学又不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现代意义。刘宗贤、蔡德贵合著的《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具体探讨了阳明心学的内在发展——现代新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思想特质及其与阳明学的思想联系。丛书还包括了韩国学者崔在穆著《东亚阳明学》的中译本，展示了一个跨国界的开阔视野。最后《阳明学综论》收录了当代多位著

① 自1981年至今，浙江学界举办过多次关于叶适、陈亮、吕祖谦、刘基、王阳明、黄宗羲等宋明理学家以及浙东学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举办了“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省一级学会“浙江省儒学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和《儒学天地》杂志以及《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继往开来论儒学》等专题论文集，还有多部儒学论著，从而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肯评。

名阳明学专家所撰稿，并汇集参与本系列研究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论文，编为论文集，希望能在阳明学研究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2009 年 6 月 10 日序于台北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二

吴 光

1984年至1991年间，我有幸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负责组织策划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等多种古籍的整理校点工作。本来还计划组织一套“浙学资料汇编”和一套“浙学研究丛书”，但由于某种非学术的原因干扰了这一计划的贯彻落实，致使当时的我在离职感言中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但到2000年前后，形势变化，我再次被委任为本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继而担任主任。于是，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董平先生共同策划、分工合作，由他负责主持“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的课题^①，由我负责主持“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后来，由我主持的课题先后得到浙江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成为浙江省2001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规划课题。我们的课题组12名成员经过7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套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总计11册约300万字的“阳明学研究丛书”。丛书完成后，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支持，提供了出版补贴；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① 本课题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立项成为本院2000年度重大课题并提供出版资助，最终完成了一套由万斌任主编，钱明、董平任副主编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10册），由凤凰出版集团于2007年出版。

予以出版，使著者、编者的辛勤劳动得偿所愿，也可谓学术之幸也。

以往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对王阳明本人及王阳明学说本身的解说，而缺乏对阳明后学各派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既没有组织集体力量进行系列性的大课题研究，更没有出版过系统梳理和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学术思想的系列丛书。然而，深入研究王阳明与阳明后学各家各派的思想宗旨、学说特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深入研究阳明学与道教、佛教以及明清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当代儒学、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之间的思想联系，深入研究阳明学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关系诸问题，不仅对于系统整理中国哲学遗产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多元和谐的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们设计本课题的初衷，一是要自觉担负起作为阳明学发源地和发展重镇的浙江学者的历史使命，对阳明学的发展演变作出系统性的思想史的总结，向国内外读者奉献我们系统探索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与角度揭示阳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代意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多元和谐新文化而贡献我们的知识与心力。本丛书的各项具体成果，基本上实现了这一初衷。

本丛书研究的主要思想是：第一，通过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及其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目标、“知行合一”为方法的学说思想的综合研究和客观评价，力求使当代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王阳明的学术贡献，正确认识王阳明学说的理论内容、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第二，通过对阳明学内部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具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理清阳明学形成、发展、分化、演变乃至衰落、复兴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三，通过对王阳明以后的明清以至当代儒学与阳明学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特点与规律，进而探索阳明学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与现代意义；第四，通过对阳明学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不同命运、不同历史作用的比较研究，探索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借鉴。

本丛书特色在于，它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各个思想家思想学术的个案分析与阳明学各学派和宋明以来心学思潮研究相结合的系列研究课题。其内容体现在各位课题参与者撰写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本丛书的选题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人物大传，主要是论述阳明学派三大儒（创教者王阳明、修正者刘宗周、转型者黄宗羲）的生平事功与学说思想，附论其所创立的学派（姚江学派、蕺山学派、浙东学派）之概况与特色；二是专题研究，本丛书选择了阳明后学三大派（泰州王学、江右王学、浙中王学）以及王阳明与道家道教、晚明佛教、当代新儒学三专题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究；三是比较研究，既有阳明学内部诸学派的比较研究，也有阳明学与明清佛学、道家道教以及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成果，大致展现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思想内涵与学派特色，展现了阳明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对中外儒学思想史的重大影响。

我相信，读者从本丛书各部著作与专题论文中，可以看到作者艰辛劳动的收获，可以分享作者闪烁智慧之光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获得弥足珍贵的思想启迪。此言虚乎？实乎？还是敬请读者深入丛书内部一探究竟吧！

2009年7月25日识于朝晖力行斋

目 录

导言	1
1 泛观博览 止心圣学	5
2 投荒万里 龙场悟心	21
3 职事屡迁 门生广进	36
4 南赣戎机 矢石书影	51
5 翦除宁藩 教揭良知	108
6 讲学越城 心目俱醒	162
7 总督两广 恩威兼行	178
8 夫复何言 此心光明	222
9 哲人往矣 尔思曷兴	232
主要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40

导 言

宋代理学的兴起与繁荣，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哲学运动或思想文化运动，其最终结果是重新追回了作为传统文化之核心支柱的儒学的道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其价值的创造性转换。“道统”的意义，与其说是关于儒学传统之历史事实的理论还原，倒毋宁说是关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理念的价值抽象，它所体现的显然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而是关于历史文化传统之理解的价值真实。正是这一关于中国文化之核心价值的根本理念，成为理学这一儒学复兴运动所立足的基点，成为其中坚人物所共同体认到的中国文化自身的“本体”，因而亦成为抗御南北朝隋唐以来佛道文化的强势繁荣甚至于思想界垄断的思想防线。理学的最终成就表明，它是在充分理解、深刻领会并融摄参贯佛道之思想精髓的前提下对佛道之思想世界的成功消解，是基于新的理论视域与经典意义的重新诠释，同时亦实现了对于儒家古典哲学系统的重新建构。这一儒家哲学的古典新义，不仅在理论上或思想上充分回应了宗教哲学的形上之思，而且在实践上重新追回了圣人人格的古典理想。由于存在的本体同时被诠释为道德的本体，因而存在的方式及其目的便应当是道德的。这一关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当然理念因在宇宙论一本体论层面上获得与道体的相互契合和同一而转化为某种普遍必然性，从而成为人本身之生活世界的建构核心，同时亦是价值世界的建构核心。

理学哲学运动的完成时期，大抵说来，盖在南宋乾道、淳熙之际（12世纪中后期），并且基本上形成了三种形态的思想成果。一是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重视天道本体之内化为人道本质的哲学诠释，关注人的生存本质在经验生活世界中发生异化或颓变的可能性，从而强调通过经验的道德践履来保证天道、天理或人性的实在性在生活世界中的纯粹表达。生命过程被理解为一个向着其自身的存在本质，同时亦是宇宙之终极实在境域的不断接近与回归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视为个体超越其经验的生存状态而优入圣域的必由之途。二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不仅重视天道本体之内化为人道本质的哲学诠释，而且尤为强调心体本身之实在状态的固有澄明与至善。由于心体具有将其自身的本质实在性表达于经验的必然性，因而对于心体之至善的澄明状态的主观认同与自觉切入便不仅为主体性的真实内容，而且亦为优入圣域的关键环节。心体之澄明的自觉顿达，便即是对其经验生存之非本真状态的即时消解，亦即是存在之终究实性的即时还原。所谓朱、陆之异，原非体现于其哲学的目的，而体现于其哲学方法或其哲学建构的逻辑行程。三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尽管吕氏早逝，其学术思想的表达并未见其抵止，因此其完密性与系统性均较朱、陆为逊色，但另一方面，吕氏本人的学术素质与学术修养却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历史的整体研究，他与朱熹一道，亲身参与了理学体系的哲学建构，与当时浙东学术群体中的主要人物，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有密切交往，并且亦亲身见证了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学术论争，对他们各自的学术主张亦都有深切的了解，其深厚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学术经验使他有可能会在整合朱陆、兼摄陈亮及永嘉之学的基础上而又超越于其各自的理论境域，独辟蹊径，而将道的理论追寻推进于社会历史的全部领域，将道的现在状态与人类当前的生活世界相互联结，强调个体的道德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本质同一性，从而在新的视域下实现了哲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融合，在某种意义与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历史哲学传统。这一源于不同学术之视域整合而出现的新学术领域，就其思想与观念的充分表达而言，其实亦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儒家原始精神的回归，并且亦因被体现为“浙东学派”的

基本学术领域与学术精神而在历史上有恒久绵远的影响。

这三种理论形态，在整体上均为理学哲学运动所达成的思想成果，亦可视为在不同的思想维度上对儒学进行重建而实现出来的三种形式。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学术上的以及制度上的，此后的各自发展却并不平衡。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理学运动之最高成就的朱熹学说逐渐成为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主流形式。直至明代中叶，因有阳明之学崛起于浙东，方始突破朱熹理学在守成的传承中所出现的僵化格局，陆九渊重视心体之自我澄明的学术精神重现于数百年之后，而学术思想界则亦因此而别见一片疏风朗月的新天。

阳明的一生并不长久，但在他五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却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所理想的“不朽”，集事业功德与立言垂教于一身。他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人，其学说的畅演与传播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思想学术之发展的整体格局；他是一位深怀韬略猷谋的将军，其事功的建立实际上改变了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他亦是一位逸兴遄飞、文心奔涌的诗人，山川幽邃、天心月圆，都曾见证其潇洒的仪态与隽永的文辞。或亦正因此故，虽数百年以后，人们犹思其功烈，想其为人，心生景仰而为之赞叹三复，如清代马士琼云：

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谓能阐性命之幽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匪异人任也。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巨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①

但阳明的一生却是偃蹇困顿的。投荒万里，颠仆途尘，征剿寇盗，削平宁藩，他所迎来的却是如瓦釜般雷鸣的谗言诟詈；抚平思恩、

^① 马士琼：《王文成公文集原序》，见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四一，1620～16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后引该书简称“《全集》”，唯注明卷数篇题页码。

田州，征讨八寨、断藤，安民人宁处之心，除国家百六十余年之患，师奏凯旋，却病死归途。他的临终遗言，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除了那一片玉壶冰心以外，他的确似乎什么亦不曾留下。然而，当我们徜徉于他的思想世界之中，回味与诠释他的良知之说，却又无法忘怀其生活所经验的百死千难。阳明的生活世界，原是其思想世界的开展形态；他的生活践履，亦原是其致良知说的确切证件。故此，了解阳明的生活世界，便成为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其思想世界的必要前提。梁启超先生云：

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①

依循任公先生此说，我们遂综理历代之所记述，参稽时彦之所研究，而请述阳明先生的生平行履，冀踪其生活世界的实迹，而窥其思想世界的深邃。

^① 梁启超：《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全集》卷四一，1631页。

泛观博览 止心圣学

(成化八年至弘治十八年，1472—1505)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公元1472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余姚。据说他的母亲郑氏妊娠十四月方始分娩，而在阳明诞生的当天，他的祖母岑氏曾梦见“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所以他的祖父便为他取名“云”，他出生的那座房子则被称为“瑞云楼”。

按照钱德洪等编撰的《阳明年谱》的记载，阳明的先祖为晋光禄大夫王览（字玄通，205—278），本为琅琊（今属山东）人，至王览的曾孙王羲之（字逸少，321—379）始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至二十三世迪功郎王寿，则自达溪迁于余姚，遂为余姚人。^① 姚江王氏是显赫的文化世家，其祖上亦代有才人，门庭荣耀。阳明的曾祖父王杰（字世杰，号槐里子），“有志圣贤之学，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及宋诸大儒之说”。“无贤愚戚疏，皆知敬而爱之，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② 曾著有《易说》、《春秋说》及《周礼考证》，又有《槐里杂稿》数卷，然皆不传。其祖父王伦（字天叙，号竹轩），

① 按《阳明年谱》及《世德纪》均以王羲之为阳明世系的始祖，然此说已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世德纪》称阳明的曾祖父王杰“其先世尝植三槐于门，自号槐里子，学者因称曰槐里先生，始祖为晋右将军羲之”（戚澜：《槐里先生传》，《全集》卷三八，1383页）。说明阳明的先世是曾“植三槐于门”的“三槐堂”王氏，余姚诸焕灿先生经考证认为，“三槐堂”实为王羲之的伯父王导（字茂弘，276—339）的二十三世孙王祐（924—987）的堂号，属于王氏“乌衣大房”世系，与王羲之没有关系（参见诸焕灿：《姚江王氏、迁居绍兴、争嗣爵位三考》，余姚市乡贤研究会编：《余姚乡贤论》第二辑，1992；钱明主编：《阳明学新探》，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钱明著《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亦采此说。

② 戚澜：《槐里先生传》，《全集》卷三八，1383页。

天性爱竹，于所居之轩，皆环植以竹，日啸咏其间，“视纷华势利，泊如也”；“于书无所不读，而尤好观《仪礼》、《左氏传》、司马迁《史》。雅善鼓琴，每风月清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识者谓其胸次洒落，方之陶靖节、林和靖，无不及焉”^①。其父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因尝读书龙泉山中，学者又称龙山先生，1446—1522），在阳明 10 岁的那一年，即成化十七年（1481），王华登进士第一甲第一名，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华的为人耿介磊落，学问深醇，因得罪于刘瑾而被强令致仕。他退居于乡，虽无富贵荣华，却仍甘之如饴。深知其道德文章者当时传曰：

先生（王华）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与人无众寡大小，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孥，曾无两语。人有片善，称之不容口。有急难来控者，惻然若身陷于沟井，忘己拯救之，虽以此招谤取嫌，亦不恤。然于人有过恶，亦直言规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返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实心无他，则亦无有深之者。先生才识宏达，无所不可，而操持坚的，屹不可动。百务纷沓，应之沛然，未尝见其有难处之事。至临危疑振荡，众多披靡惶恐，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尝以此自表见，故人之知者罕矣。为诗文皆信笔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词达而止。所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诸书，《杂录》、《进讲余抄》等稿，共四十六卷。^②

阳明所生活的这一家庭背景，对其少年与青年时代的品德素质与学术素质的涵养，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而在重视宗法的中国古代社会，其宗族的显赫与家族的荣耀，盖亦容易经其主观认同而对其思想行为产生现实的影响。

① 魏瀚：《竹轩先生传》，《全集》卷三八，1384 页。

② 陆深：《海日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397 页。

按照《年谱》的记载，阳明少时独具心慧，闻祖父诵书，即能默记，但5岁时还不会说话。“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由此可知，阳明5岁前名“云”，至5岁时由其祖父改名为“守仁”。^①而大概在此后不久，阳明的父亲王华因思念山阴山水佳丽，且原为其先祖所居之地，因此又将他的全家从余姚迁到了绍兴，居越城之光相坊。^②

阳明聪慧颖悟，天真独秀，在其祖、父的关爱之下，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化十七年（1481），王华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迎竹轩翁奉养于京师，阳明遂与祖父同行，是年11岁。《年谱》载：

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旁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

① 改名的原因是因阳明5岁不言，而神僧所谓“可惜道破”，盖因“雲”与“云”同音，故改“雲”即能“云”。“守仁”之义，或有取于《论语》“刚毅木讷近仁”，以及“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义。

② 《年谱》未确载王华于何时徙居绍兴。陈来先生据有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阳明11岁（成化十八年，1482）以前“居余姚自无可疑”。“《年谱》又云阳明17岁时自京至江西娶亲，次年冬返乡余姚，再次年阳明祖父死，王华归余姚守丧，这期间王华不可能迁居。至服除弘治癸丑，阳明已22岁。弘治九年丙辰阳明会试不第，‘归余姚结诗社’，时25岁。此后我们就没有材料证明阳明仍居余姚了。而正是丙辰这一年，钱德洪生于王家原居的瑞云楼，何以如此，是否此年王家迁越，无由得知。”又谓：“阳明27岁时其家即已迁至山阴城。”（陈来：《王阳明与阳明洞——王阳明越城活动考》，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555～5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又阳明第十六世孙王诗棠先生云：“到成化十七年（1481），海日公举家徙居越城，我姚江王氏守字辈传人遂始分居余姚、山阴两地。”（王诗棠：《王阳明世系及遗存在绍兴》，见钱明主编：《阳明学新探》，214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今按：《年谱》成化十七年下注明“先生十岁，皆在越”，这似乎表明在成化十七年以前，王华即已徙居山阴，其迁居的时间或当在成化十二年至十七年之间。至于其初居山阴的情况，按照王诗棠先生的推测，“有可能如同余姚住莫姓寿山堂‘瑞云楼’一样，系僦租而居之”（同上书，219页），这一推测应较合理。又：王华虽徙越城，然其兄王荣、其弟王袁仍居余姚，阳明夫人诸氏亦余姚人，因此阳明的青年时代乃多往来于余姚与山阴两地之间。

小月更阔。”^①

这一少年赋诗的事件，不仅可见阳明的才思敏捷，而且其诗境所表达出的那种潇洒意态与高远宏阔的气象，则几乎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其日后的思想学术成就。

阳明的少年时期，大概是既充满灵气而又颇有些顽皮放浪的，既心胸豪迈而又颇有些落拓不羁的。其12岁始就塾师，大概亦不能完全像有些儿童那样循规蹈矩，所以《年谱》称其：“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惟竹轩公知之。”^②同样是在12岁这一年，阳明最早接触到了道教的内容，“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并有了“读书学圣贤”的愿望。对道教养生之术的兴趣，从朦胧的感觉到用心钻研，阳明一直保持到了30岁之前，它在阳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盖有重要的助缘作用。

成化二十二年（1486），阳明15岁，仍居京师。这一年的重要事件是他对北部边关的山川形势及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因此有了经济世务的宏大志向。“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③时畿内有“盗起”，关中亦有流民“作乱”，阳明遂屡次欲上书朝廷以献备御之策，因被王华所斥，乃止。虽然如此，这一事件仍然充分体现了少年阳明的豪迈性格，其“经略四方之志”亦并未因龙山公的呵斥而消泯，其后尝苦心孤诣，研习兵法，则无疑可视为其经略四方、经济世务之志的进一步发展。

大概是在次年，也即是他16岁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对他后来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潜在作用的事情。《年谱》载：

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亦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

①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1页。

③ 同上书，1222页。

乃随世就辞章之学。^①

这一“格竹子”遇疾的事件，阳明晚年仍有清晰的记忆，尝与门人云：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不与诸公知道。^②

由此可知，这一“格竹子”而失败的经验，在阳明的思想当中是留下深刻烙印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少年的阳明并未真切领会朱子格物之说，但这一亲身的经历却毕竟使他对朱子之说产生出隔膜之感，并且在某种意义与程度上标志着阳明对朱熹学说怀疑的开端。

“格竹子”而“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或许正出于这一原因，阳明遂又暂时放下了圣贤之学，而开始转向对道教的兴趣，明显的证据是在17岁那一年（弘治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3页。按：《年谱》将“格竹”事系于阳明21岁，有误。陈来先生云：“我曾提出，《年谱》将格竹事记于弘治壬子（1492）阳明二十一岁时必定有误。盖为《年谱》肯定此事发生于‘侍龙山公于京师’时，但又证明本年壬子阳明‘在越’，两相抵牾，而据海日翁墓铭、行状，庚戌（1490）初，海日翁闻竹轩讣，即日南奔归越，至癸丑（1493）服满，迁右春坊右论德。故1490—1493年阳明正当随父居姚守丧，决不可能在此期间发生京师格竹的事情。”（《王阳明语录佚文与王阳明晚年思想》，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613页）此说甚为精审。陈来先生引《阳明先生遗言录》：“某十五、六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朱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筮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同上）可确证“格竹”之事确应发生在十五六岁时。

② 《传习录下》，《全集》卷三，120页。

元年，1488），他居然因与道士谈养生而耽误了自己的婚礼。是年七月，阳明从山阴往南昌迎娶夫人诸氏，《年谱》载：

外舅诸公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先生就官署委禽（送聘礼）。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养和）遣人追之，次早始还。^①

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阳明即寓居于江西，其间尝苦练书法，因深得其髓，而对“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有初步的体悟。次年十二月，阳明偕夫人诸氏由江西归余姚，途经广信（治在今上饶），拜访了当时的著名学者娄谅，娄谅为讲宋儒格物致知之学，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遂深有契于心，故《年谱》谓“是年先生始慕圣学”^②。或许正因对圣学的向慕，阳明在此后的数年当中，遂转入了刻苦的广泛阅览，白天与诸从弟习举子之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由是而不仅学问大进，且气质亦随之转移，“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谓：“昔者放逸，今知过矣！”^③

弘治五年（1492），阳明 21 岁，举浙江乡试。中举以后，遂仍往京师居住，盖既为侍奉其父王华，亦为准备明年的会试。第二年

① 《传习录下》，《全集》卷三，1222 页。按：阳明的岳父诸让（字养和，号介庵，1439—1495），据《姚江诸氏宗谱》卷二载：“诸让，字养和，号介庵，明成化戊子（1468）科举人，乙未（1475）科进士，历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本司员外郎、本司郎中、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诰授中大夫。配张氏，诰封淑人。子缩、弦、缉、经，长女适新建伯王守仁。……著有《归省录》、《肥遁斋稿》、《留园集》、《济美集》。”（本条资料由余姚诸焕灿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② 同上书，1223 页。娄谅（1422—1491），字克贞，号一斋，上饶人。少有志于圣贤之学，曾师事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1391—1469）。景泰四年（1453）举于乡。天顺（1457—1464）末，选为成都训导。不久告归，闭门著书，成《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等。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当时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江西余干人，1434—1484）颇讥其近于陆象山之学，后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1465—1547）亦以为其近于禅学。见《明史》卷二八三《娄谅本传》。黄宗羲云：“文成（阳明）年十七，亲迎过（广）信，从先生（娄谅）问学，深相契也。则姚江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七册，38 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3 页。

(弘治六年, 1493) 春天, 阳明会试不第。据说当时的宰相、文坛领袖李东阳(字宾之, 号西涯, 湖南茶陵人, 1447—1516) 尝对阳明戏曰: “汝今岁不第, 来科必为状元, 试作来科状元赋。” 阳明下笔立就, 为诸老叹为“天才”, 但亦因此而引起其嫉忌之心, 以为“此子取上第, 目中无我辈矣”, 故三年以后, 即弘治九年(1496), 阳明再次参加会试, “果为忌者所抑”^①。两次会试不第, 虽然阳明当时的表现是非常洒脱的, 尝安慰其他落第者, 以为“世以不得第为耻, 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但若谓对其思想上毫无打击, 恐亦不是事实。他落第以后, 旋即归余姚, 结诗社于龙泉山寺, 纵情于山水清幽, 驰骋于歌诗文辞, 大概亦是他排遣心中郁闷的一种方式。在此期间, 他还与当时的文坛巨子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以及顾璘、乔宇等学为古诗文, 争以才名相驰骋。^② 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弘治十年(1497), 阳明仍寓居京师, “当时边报甚急, 朝廷推举将才, 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 仅得骑射搏击之士, 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 于是留情武事, 凡兵家秘书, 莫不精究”。正是在“边报甚急”的客观形势之下, 阳明开始了对兵法的钻研, 其目的则在养成“韬略统驭之才”, 以安靖边事。而他研究兵法, 却亦并非仅仅停留于阅读, 而是将它转化为一种“实践”: “每遇宾宴, 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③ 尽管列果核布阵只是一种桌面上

① 《年谱一》, 《全集》卷三三, 1223 页。

② 参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 1407 页。按: 李梦阳(字献吉, 号空同子, 河南庆阳人, 1472—1529), 何景明(字仲默, 号大复, 河南信阳人, 1483—1521), 边贡(字庭实, 号华泉, 山东历城人, 1476—1532), 徐祯卿(字昌谷, 苏州人, 1479—1511) 四人, 才名相埒, 主张相近, 当时文坛号为“四杰”。因其倡言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 主张复古, 反对绮靡, 所以在文学史上将他们与康海(字德涵, 号对山, 陕西武功人, 1475—1540), 王九思(字敬夫, 号渼陂, 陕西户县人, 生卒年不详), 王廷相(字子衡, 河南仪封人, 1474—1544) 合称为“前七子”, “四杰”则为其中坚。顾璘(1476—1545), 字华玉, 号东桥, 苏州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第, 授广平知县, 仕至南京刑部尚书。少负才名, 工诗文, 著有《浮湘集》等, 尝与王阳明论学。乔宇, 字希大, 号白岩, 山西乐平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 授礼部主事, 嘉靖初官吏部尚书, 后因议大礼不合, 去位。为人好山水, 与李东阳等游, 诗文隽拔, 工书法。卒于隆庆(1567—1572)间。《明史》卷一九四有传。

③ 均见《年谱一》, 《全集》卷三三, 1224 页。

的“游戏”，但却为其日后军事功绩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弘治九年第二次会试落第到弘治十二年前后，实际上是阳明一生中所学最博而又思想最为彷徨的时期。在这前后四五年当中，他驰骋于文章，究心于兵法，出入于老释，思想往往游移于儒释道之间，其所事益博，却究竟未有抵止之所。虽欲用世以经略四方，但因遭忌而进士不第却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虽泛滥于辞章而文艺益精，却又自觉文辞毕竟不能通达于至道；虽欲为晦翁之说以成就圣人，但先前“格物”的教训却记忆犹新。他曾怀疑少年时“格竹子”之所以失败，或许是由于未遵照朱熹循序渐进的教导，于是又循序以进，再次将格物付诸实践，但结果却总是觉得“物理”与“吾心”不能合一，无法达到朱熹所说的那种事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浑然交融境地。因此郁郁不乐，而又旧疾发作。正因有此种生活中与思想上的挫折，在弘治十一年（1498），阳明心中原先所保持的对道教的兴趣遂再次转浓，并开始对道教养生之术进行实践，以至有“遗世入山之意”。《年谱》云：

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浹洽，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①

按照这一叙述，阳明再次转入道教并有“遗世入山之意”，与他对朱熹格物致知之说进行再次实践而又遭到失败并致“旧疾复作”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我们同样可知，无论是从事于朱熹之学还是为道教之术，阳明的目的均在于“通至道”以成圣人，而他思想上的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4页。

一切苦闷与彷徨，其根源亦均在于未能找到一条真正能通达于至道的途径。

弘治十二年（1499）春，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进士及第，朝廷命观政工部。同年秋天，他奉命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①这一原本为无足轻重的公务，却成了阳明对其军事知识进行演练的机会：“驱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②他是以军事管理的方法来完成这一民事工程的。驱役夫以军士之法，演列八阵之图，与原先的“聚果核列阵势”相比，无疑要更为生动真切，因此它实际上是阳明对其“韬略统驭之才”的一次演练，是其少年时代即深植于心灵的“经略四方之志”的进一步显扬，故“识者已知其有远志”^③。时有“彗星之变”，又有“虏寇猖獗”，朝廷“命将出师”，边务再急，阳明遂上疏条陈边务，表达了他对时务的关切，亦进一步表达了他的“远志”。

按照阳明的观点，边事紧急，外患日滋，其根源却在于内政不修，权臣为奸，故边陲之患，正为天心仁爱的表现，是改弦更张而还归政治清明的契机。其论云：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日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轍改辙之机也。

其陈言边疆“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以为当力行八事：

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

① 王越（1425—1497），字世昌，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因西部军功，成化十六年（1480）封威宁伯，世袭1200石。《明史》卷一七一有传。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4～1225页。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07页。

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①

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朝廷采纳了阳明的这些主张，但《陈言边务疏》却体现了阳明对当时政治的基本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他对自己研习兵法之心得的集中表达，其中的基本思想是为其本人未来的军事活动所实践的。

弘治十三年（1500）六月，阳明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次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各地巡按、御史审决重囚，平反了不少冤狱。^②在此期间，阳明公务繁剧，又兼深夜苦读，积劳成疾，因得咳血之病。黄绾状云：

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审囚，多所平反，复命。日事案牒，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③

按照阳明的自述，其患虚咳之疾乃在弘治十四年三月，亦即在被差往直隶、淮安审决重囚之前，当时剂灸交攻，至入秋稍愈，后“竟废医言，捐弃药餌；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内耗外侵，旧患仍作”^④。是知审囚江北，原是带病之躯，案牒繁冗，则旧疾转深。这一身体上的疾患，实为导致阳明当时在思想上发生再次转折的直接原因。正由于咳嗽之疾转趋深入，竟成咳血，因此在弘治十五年八月，阳明上疏朝廷，请求归家乡养病，得到朝廷的允许。在归山阴的途中，他游览了楚地以及九华山等名胜，作《九华山赋》，宿无相、化城诸寺，访仙

① 均见《陈言边务疏》，《全集》卷九，285～286页。

② 这里的时间据阳明《乞养病疏》，《全集》卷九，290～291页。《年谱一》谓“先生录囚多所平反”。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07～1408页。

④ 《乞养病疏》，《全集》卷九，291页。按：阳明作品中多次提到“旧疾”，这一“虚咳”乃至咳血的病症，实伴随他的一生。虽谓弘治十四年三月患病，但其病根我很怀疑实际上在“格竹子”时即已种下了。

寻道，探赜佛源，颇有些出世的遐思，谓：“逝予将遗世而独立，采石芝于层霄；虽长处于穷僻，乃永离乎嚣器。”“吾其鞭风霆而骑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抟鹏翼于北溟，钓三山之巨鳌。”“长遨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①此虽为“游仙”的传统主题，未可究实，但亦仍可视作为当时阳明思想的真实反映，因为他归山阴以后，旋即筑室于阳明洞，行导引之术，并且达到了精深的造诣。《年谱》云：

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②

这同一事件，黄绾记云：

养病归越，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其友王思舆等四人欲访公，方出五云门，即命仆要于路，历语其故，四人惊，以为神。^③

从这些记载来看，阳明因“呕血之疾”而归越，因养病而筑室于阳明洞中，“究极仙经秘旨”，“为长生久视之道”，对道教养生之术身体力行，并且达到了相当精湛的地步，无疑应为事实。但这一养生术的成就却反而使阳明再次陷于思想的矛盾之中。根据《年谱》的叙述，这一事件应该发生在弘治十五年八月至十六年之间。在行导

① 均见《九华山赋》，《全集》卷一九，659页。按：《年谱》系阳明游九华于弘治十四年下；然《全集》卷一九有《归越诗三十五首》，注明“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越并楚游作”，无相、化城诸寺之作均收入其中；又同卷《九华山赋》亦注明“壬戌”，因此我们认为他游九华山应在归越养病的途中，《年谱》或许是误记了一年。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5~1226页。按：“筑室阳明洞中”一事，在阳明的生平事迹中是一重要事件，亦是其号“阳明子”的原因，但后世因无法在会稽山找到一个可以容人居住的岩室而产生了种种怀疑，或以为“阳明洞”不在绍兴而在余姚；清初萧山毛奇龄则诋“讲学阳明洞”为“妄极”。陈来先生对此曾有详细考证，证明“阳明洞”在绍兴无疑，而所谓“洞”，非必洞穴之谓，而实为“洞天”之省文。其说详审精当。又据陈先生说，“五云门”即绍兴府城之正东门。参见陈来：《王阳明与阳明洞——王阳明越城活动考》，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545~559页。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08页。据此，则所谓“阳明书院”，即阳明在会稽山中的结庐之所。

引而“能预知”之后不久，阳明即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但对道教养生之术进行实践的成就，又使他不能立即弃去，故又屏居，“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由此我们亦就可以知道，阳明当时的确曾有出世的念头，只是思亲之念却又使他“因循未决”，其主观上是处于矛盾之中的。“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按：弘治十六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①

因此，弘治十六年（1503）在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年中，他对道教的实践达到了顶峰，但亦正因此故而“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终于完成了舍弃仙释而“复思用世”的思想转变。钱德洪尝云：

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垒，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②

在杭州期间，阳明尝往来于湖山诸刹之间，有一逸事：

（阳明）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话。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③

从这一逸事，我们同样可以反观出两点：第一，阳明对佛教，尤其是禅学盖亦有精深造诣，其对僧呼喝，正体现为禅家的典型风格，且话语也深含禅机；第二，他此时之心，盖已无滞于老释，而重新回归到了为世所以经略四方的心态。

① 均见《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6页。

②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全集》卷三七，1357页。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6页。

因此当弘治十七年（1504）秋天，他病愈起复并应山东监察御史陆偁的聘请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时，其策问当朝礼乐之制，即以“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为论。^①考毕，成《山东乡试录》，阳明为之序，“人占先生经世之学”。^②同年九月，阳明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 34 岁，这一年是其思想发展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一年，其主要事件则有二：一是“门人始进”，他开始授徒讲学，倡导身心之学；二是与湛若水定交^③，共以发明圣学为期。《年谱》载：

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贄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详见《山东乡试录·策五道》第二，《全集》卷二二，860 页。《山东通志》卷二十七：“陆偁，浙江鄞人。弘治时巡按监察御史，严正不阿，决释疑狱，尝革济宁漕闸夫役冒滥者计万人。岁大比，厘剔科场弊窦，设立条约，洪纤毕举。聘王守仁主试，名士毕收。东人称科举之盛，必推弘治甲子（十七年）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按《山东乡试录》，《年谱》谓“试录皆出先生手笔”，然详其内容，则或为士子优秀答卷的编集，其试题及策问则当出于阳明之手。《全集》“编者注”谓“非皆阳明之作”，或得之。但《试录》是否为阳明作品，似仍可存疑。或以《试录》为代表了阳明“悟仙释之非”以后关于传统儒学的基本认识，则仍然合理。钟彩钧先生以《试录》为阳明之作，认为“代表阳明在龙场之悟前对儒学的认识和造诣”，并对此进行了论述。参见钟彩钧：《王阳明思想之进展》，13~18 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③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弘治五年（1492）乡试中举，师事当时大儒陈献章（字公甫，号白沙，广东新会人，1428—1500）。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第二名，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亦正是阳明之所以能够与湛若水相识的机缘。《明史》卷二八三若水本传：“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若水尝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致仕后仍四处讲学不辍，凡所至，必建书院。然其后论学，则又与阳明不尽相同。《明史》本传：“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学者于此说宜更思量。阳明对若水之学的态度，后文当及之。

共以倡明圣学为事。^①

阳明究竟于何时“归正于圣学”，在阳明学的研究之中似乎是一个需要涉及的问题。《年谱》的以上记载并不十分明确，学术界则似乎多以他与甘泉的定交为归正圣学的标志。^②但基于本文的以上叙述，我们认为，阳明其实在弘治十六年便即已经“归正于圣学”了，他当时的心态，便即已经超离于他原先曾十分倾心的佛道二教之说，而转趋于儒学的基本立场了。因此在遇甘泉之前，他即已经开始倡导“身心之学”，教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但与甘泉的际遇却仍然是重要的，他为自己找到了思想上的同调而欣喜，并亦因此而进一步坚定了其必为圣人之志。阳明后来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曾有深刻的批评性反思，对与甘泉的定交则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

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余，求诸孔子、子思、孟轲之言，而恍若有见，其非守仁之能也。^③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④

显而易见的是，阳明与甘泉的定交，实际上并不是阳明“归正于圣学”的原因或起点，而是他坚定其圣学志向的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支持性力量。正因有甘泉的精神支持，阳明对其圣学之志才益为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6页。按：根据湛若水的记载，阳明与他的定交是在正德元年（1505），尝曰：“斯道丧而友义之废也久矣！自予抱此志以求于天下，天下非无爱予者，而独寡予助者也。正德丙寅，始得吾阳明王子者于京师，因以得曰仁徐子者。”（湛若水：《赠别应元忠吉士叙》，《甘泉先生文集内篇》卷六，嘉靖十五年刻本）可见王、湛之相遇，实两心相悦，而互有激励促发之功。

② 如秦家懿云：“他归正圣学，实定于弘治十八年或正德元年（1506），与湛若水初遇之时。”（秦家懿著：《王阳明》，4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而此说最早的首倡者，则为甘泉本人，详下页引甘泉之语。

③ 《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全集》卷七，233页。该序作于正德七年（1512）。

④ 《别湛甘泉序》，《全集》卷七，231页。该序作于正德七年（1512）。

坚定，才显得“毅然若不可遏”，沛然而莫之可御。自少年志学，继以泛观博览，中经回波折旋，终于止心圣学，乃体现了阳明对于生命的本质存在及其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其最终的止心圣学，则表明他终究在精神的深处为自己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亦就代表了阳明第一期思想发展的结束。他自此归心圣学，志意坚定，虽万苦千辛，不复稍有移易。

这里事实上还涉及一个对阳明“归正于圣学”之前的全部思想经历与生活经历的评价问题。在阳明的自我反思之中，20年的泛观博学被视为“陷溺于邪僻”，而其最终的归正于圣学则无异于思想生命的新生。在阳明的自我批评之中，我们的确可以体会到那种在经历了山重水复的艰难曲折以后终于找到真理之光明的心灵喜悦。但或许正因有阳明这一否定性的自我评价在前，人们关于他34岁以前的思想与学术的一般评价，遂亦多有否定之义。其典型之论，则为湛若水的“五溺”之说：

（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元年，1506），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①

甘泉关于阳明“归正于圣贤之学”以前的“五溺”之说，今亦往往被研究者所援引，用以说明其思想过程的艰难。但在甘泉的叙述之中，显然包含着对阳明过去之所“习”的否定性批评，将它们在价值观上与归正于圣学之后的情况相对立，并因此而十分突出了他归正于圣学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如果以“五溺”来否定阳明34岁以前的思想经历在其未来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与价值，却显然是误入歧

^①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全集》卷三八，1401页。

途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归正于圣学固然为阳明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点，它标志着阳明思想境界的转换，是对其过去全部思想经验的超越。但此同时，超越却并不意味着全然抛弃，而是基于批评性反思的重新诠释与意义整合而达到的一种新的思想境域，其泛观博览及以此为基础的全部思想成果，仍然为其未来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其一切生活实践与知识才能的广泛积累，则为其未来生活世界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其 34 岁以前思想经验上的曲折回旋，才使阳明在归正圣学以后能够独运孤明而坚信本心的真理，从而支撑起其广袤的思想世界；亦正是其 34 岁以前多方面才能的切实历练，才使其本心的表达能够挥洒自如，从而支撑起其宏大的生活世界。

投荒万里 龙场悟心

(正德元年至正德四年, 1506—1509)

正德元年(1506), 阳明 35 岁。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既是阳明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亦是其思想发生实质性飞跃的开端。是年冬, 因上书议论时政, 得罪用事太监刘瑾, 他被贬谪到了贵州龙场驿。其事情的原委大抵如此:

弘治十八年五月, 孝宗朱祐樞崩, 其长子朱厚照继皇帝位, 是为武宗。厚照性好畋猎骑射, 亲政之初, 宠信中官, 至太监刘瑾^①用事, 朝政日渐荒芜。刘瑾尝侍厚照于东宫, 及厚照继位为皇帝, 使刘瑾掌钟鼓司, 太监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皆以旧恩得宠, 当时号为“八虎”(又称“八党”), “而瑾尤狡狠, 尝慕王振之为, 日进鹰犬、歌舞、角牴之戏, 导帝微行, 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进内官监, 总督团营。”刘瑾专权, 遂结党营私, 排斥正直大臣, 搜括各地方财物, “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 又侵夺民间土地, 置“皇庄”达 300 余处, “畿内大扰”。^②

① 刘瑾(1451—1510), 本姓谈氏, 依宦官刘姓者以进, 遂冒其姓, 陕西兴平人。为人阴险, 贪婪成性。《明史》卷二〇四有传。

② 参《明史》卷二〇四刘瑾传。刘瑾擅权, 方其气焰炽盛之时, 虽正人亦往往慑于淫威。何良俊尝记一事: “刘瑾擅国日, 邵二泉(名宝, 无锡人, 1460—1527)先生与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见, 此人偶失刘瑾意, 瑾大怒, 以手将桌子震地一拍, 二泉不觉蹲倒, 遗溺于地。二泉甫出, 而苏州汤煎胶继至, 瑾与汤最厚, 常以兄呼之。瑾下堂执汤手而入, 因指地下湿处语汤曰: ‘此是你无锡邵宝撒的尿。’……人言瑾元无反谋, 只此一事, 虽族灭亦岂为过!”(《四友斋丛说》卷一五, 124 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只此一事, 便可见刘瑾淫威之盛, 虽端正如邵宝者, 亦不免被其威势所慑。刘瑾之气焰熏天, 正恐朝中耿直大臣太少, 而逢迎者太多有以致之。良俊又记云: “刘瑾虽擅权, 然不甚识文义, 中外奏疏处分, 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 本至阁下, 必先与商量, 问此事当云何, 彼事当云何, 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重大者, 令堂候官至河下问之, 然后下笔。故瑾益恣肆。若当时人人据理执正, 牢不可夺, 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同上书, 卷八, 67 页)

这种政治局面，引起了当朝正直大臣的极大忧虑，于是以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为首^①，交章极谏，列论刘瑾等罪状，要求清除“八虎”。章疏数上，帝不能从，刘健与武宗当廷面争，谓若不诛“八虎”，则卸官归田。武宗非但不从，反因此大怒，立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阉党势力由是大炽。朝中之事既已有不可为之势，刘健、谢迁遂皆去职归田。时为正德元年十月。

这一朝中变故，再致舆论大哗，然代表正义力量的斗争亦由是转趋激烈。在刘健等上疏并与武宗发生面争的同时，南京御史陆昆亦会同各道御史薄彦徽等14人联名上疏^②，极论朝政之非，要求罢去宴游，励精图治。其言曰：

陛下嗣位以来，天下颀然望治，乃未几，宠幸奄寺，颠覆典刑，太监马永成、魏彬、刘瑾、傅兴、罗祥、谷大用辈，共为蒙蔽，日事宴游，上干天和，灾寝叠告，廷臣屡谏，未蒙省纳。……陛下广殿细旃，岂知小民穷檐蔀屋风雨之不庇？锦衣

① 刘健（1433—1526），字希贤，洛阳人。师事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1392—1464），举天顺四年（1460）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弘治初，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四年，进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弘治十一年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为首辅。刘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孝宗去世，以刘健为顾命大臣。武宗正德初，数上疏对武宗切谏，皆不纳。因刘瑾等“八党”用事，残害忠良，“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刘）健及（谢）迁、（李）东阳持其章甚力”，致当廷以去就力争，然武宗不听，仍信用刘瑾等。于是刘健去位。既归，武宗复以刘健等53人为“奸党”，列刘健为首，榜示朝廷，将刘健削籍为民，追夺诰命。刘健既归田，“独教人治经穷理，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卒年九十四。详见《明史》卷一八一本传。

谢迁（1449—1531），字于乔，余姚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纂。弘治八年诏同李东阳入内阁，参预机务。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迁仪观俊伟，秉节直亮，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时人为之语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正德初，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数谏，武宗弗听，遂求去甚力。及请诛刘瑾，武宗怒，遂与刘健同致仕归田。详见《明史》卷一八一本传。

② 陆昆，字如玉，浙江湖州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清丰知县，以廉能擢南京御史。正德初，上疏陈“风纪八事”，对武宗进谏。及刘健、谢迁被逐，陆昆等上疏论救，下诏狱。卒于世宗嘉靖初年。详见《明史》卷一八八本传。薄彦徽，山西阳曲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时为四川道御史。《明史》卷一八八《陆昆传》附。

玉食，岂知小民祁寒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额赴诉之无路？昨日雷震郊坛，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价腾贵，京城盗贼横行；可恣情纵欲，不一顾念乎？^①

疏上，朝事已变，刘健、谢迁皆已被逐，于是薄彦徽又为首，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②，再次上疏极谏，请留刘健、谢迁，而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陆昆、薄彦徽、戴铣等，皆下诏狱，各杖三十，削籍为民。戴铣则被杖死狱中。

戴铣、薄彦徽等既逮系诏狱，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又挺身而出，抗疏力为挽救，其言曰：

臣迹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谏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戒，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③

疏上，刘瑾复大怒，遂逮阳明而系于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又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时为正德元年冬十二月。^④

阳明既被系狱中，虽身受摧残，然志不可折；惟风雨如晦，国是日非，则为夜不能寐。他感受到时局的黑暗而期盼着白日的光明：

① 《明史》卷一八八《陆昆传》。

② 戴铣（？—1606），字宝之，江西婺源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数有建白，以便养调南京户科。正德初，因上疏救刘健、谢迁，下诏狱，被杖死。详见《明史》卷一八八本传。

③ 《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全集》卷九，291～292页。

④ 按王阳明下狱及谪龙场的时间，《年谱》作“正德元年二月”，《明史》本传作“正德元年冬”，《明史纪事本末》作“正德元年十二月”，《全集》卷一九有《狱中诗十四首》，注：“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锦衣狱作”，当以十二月为正；《年谱》恐夺“十”字。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岂无白日？寤寐永叹！”“心之忧矣，匪家匪室。或其启矣，殒予匪恤！”^① 像当年周文王囚于羑里而演《周易》一样，阳明被执于锦衣狱，亦沉浸于《周易》的演习之中，非为占自己命运的吉凶，而是将它作为表明心志的手段。既心地光明，俯仰天地而无愧，则虽处身于幽暗的囚室之中，却自觉和风浩荡，胸次洒落。“居囚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遯》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非矫。”^② 幽拘的囚牢，因此亦就成了他心志的炼狱。

出狱以后^③，阳明被谪贵州龙场，遂赴谪所。但刘瑾并不就此罢休，派人尾随阳明之后，侦其行藏，意欲伺机加害。正德二年夏，阳明行至杭州，因发现有人追杀，遂假托投钱塘江死，并作《绝命诗》二首：

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许国惭无补，死不忘亲恨不余；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

敢将世道一身担，显被生刑万死甘。满腹文章宁有用？百年臣子独无惭。涓流裨海今真见，片雪填沟旧齿淡。昔代衣冠谁上品？状元门第好奇男。^④

他是否真的投了钱塘江，史料的记载是有龃龉的。按照《年谱》的记载，阳明似乎只是“托言”投江，而实际上却搭乘了一艘商船，遂至舟山；又遇飓风，竟飘至福建上岸。阳明因有就此遁去之意，又念有亲在，恐刘瑾加害，遂又从福建返回，中途曾往南京探望其

① 《有室七章》之四、之五，《全集》卷一九，674页。

② 《读易》，《全集》卷一九，675页。按《遯》之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③ 阳明被拘锦衣狱多长时间，史无明载；他于正德元年十二月下狱盖无疑问，《年谱》谓二年夏赴谪至钱塘，则此时必已出狱无疑，然则其拘于诏狱，当有半年左右。详其事件的顺序，当是先上疏，后下狱，再受廷杖四十（或说五十），最后被谪龙场。

④ 原载《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引自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诗文汇编及考释》，见《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27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标点略有不同。其可靠性可参钱明的“考释”。

父王华。十二月再至杭州。《年谱》云：

先生至钱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比登岸，奔山径数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纳。趋野庙，倚香案卧，盖虎穴也。夜半，虎绕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毙于虎，将收其囊；见先生方熟睡，呼始醒，惊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无恙乎？”邀至寺。寺有异人，尝识于铁柱官，约二十年相见海上，至是出诗，有“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之句。与论出处，且将远遁。其人曰：“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因为著，得《明夷》，遂决策返。……因取间道，由武夷而归。时龙山公官南京吏部尚书，从鄱阳往省。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①

这件事颇有些传奇的色彩，因此在当时就有了不同的传本。阳明弟子季本云：

正德丁卯，先生以言事谪官龙场，病于杭之胜果寺。云有二青衣者至，欲擒之沉于江，漂于海，海神曰：“吴君高者，敕之！”得生，于是入建阳，游武夷，历广信，而复归于杭。往来数千里之间，距其初行，才七日耳。所至之地，必有题咏；所遇之人，必有唱酬。篇章累积，不可胜纪。……呜呼！游海之事，茫昧幽渺，世所罕有，岂先生忘义之气有所感欤？不然，或其有为而自托焉，未知也。^②

据此记载，则所谓“投江漂海”不过为梦中之事，阳明本人实际上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7～1228页。

② 季本：《跋阳明先生〈游海诗〉后》，《季彭山先生文集》（稿本）卷四，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按：季本（1484—1563），字明德，号彭山，绍兴人，嘉靖初登进士第，以论“大礼”不合，谪为广东揭阳县主簿，起为江西弋阳县令。师事王阳明。《浙江通志》卷一七六：“既受学，精思力践，毅然以圣贤为可学而至，常兢兢磨练于事为朋友之间。患学者以自然为宗，忘其所有事，习于惰偷而自便也，曰：‘心之本体原是戒慎恐惧。天命靡宁，主宰尝惺，犹之龙也。矩则常定，潜见飞跃，随所遇而时应，是以警惕，主变化也。彼以自然为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于虚而卒流于物欲者矣。’文成存时，与书言：‘看经书取其有益于学，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特见妙诣，一时无不开发之益，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有反为之障而不自觉者。’后学成，欧文庄（欧阳德）亦以习心流注箴之。盖师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则“病于杭之胜果寺”。但既然如此，他为何又要“入建阳，游武夷，历广信，而复归于杭”呢？还是这些亦是梦中之事呢？季本却未给予明说。从时间上来说，以七日夜而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自不可信，更兼杂有神异之说，无怪乎季本以为“游海之事，茫昧幽渺，世所罕有”，而以为或阳明因“有为而自托焉”。但若据《年谱》记述，则自“投江”至重返杭州，其间有近半年的时间，除去确乎为“茫昧幽渺”的神异之事，游海而至福建，并非必不可能之事。

但黄绾的记载则又与此不同，《阳明先生行状》云：

……戴铣等下狱，公（阳明）上疏乞宥之。瑾怒，矫诏廷杖五十，毙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瑾怒未释。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纳。行半里许，见一古庙，遂据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视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无恙？”因诘公出处，公乃吐实。道士曰：“如公所志，将来必有赤族之祸。”公问：“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迹，将来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寻究汝家，岂不至赤族之祸？”公然其言。……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龙场。^①

《阳明先生行状》的记述与《年谱》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未记其泛海之事；二是未言其由武夷重返杭州，而是从武夷直接往龙场了。或许黄绾亦以游海之事为“茫昧幽渺”，故为隐而不书。然详诸家所述，盖阳明投钱塘江以摆脱刘瑾的追杀，遇商船而获救，又因风而至福建，登岸后有从此遁迹之意，因亲之念而又从福建返回杭州，或许是更为可信的。不管如何，他的《泛海》一诗，却确乎为其当时真实心态的写照：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②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08页。

② 《泛海》，《全集》卷一九，684页。

正德三年（1508）的春天，阳明终于到达贵州龙场。龙场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境^①，位于贵阳市西北约四十公里处，平均海拔高度在1300米左右，重峦叠嶂，峰岭连绵，其气候属北亚热带和南温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湿度较大。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龙场已是边荒极僻之地，当地居民以苗族为主，语言不通，故《年谱》云：“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魎，蛊毒瘴疠，与居夷人𠮟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②其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当时都是非常恶劣的。阳明初到此地，因无处居住，尝结草庵居之^③，后得一岩穴，名曰“东洞”，遂移居“东洞”，并将其改名为“阳明小洞天”^④。正因气候不适，水土不服，又生资极度短缺，阳明的随从人员遂尽皆患病，阳明乃“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⑤。此既可见当时生存环境之恶劣，亦可见阳明性格之乐观。一段时间以后，他与当地的苗族人民逐渐相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苗民“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⑥。而当地人民以为阳明居于“东洞”过于潮湿，遂伐木山中，为他构筑了数间房屋，既为安居之所，亦为讲学之处，于是就有了“龙冈书院”、“宾阳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建筑。^⑦而此同时，因粮食匮乏，阳明亦向当地人民学习刀耕火种之法，躬事于田野，以解决基本的生存

① 龙场驿，“属贵州宣慰司，洪武间置。在今贵州修文县城内”（杨正泰：《明代驿站考》，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8页。

③ 《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全集》卷一九，694页）。

④ 王阳明：《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全集》卷一九，695页。

⑤⑥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8页。

⑦ 阳明《龙冈新构》诗序曰：“诸夷以吾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全集》卷一九，697页）《全集》卷二三有《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玩易窝记》等文，皆记其事。《何陋轩记》云：“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全集》卷一九，891页）

问题。^①

当阳明与当地苗族人民相处融洽之际，思州太守却派人至龙场^②，挟势擅威，对阳明肆意侮辱，此事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义愤，遂与来使发生冲突，“共毆辱之”。思州太守怒，言于当道，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字应奎）遂致书阳明，要求他向太守行跪拜之礼，予以道歉，言下颇有以祸福相威胁之意。阳明则以义自守，严词予以拒绝：

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凡祸福利害之说，某亦尝讲之。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③

书既达，毛科惭服。不久，水西宣慰使安氏^④，使人送来米肉，又重以金帛鞍马，阳明皆辞不受，唯纳米二石及柴炭鸡鹅而已。同时致书安氏曰：

某得罪朝廷而来，惟窜伏阴厓幽谷之中以御魍魉，则其所宜。故虽数闻使君之高谊，经旬月而不敢见，若甚简伉者。然省愆内讼，痛自削责，不敢比数于冠裳，则亦逐臣之礼也。使君不以为过，使廩人馈粟，庖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亦宁不贵使君之义而谅其为情乎！自惟罪人何以辱守土之大夫，惧

① 阳明有《滴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等诗：“山荒聊可田，钱镛还易办。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田。”（《全集》卷一九，695页）

② 思州，唐贞观四年（630）置；明永乐十一年（1413）改为府，治在今贵州岑巩县。

③ 《答毛宪副》，《全集》卷二一，801～802页。按：毛科与阳明同乡，此后与阳明亦有交谊，阳明尝为其作《远俗亭记》，见《全集》卷二三，892～893页；其致仕归桐江书院，阳明为作《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见《全集》卷二二，872～873页。

④ 水西，土司名。明代贵州宣慰司（治在今贵阳市）由安氏世袭宣慰使，辖水西；由宋氏世袭宣慰同知，辖水东；水东、水西之分，大抵以鸭池河为界。安氏辖境约当今贵州省境西北部息烽、修文以西，普定以北，水城以东，大方以南地区，因大部分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通称水西宣慰。参见《辞海》“水西”条。

不敢当，辄以礼辞。使君复不以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马，礼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当矣！使者坚不可却，求其说而不得，无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使君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伏惟使君处人以礼，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则可矣。^①

思州太守的凌辱，固为滥作威福，无礼之极，人情或不能以堪，而阳明受之若素；宪副毛科的威胁，固盛气凌人，挟势以威，揆之常情，或当登门以射，息事宁人，而阳明责以大义，不为威武所屈，终折其心；水西宣慰的馈赠，固礼隆情切，当窜逐困顿之际，人情或以为相知而心存感激，而阳明坚辞不纳金帛，以义自守。从这些事情当中，我们遂可以体会到阳明那一片如光风霁月般的心怀，坦平如砥，浩浩无涯，虽身受颠蹶困厄而不殒越其志，虽处身患难贫贱而不怨天尤人，虽威武而不能折其气，虽利益而不能汨其心，自处以廉，自持以义；自养其心，自得其天乐，而亦自不失其本于襟怀坦荡的仪态之潇洒。

或许正是这种无私的潇洒，使阳明不仅能以义自持，而且亦能以义责人。盖在水西宣慰使安氏馈赠不久，安氏意欲废除水西驿传，与阳明商略，阳明乃晓以大义，其议遂罢。^②稍后，水东宣慰同知宋氏门下有阿贾、阿札等叛宋氏，自立山头，为地方之患，有司尝令安氏率军剿平，而安氏以为“宋氏之难当使宋氏自平，安氏何与而反为之役？”终不出兵。阳明又致书安氏，谕以利害，责以大义，“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难，民赖以宁”^③。

阳明被谪龙场，面对异常简陋的生存条件与艰苦的生存环境，

① 《与安宣慰》（第一书），《全集》卷二一，802页。

② 参见《与安宣慰》（第二书），《全集》卷二一，803页。

③ 《与安宣慰》（第三书），《全集》卷二一，804～805页；《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9页。

尤其是初来此地，人地陌生，言语不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以至于岩居穴处，采蕨采薪，取水作糜，不得不应对恶劣的环境对生存本身的严峻挑战。他的意绪或许是不平的，但他的心胸却仍然是坦荡的。刘瑾仍弄权于朝，忠良被逐，国势日见其衰微，犹颍阳之不可挽回。^① 只身投荒万里，日与蛊毒瘴疠为伍，又从者皆病，而道路或有客死之人^②，他无法不感受到生存本身在经受着严重威胁；世事之纷华，人间之宠辱，在生存凸现为生活之主旋律的情境当中自可淡然隐去，不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但“生死一念”却毕竟未可爽然便即超脱。阳明既“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壕，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③ 既打破生死之关，他不再感受到万里投荒的凄清孤寂，山鹿野豚，绿竹清泉，峦黛云白，风疏月朗，原是人的生命的自然之镜，不宁唯是，它们本质上便即是人的自我生命的对象化表呈。阳明在野处的自然当中，在天真素朴的自然生命当中，确乎感悟到了人与天地万物共为一体的那种生命浑然之境：“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④；“山泉足游憩，鹿麋能友予”^⑤；“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缨”^⑥；“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岵；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⑦；“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起来步闲谣，晚酌簷下设”^⑧。他将自己投身于农事的劳作，并在这种简单的劳作之中用心体悟生命自然的天真之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穡。”^⑨ “锄荒既开径，拓樊

① 王阳明《采蕨》诗云：“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浮云塞长空，颍阳不可回。”（《全集》卷一九，696页）

② 参见《瘞旅文》，《全集》卷二五，951页。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8页。

④ 《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全集》卷一九，694页。

⑤ 《赠黄太守澍》，《全集》卷一九，701页。

⑥ 《溪水》，《全集》卷一九，697页。

⑦ 《诸生来》，《全集》卷一九，697页。

⑧ 《西园》，《全集》卷一九，698页。

⑨ 《观稼》，《全集》卷一九，695~696页。

亦理园。低簷避松偃，疏土行竹根。……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① 正为对“吾道”的执著与孜孜不倦的寻求，他亦在始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若是圣人处于与他同样的境地，圣人该当如何？这一思考，实质上是心灵的自我反思，而在这种反思状态中，心灵是毫无隐蔽地将它自己完全敞开的，“胸中洒洒”的境界，亦即是心灵因这种完全无隐的开放而呈现其自体澄明的境界，“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自我反思，则实质上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之中自觉地切入了一种圣人心态，他要求自己按照这种圣人的心态去观照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所处的世界，并亦由此而实现了其心灵境界的跨越式转换。正是这一心灵境界的转换，遂终于导致其思想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性发展。《年谱》云：

（阳明）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②

“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便即为后人所说的“龙场悟道”。其感悟的实质内容则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此不应当从外在的事物当中去寻求“理”的实在，“理”的实在性原只在于“吾性”本身的灵明。就阳明的“龙场悟道”而言，其实质乃是对自我之心与宇宙之道的本质同一性的确认，是对自我之心作为天下事理之本原的确认。它不仅标志着其主体意识的最终醒觉，而且亦标志着其存在实性的终极澄明。在“吾性”被确认为世界现象之本体的前提下，“圣人之道”与“事物之理”便不再具有任何“外在”的意义，而仅仅是心灵本体的自身内容，因此唯“吾性”本身才标志了“吾”本身以及“事物之理”的终极实在。这一对于心灵自体的本质实在性的感悟，一方面，是阳明处身于逆境当中并且在生存本身受到严重威

① 《龙冈新构》二，《全集》卷一九，697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8页。

胁的境况之下对生命本质及其意义的不懈追寻所达到的一种自然结果，其中圣人心态的自觉切入无疑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但此同时，亦是他长久以来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不断思考的一种思想成果，他终于根据自己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真实状态而转向了对于朱熹学说的否定。因此阳明的“龙场悟道”，既是他在思想上真正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的开端，亦是他本人形成并建构其心学体系的开端，它在阳明思想的整体发展过程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龙场悟道”的完成，乃是阳明心灵境界的一次飞跃。这种精神状态的突破性转换，导致了生活世界所呈现的原来意义在他那里的根本改观。虽然自然的生存环境仍然恶劣，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再呈现为“陋”，反而呈现为朴茂天真的生命本然状态，因为对道的独特体悟使他心与圣人相接，从而能够安然独享心与理契的超然之趣，在浑朴天成的自然当中悠然体悟被置于圣人心态观照之下的生命天成之乐：“好鸟忽双下，脩鱼亦群游；坐久尘虑息，澹然与道谋。”^①源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体悟，他不再以自己的心去凑泊表象上所呈现的事物之理，而是将事物之理归原于心灵本体的实在性本身，从而将他的生活世界统摄于心体的管领之下。正因“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圣人的一切话言原亦只是讲说“吾性”中的本具之理。基于这一思考，他开始按照他自己的领悟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读，直抒他胸中之意，藉以验证他独特心悟的正确性，结果觉得言论虽不必尽合于先贤，却无不尽合于圣人之义，这使他感到无限欣悦！他由此而进一步认为，《五经》所记载的圣人话言，它们本身实质上并不具有权威性，而仅仅是导向个体心灵的开明以洞达于圣人之道的工具而已；若是心与道契，则吾心便即是圣人之心，圣人的话言便是可以被当作糟粕而抛弃的。他这样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

^① 《水滨洞》，《全集》卷一九，698页。

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①

这一观点的抒发，显然标志着阳明已经开始对传统儒学的义理诠释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并由此开始脱离朱熹以来认为有一总相的理，而每事每物又都各有一理的“格物致知”之说的传统轨道。他对自己的心得深信不疑，并开始在“龙冈书院”向来学的诸生宣讲他在患难中所体验得到的新思想。“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②虽然仍处于患难，仍居于“夷狄”，但他的心却已经摆脱了“陋”的俗情的缠绕，而畅游于圣人的精神世界了。

对“格物致知”的感悟，实质是对心为宇宙事相之本原的感悟；心既为宇宙的本原，那么如何实现这一本原的澄明并藉此而优入圣域便成为问题的关键。阳明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炼为“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是一个相互统一的协同系统，呈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因此“知”、“行”是不能截然相分的。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书^③聘阳明主贵阳书院，阳明随即开始宣讲他的“知行合一”新说。《年谱》云：

先生是年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

① 《五经臆说序》，《全集》卷二二，876页。按：《五经臆说》今仅存残篇13条，编入《全集》卷二六。“期有七月”是一年又七个月之意，故钱德洪按语谓“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又云：“（阳明）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全集》，976页）但《五经臆说》实为阳明建构其心学体系的开端，在其思想的演历中是重要的。

② 《诸生夜坐》，《全集》卷一九，699页。

③ 席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郾城知县，人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历河南佾事，贵州提学副使。屡迁福建右布政使，宁王宸濠反，尝急募兵二万讨之，至则贼已平，乃返。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嘉靖元年（1522），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因议“大礼”能得世宗之意，迁礼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史称其遇事敢为，而性颇偏愎。约卒于嘉靖五年（1526）或稍后。《明史》卷一九七有传。

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同异，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①

席书以“朱陆同异”为问，而阳明“不语朱陆之学”，表明他已经超出了朱陆同异之辨；“告之以其所悟”，则表明“知行合一”乃是他“龙场悟道”以后的理论结晶。这一新的学说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确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席书先是怀疑，后经阳明的再三举证，则“豁然大悟”，以为“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并对阳明的新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阳明亦开始以他的新说化导一方，“（席）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贵州）士始知学”^②。

谪居龙场，无疑是阳明生活中的巨大磨难，但源于他对生命真谛的不懈寻求，本于他立于少年，尤其是“归正于圣学”之后不可摧折的必为圣人之志，他在生命的苦痛之中实现了其心灵境界的转向与跨越，反而成为他思想上结出丰硕成果的契机，成为他基于宋代以来主流学术思想的全面反思而创立新说的开端。因此后人论阳明之学，往往以龙场时期为他思想发展的一个分界。如阳明的高弟王畿论其师之学^③，谓“我阳明先师崛起于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渍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29页。

② 《明史》卷一九七《席书传》。

③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绍兴人。《明史》卷二八三本传：“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后受业王守仁，闻其言，无底滞，守仁大喜。嘉靖五年举进士，与钱德洪并不就廷对，归。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书院。已奔守仁丧，经纪葬事，持心丧三年。久之，与德洪同第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给事中戚贤等荐畿，夏言斥畿伪学，夺贤职。畿乃谢病归。畿尝云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请，以不谨斥。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畿为阳明学说的有力传播者，然其思想发展的成熟形态，则又与阳明不无同异。

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① 钱德洪云：“先师始学，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学养生，而沉酣于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② 黄宗羲为《明儒学案》，则隐括其意，谓阳明“学有三变”：“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③ 这些评论，虽然在细节上仍有可商量之处，因为它们似乎未反映出阳明早在弘治十八年即已经在思想上回归于儒学，但基本上仍然合乎阳明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形。龙场时期，代表了阳明思想在“归正于圣学”之后的第一期创新，“知行合一”新说则为这一创新性发展的核心的思想成果。

① 王畿：《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全集》卷三七，1360页。

② 钱德洪：《答论年谱书》（第十），《全集》卷三七，1378页。按：钱德洪（1496—1574），本名宽，字德洪。以字行，遂更字洪甫，号绪山，余姚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然不赴廷对；至十一年（1532）始成进士，累官至刑部郎中；因事下诏狱，被斥为民。《明史》卷二八三本传：“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王）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云。”钱德洪、王畿与阳明学说的后续发展关涉最为重大，阳明在绍兴讲学盛时，凡学者均先就钱、王疏通大意，最后乃卒业于阳明。然二人对阳明学说宗旨的理解不尽相同，阳明去世之后，其学派的分化盖亦与钱、王二人关系甚重。又按：阳明正式揭示良知之说，乃在平宁藩之后，他虽曾谓自龙场以后即不出此意，只是讲此二字不出，但似乎不可谓在龙场时即已悟良知之旨。故于钱、王之说，学者但当会其意，而不必过于拘泥。黄宗羲不谓阳明在龙场即悟良知之旨，而谓悟格物致知而始得圣学之门，盖更切于实情。

③ 《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一〇，《黄宗羲全集》第7册，201页。

职事屡迁 门生广进

（正德五年至正德十年，1510—1515）

阳明有诗曰：“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① 他坚信浮云终究不能永久遮蔽日月，自己的经济世务之雄才亦不可能永远被埋没于天地之间，而事实上，他的确亦没有在龙场居留太久，从正德三年春至龙场，到正德五年春离开，他在龙场的实际居留时间约为两年。

正德五年（1510），阳明前后三年的贬谪期满，被升为庐陵县（属江西省）知县，他于三月十八日到任。^② 初到庐陵，虽身体虚弱多病，但他仍勉勉从事，切实了解当地民情，体察民间疾苦，竭尽己能，力予纾解。正德二年，有太监姚氏为钦差大臣按巡吉安布政司，要求所属各县进贡葛布，无葛布出产的县则折银输官，庐陵县向来无葛布出产，因此摊派到折银一百五十两。这显然是一项额外的杂派，所以“当时百姓嗷嗷，众口沸腾”，冤苦愤懑之声载于道路。及阳明为庐陵县令的时候，非但这一百五十两的杂派没有取消，而且又增加了其他的杂项，“百姓愈加惊惶，恐自此永为定额，遗累无穷。兼之岁办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项，旧额三千四百九十八两，今年增到一万两，比之原派，几于三倍。其余公差往来，骚扰刻剥，日甚一日”。当时庐陵县旱灾严重，疾病流行，“民产已穷，征求未息，况有旱灾相仍，疾疫大作，比巷连村，多至阖门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顾疗。幸而生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

① 《龙冈漫兴》之五，《全集》卷一九，703页。

② 参见《庐陵县公移》，《全集》卷二八，1031页。

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日无虚夕”。了解到这些实际情况以后，阳明无法坐视民困而不顾，心切时弊而不言，遂自作主张，尽行蠲免了岁额及各项杂派，而只将原已征收的银一百两解送吉安府，同时移书府台，请求“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而若“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中心所甘”^①。可以想见，阳明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冒有风险的，但他不顾个人安危而唯百姓利益是念的做法，及时缓解了民众的贫困状况，对安定人心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亦因此而赢得了庐陵人民的信任。

在此同时，阳明尤为重视道德对于民心的化导作用，以敦风励俗、民德归厚为政治之本。庐陵虽为文献之地，但民风未淳，“而以健讼称”，事无巨细，皆讼于官府，故狱牒盈庭。阳明莅政之初，正当春耕时节，因此并未立即坐堂听讼折狱，“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独为吾病不任事，以今农月，尔民方宜力田，苟春时一失，则终岁无望。放告，尔民将牵连而出，荒尔田亩，弃尔室家，老幼失养，贫病莫全，称贷营求，奔驰供送，愈长刁风，为害滋甚”。但见诉讼之人尝呼号于道路，遂升堂听讼，结果来告状的人有数千之多，而“披阅其词，类虚妄；取其近似者，穷治之，亦多凭空架捏，曾无实事”。阳明因此而发布文告，“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又谆谆告谕父老，务以“和巽自处，以良善称于乡族”^②，须劝诫子弟兴行孝悌，息争兴让，讲信修睦，以还归于民风的醇厚。

及入夏季，庐陵遭遇到严重的旱灾，秋熟无望；枵腹号呼，不绝于途，而又疫病流行；贫病交迫，官府摧征，终致盗贼多起；天时亢旱，水源枯竭，城中火灾连连。天灾人祸，相继频仍，这对以有病之躯而为一县之令的阳明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他发挥自

① 《庐陵县公移》，《全集》卷二八，1031～1032页。

② 《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全集》卷二八，1027～1028页。

己的才能，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对治之法，使地方重新归于平靖，人民的生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

“今灾疫大行，无知之民，惑于渐染之说，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针对这种情况，阳明一方面从道义上进行劝谕，以“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为倡导，以激起民众的道德之心，实现相互救助；另一方面则采取积极措施，给粥施药，其“贫弗能者，官给之药”，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蔓延。

对于“今县境多盗”，阳明认为其原因：“良由有司不能抚辑，民间又无防御之法，是以盗起益横。”他同样采取标本兼治之方，既饬谕父老须加强对子弟的教诲，务以兴行孝义为主，又在城乡实行保甲之法。“近与父老豪杰谋，居城郭者，十家为甲；在乡村者，村自为保。平时相与讲信修睦，寇至务相救援。庶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义。”保甲法的实施，实现了民间对寇盗的自防与联防，对寇盗起到了有效的扼制作用。

因旱灾严重，疫疠过后，又火灾频繁，“今天时亢旱，火灾流行，水源枯竭，民无屋庐，岁且不稔”。“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余，实切痛心！”阳明既“斋戒省咎，请罪于山川社稷，停催征，纵轻罪”，告谕百姓“宜解讼罢争，息心火，无助烈焰，禁民间无宰杀酗酒”，又细致考察火灾之所以蔓延的缘由：“何延烧至是？皆由衢道太狭，居室太密，架屋太高，无砖瓦之间，无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扑。”因此在灾后的重建中，他强调了防火的重要性，并对民居建筑的规制作出了具体规定：“今与吾民约，凡南北夹道居者，各退地三尺为街；东西相连接者，每间让地二寸为巷。又间出银一钱，助边巷者为墙，以断风火；沿街之至，高不过一丈五六，厢楼不过二丈一二。”^① 这些措施，使民居各有间隔，一旦有火，则能切断火源，而楼不太高，扑救亦相对较易，对城市火灾的防范应该是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

① 以上三段引文见《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全集》卷二八，1027~1030页。

阳明担任庐陵县令不过七个月，但却应对了严重复杂的局面，及时妥善措置了重赋、旱灾、疫病、寇盗、火灾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不仅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且亦进一步培养了他在复杂局面下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而以道德为政治之本，重视人心的启迪以实现内在德性的自觉，将政治的合理化视为道德理性的外向显扬，则既体现为传统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同时实际上亦为阳明将他自己在龙场对于心体的感悟付诸政治实践的一次成功尝试。《年谱》对阳明在庐陵的事迹有一简要的总述：

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狱牒盈庭，不即断射。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民胥悔胜气嚣讼，至有涕泣而归者，由是囹圄日清。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大抵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荡僻。城中失火，身祷返风，以血禳火，而火即灭，因使城中辟火巷，定水次兑运，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至今数十年犹踵行之。^①

我们无法考证阳明“身祷返风，以血禳火，而火即灭”是否为事实，但他所采取的一系列防火措施，以及戒奢靡、绝横征、立保甲、通商旅的方针，对庐陵灾后人民生活的安定以及经济复苏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阳明是知行合一之说的坚定倡导者，亦是知行合一之说的切实实践者。

正德五年秋，刘瑾被诛；是年十一月，阳明亦结束了他在庐陵7个月的县令生涯，奉命入京朝觐。在庐陵时期，他一方面投入各种行政事务的处理，切实履行他作为县令的职责，另一方面却亦从未间断他的讲学活动。“龙场悟道”使阳明确立了心的主体地位，心成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0页。

为他哲学思想体系建构的核心或主脑，“知行合一”作为他龙场悟道以后思想的集中概括，则成为他当时讲学的主要内容。但或许是由于常识的误导，亦或许是由于格物致知之说的传统诠释所形成的思想窠臼，“知”须先在于“行”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学者对他的这一新思想亦普遍缺乏同情，“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①。这一状况使阳明适时调整了他讲学的思路。他重新考虑应该如何使他人能够充分理解心体作为宇宙本体的内涵。按照他的观点，心体本来的自身存在状态原是清澈澄明的，原是没有任何渣滓的，正因为它本身的澄明，它才能保持它的灵性，犹如镜体本身明净，不着纤尘，才能保持它能照的功用。处于日常生活世界当中的人，虽然因他的气质、习染而受到种种限制，甚至于私欲泛滥，行类禽兽，但他的心体本然存在的本性却仍然是澄明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表现出种种不善甚至是恶劣的行径，只是表明他的心体之本然的明净状态受到了遮蔽，只要体悟到心体澄明的本性，从而在主体自身将这种澄明的本性还原出来，那么他实际上就实现了自我心灵状态的转向，实现了向圣人境界的跨越。缘于这一观点，阳明在庐陵的讲学活动中暂时搁置了“知行合一”问题，而教学者通过静一的方式来悟入于心体本身的澄明状态，这一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②这种“静坐”的方式，就它的表现形式而言，与佛家的坐禅或许并无太大的区别，因此它在当时大概也引起了一些误解，但阳明认为，“静坐”与“坐禅”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的目的指向是有本质区别的，静坐非为入定，而仅仅是为了收束身心，使自己的思虑从繁杂的日常生活的欲念当中摆脱出来，使其不致过于纷纭驰骛，从而成为导向心体自在之澄明的一种辅助性手段：“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

①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0页。

着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①按照这一解释，所谓静坐，乃是阳明为实现心体的自觉与开明而倡导的一种实践方式，是优入圣域的下手入头之处，其内涵是体现了他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解的，但在表达方式上，它毫无疑问地又借鉴了佛家或道家的身心修养方法。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便亦可以将阳明心学在整体上诠释为对已有不同思想文化形态的全新的视域融合。

阳明入京以后，馆于大兴隆寺，他的思想亦开始在京城传播。黄绾^②成为他的弟子，可作为其思想在当时学术界发生影响的一个实例。黄绾自述云：

是岁（正德五年）冬，（阳明）以朝覲入京，调南京刑部主事，馆于大兴隆寺。予时为后军都事，少尝有志圣学，求之紫阳、濂洛、象山之书，日事静坐。虽与公（阳明）有通家之旧，实未尝深知其学。执友柴墟储公罐^③与予书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趋向正，造诣深，不专文字之学，足下肯出与之游，丽泽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趋见。适湛公（若水）共坐室中，公出与语，喜曰：“此学久绝，子何所闻而遽至此也？”予曰：“虽粗有志，实未用功。”公曰：“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即问：“曾识湛原明否？来日请会，以订我三人共学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馆中，会湛公，共拜而盟。又

① 《与辰中诸生》，《全集》卷四，144页；又见《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0~1231页。

② 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号久庵，又号石龙，浙江黄岩人。承祖荫得官。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合世宗之意，擢光禄寺少卿，寻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后因为其父母请赠诰命，世宗怒，夺其尚书之职，令以侍郎闲住。黄绾初师事谢铎（字鸣治，号方石，今浙江温岭人，1435—1510），宗程朱之学，正德五年闻阳明讲学，大受启迪，遂以阳明为师，后又离开师门，至嘉靖元年（1522）再入阳明门下。晚年又叛出师门，且攻阳明之说甚烈。《明史》卷一九七本传：“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之。”阳明去世之后，其子正德尚幼，黄绾出于保护之意，遂以女妻之。

③ 储罐，字静夫，号柴墟，江苏泰州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第一人。白岩乔公，即乔宇，时为南京吏部尚书。蓬庵杨公为杨一清（字应宁，号蓬庵，又号石淙，祖籍云南安宁，徙居今江苏镇江，1454—1530），时为户部尚书。《明史》卷一九八有传。

数日，湛公与予语，欲谋白岩乔公转告冢宰邃庵杨公，留公北曹，杨公乃擢公为吏部验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职事之外，稍暇，必会讲；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砺。^①

从这一叙述我们可以知道，阳明在进京朝觐的一段时间里，已开始积极宣扬他在龙场所得的学术思想，并且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明显影响。而与湛若水的再次会晤，则更激发了他传播圣学的热情，其按时举会以讲学的形式，则成为传播其学术思想的有效途径，并且成为明代中叶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就嘉靖、万历时代而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讲会都与阳明学者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就是‘王学讲会’。这些讲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理学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并常常与地方风俗教化发生联系。因此，它们不仅仅是理学家的个人交游，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事实上，阳明学话语的建立、扩展及在明中后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笼罩，正是通过推行会讲、讲会的形式得以实现的。”^②

入觐以后，在同年的十二月，阳明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亦即正德六年（1506）的正月，又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根据黄绾的以上记述，这一调任乃是出于湛若水的提议，经黄绾促成，而由杨一清决定的。阳明因此而可以留在京师，继续他的讲学活动。

这时的阳明，其思想正处于成熟发展的过程当中，讲学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事务，而有心向学的有志之士亦日聚于门下。就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而言，朱熹学说仍居于主导地位，而阳明重视心体之自我澄明的学说，在原理上则确与朱熹学说不能完全相合。或许正由于这一缘故，他的弟子中间亦出现了朱、陆之辨。《年谱》记载，“王與庵读象山书，有契，徐成之与辩，不决”，遂请质诸阳明。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09～1410页。

② 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338页。

阳明曰：“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虽微成之之争，與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这一回答并不能使徐成之满意，认为是“漫为含糊两解”之辞，而实则阴助王與庵之说。阳明遂趁开导徐成之的机会，发表了他关于朱、陆学术同异的基本观点，就朱、陆之说作出了一般衡定。

朱、陆之辨，确为中国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淳熙二年（1175）的“鹅湖之会”，朱、陆发生正面的思想交锋。此后，朱熹曾对自己的学术取向与陆氏之异作过反思，在写给项平父的书信中，朱熹云：“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象山）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①《中庸》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盖“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确很难如朱熹所说的那样可以截然分作“两事”，所以后来陆象山了解到朱熹的这一观点，便提出了反驳：“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②但此后学术界关于朱、陆之异的辨析，大抵即以朱熹重“道问学”而象山主“尊德性”为论，当时王與庵之是象山与徐成之之是朱熹，亦是就“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孰是孰非而展开的。而按照阳明的见解，象山固然主于“尊德性”，但亦未尝不教其徒读书，其平时汲汲乎所称述以海其弟子者，亦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克己复礼”，“求放心”而已，皆孔孟之言，“乌在其为空虚乎”？故象山之“尊德性”，盖未至于“专”，而仍不废“道问学”工夫。朱熹固主于“道问学”，但亦论“存心养性”，亦论天理之本然，“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故所谓朱熹之“道问学”，亦未至于“专”，而仍不废“尊德性”。因此之故，“尊德性”既未足以尽象山之学，“道问学”亦未足以尽朱熹之学。或以为朱学流于支离，则阳明辩之，以为朱熹“恐学者之獵等，而或失之于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无不明，

① 朱熹：《答项平父》（第二书），《朱文公文集》卷五四，962页（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陆九渊：《语录》，《陆象山全集》卷三四，255页，北京，中国书店，1992。

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烦而失之愈远，至有弊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自为之，则亦岂至是乎？”因此他作出结论，谓：“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阳明关于朱、陆的这一基本衡定，实际上是表明这样一点，即尽管朱、陆之学各有侧重，但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别却未足以为其学术之所以相异的分界，而无论朱、陆，皆为圣人之徒，其学亦皆为圣人之学。既然如此，那么虽自朱熹以来天下皆称象山之学为禅，其实便未必为禅；虽然“是朱非陆”似乎论定已久，其实亦岂能便即执为定论？因此，阳明最终表明了他对于象山之学的态度：

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砒砒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晦庵之学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犹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①

阳明的学术，原亦培育于尊朱的学术氛围，其本人亦曾对朱说笃信不疑，只是在他的切身实践中，因切实体悟到了朱熹学说终究不能与心相契，才最终对朱学产生怀疑。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阳明对象山之学实际上都更能产生共鸣。王舆庵与徐成之的论辩，不过为他表达关于朱、陆学术同异之见的一个契机而已，而这一契机，实际上亦成为他后来集《朱子晚年定论》的思想前导。《朱子晚年定论》以及后来重刊的《陆象山全集》，均为阳明欲为象山洗四百年“无实之诬”所做的实际努力。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2～1233页。

正德六年二月，阳明为会试的同考试官；同年十月，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大概在此前后，湛若水奉命出使安南封国，因此他们不得不相互作别。阳明作《别湛甘泉序》，又作诗二首以赠。^①在《别湛甘泉序》中，阳明对当世的学风提出了批评，回忆了自己为学的经过，肯定了与若水的定交对其归正于圣学之后进一步坚定其必为圣人之志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同时亦表示了共戮力于斯道以相互切磋砥砺的期望。

正德七年（1512）三月，阳明升考功清吏司郎中，仍居京师，从其学者益众。是年十二月，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而在此同时，阳明的妹夫徐爱^②恰以祈州知州考满进京，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遂相约到南京上任前先一同归越省亲。次年，即正德八年的二月，阳明回到家乡绍兴。阔别多年，宗族亲友不免相互走访，阳明亦耽于应酬之事。他原想到绍兴后即与徐爱、黄绾等一道出游天台、雁荡，但一方面因绊于亲友应酬，另一方面亦因久候黄绾不至，直至五月末尚未成行。时徐爱假期已满，势不能再等，约到了七月初，遂只好与徐爱等成行，但此行并不愉快。阳明记云：

仆到家，即欲与曰仁成雁荡之约，宗族亲友相牵绊，时刻弗能自由。五月终，决意往；值烈暑，阻者益众且坚，复不果。时与曰仁稍寻傍近诸小山，其东南林壑最胜绝处，与数友相期，候宗贤一至即往。又月余，曰仁凭限过甚，乃翁督促，势不可复待。乃从上虞入四明，观白水，寻龙溪之源；登杖锡，至于雪窦；上千丈岩，以望天姥、华顶，若可睹焉。欲遂从奉化取道至赤城，适彼中多旱，山田尽龟裂，道傍人家彷徨望雨，意惨然不乐，遂从宁波买舟还余姚。往返亦半月余，相

① 《别湛甘泉序》见《全集》卷七；诗二首，见《全集》卷二〇。其一云：“远别情已惨，况此艰难秋！”则知其别当在是年秋季。

② 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为人敦厚淳谨，笃信阳明学说，对阳明之学的早期传播贡献尤多。卒时年仅31岁，阳明哭之甚恸。

从诸友亦微有所得，然无大发明。其最所歉然，宗贤不同兹行耳。^①

可知阳明这次出游，并未完成他预定的计划，既未至天台，更未到雁荡，而只到了奉化一带即返回了余姚，其原因既由于天旱而田野龟裂，心下惨然不乐，亦还由于黄绾不曾同行，其意亦终有不愜，故《年谱》云：“先生兹游虽为山水，实注念爱、绾二子。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② 由此非但可知阳明对徐爱与黄绾的器重，而尤可知阳明教人之法，原亦不拘于定格。

是年十月，阳明至滁州。职事清闲，遂日与群弟子放游于山水之间。《年谱》记云：

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酿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③

滁州，即今安徽省贵池县，亦是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地方，此所谓“酿泉”，盖即《醉翁亭记》中的“酿泉”。酌泉为酒，月夕弦歌，风动云散，心与月明。想阳明之乐，盖亦有当年“醉翁”之所不知者也。正德九年（1514）四月，阳明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滁州诸友送至乌衣，犹依依不舍，不能作别，及暮，诸友又送至江浦，伫立江皋，必俟阳明渡江，阳明书《滁阳别诸友》诗^④，促之归。师生之间的这份缱绻深情，虽数百年而后，想来犹令人神往。

正德十年（1515）因两京考察，阳明再至京师，上疏自劾乞休，不允。至八月，因武宗命太监刘允等迎供诸佛，多有靡费，阳明撰

① 《与黄宗贤》（第二书），《全集》卷四，149～150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6页。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6页。邹守益尝云：正德七年，“阳明先师来卿于滁，集邑之俊髦，切磋于良知之学，与水之必下，人之必善，千载一揆。诸生彬彬颺颺，趋于正教，而科第亦汇征不替。”（《全椒县儒学增修记》，《邹东廓集》卷四，四库存目丛书本）

④ 诗见《全集》卷二〇，733页。

《谏迎佛疏》，然具稿未上；同月，因祖母岑氏已96岁高龄，遂上疏请告归省，疏至再上，辞极哀恳。^①因阳明的夫人诸氏婚后一直没有生育，而阳明的诸弟守俭、守文、守章亦皆无子嗣，所以其父王华就在这一年将正宪立为阳明之后。正宪是阳明的叔父王袞之孙、其从弟守信之子，是年8岁。

自正德五年至正德十年的六年，是阳明一生中职事变化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然所居大抵为闲职，并无繁忙的公务，因此它实际上便亦成为阳明较能集中精力讲学的一个时期。从北京到南京，凡所之皆无非讲学之地，因此其门徒益众，而学术影响亦日增。就阳明思想的发展而言，这六年是他将龙场之悟进一步扩充、完善，并使之体系化的重要时期，亦是其学说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实际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将关于心体的学说以及知行合一的学说贯穿于儒家原始经典的系统诠释之中，超越朱熹之学的固有规模，而单独开辟了一片广袤的天空。与徐成之论朱陆之学，实际上即已然公开表明其思想之逸出朱学藩篱；而在越中与徐爱论《大学》之旨，其主要内容即今《传习录上》的前半部分，则是阳明对朱熹格物说进行比较系统的公开批评以及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开始形成的基本标志。其学说在当时学术界所产生的思想震动，从徐爱的记述则亦约略可见一斑：“爱因旧说汨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②始而“骇愕不定”，终而笃信不疑。徐爱的这种反应，在当时闻阳明之说的学者当中或许是普遍的。徐爱并不仅仅是阳明的妹婿或弟子，而更是其思想上的同道，对阳明学

① 《自劾乞休疏》、《谏迎佛疏》、《乞养病疏》，均见《全集》卷九。

② 《传习录上》，《全集》卷一，10～11页。

说始终能给予深切的理解与热烈的响应，对阳明学说的早期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正德九年，阳明与徐爱同在南京，阳明门下弟子陆澄、薛侃、季本等数十人皆来相会，“同聚于师门，日夕渍砺不懈”，这与徐爱在同门弟子中享有较高声誉是有直接关系的，故《年谱》谓“自徐爱来南都，同志日亲。”^①正是通过这种聚会的方式，阳明学说获得了迅速的广泛传播，从而奠定了其学派的整体规模。

在这一时期，阳明讲学的重点仍然落实于知行合一，既将它作为某种原理而贯彻于儒学经典之义理的诠释，亦将它视为格物致知的实践之方，而其目的则在廓清心体，以实见真性之流行。正德六年，亦即阳明自庐陵到京师后不久，他即与黄绾、应良（字原忠）讨论实践之功，以为“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②。“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③而“刮磨”以开明心体的方法，则以“静坐”为主。在滁州时，有弟子谈到“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阳明答云：“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④自在庐陵倡导“静坐”以来，这一方法基本上即成为阳明这一时期教人实践的主要方法。但事实上，“静坐”与“坐禅”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是没有分别的，因此亦极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学者中的高明豁达之士，或亦容易将阳明之说等同于禅家的明心见性之论，阳明自己尝谓“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惟笃志圣学者始能究析其隐微”^⑤，此语虽意在引导学者不为疑似者所惑而惟笃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7页。

② 同上书，1231页。

③ 《答黄宗贤应原忠》，《全集》卷四，146页。

④ 《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全集》卷二六，982页；又见《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6页。

⑤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7页；又略见《传习录上》，《全集》卷一，36~37页。

志于圣学，但他对“二氏之学”采取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而不严立门墙，则亦为事实。而这种态度在诸弟子中间会产生出不同的反应，则显然亦在情理之中。因此在南京时期，阳明便因学者中有流于虚空一路而适时改变了他对学者的引导方法。《年谱》云：

客有道自滁游学之士，多放言高论，亦有渐背师教者。先生曰：“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①

后来钱德洪回忆道：“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嘉靖癸丑（按：三十二年，1553）秋，太仆少卿吕子怀复聚徒于师祠，洪往游焉，见同门高年有能道师遗事者。当时师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既后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②由此可见，随着阳明学说的不断传播，在其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对其学说的误解、非难亦在悄然发生，以至“亦有渐背师教者”。而在阳明的弟子当中，亦有对其师说未能深入领会其精髓者，因而渐流入空虚一路而为“脱落新奇之论”。阳明对这种新的弊端有及时的洞察，从而适时改变了其接引学人的方法。在南京时期，他即已经逐渐舍弃了“静坐”之法，而倡导“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这种教学方法的及时调整，正足以表明阳明之学原是在不断讲学的过程当中，在引导学人的实践当中不断发展与不断完善的，然必欲使人心体开明，仁心充沛，从而导生命于光大高明的神圣境域，却是阳明学说不变的宗旨。事实上，阳明在思想上对朱学的疏离、在理论上对朱学的解构、在方法上对“二氏”的整合，便已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的学说体系既可能受到踊跃的欢呼，亦可能受到激烈的非难的历史命运。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7页。

② 《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德洪按语，《全集》卷二六，982～983页。

不管如何，正德十年，阳明方才 44 岁，他的思想世界的建设虽已初具规模，却仍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拓展与细致的完善，他经略四方的雄才大略虽已蕴蓄良久而郁勃于胸中，却未曾获得真正表露与发泄的机会。而就在次年，他被任以新命，其生活与思想世界的开拓亦因此而转进于新的境界。

南赣戎机 矢石书影

（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三年，1516—1518）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吏部下文：“承圣旨：王守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写敕与他。钦此。”^① 这一新的任命，是出于尚书王琼的推荐，然命下之日，阳明却在“惊惶感泣之余，莫知攸措”，遂上疏请辞去新任而仍以旧职致仕，其略云：

窃念臣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待罪鸿臚闲散之地，犹惧不称，况兹巡抚重任，其将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膺仕显官，臣心岂独不愿？一时贪幸苟受，后至溃政债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无事，尚尔奄奄，军旅驱驰，岂复堪任？……伏愿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轻，地方之重寄不可苟，体物情之有短长，悯凡愚之所不逮，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悯臣之愚，不加谪逐，容令仍以鸿臚寺卿退归田里，以免负乖之诛，臣虽颠越，敢忘衔结！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去岁乞休，虽迫疾病，实亦因此。臣敢辄以蝼蚁苦切之情控于陛下，冀得便道先归省视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②

① 《谢恩疏》，《全集》卷九，298页。

② 《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全集》卷九，297页。

这一辞任之疏，首以体弱多病，恐不克当军旅驱驰之劳而溃政债事；次以朝廷任职之典，当择善择能，地方之寄，不可苟且，而其“才本庸劣，性复迂疏”，恐不能担当地方重任；末以祖母岑氏年届大耋，义当奉养，以伸孝道。这三项辞职的理由应该是充分的，其措辞恳切，并无矫揉造作。但当时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四省毗连地区寇乱的实际情形，却已不容阳明以任何私人的理由而辞职，因此几乎在他的辞新任疏上达的同时，十月二十四日，朝廷已敕諭再下：

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处，累有盗贼生发。因地连各境，事无统属，特命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安抚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但有盗贼生发，即便严督各该兵备、守御、守巡，并各军卫有司，设法剿捕，选委廉能属官，密切体访，及签所在大户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袭，量加犒赏；或募知因之人，阴为乡（向）导；或购贼徒，自相斩捕；或听胁从并亡命窝主人等自首免罪。其军卫有司官员中政务修举者，量加旌奖；其有贪残畏缩误事者，径自拿问发落。尔风宪大臣，须廉正刚果，肃清奸弊，以副朝廷之委任。钦此。^①

尽管如此，阳明并未立即就任，他似乎仍在期待着朝廷对他致仕请求的批复。十一月十四日，都御史文森因上疏称病请致仕而延误了“紧急贼情事”，受到朝廷的严厉叱责：“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守仁因见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正出于这种考虑，吏部再次颁诏督责阳明就任：“奉圣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① 《巡抚南赣钦奉敕諭通行各属》，《全集》卷一六，525页。

至十二月初二日，朝廷对阳明的辞新任疏作了最后批复：“该臣奏为乞恩辞免新任仍照旧职致仕事，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①

朝廷之命再四下达，措辞严厉峻切，不容阳明再有任何踌躇。就在接到朝廷批复的第二天，即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阳明便即启程前往江西，从此开始了他儒生的军旅生涯。这一年他 45 岁。

推想阳明当时的心境，盖确乎处于某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四府之职，担负平靖地方寇乱的重大责任，保土安民，实致王道雍熙之治，原为儒学的政治理想，他自少年时即已蕴蓄胸中的经略四方之志，至此有了一个充分发为现实的契机；但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确乎一向羸弱，自青年时即患喘咳之疾，他对此行的凶险、前途的坎坷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他上疏辞去新任，亦并非矫情之举。但就当时的情势来判断，他大概亦能估计到朝廷不会准许他辞任的请求，因此在递交了辞任的奏疏以后，他即从南京回到绍兴，在探视亲友、将养病躯的同时等待着朝廷的最后批复，他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前往江西的必要准备。

武宗之世的明朝政治是极其晦暗的。朱厚照是一个胸无大志、心浮气躁而又极为刚愎自用的庸人。其践祚之初，即重用刘瑾等宦官，沉湎于嬉游宴乐，亲群小而逐直臣，致使朝政一片混浊。政纲废弛，荒于缉理，致使内忧外患日趋严重，而天灾人祸频仍，人民生计愈加窘迫。自正德三年（1508）以来，几乎年年有天灾，年年有盗起，赣、闽、湖、广四省边境地区，被盗尤甚。四省地缘相联，幅员广袤，民人众多，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溪壑沟壑，自然天险。地形既极为复杂险峻，而又交通不便，尤为群盗渊藪。正德四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②。江西之盗多集中在赣南，此正为四省交界之地，群盗据大帽山、大庾岭、九连山、八面

① 《谢恩疏》，《全集》卷九，298 页。

② 《明史》卷一七《武宗本纪》。

山等以为天然屏障，流窜劫掠，甚至于攻城掠府，严重扰乱了居民的生活与生产秩序。如赣州“贼犯新淦，执参政赵士贤；靖安贼胡雷二等，据越王岭玛瑙寨，华林贼陈福一破瑞州。既而抚州东乡、饶州桃源洞等处，贼亦作乱”^①。正德六年夏四月，朝廷命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右副都御史俞谏提督军务，协力讨江西盗贼，陈金、俞谏奏请调广西田州、东兰等土司的“狼兵”至赣征剿，自此拉开了正德年间朝廷讨伐江西等地寇乱的序幕。但由于此地万山荆棘，形势险要，沟壑纵横，森林茂密，诸寨既相互勾连，又互通声气，官兵东扑则东伏而西起，西扑则西伏而东起，虽可收暂时之效，终不能从根本制敌而收久安之绩。至正德十一年，四省边境地方仍多为盗寇所据，形成了数处大的山寨：福建漳州府境内，以小溪为根本据点，以詹师富、温火烧等为首领；江西南安、赣州府境内，以横水、桶冈为主要据点，以谢志珊、蓝天凤等为首领；广东惠州府境内，以洴头为主要据点，以池仲容（大鬓）等为首领。“山谷凶民，初为攘窃，渐至劫掠州县，肆无忌惮，远近视效。凡在虔、楚、闽、广接壤山谷，无非贼巢。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终不可除。”^②

阳明于此时经兵部尚书王琼的特荐，膺朝廷之命而任左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实亦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于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初三离开绍兴赴任，至江西境内，即坐船沿赣江南下，舟过南安府万安，“遇流贼数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进。先生乃联商舟结为阵势，扬旗鸣鼓如趋战状。贼乃罗拜于岸，呼曰：‘饥荒流民，乞求赈济！’先生泊岸，令人谕之曰：‘至赣后，即差官抚插，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自取戮灭。’贼惧，散归”^③。这是阳明进入江西境内、抵达赣州之前的一段小插曲，但却可以表明当时饥荒肆虐、流民结伙成盗、四处劫掠的严重程度。阳明于次年，即正德十二年的正月抵达赣州，旋即于十六日开府，以全副精力投入于地方军政

① 谷应泰：《平南赣盗》，《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

②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10页。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38页。

事务的处理。当时之急务，是尽快消除地方寇乱，恢复当地人民的生活与生产秩序，为此目的，他迅速行文四省各府，要求消除地方偏见，务以大局为重，各司所务，详细了解各自职分管辖范围之内各种实际情况，限期呈报；广开言路，要求各献计谋方略；申明赏罚之典，要求恪尽职守。其略曰：

照得抚属地方，界连四省，山溪峻险，林木茂深，盗贼潜处其间，不时出没剽劫，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调观望，不肯协办追剿，遂至蔓延日多。……绥抚之方，随时殊制；攻守之策，因地异宜；若非的确询访，难以臆见裁度。为此仰钞案回司，著落该当官吏照依案验内事理，即行本司该道分巡、分守、兵备、守备等官，并所属大小衙门各该官吏，公同逐一会议，要见即今各处城堡关隘，有无坚完；军兵民快，曾否操练；某处贼方猖獗，作何擒剿；某处贼已退散，作何抚缉；某贼怙终，必须扑灭；某贼被诱，尚可招徕；何等人役，堪为乡导；何等大户，可令追袭；军不足恃，或须别募精强；财不足用，或可别为经画；某处或有闲田，可兴屯以足食；某处或多浮费，可节省以供军；何地须添寨堡，以断贼之往来；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贼之要害。姑息隐忍，固非久安之图；会举挟攻，果得万全之策？一应足财养兵、弭寇安民之术，皆宜悉心计虑、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险易，必须亲切画图；城垒居民之错杂，皆可按实开注。近者一月以里，远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见，备写揭贴，各另呈来，以凭采择。非独以匡当职之不逮，亦以验各官之所存。务求实用，毋事虚言。^①

兵战之道，无非攻守；攻守之要，则期于克敌而制胜。故凡山川险隘、路途阻塞、甲兵储备、财用供给、敌情虚实、风土民俗等等，一切皆须讲究考详，务得其实，如此方能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

^① 《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全集》卷一六，525～526页。

而作出如实的判断，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绥抚之方，随时殊制；攻守之策，因地异宜”，正体现了阳明因时势、随事变而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战略思想，而灵活的战术，则又必须建立在对山川地形、民情物态以及敌对双方之兵力、兵种、作战能力与特点的切实了解的基础之上，故须询访的确而黜去臆见裁度，务求切于实际而收实用之效。阳明甫一到任便即行文各属，要求详细禀报其辖区内与军务相关的各种实际情况，并且亦亲自进行实地巡访，了解军备情况，无疑体现了他谨慎务实的工作作风。

基于对敌我双方之实情的确切了解，阳明总结过去历次靖乱虽能取一时之效，却终究不能从根本制敌的经验与教训，厉行两项重大的军事改革措施：一是推行“十家牌法”；二是训练民兵。

所谓“十家牌法”，乃是一种户籍登记与查验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是鉴于过去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往往走漏消息，官军因此多劳而无功。阳明认为，“御外之策，必以治内为先”，因“访得所属军民之家，多有规图小利，寄住来历不明之人，同为狡伪欺窃之事，甚者私通畚贼，而与之传递消息；窝藏奸宄，而为之盘据夤缘；盗贼不靖，职此其由”。基于这种关于盗贼屡肃不清的内部原因的分析，他要求建立城市居民的户籍登记与查验制度，遂行令所属府县，“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背写本院告谕，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纵恶，而奸伪无所潜形”。并亲自详细制定了“十家牌”的法式、须查验登记的各项具体内容以及各家换牌的时辰，“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颁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编排，务在一月之内了事”^①。同时告谕各府父老子弟，“自今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

^① 《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全集》卷一六，531页。

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①。“十家牌法”的实施，杜绝了奸细混入居民刺探军事情报的可能性，亦杜绝了居民为盗寇通风报信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了军事行动的机密性与有效性。

在此同时，阳明对官军的兵力、部署、士气及其作战能力等方面作了实际调查，发现问题多多。“莅任以来，甫及旬日，虽未遍历各属，且就赣州一府观之，财用耗竭，兵力脆寡，卫所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御寇之方，百无足恃。以此例彼，余亦可知。夫以羸卒而当强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军费不足，兵力不充，能力脆弱，士气不振，正为官军自身所存在的根本问题；亦正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每当寇乱猖獗之时，官军既无能御敌，便“非调土军，即倩狼达”，而这种大范围军事调动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行动迟缓，耗费时日，“往返之际，辄已经年”；其次，消耗太大，浪费资财，“靡费所须，动逾数万”；再次，暴露目标，贻误战机，“逮至集兵举事，即已魍魎潜形，曾无可剿之贼；稍俟班师，则又鼠狐聚党，复皆不轨之群”。因此阳明认为，究其屡次征剿而寇乱仍不能平靖的缘由：“良由素不练兵，倚人成事，是以机宜屡失，备御益弛。征发无救乎疮痍，供馈适增其荼毒。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②从战争的观点来看，“兵贵‘拙速’”，“不欲久战于外，以疲民耗国”^③，而调动土兵“狼达”进行远距离作战，恰与“拙速”之道相违，不但难以收到军事行动的实际绩效，而且“狼兵”所过，对居民多所劫掠，其程度不异于盗寇，民众既为调兵担负了过度的赋税，却反而因此受到更为深重的毒害，是即所谓：“征发无救乎疮痍，供馈适增其荼毒。”有鉴于此，阳明强调必须改变过去一味依赖于“狼兵”

① 《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全集》卷一六，528～529页。

② 《选拣民兵》，《全集》卷一六，527页。

③ 《武经七书评》，《全集》卷三二，1185页。

的作战心态，反被动为主动，“夫事缓则坐纵乌合，势急乃动调狼兵，一皆苟且之谋，此岂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假闻戍以兴师。岂以一州八府之地，遂无奋勇敢战之夫？”他坚信事在人为，“事豫则立，人存政举”，只要切实加强军事训练，从民间选拔有力孔武之人充实军队，那么使官军自身的作战能力获得迅速提高是可能的。为此他行文四省各兵备官，要求“于各属弩手、打手、机快等项，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辈，务求魁杰异材，缺则悬赏招募”，以组成官军自己的精锐部队。他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了各省精锐组成的基本人数：“大约江西、福建二兵备，各以五六百名为率；广东、湖广二兵备，各以四五百名为率。中间若有力能扛鼎、勇敌千人者，优其廪饩，署为将领。招募犒赏等费，皆查各属商税赃罚等银支給。”^① 他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举措的实际作用及其军事意义：

教习之方，随材异技；器械之备，因地异宜。日逐操演，听候征调。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进止金鼓之节；本院间一调遣，以习其往来道途之勤。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运机设伏，呼吸从心。如此，则各县屯戍之兵，既足以护防守截，而兵备募召之士，又可以应变出奇。盗贼渐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无恐，然后声罪之义克振，抚绥之仁可施。弭盗之方，斯惟其要。^②

从民间选拔“魁杰异材”以充实军队，并在此基础上新建能够承担突袭任务的精锐“奇兵”，不仅切实扭转了过去动辄调遣土兵狼兵的被动局面，而且优化了军队结构，振作了士气，提升了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

“十家牌法”与“选拣民兵”，是阳明到任以后为肃清寇乱而实施的两项重要的战略举措，是备战的重要环节。其目的皆在“治

① 《选拣民兵》，《全集》卷一六，527页。

② 同上书，528页。

内”，以强化自身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在阳明的严厉督责下，这两项战略措施得以顺利施行，收到了预期效果。在这一形势下，阳明认为对盗贼发动军事攻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因此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开始，他连续指挥了三次大规模战役，彻底荡平了四省边境地区为患多年的寇乱。这三次战役，可概括为“漳南之役”、“横水桶冈之役”、“浰头之役”。

（一）**漳南之役**。是役开始于正德十二年二月，结束于四月，前后凡三月。战争目的：肃清福建漳州南部以詹师富、温火烧等为首领的盗寇；战争地点：以南靖县小溪为核心的漳州南部及广东东北部区域。

漳州西南与广东接境，地形险峻，以小溪为中心的诸山寨又与龙川县诸大贼巢相互呼应，而东南则滨海，地理环境复杂，故其气焰嚣张，活动猖獗。在军队的内部整顿初见成效以后，阳明决定先对漳南之寇发动攻击。正德十二年二月，阳明行文广东、福建两省兵备官，要求两省兵马密切配合，对漳南之寇进行夹击，并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广东之兵扼守要冲，东进夹击，既可防止敌军向西奔突，亦可阻断其与广东境内诸寇的相互联络。他下令江西兵备副使杨璋，派兵士严密把守各道路关隘，截断敌军之间可能的互通声气，福建境内的攻击主力则向西进逼，由此而形成了对漳州南部盗寇的合围之势。约定闽、广二省军队克期进攻，协同作战。首战在长富村打响。战斗开始以后，前期进展较为顺利，“前后大战数合，擒斩首从贼犯黄烨等，共计四百三十二名颗，俘获贼属一百四十六名口，烧毁房屋四百余间，夺获牛马等项”^①。但随后却由于闽、广两省军队的配合发生失误，一度使战争陷入僵局。长富村等处战斗开始以后，“贼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莲花石，与贼对垒。会广东兵至，方欲合围，贼见势急，遂溃围而出”^②。在广东

① 《闽广捷音疏》，《全集》卷九，303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40页。

大伞地方追杀溃奔之敌的战斗中，福建指挥覃桓、县丞纪镛因马陷入深泥，被伤身死；而广东兵则畏敌之势，拦截不力，致使敌军向广东方向突围成功，占据象湖山、箭灌、可塘等处天险，战局遂成对峙。

当此之时，前方诸将认为战争已陷入困境，而敌军所据的“象湖、可塘等寨，系极高绝险，自来官兵所不能攻”^①，遂向阳明建议请调“狼兵”，等到秋天再对象湖山等处发动围剿。阳明闻讯以后，立即亲率军队2000余人自赣州进军福建汀州，一面下令严责畏敌官员，一面重新分析战局，进行新的战略部署。按照阳明的预计，这场夹击漳南盗寇的战斗，若两省各部严格执行事先的战略决策，同心协力，原是有必胜的把握的，“看得两省剿捕事宜，设施布置，颇已详备；诚使诸将齐心，军士用命，并举夹攻，已有必克之势”。而中途之所以发生变故，正在于“事干各省，举动难一，顿兵既久，变故旋生”^②。他对闽、广两省军队临阵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战略思想上对领军诸将提出了批评：

照得福建军务整缉既久，兼有海沧、演城、政和诸处打手，足可济事；诸将咸有以功赎罪之心，意气颇锐，当道亦皆协谋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战。若当集谋之始，掩贼不备，奋击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旷日持久，声势彰闻，各巢贼党必有连络纠合，阻阱设械，以御我师，其为奸党，当亦日加险密。至于今日，已为持久之师，且宣示以宽懈，待间而发；而犹执其乘机之说，张皇于外，以坚贼志，是谓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未可击也。

广东之兵，集谋稍缓，声威未震，意在倚重狼达土军，然后举事，利于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谋；谋贼闻之，虽相结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战期，其备必犹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缓，乘此机候，

① 《钦奉敕谕切责失机官员通行各属》，《全集》卷一六，540页。

② 《按行广东福建领兵官进剿事宜》，《全集》卷一六，533页。

正可奋怯为勇，变弱为强，而犹执其持重之说，必候土军之至，以坐失事机。是徒知吾卒之未可击，而不知敌之正可击也。^①

由此看来，在战争形成僵持的局面之下，当时闽、广两省军队的将领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福建军队士气高昂，以为当乘机速战，而广东军队则有畏葸之态，认为当请调狼兵，俟秋再战。而在阳明看来，僵局既已形成，且敌军占据险要的有利地形，速战的时机实已经丧失，则所谓“乘机之说”，适足以使敌军更加严于防守，使我军的进攻变得更加困难，故谓是“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未可击也”。而就广东军队而言，即便在当时敌军已经突围的情况之下，诸将亦“正宜协愤同奋，因败求胜，岂可辄自退阻，倚调狼兵，坐失机会？”^② 故谓“是徒知吾卒之未可击，而不知敌之正可击也”。总而言之，“参看各官顿兵不进，致此败衄，显是不奉节制，故违方略”^③。为严肃军纪，他对失事官员进行了严厉处分，令其戴罪立功。福建军队指挥高伟，“既奉差委督哨，自合与覃桓等相度机宜，协谋并进，若乃孤军轻率，中贼奸计，虽称督兵救援，先亦颇多斩获，终是功微罪大，难以赎准。广东通判陈策、指挥黄春、千户陈洪、郑芳等，既与覃桓等面议夹攻，眼见摧败，略不应援，坐损军威，坏事匪细，俱属违法。各该领兵守备、兵备、守巡等官，督提欠严，亦属有违，合就通行参究；但在紧急用人之际，姑且记罪，查勘督剿”。而关于请调“狼兵”一事，阳明认为，“今始成军而出，一遇小挫，辄求济师，况动调狼兵，往返数月，非但临渴掘井，缓不及事，兼据见在官兵二千有余，数已不少。兵贵善用，岂在徒多？况称粮饷缺欠，正宜减兵省费，安可益军匮财？”^④ 可见他是从根本上反对依循过去的旧例，动辄调动“狼兵”参战的。按照他的观点，“兵贵善用”，而不在于多寡，何况现有官军2000余人，数目已不算

① 《按行广东福建领兵官进剿事宜》，《全集》卷一六，534页。

②③ 《钦奉敕谕切责失机官员通行各属》，《全集》卷一六，540页。

④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全集》卷一六，535～536页。

少；而调动“狼兵”，不但往返数月，贻误战机，而且会增加军费开支，这对官军显然不利。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战争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且敌军占据天险，深藏山谷，绝岩峻岭，易于防御，而官军虽处攻势，却无法强攻。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为扭转战局，阳明重新进行了战略部署，制定了新的克敌之策。他以“剿捕漳寇方略”密授广东岭东兵备佥事顾应祥与福建汀、漳等处兵备佥事胡琏，要求密切会同守巡等官，依计而行，不得再有迟误。简括其计策，总在外松内紧，意在麻痹敌军，使战备松懈，消解其战斗意志，而官军则暗中加紧备战，伺机发动进攻。他要求做到这样几点：

1. 对外公开扬言现在天气已经转暖，正是春耕时节，而山路艰险，林木茂盛，又雨水增多，瘴雾骤兴，不便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暂时罢兵，等秋收之后，天气转凉，再考虑会师围剿事宜。为使敌人信以为真，他要求仅在某些要紧地方酌情保留少量的打手机兵，进行操练防备；其余军马，逐渐撤回，而且要大飧军士，犒劳给赏，作出解散军队的假象。

2. 暗中加紧备战，激励士兵的斗志，假意遣散的军队，不得走远，要确保能迅速召集。同时要派出间谍，打探敌军的虚实，充分了解敌情，把握作战时机。

3. 一旦发现敌军疏于防守，斗志懈怠，有机可乘，便即迅速召集军队，连夜衔枚进发，“当此之时，却须舍却身家，有死无生，有进无退。若一念转动，便成大害。劲卒当前，重兵继后，伺至其地，鼓噪而入”。

4. 在进攻的过程中，前锋的任务仅在于破敌之阵，“不许斩取首级”；后继的重兵，亦“止许另分五六十骑，沿途收斩。其余亦不得辄乱行次，违者就便以军法斩首。重兵之后，纪功赞画等官，各率数队，相继而进，严整行伍，务令鼓噪之声连亘不绝，使诸贼逃遯山谷者闻之，不得复聚”。

5. 围剿的目的，以擒获敌首为主，而不在于多数杀伤。“若贼首

未尽，探其所如，分兵速蹙，不得稍缓，使贼复得为计。已获渠魁，其余解散党与，平日罪恶不大，可招纳者，还与招纳；不得贪功，一概屠戮。乘胜之余，尤要肃旅如初；遇敌不得恃胜懈弛，恐生他虞。归途仍将已破贼巢，悉与扫荡，经过寨堡村落，务禁掳掠；宜抚恤者，即加抚恤；宜处分者，即与处分；毋速一时之归，复遗他日之悔。”

6. 重申各部必须严肃军纪，听奉号令，统一行动，“即今进兵，一应机宜，悉宜禀听本院，庶几事有总领，举动齐一。授去方略，敢有故违，悉以军法论处”^①。

对战争的全局把握，基于对当前局势全面而切实的了解，而灵活的战术与策略的制定，则基于对敌我双方的攻守之势、所据地形、作战心态诸方面的深刻洞察与如实分析。阳明这一“剿捕方略”的制定，是在战争形势对己方不利的情况之下作出的，就当时的实际形势来看，敌方占据着有利地形，若其严于防守，则虽强兵而必不能克，而作出“罢兵”的假象，虽似消极，实际上却正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促成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一旦有机可乘，即可攻其不备，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但战争的实际情况总是处于变化当中的，执定一种“成算”，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实际的成效，因此阳明强调，“善用兵者，因形而借胜于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胜负之算，间不容发，乌可执滞？”^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又强调领军的将领必须在临阵的实战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奉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灵活作战，“务要同心协德，乘间而动，毋得各守一见，糜军费事；一应举止，不必呈禀，以致误事”^③。“各该官员俱要奋勇协心，乘机进剿，毋顿兵遥制，以失机宜；毋待狼兵，以自懈弛；务须连营犄角，以壮我军之威；更休迭起出，以蓄我军之锐；多方以误贼人之谋，分攻以疲贼人之守，扫荡巢穴，靖安地方，则东隅可收于桑榆。”^④

① 《剿捕漳寇方略牌》，《全集》卷一六，532～533页。

②③ 《案行广东福建领兵官进剿事宜》，《全集》卷一六，534页。

④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全集》卷一六，536页。

在制定出新的作战方略的同时，阳明率军自汀州进驻上杭，以观战局，“期至贼寨，亲自督战”^①。他密切关注敌军的动静，派出暗哨密探，以获得可靠情报。二月十九日，三省官兵遂再次对盘踞在象湖山、可塘洞、箭灌等处天险的敌人发起了大规模攻击，获得全胜。其战争的具体情况，《年谱》载：

（阳明）密遣义官曾崇秀觇贼虚实，乘其懈，选兵分三路，俱于二月十九日乘晦夜衔枚并进，直捣象湖，夺其隘田。诸贼失险，复据上层峻壁，四面滚木礮石，以死拒战。我兵奋勇鏖战，自辰至午，呼声振地。三省奇兵从间鼓噪突登，乃惊溃奔走。遂乘胜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长富村等巢三十余所，广东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斩首从贼詹师富、温火烧等七千有奇，俘获贼属、辎重无算，而诸洞荡灭。^②

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阳明）谕令佯言犒军退师，俟秋再举，密探虚实，乘贼懈怠，以护送广东布政使邵蕡为名，选精兵一千五百当先，重兵四千二百继后，夜半，自率数十骑至，密招前军来，令分三路，各衔枚直趋象湖山，捣其巢穴。我兵夺据隘口，贼犹不知。贼虽失险，其间骁悍，犹能凌绝谷，超距如飞，复据上层峻险，四面飞打滚木礮石，以死拒敌。我兵奋勇鏖战，自辰至午，三省所发奇兵，复从间道鼓噪突登，始惊溃大败。我兵乘胜追杀，擒斩俘获无算，坠崖壑而死者不可胜计。余党复入流恩、山冈等巢，与诸贼合势。明日复战，贼又不利，遁入广东界上黄蜡、樟溪大山。贼酋詹师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粮守险，势甚坚固。公（阳明）命分兵五路攻击，与贼连战。令知府钟湘破长富村等巢三十余处，擒斩俘获益多。其胁从余党，悉愿携家以

① 《钦奉敕谕切责失机官员通行各属》，《全集》卷一六，540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40页。

听抚安。公委官招抚，复业者四千余人。又令金事顾应祥等委官统领军兵，会同福建克期进剿，扬言班师，出其不意，从牛皮、石岭脚等处分为三哨，鼓噪并进。贼瞻顾不暇，望风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岩等巢，直捣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清泉溪、曰（白）罗、南山等巢，直捣洋竹洞、三角湖等处。前后大战十余，俘获四千人有奇，牛马货物无算。^①

《年谱》及《阳明先生行状》的记载，都是关于始自二月十九日直至漳南战役基本结束的总战况。详战争的实际进展，盖二月十九日主要是对象湖山发起进攻，这亦是整个漳南战役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参加作战的官军有二万二千余名。象湖山之战，“擒斩大贼首黄猫狸、游四并广东大贼首萧细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颗，俘获贼属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间坠崖堕壑死者不可胜计。夺回水黄牛、赃银、枪刀等物，烧毁房屋五百余间。余贼溃散，复入流恩、山冈等巢，与诸贼合势。”次日早，各路官军又对溃散余敌发起进攻，“交锋大战，擒斩首从贼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颗，俘获贼属一百六名口。余贼败走，各遁入广东交界黄蜡溪、上下漳溪大山。”^②

象湖山之战，彻底扭转了整个漳南战役的基本格局，战争形势开始明显有利于官军。该战结束以后，“大约贼众以四分为率：一分就擒，一分听抚，……一分远遁广东境界，一分深藏本处山谷”^③。针对这一情况，阳明号令全军，务必乘胜追击，搜剿余贼，“看得象湖、箭灌，最为峻绝，诸巢贼首，悉遁其间；贼之精悍，尽聚于此。自来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虽有前挫，随能密遵方略，奋勇协力，竟破难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计其大捷，足盖小挫。但象湖虽破，而可塘犹存；贼首颇已就擒，而余猾尚多逃遁。若不乘此机会速行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11页。曰罗，据阳明《闽广捷音疏》（《全集》卷九），当作“白罗”。

② 《闽广捷音疏》，《全集》卷九，303～304页。

③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全集》卷一六，535页。

剿扑，薙草存根，恐复滋蔓；狡兔入穴，获之益难。……乘此胜锋，急攻可塘，破竹之势，不可复缓。仍一面分兵搜斩余猾，毋令复聚为奸；罪恶未稔，可招纳者，还与招纳，毋从贪功，一概屠戮。务收一篲之功，勿为九仞之弃”^①。

遵照阳明的这一号令，三省官兵随即又对贼首詹师富所据可塘洞、温火烧所据箭灌等处贼巢发起进攻。可塘洞之战，官军“分兵五路，连日攻打，生擒大贼首詹师富、江嵩、范克起、罗招贤等四名，余贼败走，复入竹子洞等处大山啸聚。随又分兵追袭，与贼连战，擒首从贼犯范兴长等二百三十五名，俘获贼属八十二名口，夺回被虏男妇五名口，夺获马牛等物”。遁入闽广交界处深山的贼党，主要在黄蜡溪、上下漳溪一带，此地与广东饶平县及福建永定县接壤，山界相连，为追剿余贼，赣、闽、广三省官兵于三月二十一日子时统一行动，发兵齐至黄蜡溪，三路进攻，“贼出，拒战甚锐。我兵奋勇大噪而前，擒斩首从贼犯温宗富等九十一名，俘获贼属一十三名口，余贼败走。各兵乘胜追至赤石岩，仍与大战良久，贼复大败，又擒斩首从贼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俘获贼属九十名口”。从黄蜡溪突围溃散之敌，逃窜到陈吕村地方，遇官兵，又大战，“当阵擒斩首从贼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俘获贼属八名口”。闽广交界处的余敌遂告基本肃清。在此同时，各路官兵对广东境内箭灌大寨发起夹击，三月二十日前后，“蒙委知县张戢督同指挥张天杰，分哨由别路进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岩等巢，直捣箭灌大寨。诸贼迎战，我兵奋勇合击，遂破箭灌。当阵斩获首从贼犯共计二百二十四名，俘获贼属八十四名口及牛马赃仗等物。各寨贼党闻风奔窜，已散复聚，愈相联结，各设机险，以死拒守。各职统兵分兵并进，于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白罗、南山等巢，直捣洋竹洞、三角湖等处，前后大战十余，生擒贼首温火烧、张大背、雷振、蔡晟、赖英等，并擒斩贼犯共一千四十八名，俘

^① 《案行领兵官搜剿余贼》，《全集》卷一六，537页。

获贼属八百三十八名口，夺获马牛、赃银、铜钱、衣帛、器仗、蕉纱等物”^①。

箭灌之战的结束，标志着漳南战役以官兵的胜利而告终。自重新调整作战方略到整个战役的结束，持续约一个月，象湖、箭灌、可塘、大伞等处盗贼据点，悉为荡平，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将领是漳州府知府钟湘、通判徐玘等。阳明对有功官兵进行了嘉奖，指出：“象湖、箭灌诸寨，皆系极险最深贼巢，自来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运谋设策，协力夹攻，旬月之间，擒斩贼首，扫荡巢穴，谋勇显著，功劳可嘉。”^② 其具体战绩，则为“攻破贼巢三十余处，擒斩首从贼人一千四百二十余名，俘获贼属五百七十余名口，烧毁房屋二千余间，夺获牛马赃仗无算；即今余党，悉愿听抚，出给告示，招抚得胁从贼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③

漳南之役，从首发兵到结束，前后持续约三个月，而“漳南数十年逋寇悉平”^④，阳明遂于四月班师。在率军返回赣州的途中，他再次驻军上杭，但这次与他数月前挥师上杭时的心态已大不相同。“参照闽、广贼首詹师富、温火烧等，恃险从逆已将十年，党恶聚徒，动以万计。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渐无纪极；劫剽焚驱，数郡遭其荼毒；转输征调，三省为之骚然。臣等奉行诛剿，三月之内，遂克歼取渠魁，扫荡巢穴。百姓解倒悬之苦，列郡获再生之安。”^⑤ 山城上杭已隐退了干戈斧钺之影，而呈现出祥和平宁之致。峰峦的苍翠、农民的劳作、适时的喜雨、山溪的淅波，一切似乎都在绽放着更生的喜悦，因此阳明的心情亦是和平喜悦的：

山城经月驻旌戈，亦复幽寻到薜萝。南国已忻回甲马，东

① 《闽广捷音疏》，《全集》卷九，304~306页。

② 《奖励福建守巡漳南道广东守巡岭东道领兵官》，《全集》卷一六，538页。

③ 《钦奉敕谕切责失机官员通行各属》，《全集》卷一六，540页。

④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40页。

⑤ 《闽广捷音疏》，《全集》卷九，306页。

田初喜出农蓑。溪云晓度千峰雨，江涨新生两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极，绝怜苍翠晚来多。^①

回到赣州以后，阳明随即又投入到一系列包括经济恢复在内的政治秩序与民众生活秩序的重建工作之中。他发出告谕，安抚新民，鼓励当地居民及被招抚的原先从贼人众，当前正是春耕时节，须抓紧农时，尽快投入生产活动，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须安分守己，加强对子弟的教育，永为良善之民。“尔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训子弟，头目人等抚辑下人，俱要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无有为善而不蒙福，无有为恶而不受殃。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尔等务兴礼义之习，永为良善之民。子弟群小中或有不遵教诲，出外生事为非者，父老头目即与执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则彰明尔等为善去恶之诚，一则剪除莠莠，免致延蔓，貽累尔等良善。”^② 他将布帛等物分发给父老人等，以示抚恤之意。

漳南战役虽告结束，但如何杜绝寇盗的再次发生，永保地方安宁，却引起阳明的深思。漳南地方之寇，主要盘踞于小溪（河头）一带，该地原属福建省南靖县管辖。南靖县原处僻地，政教不力，而因地广山多，交通不利，朝廷的政治影响力遂颇受削弱。战役结束以后，阳明会同福建按察司、漳州府、南靖县等有关方面参议，认为欲杜绝寇盗之患而收长治久安之效，有必要添设县治，加强对该地区的政治管理，扼制闽、广两省的交通要道。他会同各方官员进行商议，选定河头（小溪）为新县治的所在地，划定了新县治的行政管辖区域，同时建议将原在小溪的巡检司移到枋头，“盖河头者，诸巢之咽喉；枋头者，河头之唇齿；势必相须”^③。阳明认为，“方贼之据河头也，穷凶极恶，至动三军之众，合二省之力，而始克

① 《回军上杭》，《全集》卷二〇，745页。

② 《告谕新民》，《全集》卷一六，538~539页。

③ 《添设清平县治疏》，《全集》卷九，321页。

荡平。若不及今为久远之图，不过数年，势将复起，后悔无及矣。盖盗贼之患，譬诸病人，兴师征讨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辑者，饮食调摄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也。”^①因此在给朝廷的奏本之中，他陈述了何以要添设新县并将新的县治确定在小溪的基本理由：“臣观河头形势，实系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而遗孽残党，亦宁无有逃遁山谷者？旧因县治不立，征剿之后，浸复归据旧巢，乱乱相承，皆原于此。今诚于其地开设县治，正所谓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不然，不过年余，必将复起。其时再举两省之兵，又糜数万之费，图之，已无及矣。臣窃以为开县治于河头，以控制群巢，于势为便。……至于移巡司于枋头，亦于事势有不容已。……臣等已经画区处，大略已备，不过数月，可无督促而成。……今新抚之民，群聚于河头者二千有余，皆待此以息其反侧。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后有噬脐之悔，徒使臣等得以为辞，然已无救于事矣。”^②他初为新县取名“清平”，后更名“平和”，获得朝廷的批准，于次年正式开县。^③平和县治的设立，强化了朝廷对漳南山区的政治与经济的管理；而儒学等机构的创设，则强化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政以临之，德以化之，使民知法度而移风易俗。新县治的设立，正清晰地包含了古所谓政教之义，它对控制地方局势，防寇盗之患于未萌，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漳南之役的胜利，集中打击了闽、广交界地区为患多年的寇盗，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42页。

② 《添设清平县治疏》，《全集》卷九，320~321页。

③ 《全集》卷九有《添设清平县治疏》，卷一一有《再议平和县治疏》，所议皆为同一事体，可知新县初名“清平”，而后则更名“平和”，其缘由则为“县名须应土俗”，而河头地方原属“平河社”，以此议名“平和县”。据此二疏，知新县的设立，得到了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共同支持，百姓积极参与了新县城池及其他工程的建设。新的平和县于正德十三年三月开县，各项工程则至是年冬天基本结束。因移小溪巡检司于枋头，该巡检司遂更名为“漳汀巡检司”。

使地方得以平靖，人民的生活秩序得以逐渐恢复，阳明亦因此而获得了朝廷的嘉奖。正德十二年九月，敕谕：“贼害既除，良民安堵。盖由尔申严号令，处置有方，以致各该官员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来闻，朕心嘉悦。除有功官军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升赏外，升尔俸一级，赏银二十两，纓丝二表里，仍降敕奖励。尔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修明武备，多方计画，务使四省交界之区数年啸聚之党，抚剿尽绝。地方永获安靖，斯称朕委任之意。毋或徇于此捷，遽生怠玩，致有他虞。钦此。”^①

漳南战役是阳明卓越的军事才能的首度展示，他早年列果核为战、驱役人为阵的戏游演练，终得发越为金戈铁马、堂堂之阵的实战指挥；其经略四方的少年之志，至此亦终究获得了充分施展的机会。但漳南战役虽然以胜利而告结束，他亦因此而获得了朝廷的奖赏，但他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清除四省边界寇乱的战争，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他即将面临的是一场规模更大、局势更为复杂的战役。

（二）横水、桶冈之役。是役开始于正德十二年十月，结束于十二月，前后凡三月。战争目的：肃清江西省南安府上犹县、大庾县、南康县境内以横水、桶冈为根本据点，以谢志珊、蓝天凤等为主要首领的寇盗；战争地点：以南安府南康县以西、湖广省桂阳县（今湖南汝城）以东、广东省乐昌县以北为主要区域的三省边界地区。

漳南战役在某种意义上亦是对江西等地官军将领的统兵能力以及士兵作战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战争虽告胜利，但战争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仍然是明显的。将领或有畏敌情绪，或徇于小胜，不奉节制；兵士或勇气不足，或技艺不强，作战能力较差。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那么新的战争很可能就会成为军事冒险，难以稳操胜券。阳明在漳南之战结束以后，对当前军事形势以及官军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着重处理了事权不专、赏罚不明、部伍不整、号令不明，以及军费不足等重要问题，为新的战争进行了

^① 《升赏谢恩疏》，《全集》卷一〇，338页。

细致准备与详密部署。

十二年五月，阳明上书朝廷，汇报了当前各地寇盗活动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以及盗贼滋多的根本原因。“卷查三省贼盗，二三年前，总计不过三千有余。今据各府州县兵备、守备等官所报，已将数万，盖已不啻十倍于前。臣尝深求其故。寻诸官僚，访诸父老，采诸道路，验诸田野，皆以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①。所谓“招抚之太滥”，是指过去凡有盗贼生起，官府因兵力不足，追剿无方，一概以招抚了事。如湖广桂阳县龚福全，于正德三年聚众劫掠，后官兵加以征剿，然余党犹存，至七年，兵备衙门将龚福全招抚，给与冠带；高仲仁（高快马）、谢志珊等给与巾衣，设为老人。然未及两月，皆已出要路劫杀军民，势壮于前。正德十一年，重为招抚，给与冠带，然未宁半月，仍出劫如故。而高仲仁、谢志珊等，正为横水、桶冈之役所要征讨的主要对象，所以阳明认为，“招抚之太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怂恿了盗贼，而民众知官府对盗贼除招抚之外别无良策，亦转而附贼，“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所谓“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是阳明基于官军作战能力低下这一事实而作出的基本判断。“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殄渠魁而荡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捆载归巢矣。或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兵既脆弱骄惰而不能御强悍之敌，官员又恐担坐视之名而落职丢官，所以只

^① 《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全集》卷九，308页。

好动辄以招抚了事，“宁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张之虏；宁使孤儿寡妇之号哭，颠连疾苦之无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及招之贼”。“故曰‘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所谓“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则是阳明关于官军作战能力之所以低下的原因的分析。按照他的观点，南、赣之兵尚有数千，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少，其根本问题是士气低落，作战能力太差，“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而究其原因，则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既然如此，“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①。

基于以上分析，阳明再次批评了当时在各级将领中普遍存在的以为只有调集邻省狼兵、土兵才能实施对敌围剿的依赖思想与畏敌情绪，强调指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貲，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氓。于是乎有横罹之惨，于是乎有妄杀之弊。”原于“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的观点，他要求朝廷授予他以更高的军事权力，“使得以大军诛讨之赏罚而行之平时，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时而惟成功是责，则比于大军之举，臣窃以为可省半费而收倍功”^②。“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③ 阳明的这一请求，至同年九月，获得了朝廷的正式许可，下令改授其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八面，得便宜行事。敕云：“特改命尔提督军务，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俱听便宜区画，以足军饷。但有盗贼生发，即便设法调兵剿杀，不许踵袭旧弊，招抚蒙蔽，重为民

① 以上均见《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全集》卷九，309～310页。

② 同上书，310页。

③ 同上书，311页。

患。其管领兵快人等官员，不问文职武职，若在军前违期并逗遛退缩者，俱听军法从事。生擒盗贼，鞫问明白，亦听就行斩首示众。”^①

事权的专一，使阳明能够摆脱许多相互掣肘的纠葛，从而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更为明确地贯彻他自己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意图。虽然实际要到九月阳明才“提督军务”，“得便宜行事”，但事实上，他在五月份上疏以后，即已经按照他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在进行一系列的战前筹备了。朝廷的任命，在某种意义上是“迟到”的，但它终究使阳明的全部工作获得了“合法性”。为解决“南、赣之兵素不练养”从而作战能力脆弱的问题，阳明对军队进行了重新编制，务使部伍严整；强化了军事训练，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同时，申明赏罚之典，严明军队纪律，为扫除横水、桶冈宿敌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

阳明认为：“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所据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预定。”为此，他将在编官军进行重新编制：每25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50人编为一队，队有总甲；200人编为一哨，哨有哨长、协哨二人；400人编为一营，营有官、参谋二人；1200人编为一阵，阵有偏将；2400人编为一军，军有副将。偏将不设定员，临阵而设。小甲从各伍之中选能力优胜者担任，总甲从小甲之中选能力优胜者担任，哨长从千户、百户、义官之中选能力优胜者担任。为严明军纪，他规定副将得以罚偏将，偏将得以罚营官，营官得以罚哨长，哨长得以罚总甲，总甲得以罚小甲，小甲得以罚伍众。“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编制既定，又分别设立“伍符”、

^① 《换敕谢恩疏》，《全集》卷一〇，334页。得到朝廷的敕谕以后，阳明随即将它抄送所属各守巡、兵备、守备及府、卫等官，以及府、卫、所、县各大小衙门，要求一体遵行。见阳明《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全集》卷一六）。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十二年）秋七月，王守仁请提督军务，许之。初，守仁上疏论狼兵所过，不减于盗，转输之苦，重困于民，乃谓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时。兵众既练，号令既明，事无掣肘，可以相机剿灭。众迂其议，屡不报。尚书王琼慨然曰：‘朝廷有此等人，不与以柄，又将谁用？’因守仁疏覆议，即奉旨改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卷四八，《平南赣盗》）按：阳明上疏是在五月，授提督军务的具体时间为九月十一日，均与“秋七月”无关，谷氏误。

“队符”、“哨符”、“营符”，“每五人给一牌，备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连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藏本院，谓之队符”；“每哨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哨长，一藏本院，谓之哨符”；“每营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营官，一藏本院，谓之营符”。强调凡有军事调动，须发符比号而行，以防奸伪；部伍的缉养训练之方，旗鼓进退之节，则务要逐一讲求，以收实用之效。^①

对军队进行重新编制，显然有利于部伍的整肃与军威的壮大，能够强化军、阵、营、哨、队、伍等各军事单位之间的相互勾连，使其凝聚成统一的整体，从而提升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对从民间招募的兵役人员，阳明又要求各兵备遴选部下骁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或五十人，集中到赣州城内教场进行集体操练，“除耕种之月，放令归农，其余农隙，俱要轮班上操。仍于教场起盖营房，使各有栖息之地；人给口粮，使皆无供馈之劳；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赏；违犯约束者，时与惩戒。如此则号令素习，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义素行，自然兴父兄子弟之爱；居则有礼，动则有威，以是征诛，将无不可矣”^②。

为解决军费短缺的问题，阳明于六月份上疏朝廷，请求疏通盐法，鼓励通商，藉盐税收入以补充地方财政而筹集军费。按照正德六年以前的旧例，广东之盐只允许到赣州、南安二府发卖，不许到邻近的袁州、临江、吉安三府发卖。正德六年，总制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左都御史陈金为筹措军饷，曾暂时允许广盐到袁、临、吉三府，立厂抽分，但到正德九年而终止。阳明调查了该项盐税的数目及其用途：“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设立抽分厂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终止，共抽过税银四万八百四十余两。陆续奉抚镇衙门明文支发三省夹攻大帽山等处赏功军饷，并犒劳过狼兵官军士兵口粮，并取赴饶州征剿姚源军前应用，及起造抽分厅浮桥，修理城池，买谷上

① 参见《兵符节制》，《全集》卷一六，541～542页。

② 《预整操练》，《全集》卷一六，542～543页。

仓，预备赈济，及遵巡抚军门批申，借支赣州卫官军月粮等项，支过税银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余两。”他由此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则地方粮饷之用，岁费不貲，而仰给于商税独重。前项商税所入，诸货虽有，而取足于盐利独多。”因此他要求仍行正德六年之例，允许广盐到袁、临、吉三府发卖，但取税有异，凡贩至赣州发卖，每10引抽1引；贩至袁、临、吉三府发卖，每10引抽2引，以备军饷之需。他认为：“赣、南二府，闽、广喉襟，盗贼渊藪，即今具题夹攻，不日且将命下，粮饷之费，委果缺乏。计无所措，必须仰给他省。但闻广东以府江之师，库藏渐竭；湖广以偏桥之讨，称贷既多；亦皆自给不贍，恐无羨余可推。若不请发内帑，未免重科贫民。然内帑以营建方新，力或不逮；贫民则穷困已极，势难复征。及照前项盐税，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两便，庶亦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①这一措施，不仅使军费来源获得了有效保证，而

① 《疏通盐法疏》，《全集》卷九，321~324页。按：该项疏通地方盐法的措施，实为阳明筹措军饷的重要举措，当时阳明曾谓待地方平靖以后，仍依正德六年以前旧例施行，即广盐仍只许行到南、赣二府，所以户部在批复中规定这一暂时性措施到正德十三年终止。自正德十二年正月，到正德十三年九月，共抽商税银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八两五钱八分七厘七毫五丝。两次用兵（征桶冈、浰头）共用银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七两二钱二分八厘四毫三丝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谷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实支用商税银一万八千三百一十八两三钱三厘三毫三丝三微，尚余二千四十四两五钱八分五厘七毫五丝一忽六微。南、赣战事基本结束以后，阳明认为，地方盐法的疏通，不仅有利于地方财政，而且亦保证了商贾的利益，更有利于民众的生活，遂于正德十三年十一月上书，建议再开广盐，“著为定例”，如此则可“籍其税课，以预备军饷不时之急；积其羨余，以少助内府缺乏之需；实夹公私两便，内外兼资”（《再请疏通盐法疏》，《全集》卷一一，383~387页）。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当地军民颇受其利。又按：课商税以筹军费的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曾发生官吏不按规定执行而骚扰、重课商人等事，阳明曾为此发布禁令，谓“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桥子之属，骚扰客商。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因此，他规定：“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桥子人等止许关口把守开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袭骚扰，违者许赴军门口告，照依军法拿问。”（《禁约榷商官吏》，《全集》卷一六，566~567页）这些观点与做法，体现了阳明对商人及商业的重视。嘉靖六年在广西，为平思恩、田州之乱，岭西道曾提出征收商税以补军费之需，阳明批文指出：“立税征商，本非善政；从权济急，似可暂行。仰该道仍行各该地方，务须历访居民之意，备询行旅之情。若果于事无扰，于商有便，可照议施行，不然，则毋以一时之获，遂贻一方之怨。慎之慎之！”（王阳明：《批岭西道税法呈》，《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嘉靖三十四年闰东序刻本）足见阳明对于商人利益的重视与保护的觀點是一贯的。

且促进了商品流通，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既减轻了中央财政的困难，又避免了重科于民，正所谓官商、军民两便，是有利于民生的实际利益的。

就当时四省边界地区的主要寇盗而言，漳南已经基本肃清，江西、湖广两省交界地区以横水、左溪、桶冈等处天险为主要据点的寇盗，便成为须集中军事力量进行重点打击的对象。从地理上来考虑，尽管广东龙川县境内盘踞在洊头一带的寇盗，与桶冈等处距离较远，但从战略上来考虑，由于各贼巢之间原有联络，声气互通，所以仍有必要既须防止攻打桶冈等处时敌人向广东境内奔突，又须防止广东境内之敌对桶冈等处的军事援助。因此阳明认为，必须先军事上使湖、赣之敌处于孤立地位，截断他们与广东之敌的情报与交通，同时须使广东之敌处于观望而不采取军事行动。为此，他于五月份对广东洊头贼巢发出安抚性的告谕，并犒以牛酒银布，希望他们诚心悔过，放弃军事对抗。其告谕之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喻之以义，告之以害，极见其诚恳恻怛之意。略曰：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寻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诬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

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以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①

这份告谕，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稳定了浰头贼巢，而且亦确有前来投诚的从贼人众。“是谕文蔼然哀悯无辜之情，可以想见虞廷干羽之化矣。故当时酋长若黄金巢、卢珂等，即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②

当时湖、赣、广三省交界地区的寇盗主要集中于江西省南安府

^① 《告谕浰头贼巢》，《全集》卷一六，561~563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45页。当时来投诚的浰头贼首，还有刘逊、刘粗眉、温仲秀等，见《浰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59页。

境内，上犹、大庾、南康三县，除贼巢小者未计，其大者总计三十余处，以谢志珊、萧贵模、蓝天凤等为首，拥众八千有余，且与邻近湖广省桂阳县、桂东县以及广东乐昌县诸处贼巢相联盘踞，流劫三省，为害多年。他们以横水、左溪、桶冈等处天险为屏障，行动迅疾，出劫无时，在阳明率军集中围剿漳南之寇时，其活动转趋频繁，气焰猖獗。四月份，大庾县被四百余人打破下南等寨，又被上犹、横水等处贼人七百余徒截路打寨，劫杀居民；南康县又被盗贼来龙句保地方虏劫居民，又被三百余徒突袭，虏捉男妇八十余人，耕牛一百余头；又有一伙贼人虏劫上龙井乡地方耕牛三百余头，男妇子女不知其数；广东浚头贼首池大鬃等三千余徒，突袭龙南县总甲寨所；上犹县贼首谢志珊纠合广东乐昌县高仲仁（高快马），统众二千余人，围攻南康县治，杀损官兵；湖广桂阳县、桂东县以及广东乐昌县等地，盗寇活动亦愈益频繁。^① 到六七月份，“大贼首谢志珊号‘征南王’，纠率桶冈等巢贼首钟明贵等，约会广东大贼首高快马等，大修战具并吕公车，欲要先将南康县打破”。“至七月二十五日，贼首谢志珊果复统众一千五百余徒，攻打南安府城。”“八月二十五日，贼首谢志珊又统领二千余徒，复来攻打南安府城。”^② 这些活动，的确给朝廷造成了重大压力，亦使谢志珊等人的活动具有了某种政治意义。还在五月份阳明给朝廷的奏疏之中，他即曾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桶冈等处盗寇，“占据居民田土数千万顷，杀虏人民尤难数计。攻围城池，敌杀官兵，焚烧屋庐，奸污妻女；其为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讨所当必加者也”^③。“臣等参看得前项贼徒，恶贯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痈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溃肺决肠。”^④ 但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看，漳南战役刚刚结束，军队需要休整，若立即进行三省围剿，则兵力、军费等方面均有不足，更兼湖

① 参见《攻治盗贼二策疏》，《全集》卷九，311~315页。

② 《议夹剿方略疏》，《全集》卷一〇，331~332页。

③ 《攻治盗贼二策疏》，《全集》卷九，313页。

④ 同上书，315页。

广、广东二省亦皆有兵事，同样亦存在兵力、财力不足的问题，“近年以来，江西有姚源之役，疮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军旅未旋；府江之师方集于两广，偏桥之讨未息于湖湘。……若复加以大兵，民将何以堪命？”^① 因此他认为宜暂缓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欲约会夹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连绵，草木茂盛，非惟缓不及事，抑且虚糜粮饷。合无一面募兵练武，防守愈严，积谷贮粮，军需大备。告招抚者，顺其情，暂且招安；肆恶者，乘其间隙，量捣其穴。候三省约会停当，然后大举，庶有备无患，事出万全”^②。他要求朝廷赋予他更高的军事权力，不限以时，唯责其成，正是以这种情形为背景的。在此期间，虽然与敌人交锋的小规模战事不少，官兵亦曾取得过局部的胜利，但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进行集中打击的大规模战争，阳明认为时机仍未充分成熟。而经过数月的准备，各方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观，阳明遂决定于九月中旬实施对敌围剿。^③

因此从七月上旬开始，征剿横水、桶冈的战役进入实质性的军事谋划阶段，阳明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周密的军事部署。基于江西、湖广、广东三省交界地区的地理形势以及各处贼巢活动的实际情形的分析，阳明认为，尽管三省毗连，地形相接，各处巢穴有比较频繁的相互联系，若要一举荡灭该地诸处贼巢，三省夹攻，同时举兵，应是常规，为“事体之常”，“然兵无定势，谋贵从时，苟势或因地而异便，则事宜量力以乘机。三省贼巢，连络千里，虽声势相因，而其间亦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④。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广东方面因府江之役，兵力调集相对困难，所需时日较多，如必欲等广东军队大集，再行三省夹攻，则赣、湖“两省之兵既集，久顿而

① 《攻治盗贼二策疏》，《全集》卷九，316页。

② 同上书，312～313页。

③ 从王阳明《议夹剿兵粮疏》等文可知其进剿的时间原定于九月中旬，实际则推迟到十月初七。

④ 《议夹剿方略疏》，《全集》卷一〇，333页。

不进，贼必惊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潜逃；老师费财，意外之虞乘间而起，虽有智者，难善其后”。因此在总的战略决策上，阳明认为，对桶冈等地的战役，名义上虽为三省围剿，但战争的具体进程则应有先后次第。他提出了总战略：先合湖广、江西之兵，围歼上犹诸贼，这样可为广东军队的调集赢得时间；待广东军队既集，则合广东、湖广之兵，并力而举乐昌诸处，这样又可使江西之兵得到暂时的休整；最后又合广东、江西之兵，并力而举龙川浰头等处。按照他的谋划，“方其并力于上犹，则姑遣人佯抚乐昌诸贼，以安其心。彼见广东既未有备，而湖广之兵又不及己，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犹。及夫上犹既举，而湖广移兵以合广东，则乐昌诸贼，其势已孤，二省兵力益专，其举之益易。当是之时，龙川贼巢相去辽绝，自以为风马牛不相及，彼见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师之日，出其不意，回军合击，蔑有不济者矣”^①。“三省夹攻事宜，集兵有先后，期约有迟速，如上犹、大庾之贼，江西先与湖广夹攻，止今广东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广东兵力已齐，听湖广、广东约会夹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广东、湖广夹攻已毕，广东之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龙南，又行约会夹攻。如此庶先后有序，事机不失，兵力不竭，粮饷可省。”^②这是阳明在战前所提出的基本战略，但围剿龙川县浰头贼巢的战争，实际上却并没有作为此次桶冈战役的一部分，而是到了本年底才实施的另一次单独的军事行动。

按照阳明这一孤立敌军、分兵合击的基本构思，各项战前的军事筹备活动得以顺利有序地开展起来。阳明行文湖广郴州兵备道，要求派遣“素有胆略，才堪将领，熟知贼寨险夷，备晓盗情向背，忠慎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来军门，凡遇地方机务，即与密切商度，往来计议”^③，并要求广东、湖广各官，“起集骁勇机快、父子

① 以上均见《议夹剿方略疏》，《全集》卷一〇，333页。

② 《咨报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秦夹攻事宜》，《全集》卷一六，548页。

③ 《选募将领牌》，《全集》卷一六，543页。

乡兵，选委素有能干官员统领，各于贼行要路，昼夜严加把截。或遇前贼奔逃，就便详察险易，相机截捕”。或于诸贼可能潜逃的山寨，“多张疑兵，使贼不敢奔往”，“务要虑出万全，不得堕贼奸计”。要求各道派出间谍，密切注意敌人动静，“各道仍须分投爪探，出奇设伏，先事预防，但得贼中虚实，差人飞报军门”^①。在兵力的整体配置上，阳明将军队分为二部：一为防守之兵，一为剿袭之兵。他从各县抽调三分之一兵力以补充“剿袭之兵”，预留三分之二作为“防守之兵”。“各县所留之兵，止于防守；而兵备所选之士，将以剿袭。防守之兵，虽老弱皆可以备数；而张威剿袭之士，非精锐不可以摧锋而陷阵。”^②为防止官军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错杀良民，阳明又要求各官将上犹、南康、大庾三县所属村寨进行统计，严格区分是否与贼相通，并在地图上进行详细标注，给予各村寨良民以“良善旗号”，临期拨兵护守，以防错杀。^③

三省合兵剿袭的主要对象集中在南安府境内，以横水、桶冈、左溪三地为核心，而尤以桶冈之敌最为强大，地形亦最为险要。当时议者以为应合湖广、江西之兵，先攻桶冈，而阳明认为：“桶冈、横水、左溪诸贼，荼毒三省，其患虽同，而事势事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诸巢为贼之咽喉，而横水、左溪诸巢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诸巢为贼之腹心，而桶冈诸巢为之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今议者纷纷，皆以为必先攻桶冈，而湖广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贼见我兵未集，而师期尚远，且以为必先桶冈，势必观望未备。今若出其不意，进兵速击，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临桶冈，破竹之势，蔑不济矣。”^④在阳明看来，就江西诸处贼巢而言，横水、左溪实为腹心之患，若先攻桶冈，则势必先绕

① 《咨报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秦防贼奔窜》，《全集》卷一六，545页。

② 《批广东韶州府留兵防守申》，《全集》卷一六，544页。

③ 参见《咨报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秦夹攻事宜》，《全集》卷一六，547~548页。

④ 《横水桶冈捷音疏》，《全集》卷一〇，343~344页。

过横水、左溪，不仅有长途奔袭之劳，而且有可能前迎桶冈之敌，背受横水、左溪之敌，反而陷入敌军的两面夹击；若先攻横水、左溪，则可以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因此他决意先攻横水、左溪。但他同时又认为，可以利用先攻桶冈的舆论，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有利于官军攻其不备。为此，他亲自率军千余进屯南康县，临阵督战，期与诸军会合于横水，同时严密布置了各哨官军的进军路线及其主要任务：

1. 江西赣州府知府邢珣率兵千余，自上犹县石人坑进，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过白封龙等处，经朱坑、旱坑，入杨梅村，主攻白蓝、横水诸巢，而与都司许清、指挥谢昶和姚玺、知县王天与等所率官兵会合，共结为一大营。乃各选精锐，用向导分引，搜剿附近茶坑等处余贼，务期尽绝，待左溪诸贼既尽，奔袭桶冈，与知府唐淳、指挥余恩和谢昶等所统官兵合势夹击，与诸营会合。

2. 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率兵千余，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桥、浮江、合村等处进屯大庾县聂都，会同推官徐文英，袭击上关、下关诸处，然后兵分三路，进击左溪。三路复合为一，与阳明本人会师于横水，又与守备郑文、知府季敦、指挥余恩、县丞舒富等会师，结为一大营。乃各选精锐，用向导分引，搜剿余敌，务期尽绝，待左溪之贼既尽，然后分哨起营，与知府邢珣、指挥余恩所统官兵，合势夹击桶冈。

3. 江西南安府知府季敦统兵千余，自南安府石人背进，破义安等处，分兵搜剿各处余贼，屯兵于大庾县稳下，奔袭左溪，并与阳明本人会师于横水，复与守备郑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挥余恩、县丞舒富等兵会合，结为一大营。各选精锐，用向导分引，搜剿各处余敌，务期尽绝，待左溪之敌既尽，然后分哨起营，过密溪等处，截断葫芦洞等处敌人的退路，四面设伏，以待桶冈溃奔之敌，同时又作为都指挥许清的援兵。

4. 江西都指挥僉事许清率兵千余，自南康县所溪进，破溪湖等处，进击白蓝，而与阳明本人会师于横水，又与知府邢珣等兵会合，结为一大营。乃各选精锐，用向导分引，搜剿附近各山寨余敌，务

期尽绝，待横水诸贼既尽，然后分哨起营，自横水穿牛角窟等处，会于左溪，又入密溪等处，屯兵于左泉，截断西山界、葫芦洞等处敌人的退路，四面设伏，以待桶冈溃奔之敌，然后回师屯于横水，控制敌人诸巢穴，以与知府季教相互策应。

5. 守备南赣指挥使郑文率兵千余，前往南安府，自上犹县石人坑，度汤瓶岭，破义安、上西峰等处，进袭左溪，与阳明本人会师于横水，又与知府唐淳、季教、指挥余恩、县丞舒富等兵会合为一大营。乃各选精锐，用向导分引，搜剿附近山寨余贼，务期尽绝，等左溪附近诸贼既尽，然后分哨起营，自左溪过密溪，搜剿诸处余敌，屯兵于十余磊，截断下章等处敌人退路，设伏以待桶冈溃奔之敌，同时又为知府唐淳之援兵。

6. 赣州卫指挥余恩率兵千余，自上犹县官隘，翻越独脚岭，至营前，屯兵于金坑，破长流坑等处，协攻左溪，与阳明本人会师于横水，又与县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教、守备郑文等兵连结为一大营。乃各选精锐，用向导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务期尽剿余敌，待左溪之敌既尽，然后分哨起营，过密溪等处，从左溪入西山界，会合知府邢珣、唐淳、指挥谢昶等，夹击桶冈。

7. 宁都县知县王天与，督同典史梁仪，率兵千余，自上犹县官隘等处，由白面寨至长潭，经杰坝，屯兵于石玉，分兵搜剿樟木坑，自黄泥坑，经大湾，人员分，与阳明本人会合于横水，又与知府邢珣、都司许清之兵合为一大营。各选精锐，开合纵横，搜剿附近山寨，务期余敌尽绝，待横水等处之敌既尽，然后分哨起营，过乌背坑等处，沿途搜剿，屯兵于下新地，于各险要处设伏，以待桶冈溃奔之敌，又为知府邢珣的援兵。

8. 南康县县丞舒富率兵千余，自上犹县营前、金坑进，屯兵于过步，破长流坑，攻左溪，与阳明本人会师于横水，又得与知府邢珣、唐淳、季教、守备郑文等兵会合，连结为一大营。各选精锐，用向导分引，搜剿附近如鳌坑、箬坑、左溪等处余敌，然后分哨起营，一路搜剿，屯兵于锁匙龙，四面设伏，以待桶冈溃奔之敌，并

与王天与所率军队相互策应。

9. 江西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率兵千余，前去于大庾县稳下屯扎，会同守备郑文，协力搜剿稽芜等处贼巢，进屯横水，然后进攻桶冈。

10. 广东潮州府程乡县知县张戢，统领部下新民、打手、乡夫人等，搜剿稽芜、新地等处贼巢，进屯横水，然后进攻桶冈。

阳明同时对各哨官兵发布了十分严格的军令，如：“失误军机者斩。临阵退缩者斩。违犯号令者斩。经过宿歇去处，敢有搅扰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斩。”“贼巢财物，并听杀贼已毕差官勘验给赏，敢有临阵擅取者斩。乘胜逐贼，不许争取首级；路有遗下金银宝物，不许低头拾取，违者皆斩。”^①等等。

以上10哨，构成了攻击横水、左溪、桶冈等处的主力。显而易见，其部署是十分严密的，既确保了对敌人的重要据点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围剿，又部署了在敌人溃退奔突情况下对其进行堵截、搜剿的足够兵力，其基本主张是分割、孤立敌军，使其不能相互策应救援，而始终处于官军的攻击范围之内；其进军的基本路线则是先横水，次左溪，最后诸军皆会于桶冈，集中优势兵力对其进行围剿。阳明约定各路官军俱于十月初七日夜，按其预定路线同时进发。

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齐发。初九日，阳明亲率军队进驻南康，次日，屯兵于至坪。“使间谍四路分探，皆以为诸贼不虞官兵猝进，各巢皆鸣锣聚众，往来呼噪奔走，为分投御敌之状，势甚张皇；然已于各险隘皆设有滚木礮石，度此时贼已据险，势未可近。”说明各路官兵齐进，起到了突袭而攻敌不备的效果，但敌军的反应亦非常迅速，随即据险隘抵御。阳明指挥军队乘夜进军，十一日傍午时分，在距离敌巢30里处安营扎寨，“使人伐木立栅，开堑设堠，示以久屯之形。”至夜，使善于登山者400人，各与一旗，携带銃砲钩镰等

^① 以上各路官兵进军路线，详见《征剿横水桶冈分委统哨牌》，《全集》卷一六，548～555页。

器具，从间道攀崖壁而上，分别占据远近山顶，命其张立旗帜，燃烧茅草为数千灶，待官兵至敌险隘之时，则举砲燃火，相为响应。十二日早，阳明进兵至十八面隘。“贼方据险迎敌，聚闻远近山顶砲声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复呼噪奋逼，铕箭齐发；贼皆惊溃失措，以为我兵已尽入破其巢穴，遂弃险退走。”“我兵乘胜骤进，声震天地。”此时指挥谢昶等兵已由间道先入，尽焚贼巢，“贼退无所据，乃大败奔溃”，官兵遂克长龙、十八面隘等巢，继又克白蓝、横水大巢。

谢志珊、萧贵模等，原以为横水居众山之中，自然天险，官兵必不能克，及“闻官兵四进，仓卒分众扼险，出御甚力。至是，见横水烟焰障天，铕砲之声撼摇山谷，亦各失势，弃险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奋勇力战而入”。与此同时，知府邢珣、知县王天与、都指挥许清，亦各率其所统官兵攻克预计各巢，皆会兵于横水。知府唐淳按预定进军路线，攻克左溪大巢。而守备指挥郑文、指挥余恩、县丞舒富、知府季教，亦各按原定路线扫荡沿途各巢，皆会兵于左溪。守巡各官随后亦皆督兵而至。仅十二、十三两日，“擒斩首从贼人、贼级并俘获贼属男妇、夺回被虏人口、牛马、赃仗数多，其余自相蹂践、堕岸填谷而死者不可胜计。当是时，贼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树，设阱埋签，不可行。我兵昼夜涉深漳，蹈丛棘；遇险绝，则挂绳崖树，鱼贯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堕深谷”。“各兵已至横水、左溪，皆困甚，不复能驱逐。会日已暮，遂令收兵屯扎。”十四日，天雨，山中大雾甚浓，“咫尺不辨，连数日不开”。阳明遂令各营休兵享士，而使向导数十人四出打探敌人逃遁的去向以及尚未攻克诸巢敌人的动静。十五日，得各向导回报诸敌动向，知其虽有所备，但备御不严，不意官兵进军如此之速，故若分兵四击，可以尽获。阳明认为，因与湖广相约围剿桶冈的时间是在十一月初一，时间已紧，此地距离桶冈有100多里，山路险峻，需三日始能到达。但若横水、左溪周围诸敌不尽，而移兵桶冈，则有后顾之忧。为此，他令各营将所统官兵分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袭其后，冒雨

雾迅速挺进，分投急击。^①到二十八日，各路官兵分别攻破附近各巢，左溪、横水一带诸敌遂基本剿灭。

此时，各营官兵请乘胜进攻桶冈。阳明认为：“桶冈天险，四面青壁万仞，中盘百余里，连峰参天，深林绝谷，不睹日月。中所产旱谷、薯蕷之类，足饷凶岁。往者亦尝夹攻，坐困数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抚为名而罢。”因此不能贸然进兵。他询访向导，了解到进入桶冈的入口，只有锁匙龙、葫芦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处地方，“然皆架栈梯壑，夤悬绝壁而上。贼使数人于崖巅，坐发礮石，可无执兵而御我师”。因此强攻必然会冒更大的风险。虽然还有上章一路亦可通桶冈，而且地势稍平，但该地深入湖广，若迂回取道，要半月始能到达，而且这原是预定湖广官兵夹攻桶冈的进军路线，若此时各军取道上章，非但有长途奔波之劳，而且无法形成夹攻之势，更何况横水、左溪余敌皆已逃入桶冈，其同难合势，为守必力。出于多方考虑，阳明认为，此时避免一味强攻而对敌人进行劝降反而是有效的，“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今我欲乘全胜之锋，兼三日之程，长驱百里而争利，彼若拒而不前，顿兵幽谷之底，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养锐，振扬威声，先使人谕以祸福，彼必惧而请服。其或有不从者，乘其犹豫，袭而击之，乃可以逞”。于是，他遣原与桶冈有旧交的义官李正岩、医官刘福以及俘获的桶冈之贼钟景，开释其罪，使于二十八日夜悬壁进入贼巢劝降，预期于十一月初一日于锁匙龙受降，因此他遣县丞舒富率兵数百屯于锁匙龙，促使敌军出降。又遣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县张戢入葫芦洞，预定各军皆于三十日夜到达指定地点，因遇大雨，无法进军，遂于十

① 阳明于此时曾发布搜剿余敌的号令，要求各军务于三日之内扫除横水、左溪一带余敌，认为：“若不乘此破竹之势，疾速急击，使诸贼声势复得连络，用力益难。为此，牌仰该道官吏，严督各营官兵，星夜速进，务在三日之内扫荡余孽，必使噍类无遗。敢有徇于一胜，怠忽因循，逗遛不进，致误军机者，仰即遵照敕谕事理，当时以军法从事。”参见《搜剿余党牌》，《全集》卷一六，556页。

一月初一日早，诸军冒雨疾登。当此之时，蓝天凤方就是否出降的问题与众会议，“闻各兵已入险，皆惊愕散乱，犹驱其众千余人，据内隘绝壁，隔水为阵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击，张戢之兵冲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张戢右悬崖而下，绕贼旁击。贼不能支，且战且却。及午，雨霁；各兵鼓奋而前，乃败走。县丞舒富、知县王天与所领兵，闻前山兵已入，亦从锁匙龙并登。各军乘胜擒斩，贼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复严阵迎贼，又败。然会日晚，犹扼险相持。次早，诸军复合势并击，大战良久，遂大败”。至十一月初十午时，以知府邢珣所统官兵为主力，攻破桶冈大巢。各路官兵又按预定进军路线袭击其周围各巢，皆破之。然敌人大势虽败，结阵逃遁者尚多。阳明遂指挥各路官军分布扼守各要冲之地，对敌人进行全面的围追堵截，荡灭敌军据点多处，到十一月十三日，“桶冈之贼略尽”^①。

到十一月十六日，广东鱼黄地方诸敌因被湖广之兵攻袭，上千人奔突进入江西省境。阳明闻知以后，又立即重新布置兵力，对其展开搜剿，至十二月初三，“奔遁之贼殆尽”。但考虑到湖广、广东二省之兵仍在合力进行局部围剿，为防止再有敌军四散奔突，阳明遂在茶寮、横水布置2000余兵力留守，其余官兵俱于初九日回军于近县，以休息疲劳。至此，横水、桶冈之役遂告基本结束。^②

是役实际只用2个月时间，“通计捣过巢穴八十余处，擒斩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等八十六名颗，从贼首级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颗，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夺回被虏男妇八十三名口，牛马骡

① 以上关于战争过程的叙述及引文，详见《横水桶冈捷音疏》，《全集》卷一〇，344～348页。

② 这次战役，阳明在战前对其艰苦程度作了充分的考虑与周详的准备，并命湖广方面于一月初一发兵，对桶冈实施夹击。但战争的实际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要顺利得多，以至于桶冈已破，而湖广之兵尚未进入江西边境，因此湖广之兵实际上并未参与桶冈之役。但阳明在差人告知湖广统兵参将史春不必过境的同时，仍然对其进行了嘉奖，送去诸种礼物，“看得桶冈天险，先经夹剿，围困半年，终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诸将用命，军士效力，实亦湖广兵威大震，有以慑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溃，以克收兹全功。访得湖广统兵参将史春，纪律严明，行阵肃整，故能远扬威武，致兹克捷，虽兵不接刃而先声以张，相应差官奖励”（《奖励湖广统兵参将史春牌》，《全集》卷一六，557页）。

六百八只匹，赃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银一百一十三两八钱一分；总计首从贼徒、贼属、牛马、赃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颗口只件”^①。各路军队稍事休整以后，阳明遂令班师。

横水、桶冈之役，前后不过三个月，一举而荡平数十年之寇，使地方复归安定，这是符合当时众多百姓的利益，因此当阳明于十二月十五日班师经过南康的时候，“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②。故当时舆论以为阳明“亲率诸军捣其巢穴，擒其首恶，妖氛为之扫荡，地方为之底宁；三县之民欢欣鼓舞，如获更生”^③。

阳明于十二月二十日回到赣州。他照例对各有功官兵进行了嘉奖，上书朝廷为其请功，同时亦为地方的长久安定作了深远考虑。他首先在桶冈腹地茶寮设立隘所，使其成为要塞，分拨军兵，委官防御，以控制湖广、江西二省的边界交通。^④而横水、左溪、桶冈等处，在地域上界于上犹、南康、大庾三县之间，东西南北相去皆300余里，地处僻远，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为盗贼渊藪，正与该地向来政治管理疲弱大有关系。从地理形势来看，横水去三县距离适中，又襟控原先各大贼巢盘踞之地，既属于交通要道，而又山水合抱，土地平旷。阳明认为，为强化该地的政治管理，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以涵养道德人心，防止盗贼的再次发生，宜于此地筑城。当驻军横水时，他曾亲自勘察地形，相视形势，且在横水创筑土城，设关隘以控制三省交通往来之路。战争结束以后，他又会同各府县商议，拟在横水设立县治，庶保地方永久平安。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他正式向朝廷上书，请在横水创立县治，并议定了新县的管辖范围，因新县治所在地原属上犹县崇义里，故名新县为“崇义”。他请求朝

① 《横水桶冈捷音疏》，《全集》卷一〇，348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47页。其班师至南康及到赣州的时间，参见《洊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61页。

③ 《立崇义县治疏》，《全集》卷一〇，350页。

④ 参见《设立茶寮隘所》，《全集》卷一六，557~558页。

廷：“俯顺民情，从长议处，早赐施行，并儒学巡司等衙门一体铨选官员，铸给印信。如此，则三省残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无潜匿之所而不敢逃。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久安长治，无出于此。”^① 这项建议随即获得了朝廷的批准，新县治遂于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开始正式营建，各项土木工程包括城墙则到八月末基本完工。因考虑到新县创设伊始，“凡百草创，为县官者若非熟知地方与凡捕盗安民之术，民情土俗之宜皆能洞晓，举而用之，鲜不败事”^②，遂委原南康县县丞舒富职掌新县事。

横水、桶冈之役的结束，标志着四省毗连地区的盗贼已大部肃清，官军的连续胜利，使江西与广东交界地区以浰头为主要盘踞地的盗贼愈加处于孤立地位。桶冈之役甫告结束，阳明便又开始策划对浰头实施围剿。

（三）浰头之役。是役开始于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七，结束于三月初八，实是2个月。战争目的：肃清广东龙川县境内以浰头为主要据点、以池仲容（大鬃）等为主要首领的寇盗；战争地点：江西省龙南县以南、广东省龙川县以北的两省边界地区。

浰头处于广东省龙川县北部与江西省交界之处，分上、中、下三浰，属九连山区，山脉绵延，青嶂接天，地形极为复杂险要。以池仲容为首的浰头之贼，依托九连山天险，四处劫掠，出攻退守，行动迅速剽悍，其活动范围及于江西信丰县以南，包括安远县、龙南县在内，广东始兴县、翁源县以东、龙川县以北的广大区域。他们“盘据一方，历有岁年，僭称王号，伪设官职；广东翁源、龙川、始兴，江西龙南、信丰、安远、会昌等县，屡被攻围城池，杀害官军，焚烧村寨，虏杀男妇，岁无虚日。曾经狼兵夹攻数次，俱被漏网。是乃众贼奸雄之巨擘，三省群盗之根源也”^③。在当时四省边界地区的众寇当中，实以浰头实力最为强大。阳明在策划横水、桶冈之役时，他的全盘策略是先

① 《立崇义县治疏》，《全集》卷一〇，352页。

② 《再议崇义县治疏》，《全集》卷一一，377~380页。

③ 《浰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58页。

攻横水，次攻桶冈，最后与广东会兵攻取浰头，“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①，正体现了他对浰头的重视。但在他的严密谋划之下，浰头之役的全过程非但势如破竹，且几乎有了某种喜剧的色彩。

上文提及，阳明在谋攻横水、桶冈时，为防止浰头出兵支援，曾对浰头发布告谕安抚，当时黄金巢、刘逊等皆被感召而率众投诚，而池仲容“独愤然谓其众曰：‘我等做贼已非一年，官府来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为凭！待金巢等到官后，果无他说，我等遣人出投，亦未为晚。’”金巢等至官府，阳明“乃释其罪，推诚厚抚”，金巢等为显示其诚意，愿加入横水之役，以杀贼立功。阳明于是“藉其众五百余，悉以为兵，使从征横水”。十月十二日，横水破，池仲容听说以后，开始感到恐惧，认为待桶冈破后，阳明定会对其用兵，遂与其他首领池仲宁、高飞甲等商议，一方面加紧备战，另一方面又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人众 200 余，出来假意投降，要求随众立功，而其本意则在探听虚实，欲乘机作为内应。池仲容的这一计谋虽立即被阳明所识破，但他仍不动声色，假意答应了池仲安的要求。在进攻桶冈时，阳明使池仲安率其众于上新地把截，其意图是要使他们更远离浰头老巢。阳明既“内严警御之备，以防其衅；外示宽假之形，以安其心”，又密遣使者召集浰头附近各县被害者数十人前来商议，“问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贼狡诈凶悍，非比他贼。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谋，人不能测。自知恶极罪大，国法难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备，亦极险谲。前此两经夹剿，皆狼兵二三万，竟亦不能大捷。后虽败遁，所杀伤亦略相当。近年以来，奸谋愈熟，恶焰益炽”。官府实无可奈何，每以调狼兵予以恐吓，而池仲容曰：“狼兵易与耳！纵调他来，也须半年；我纵避他，只消一月。”因此愈加肆无忌惮。舆论以为，要剿灭浰头贼巢，必须大调狼兵，若不如此，则事恐难济。阳明认为：“兵无常势，在因敌变化而制胜。今各贼狃于故常，且谓必待狼兵而后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② 于是密布方

① 《浰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59 页。

② 同上书，359～360 页。

略，使数十人各归其县，召集部众，等官军围剿日期既定，各占据要塞之处予以策应。^①

十一月，桶冈被攻克以后，池仲容愈加感到恐惧，备战益严。阳明闻知后，遣人公开至其据点，以赐其牛酒为名，实则察其虚实，以观其变。池仲容既无法隐瞒其备战的实情，遂辩解说，他之所以备战是因为得到消息，龙川县的卢珂、郑志高等要来偷袭，并不是为了防备官军。卢珂、郑志高等，原先亦曾从贼，被阳明感召而投诚，有兵众3000余人。卢珂与池仲容素有矛盾，相互仇恨，阳明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未发兵前即设计将池仲容诱捕成功，成为洴头之役颇有喜剧性的序幕。

池仲容既谓卢珂要来偷袭，故密为之防，阳明当时佯信其言，谓卢珂等擅兵仇杀，罪不容诛，遂移檄龙川县，使严加查访，同时又使贼人伐木开道，声称回兵时将取道洴头，前往征讨卢珂。池仲容见状，既希望阳明所言是实，真为征伐卢珂而作准备，却又担心阳明的真意在假道征讨洴头，所以且喜且惧。十二月十五日，阳明班师至南康县，卢珂、郑志高来告，谓：“池仲容等僭号设官，今已点集兵众，号召远近各巢贼首，授以‘总兵’、‘都督’等伪官，使候三省夹攻之兵一至，即同时并举，行其不轨之谋。”这些情况，其实阳明早已知晓，但为诱捕池仲容，他仍对卢珂作出愤怒的样子，以为池仲容有意投诚，而卢珂等擅兵仇杀投招之人，罪已当死，现又伪造谎言，乘机诬陷，遂将卢珂绑缚收监，声称要将他处死。当时池仲安等人皆在军营，见卢珂等来告状，大惊失色，而见卢珂被缚，又都转惊惧为欢喜，“罗拜欢

① 阳明盖于此时就洴头之役作出了整体的军事部署。他行文广东惠州府知府陈祥，“速将合用粮饷等项，一面从长议处，一面即于所属选集精壮骁勇、曾经战阵机快兵壮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备锋利器械，编成队伍，坐委素能谋勇官员统领；一面密行龙川、河源等附近贼巢等县，亦各选募惯战杀贼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义官、新民、头目人等，分截要路”。并令陈祥“总督诸军，亲至贼巢去处，指画方略，克期进剿”，对洴头周围的地形，必须详尽了解，“要见某处平坦，人马可以直捣；某处险阻，可以把截；某处系贼必遁之路，可以设伏邀击；某处贼所不备，可以间道扑掩；各要一一详察停当，务尽机宜，具由连图差人马上赍报”（《进剿洴贼方略》，《全集》卷一六，563页）。

呼，竟诉珂等罪恶”，而阳明亦“阳令具状，谓将并拘其党属，尽斩之”，而暗中则向卢珂讲明要利用他来诱捕池仲容的真相，并要他先派人回去召集人马，作好准备，一等卢珂放回，即发兵策应。十二月二十日，阳明率军返回赣州，大享将士，颁下号令，谓横水、桶冈等处贼巢已尽行荡灭，而洊头则有诚心归化之意，地方已经安定，民久劳苦，亦宜暂休为乐，“遂散兵使各归农，示不复用”。“而使仲安亦令众归，助其兄防守，且云卢珂等虽已系于此，恐其党致怨，或掩尔不虞。仲安归，具言其故，贼众皆喜。”于是洊头的战备便松弛下来。而此同时，阳明又派指挥余恩前往洊头，对池仲容颁赐历书，假行招安，并告诫他防守不可松懈，以备卢珂来袭，仲容等愈加欢喜；又派黄表、雷济等游说仲容，谓：“今官府所以安辑劳来尔等甚厚，何可不亲往一谢！况卢珂等日夜哀诉反状，乞官府试拘尔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证反状之实；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诉珂等罪恶，官府必益信尔无他，而谓珂等为诈，杀之必矣。”仲容以为然，乃谓其众曰：“若要伸，先用屈。赣州伎俩，亦须亲往勘破。”^①遂率其麾下 40 余人，亲自前往赣州。

至此，阳明诱捕池仲容的计策可谓已经得逞。池仲容一离开洊头，阳明便立即秘密地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使洊头处于严密的军事控制之下。^②他“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属县勒

① 《洊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61～362 页。

② 阳明将攻击洊头的官军分为 10 哨：1. 惠州府知府陈祥统领典史姚思衡、驿丞何春、巡检张行、报效生员陈经世、新民卢琢等官军，从龙川县和平都人，攻热水巢、五花障巢、铁石障巢，直捣中洊大巢；2. 赣州府知府邢珣统领知县王天与、典史梁仪，并老人叶秀芳、黄启济、义官吴明等官兵，从龙南县太平保人，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黄田坳巢、中村巢，直捣上洊大巢；3. 指挥姚玺统领新民梅南春等兵，从龙川县乌虎镇人，攻淡方巢、石门由巢，直捣岑冈大巢；4. 指挥余恩统领百夫长王受、黄金巢等兵，从龙南县龙子岭人，攻谿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捣下洊大巢；5. 千户孟俊统领义官陈英、郑志高、新民卢琢等官兵，从龙川县和平都人，攻平地水巢、大门山巢、黄狗坳巢，直捣中洊大巢；6. 推官危寿统领义民叶芳、百夫长孙洪舜等官兵，从龙南县南平人，攻脱头石巢、镇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捣中洊大巢；7. 知府季教所统官兵，从信丰县黄田冈人，攻新山径巢、古地巢；8. 县丞舒富所统官兵，从信丰县乌径人，攻旗岭巢、顿冈巢；9. 守备指挥郑文率军从龙南县冷水径人，监督姚玺、余恩、孟俊三哨官兵，分路进剿；10. 阳明亲率帐下随军官属兵快人等，从冷水径人，直捣下洊大巢，并亲自督促诸路官军。参见《克期进剿牌》，《全集》卷一六，564 页；并参见《洊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62 页。按：守备指挥郑文，《克期进剿牌》等或作“郁文”，作“郑文”是。

兵，分哨道，候报而发。又使千户孟俊先至龙川，督集卢珂、郑志高、陈英等兵；然以道经浰巢，恐摇诸贼，则别赍一牌，以拘捕卢珂党属为名。各贼闻（孟）俊往，果遮迎问故，俊出牌视之，乃皆罗拜，相争导送出境。俊已至龙川，始发牌部勒卢珂等兵。众贼闻之，皆以为拘捕其属，不复为意”。闰十二月二十三日，池仲容至赣州，“见各营官兵皆已散归，而街市多张灯设戏为乐，信以为不复用兵。密赂狱卒，私往觐卢珂等，又果械系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归，报其属曰：‘乃今吾事始得万全矣！’”而在当夜，阳明便释放了卢珂、郑志高等，使其连夜驰归发兵，作好攻取浰头的各项准备。同时，他又令所属官僚，依次轮流设宴，日日犒劳池仲容等，以缓其归。到十三年正月初三，阳明估计卢珂等已经到家，而周围各县兵众亦已调集待命，遂以设宴为名，预伏兵士于庭，“引仲容入，并其党悉擒之。出卢珂等所告状，讯鞠皆伏，遂置于狱”^①。

池仲容的就擒，以及前此所造成的各种假象，既使敌人失去了最高首领的统一指挥，又使敌军处于战备松懈的状态，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浰头之役的顺利进展。在池仲容就擒的当天夜里，阳明即对各路领兵官发出了克期进剿浰头的号令，俱于正月初七日黎明（寅时），各路官兵同时按各自预定的进军路线向浰头发起进攻。

十三年正月初七，浰头战役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由于浰头先前曾得到池仲容送回的书信，谓赣州已罢兵不复用，因此毫无作战

① 《浰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58～362页。按：《年谱》谓池仲容至赣州，随从人众有93人，皆悍酋，至赣州后，先至教场，而自以数人入见，“先生（阳明）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见而营教场，疑我乎？’仲容惶恐曰：‘听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宫，（仲容）见物宇整洁，喜出望外。是时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参随数人馆伴（仲容），复制青衣油靴，教之习礼，以察其志意所向。审其贪残终不可化，而士民咸诉于道，曰：‘此养寇贻害。’先生复决歼魁之念矣。逾日，（仲容）辞归，先生曰：‘自此至三浰八九日，今即往，岁内未必至家；即至，又当走拜正节，徒自取劳苦耳。闻赣州今岁有灯，曷以正月归乎？’数日，（仲容）复辞，先生曰：‘正节尚未犒赏，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于营，以次日宴。是夕，令龙光潜入甲士，诘旦，尽歼之。先生自惜终不能化（仲容），日已过未刻，不食，大眩晕，呕吐”（《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49～1250页）。据此，则不仅可补足诱捕池仲容的一些细节，而且亦可见当时阳明确曾有招降池仲容的诚意。

准备。官军的四处突袭，首先使他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先是，贼徒得池仲容报，谓赣州兵已罢归，他已弛备，散处各巢。至是，骤闻官兵四路并进，皆惊惧失措。乃分投出御，而悉其精锐千余，据险设伏，并势迎敌于龙子岭。我兵聚为三冲，犄角而前。指挥余恩所领百长王受兵，首与贼遇，大战良久，贼败却。王受等奋追里许，贼伏兵四起，奋击王受。推官危寿所领义官叶芳兵，鼓噪而前，复奋击贼伏兵后；千户孟俊兵从傍绕出冈背，横冲贼伏，与王受合兵。于是贼乃大败奔溃，呼声震山谷。我兵乘胜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洲。各哨官兵遥闻三洲大巢已破，皆奋勇齐进；各贼皆溃败。”^①在此后的近10天当中，虽敌人抵御甚力，然各路官兵的进攻都基本顺利，敌人的大小据点纷纷告破。至十六日后，各巢奔散之敌，其精悍者尚有800多人，相互联结，退入九连山中，扼险自固，给官军的进一步清剿带来极大困难。阳明对战争形势进行了及时分析，认为：“九连山势极高，横亘数百余里，四面斩绝。我兵既不得进，而其内东接龙门山后诸处，贼巢若百数。以我兵进逼，贼必奔往其间，诱激诸巢，相连而起，势亦难制。然彼中既无把截之兵，欲从傍县潜军，断其后路，必须半月始达，缓不及事。止有贼所屯据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贼已据险，自上发石滚木，我兵百无一全。”敌人既据有极为明显的地形优势，强攻显然是不明智的，亦是极难奏效的。但另一方面，敌人又毕竟处于被追击的过程当中，虽有天险可守，然部伍不整，呈现出混乱之状，阳明正及时利用了敌人的这一弱点，使战局瞬间发生了急剧转变。他选精锐700余人，穿上敌人的服装，假装成溃奔之敌，乘夜直接冲上被敌人所占据的悬崖下小道，向上急奔。“贼以为各巢败散之党，皆从崖下招呼，我兵亦佯与呼应；贼疑，不敢击。”这支精锐奇兵既冲过了险阻，遂立即占据险要地形，阻断了敌人的退路；而到第二天，敌人才发现他们原来并不是自己人，遂并势力敌，但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官兵已经占

^① 《洊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62～363页。

据了有利地形，从上击下，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敌不能支，终于败退。而此时，阳明已命各路官军在敌人可能败退的所有出口预设伏兵，分投急击，几无可遁。到三月初三日，据各方向导人等回报，洴头及其周围各处贼巢“积恶凶狡”之辈，“皆已擒斩略尽”，唯余党200余人，皆协从老弱之辈，愿意投诚，阳明遂予以招抚。至此，洴头之役基本结束。到三月初七，赣州府知府邢珣谓自去年二月漳南战役以来，赣州官兵“迄今一年有余，未获少休，今幸各巢贼已扫荡，余党不多，又蒙俯顺招安；况今阴雨连绵，人多疾疫，兼之农功已动，人怀耕作，合无俯顺下情，还师息众”^①。阳明遂酌留部分官兵防守，而于初八班师。

整个洴头战役，“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后两月之间，通共捣过巢穴三十八处；擒斩大贼首二十九名颗，次贼首三十八名颗，从贼二千零六名颗；俘获贼属男妇八百九十名口；夺获牛马一百二十二只匹，器械、赃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赃银七十两六钱六分；总计擒斩、俘获、夺获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颗口只四件把”^②。在战略上说，洴头之役虽然是横水、桶冈之役的延伸，但作为一次单独的军事行动，其中却更为充分地体现了阳明善用谋略的军事才能。兵战之事，原属“诡道”，所谓“兵不厌诈”，目的只在于克敌而制胜，然在谋略之“诡道”的运用之中，却又见其心地光明直谅，而有大智大勇存焉。荡平洴头诸巢，使江西、广东交界区域的多年寇乱终归平靖，使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活秩序得以恢复。而由于池仲容等人的作为并不仅仅局限于劫掠民众，而具有某种政治意图，因此它实际上亦消解了民间武装可能形成的地方割据

① 《洴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64~365页。按：《年谱一》谓“四月班师”，不确。详《洴头捷音疏》所述，到三月初三，战事实即已经结束，故初七日邢珣即请还师，阳明班师不可能拖到四月份。洴头战役结束之后，阳明曾撰《平洴头碑》（《全集》卷二五，947页），其中有曰：“戊寅正月癸卯，计擒其魁，遂进兵击其懈。丁未，破三洴，乘胜归北。大小三十余战，灭巢三十有八，俘斩三千余。三月丁未，回军。壶浆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欢。”“三月丁未”，即三月初八，公历为1518年4月17日。

② 《洴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65页。

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从而具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意义。浰头之役结束以后，阳明曾对此有过扼要总结：“参照大贼首池仲容等，荼毒万民，骚扰三省，阴谋不轨，积有年岁，设官僭号，罪恶滔天，比之上犹诸贼，尤为桀骜难制。盖上犹诸贼，虽有僭窃不轨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烧是嗜；至于浰头诸贼，虽亦剽劫掳掠是资，而实怀僭拟割据之志。故其招致四方无籍，隐匿远近妖邪，日夜规图，渐成奸计。兼之贼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竞飞猱，凶恶之名久已著闻，四方贼党素所向服；是以负固恃顽，屡征益炽。前此知其无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无事；其实无救荼毒之惨，益养奸宄之谋。今乃臣等驱不练之兵，资缺乏之费，不逾两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虏，除三省数十年之患。……就今事而言，前此尝夹攻二次，计剿数番；以兵，则前者强而今者弱，前者数万，而今者数千；以时，则前者期年，而今者两月；以费，则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则前者多知谋老练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疏浅劣。”^①毋庸讳言，池仲容等啸聚山林，确乎与他处不同，而具有某种暴动或“起义”的性质，我们亦容或从今天的价值观出发而指责阳明为“镇压农民起义”，但价值观原具有时代特性，当阳明之时，勤于王事，安靖地方，维护朝廷政权的尊崇与统一，原被视为臣子的当然职责，亦是所谓“经略四方”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阳明那里，他对“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的哀感之情是真切的，他“兴师正为民瘼甚，陟险宁辞鸟道斜”^②的心意袒露同样亦是真切的。如果我们仅就事件的本身而言，阳明在全部军事行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非常才能与智慧勇决，仍然令人景仰，正所谓：“英敏天成，机权莫测，智计绝人，用兵神秘，训练严明，筹画精密。”^③

战争结束以后，阳明认为，南安、赣州诸处地方之所以盗贼滋多，其本源在于民风之不淳，而民风之不淳，则在于教化之不及，

① 《浰头捷音疏》，《全集》卷一一，365~366页。

② 《桶冈和邢太守韵二首》之一，《全集》卷二〇，747页。

③ 顾其言：《皇明百将列传评林》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7册。

而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亦未能尽举，姑先就其浅近易行者开道（导）训海”，便为十分必要之事。他拟定了对南、赣所属各县百姓进行教化的文告，要求南、赣二府“照式翻刊，多用纸张，印发所属各县，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给与一道。其乡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务遵依告谕，互相戒勉，共兴恭俭之风，以成淳厚之俗”^①。其具体内容则有：“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为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之家，丰俭称贲，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饰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② 这些内容，确为“浅近易行者”，然民俗之去奢泰而归敦厚，去浮靡而归淳朴，却正是从这些简单易行之事当中体现出来。通过浅显易行的日常事为来收束身心，目的只在于开明心性，使民众渐次达到对于本善之心体的自觉认同，从而导人心于光大高明之路。为此目的，兴礼乐文明之教而从本源处直启人心，显然更具有深远意义，正因如此，阳明遂亦在民间大力倡导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③。

民风不淳，教化不施，固然为粤、赣边界地方之所以不安定的根本原因，而地僻人稀，交通闭塞，朝廷的政治影响薄弱，则又为教化之所以不施、民风之所以不淳的根源。因此在战争以后，舆论

① 《仰南安赣州印行告谕牌》，《全集》卷一六，566页。

② 王阳明：《告谕》，《全集》卷一六，565～566页。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52页。“师自征三荆，山寇尽平。即日班师，立法定制，令赣（州）属县俱立社学，以宣风教。（赣州）城中立五社学：东曰义泉书院，南曰正蒙书院，西曰富安书院，又西曰镇宁书院，北曰龙池书院。选生儒行义表俗者，立为教读；选弟子秀颖者，分入书院，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未期月而民心丕变，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长衣、叉手拱揖，而歌颂之声溢于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遗风矣。”（《年谱附录一》，《全集》卷三六，1343页）由此事，盖可以明“文明以止，以化成天下”之意。

以为“今蒙提督军门亲捣贼巢，扫荡残党，除数郡之荼毒，雪万姓之冤愤，若不趁此机会，建立县治，以控制三省贼冲之路，切恐流贼复聚，祸根又萌”^①。在亲征浞头之时，阳明就曾对周围的山川地形与民情风俗作了细致考察，“备阅山溪形势，讲求贼情民俗，深思善后之图”，以为要确保此地的长久安定，“贼平之后，经久良图，诚无逾于添设县治者”^②。为此，他会同广东惠州府、龙川县、河源县，以及江西赣州府等府县商议，同时采纳民间建议，决定在龙川县和平洞地方设立县治。此地“山水环抱，土地坦平，人烟凑集，千有余家”，其距离周边县城，各有数日之程，“其间山林阻隔，地里辽远，人迹既稀，奸宄多萃”^③。因此在和平洞设立县治，便既可以强化地方的政治管理，又可以对周边地区实行军事上的实际控制。他会同各方议定了和平县的行政管辖区域，并于正德十三年五月上书朝廷，申述了添设和平县的理由，建议将原设立在和平的巡检司移置于浞头，以更有利于对险隘之地的控制，同时请求朝廷对新和平县的各项赋役租税减免三年：“凡遇一应杂泛差役，坐派钱粮物料等项，俱各酌量减省；期待三年之后，方与各县一体差科。”阳明认为：“议照前项地方，实系山林深险之所，盗贼屯居之乡；当四县交界之隙，乃三省闰余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间接连闽、广，反覆贼巢，动以百数。据而守之，真足以控诸贼之往来，杜奸宄之潜匿；弃而不守，断为狐鼠之窟穴，终萃逋逃之渊藪。……今赖朝廷威德，巢穴荡平，若不乘此机会，复建县治以扼其要害，将来之事，断未可知。……若县治不立，制驭阔疏，不过一年，泛然投招之人必皆复化为盗；其时又复兴师征剿，剿而复聚，长此不已，乱将安穷！”^④ 添设和平县治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自正德十二年二月到十三年三月，阳明实际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

① 《添设和平县治疏》，《全集》卷一一，367页。

② 同上书，368~369页。

③ 同上书，367页。

④ 同上书，370页。

时间，即迅速平定了赣、湖、闽、广四省边界地区屡次征剿却终归无效的多处寇乱，非但使地方重归平靖，而且亦解除了地方武装势力可能对朝廷造成的威胁，他的声誉日益隆盛，受到江西百姓的普遍爱戴。但此同时，他的身体状况却愈趋于羸弱。他的体魄原本不甚强健，素有咳血之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更兼军旅驱驰，出入艰险，冒矢石，冲瘴病，甚至要人用担架抬着出入于战阵，为赢得战争实可谓呕心而沥血，因此到浰头战役结束之时，他已是疾病交迫，确实感到了身心疲惫。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他曾上书朝廷，请求退休，略曰：

臣自待罪鸿臚，即尝以病求退；后惧托疾避难之诛，辄复勉来此。驱驰兵革，侵染瘴病，昼夜忧劳，疾患愈困。自去岁二月往征闽寇，五月旋师；六月至于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横水，十一月破桶冈，十二月旋师；未几，今年正月又复出剿浰贼。前后一岁有余，往来二三百里之内，上下溪涧，出入险阻，皆扶病从事。然而不敢辄以疾辞者，诚以朝廷初申赏罚之请，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托不效，以辜陛下听纳之明，负大臣荐扬之举。且其时盗贼方炽，坐视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后人，非仁也；已逃其难而遗人以艰，非义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故宁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职。今赖陛下威德，庙堂成算，上犹、南康之贼既已扫荡，而浰寇残党亦复不多；旬日之间，度可底定，决不至于重遗后患；则臣之罪责，亦既可以少逭于万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疗罔效，潮热咳嗽，疮疽痛肿，手足麻痹，已成废人。……伏惟陛下覆载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悯臣因病讨贼所备尝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准令臣旋师之日，放归田里。……臣不胜哀恳祈望之至！^①

这一请求退休的奏疏，言语朴实，心意诚恳，并无任何矫揉造作之态。按照阳明当时的估计，朝廷批准他退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① 《乞致休疏》，《全集》卷一一，353～354页。

因此他在期待着朝廷回复的同时，已在做着回乡的打算，甚至是归心似箭了。四月二十二日，他曾写信给余姚家乡的诸弟，谓：“吾自到任以来，东征西讨，不能旬日稍暇，虽羈鸟归林之想无时不切，然责任在躬，势难苟免。今赖朝廷威德，祖宗庇荫，提兵所向，皆幸克捷，山寇峒苗，剿除略尽，差可塞责。求退乞休之疏去已旬余，归与诸弟相乐有日矣。为我扫松阴之石，开竹下之径，俟我于舜江之浒，且告绝顶诸老衲，龙泉山主来矣！族中诸叔父及诸弟不能尽书，皆可一一道此意。”^① 看得出，他写信时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已在预期着在家乡的松石竹径间与诸弟优游的安闲，在峰峦绝顶处与老僧探玄的超逸。然而事实上，朝廷却并没有怜悯他“與病讨贼所备尝之苦”，甚至并没有理会他的申请。到六月初六日，他等到的并不是朝廷允许他退休的诏命，却反而是对他升官荫子的敕谕：“王守仁升右副都御史，荫子一人做锦衣卫，世袭百户，写敕奖励。钦此。”^② 升官荫子，或常人之所企求，但它却并没有使阳明感到兴奋，他只期望朝廷能将他放归田里，既以调摄身心，更能继续他的讲学生涯。因此在六月十八日，阳明又具奏本，请求辞免升官荫子，仍照原职退休。^③ 十月二日，朝廷对他三月份的《乞致休疏》下了批

① 《与诸弟书》，阳明手迹，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钱明据计文渊《王阳明法书集》移录。标点稍有不同。

② 《升荫谢恩疏》，《全集》卷一一，387页。

③ 即《辞免升荫乞以原职致仕疏》，见《全集》卷一一，375页。其略曰：“臣闻命惊惶，莫知攸措；感极而惧，若坠冰渊。切念臣以章句府儒，过蒙朝廷涤瑕掩垢，收录于揆弃之余；既又求长于短，拔之闲散之中，授以巡抚之寄。其时臣方抱病在告，偶值前官有托疾避难之嫌，该部论奏之议甚严，朝廷督责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计，狼狈就途。莅事之后，兵耗财匱，盗炽民穷；束手四顾，莫措一筹。……臣以赏罚之柄，而激励三军之气；以旗牌之重，而号召远近之兵；以提督之权，而纪纲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缩如志，举动自由。于是兵威渐振，贼气先夺，成军而出，一鼓而破横水，再鼓而灭桶冈。全师克捷，振旅复举，又一鼓而破三荆，再鼓而下九连。皆役不再藉，兵无挫刃。……由是言之，其始捉臣之来莅事者，该部之议，朝廷之断也；旗牌之能号召者，该部之议，朝廷之断也；提督之能纪纲者，该部之议，朝廷之断也；方略之所分布，举动之能展舒者，该部之议，朝廷之断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赏乎？……况臣驱逐之余，疾病交作，手足麻痹，渐成废人。前在贼巢，已尝具本请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报，庶几生还畎亩。今乃求退而获进，请咎而蒙赏，虽臣贪冒垂涎，忍耻苟得，其如赏功之典何！”

复：“奉圣旨：王守仁帅师讨贼，贤劳懋著，偶有微疾，著善调理，以副委任。所辞不允。该部知道。钦此。”十二月二十九日，朝廷对他六月十八日的乞辞免荫升容照原职致仕的奏本又下了批复：“奉圣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剿贼成功，升官荫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该部知道。钦此。”^① 阳明自以为他的疾病“月深日亟，百疗罔效，潮热咳嗽，疮疽痈肿，手足麻痹，已成废人”，而朝廷却以为不过是“偶有微疾”而已。然既未获得朝廷的许可，阳明便亦只有仍留在江西，尽忠于他的职守。

但不管如何，战争已经结束，他亦终于能够稍得空闲，在调理病躯的同时重新整理他的思想，继续他的哲学思考。《年谱》云：“先生出入贼垒，未暇宁居，门人……皆聚讲不散。至是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人道之方。”^② 尽管早在龙场的时候，阳明就曾对《大学》一文进行过深入思考，觉察到了朱熹《大学章句》中的某种谬误；尽管他在赴江西之前即曾对徐爱等人宣讲过他所理解的《大学》本旨，并在学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思想震撼，但他并未将《大学》一文的“古本”刊刻出来。在最近一年多的战争之中，阳明虽殚精竭虑于战事，但实际上却亦并未完全停止其思想体系的完善性建设。作战的实际经验，似乎更加坚定了他以心为至善之本体的基本信念，并亦因此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朱熹“补大学传”并不合乎圣人之旨的观点。朱熹认为，《大学》的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已有佚失，其原文应有“经”、“传”两个部分，今本虽“经”文仍存，而“传”文已经不全，于是遂对《大学》进行重新编次，“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为如此则“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③。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补格物致知之传”。然阳明认为，《大学》本文“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

① 《乞放归田里疏》，《全集》卷一一，388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53~1254页。

③ 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集注》，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诚意，原无缺传可补”^①。而自朱熹“补格致传”之后，“后之学者，附会于《补传》而不深考于经旨，牵制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离而卒无所得，恐非执经而不考传之过也”^②。亦即是说，朱熹对《大学》的重新厘定，反而是窜乱了圣人的本意，“诚意”之旨正因此而晦暗不明，圣人之学亦正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故谓“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他舍弃了朱熹对《大学》的经、传之分，删去了朱熹所添加的“补传”，不仅恢复了《大学》文本的旧貌，而且就原文添加了“旁释”，以引其本义，希望藉此而“复见圣人心”^③。他于正德十三年七月刻为《大学古本》，将它作为指示门人的人道之要。

重新刊刻《大学》“古本”，并不是阳明对古籍整理发生了兴趣，而是其思想的自身建设愈趋完善的一个标志。按照阳明的理解，《大学》的根本要义，仅在于“诚意”而已，实现“诚意”的根本途径在于“格物”，“诚意”所达到的极致在于“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根本方法在于“致知”。心的本体原是“至善”的，原本具有“知”的先天能力。“意”是心之动，“意动”必然与人的经验状态相关联，故有“正”有“不正”，并因此而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善、不善的经验价值，所以“意”需要在实践中去“诚”，使去其不正而归于正。因此“格物”是“致知”的实功，“物”既“格”则知致，知致则意诚，意诚则心正，心正则止于至善。圣人之能事，仅此而已。个人在经验生活中的格物，其目的归趋并不在于经验之知的获得，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54页。朱熹的《大学》“补传”，多为后人所怀疑，阳明并不是明确质疑其“补传”非圣人之旨的第一人。如南宋后期的王柏（1197—1274，字会之，号鲁斋，金华人），虽尊崇朱熹之学，但亦对朱熹的《大学》“补传”提出明确的批评，认为“格致传”原本不亡，无待于补。见其所著《大学沿革论》（《鲁斋集》卷九）、《大学沿革后论》（卷一〇）。

② 《答王天宇》二，《全集》卷四，163页。

③ 《大学古本原序》，《全集》卷三二，1197页；亦见《大学古本序》，《全集》卷七，243页。邹守益云：“阳明先师恐《大学》之失其传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复为问答以阐古本之蕴，读者虚心以求之，泝濂洛以达孔孟，其为同为异，必有能辨之者！”（《跋古本大学问》，《邹东廓先生文集》（12卷）卷八，《四库存目丛书》本）

而在于至善的心本体的自身开明。“是故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① 阳明关于《大学》的观点，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他与朱熹“格物致知”之说的重大差异，同时亦表明他的思想体系在进一步完善。心之本体的至善，尽管是一种先天的价值预设，但正是这一预设的确立起了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确保了人在经验中通过格物之功来实现知致意诚的根本可能。经验的德行被表达为德性的实践，是实现至善心体自身充分开显的切实途径，而且正是人的这种德性实践活动，才将他的本体之心与他全部的现实世界联结为一体。诚意功夫至精至到，便是天下万物一体之仁在主体本身的充分实现。主体本身的世界，因此便即是以心体为运行轴心的。

这一观点与朱熹所阐明的“格物致知”说在思维取向上显然是不同的。按照朱熹的观点，所谓“致知”，即是经验上的“即物而穷其理”。因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知有不尽，正因理有未穷，所以必须格物以穷理，穷理以致知，致知以诚意，诚意以尽性。他同时认为，“理”有“一本”，有“分殊”，天下万物的统体之理，是为“一本之理”；天下万物各有一理，是为“分殊之理”。分殊之理是一本之理的具体显现，一本之理则是分殊之理的全体共相，所以若格物穷理之功达于极致，至乎其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②。而在阳明看来，朱熹的这种格物致知之论，恰好使物之理与心之知分裂为两段，因为如果物之理的本原不在于心体本身，那么即使格得物之理来，却如何可能诚得自家的意？他之所以说朱熹“支离”，正因为他觉得朱熹的观点缺乏一个将天下万物与吾心之至善的本体联结在一起的“主脑”，将

① 《大学古本原序》，《全集》卷三二，1197页；亦见《大学古本序》，《全集》卷七，243页。

② 朱熹：《补格致传》，《四书章句集注》，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心、物分割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早在龙场的时候，阳明就对朱熹的观点感到不妥，并取《六经》、四子之书相互印证，愈加觉得他自己的领悟是正确的，是不悖于圣人之说的，但此同时，他又因为自己的观点不能与朱熹相合而常常感到不安，“恒疚于心”。因此在南京做官的时期，他曾重新研读朱熹的著作，这一研读，使他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他认为流传最广的《四书集注》、《或问》之类的作品，都是朱熹中年以前的观点，是“未定之说”，不是他的“晚年定论”；而《语类》之类，又多掺杂了其门人的私意私见，不能完全视为朱熹本人的观点。他认为朱熹在晚年的著作中，已经“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在他看来，朱熹晚年的观点，与他自己所坚持的以心体统摄全体宇宙的理念是不矛盾的，所以他专门从朱熹的作品中辑出了“晚年定论”，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并于此时刊刻出来。他为该书写了序，对当世学者执朱子“未定之说”相互攻讦的风气提出了批评：

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朱子）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①

在学术上，我们今天大可不必同意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之说，但却需要了解他编辑《朱子晚年定论》的用意。在当时的学术界，朱子学说传习已久，几乎人人执为已定之说，乍闻阳明心体之论，几无不惊怪，以为轻狂，遂亦多取朱子之说藉以进行攻击。阳明曾

^① 《朱子晚年定论序》，《全集》卷七，240～241页。

举到一个例子：“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①由此大抵可知，阳明之所以辑《朱子晚年定论》，其基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朱子的观点，而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新思想，使借朱子之说以攻击者无所措其口，从而为其心学的进一步传播扫除思想障碍。

这一年的八月，阳明门人薛侃^②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刻之于虔。徐爱已于正德十二年去世，年才31岁。这一事件对阳明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对徐爱的感情极为深厚，不仅因为徐爱是他的妹夫，更因为徐爱是他思想上的同调，最能领悟其新观念的精髓，并且亦是传播其新思想的中坚。当徐爱去世的消息传来之时，阳明正筹备进剿横水、桶冈，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他仍无法掩饰其悲痛情怀，“自得曰仁讞，盖哽咽而不能食者两日”^③，遂亲撰祭文，使其弟守文奠于徐爱的灵柩之前：

维正德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寓赣州左金都御史王守仁，使十弟守文，具清酌之奠，哭告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妹婿徐曰仁之柩曰：

呜呼曰仁！乃忍去吾而死耶？吾又何以舍子而生为乎？呜呼曰仁！子则死矣，而使吾妹将何以生乎？使吾父母暮年遭此，何以为怀乎？又使子之父母暮年遭此，何以为生乎？此皆人世之至酷极烈所不忍言者，吾尚忍言之乎？呜呼痛哉！吾复何言！

① 《与安之》，《全集》卷四，173页。

② 薛侃，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成进士，即以侍养归。师王守仁于赣州，归语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铠等往学焉。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至嘉靖七年（1528）起故官，闻阳明讞，为位朝夕哭之。尝以事下诏狱，削籍为民，“归家益力学，从游者百余人”。隆庆初复原官，赠御史。详见《明史》卷二〇七本传。

③ 《祭徐曰仁文》，《全集》卷二五，956页。

吾复何言！尚飨！^①

徐爱的去世，确使阳明深感哀伤，而《朱子晚年定论》及《传习录》的刊刻，则使其思想的传播更为迅速，影响日益广大，四方来学之士，几若雾拥云屯。为了安置这些学者，阳明于正德十三年九月重修了濂溪书院，“四方学者辐辏，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书院居之”^②。

正德十一年至十三年，是阳明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时期，他的生活经验因此而发生了重大转变。迅速平定四省边区的多处寇乱，使他声誉日趋隆盛；升官荫子，则使他成为朝野关注的重要人物；他蕴蓄积养已久的雄才大略，终于发皇为现实的事功，似乎酬了他的少年壮志。但此同时，他的身体却愈见羸弱，时时经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思亲心切，了却王事之后欲尽早返回家乡，却无法得到朝廷的同情，他需要忍受着思亲思乡的愁绪；徐爱的过早去世，更使他有“吾道益孤”^③之叹，他又不得不强抑悲怀，忍受着感伤亲情与“吾道”的双重苦痛。然而所有这一切，阳明竟然都能处之泰然，将它们视为动心忍性之地，作为开明其心体之本觉本怀的实践

①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嘉靖十三年汶上路氏浙江刊本《横山遗集》卷下。据此，则《年谱》系徐爱卒于正德十三年，误。日本学者今关寿庵《宋元明清儒学年表》亦系徐爱之卒于正德十二年，见该书第11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按：阳明曾多次撰写祭徐爱文，此篇当是最早的一篇。因战争在即，又因悲痛过度，故文字简约，未尽其怀，阳明遂于同年八月十一日再撰一篇（今收入《全集》卷二五的《祭徐曰仁文》，据钱明说，是篇亦载《横山遗集》卷下，且有明确的写作时间，《全集》系于“戊寅”，误。），使其弟守俭代为哭告；正德十三年四月十七日，阳明又思徐爱之贤，在江西祭之于旅次，并录其祭文，寄其弟守俭、守文，使哭告于徐爱的柩前；嘉靖三年，阳明撰《又祭徐曰仁文》（见《全集》卷二五，958页），亲奠于其墓前。正德十三年四月的祭文，谓：“呜呼曰仁！子之别我，既两阅岁兮；子之长逝，忽复逾年兮。”照此推测，则徐爱很可能卒于正德十二年三四月间。阳明《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之书曰：“曰仁春来颇病，闻之极忧念。”（《全集》卷四，167页，作于正德十二年）盖亦可证。《年谱》谓徐爱卒，“先生哭之恸。爱及门独先，闻道亦早。尝游南岳，梦一瞿昙抚其背曰：‘尔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归，与陆澄谋耕霅上之田以俟师。年才三十一。先生每语辄伤之”（《全集》卷三三，1255页）。其师生之情的深厚缱绻，由此亦约略可见矣。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1255页。

③ 《与陆原静》第二书，《全集》卷四，167页。

之功。他自谓“来日因兵事纷扰，贱躯怯弱，以此益见得工夫有得力处”^①，他确乎是以现实的纷扰兵事与生活的磨难来磨砺其心志、廓清其欲念、澄明其心体的。他的思想随着生活世界的拓展与激荡而气象愈趋宏阔，日见纯真。他亦以此谆谆告诫其弟子，要求他们须就日用之间勇猛克治其习染之蔽，复还其皎如白日的本心之明，他将破除心中之欲以开明心体视为“丈夫不世之伟绩”。“某向在横水，尝寄书（杨）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②寥寥数语，却是仁心充沛，洋溢着一种夺人心魄的英豪之气。在他那里，心体原本就统摄了宇宙间一切万事万物，其大无外。心体光明，便即是世界光明，俯仰无愧疚，精纯涵乾坤。正因为如此，近三年的军旅生涯非但没有妨碍他心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却反而在百死千难中使他的思想世界变得益为广袤壮阔，对本心的体认益为真切，至善的涵养益为纯熟，他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感受着潇洒自由，并且亦在与诸生的切磋砥砺中享受着德业日进的欢欣。

虽然赣、闽、湖、广四省边界地区的寇乱已经剿平，虽然阳明期待着优游于田野峦壑之间的闲雅，企慕着与亲人团聚而安享天伦的欢悦，盼望着心接古人与诸生商略心得的讲论之乐，但他在江西的使命却还没有完成。在此后的三年中，他几乎在不经意中再创了事功的伟绩，却在历尽艰险之后提炼了其思想的精粹。

① 《寄薛尚谦》第三书，《全集》卷四，171页。

② 《与杨仕德薛尚谦》，《全集》卷四，168页。

翦除宁藩 教揭良知

(正德十四年至正德十六年, 1519—1521)

正德十三年下半年, 阳明在处理地方事务的同时, 大抵在养病与讲学中度过。他在江西的一批主要弟子, 如邹守益、欧阳德、黄弘纲等, 皆在此时来学, 相与讲习, 成一时之盛, 而有“江右王门”之派别。江西是阳明学说集中传播的主要区域之一, 学者师从既久, 亲闻警发, 亦颇能得阳明思想之真际, 所以后来黄宗羲谓“姚江之学, 惟江右为得其传”, “阳明之道赖以不坠”, “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 亦其感应之理宜也”^①。尽管讲学确乎给阳明带来乐趣, 他的思想体系亦在讲学中不断臻于完善, 但他当时的心思, 却仍在期盼着朝廷下诏允许他致仕, 使他能够返回家乡。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朝廷下达了“王守仁才望素著, 累次剿贼成功, 升官荫子, 宜勉遵成命, 不准休致”的敕谕, 这使阳明确感到了“跼身无地”的彷徨与困惑, 但按照惯例, 他还必须具疏对朝廷表示谢恩, 因此在正德十四年正月初二, 他撰写了《升赏谢恩疏》^②, 同时仍然表示“荫子实非常典, 私心终有所未安”, “自恨疾病之已缠, 深惧图报之无日”, 所以他在“感激洪恩”的同时, 还是要“别行具本请罪乞休”^③的。正月十四日, 阳明遂再次向朝廷递交了《乞放归田里疏》, 其中有曰: “窃惟圣主之任官也, 因才而器使, 不强人以其所不能, 是以上无废令,

① 《江右王门学案》, 《明儒学案》卷一六, 《黄宗羲全集》第7册, 377页,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② 《全集》卷一一, 387页。

③ 同上书, 388页。

而下无弃才；人臣之受职也，量力而成事，不强图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绩，而身无鰥旷之诛。历考往昔，盖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于愆谴者也。”^① 详其语意，他希望朝廷不要过度强人所难的意思实甚为明显。他将自己比作“驾破败之舟以涉险”的“懦夫”，“冲冒风涛”而行于“洪河大江之中”，时时面临着“沦溺”的危险；他如一支茅草，已经当不得栋梁之用来支撑大厦了。故谓：

今四方多故，銮舆远出，大小臣工，惶惶旦暮。臣虽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国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托故，苟求退遁？顾力纤负巨，如以蒿支栋，据非其任，遂使殒身，徒以败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来，百病交攻。近因驱驰贼垒，瘴毒侵陵，呕吐潮热，肌骨羸削；或时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醒，手足麻痹，已成废人；又以百岁祖母卧病床褥，切思一念为诀。悲苦积郁，神志耗耗，视听恍惚，隔宿之事，不复记忆。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难矣，而况使之当职承务，从征讨之后，其将能乎？^②

显而易见，阳明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某种政治危局出现的可能性。正因为武宗朱厚照时时“銮舆远出”，朝政荒芜，佞倖环堵，“大小臣工惶惶旦暮”，致使“四方多故”，国是几有不可为之势。因此，除了确乎身罹疾病之外，当时政局的晦暗，实际上乃为阳明必欲隐退的另一重要原因。遗憾的是，阳明所觉察到的这种政治危局迅即出现，而能够迅即力挽明王朝这条“破败之舟”于惊涛骇浪之中，使之重归“顺风安流”的人，竟然仍是阳明这个自称“手足麻痹”的“废人”。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阳明得到朝廷的敕谕：“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胁众谋反，特命尔暂去彼处地方，会同查议处置，参奏定夺。

^① 《乞放归田里疏》，《全集》卷一一，388页。

^② 同上书，389页。

钦此。”^①六月初九，阳明遂从赣州启程，沿赣江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丰城县黄土脑。丰城知县顾佖出迎，却向阳明通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宁王朱宸濠已经于本月十四日起兵谋反。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突发事件，虽在仓卒之际，阳明仍迅即对当时形势作出了睿智的判断。他立即回到舟中，溯赣江而上，疾驶重返吉安方向，准备调兵“勤王”。宸濠闻知以后，派兵急追，《年谱》云：“先生闻变，返舟，值南风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悯生灵，许我匡扶社稷，愿即反风；若无意斯民，守仁无生望矣！’须臾，风渐止，北帆尽起。”为躲避宸濠的追兵，阳明乃乘夜与参谋雷济、萧禹一起潜入小鱼船中，摆脱了宸濠的追击。^②六月十八日，阳明至吉安。次日，具疏宁王朱宸濠谋反之事，遣人飞报朝廷。

① 《飞报宁王谋反疏》，《全集》卷一二，391页。按：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公琼逆知宸濠必将为变，一日，召其属主事应典曰：‘我置王某于江西，与之便宜行事者，不但为溪洞诸贼而已。或有他变，若无便宜行事敕书旗牌，将何施用？’时福建有军人进贵（原文“进贵”作“进贡”，盖误。）等之变，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烦王某，但假此以率。便宜敕书在彼手中，以待他变。尔可为我做一题稿来看。’稿成，具题。降敕与公（阳明）曰：‘福建三卫军人进贵等协众谋反，特命尔暂去彼处地方，会同查议处置，参奏定夺。’”（《全集》卷三八，1416页）《明史》王琼本传：“先是，琼用王守仁抚南、赣，假便宜提督军务。比宸濠反，书闻，举朝惴惴。琼曰：‘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未几，果如其言。”根据这些记载，则朝廷将阳明羁留在江西，以及此时命其勘处福建叛军，均为出于尚书王琼的特意安排。盖王琼已觉察到宸濠的谋反迹象，其本意正是要利用阳明来牵制宸濠。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1页。阳明摆脱宸濠追兵之事，黄绾所载稍详：“公（阳明）度单旅仓猝，兵力未集，难即勤王，亟欲溯流趋吉安。南风方盛，舟人闻宸濠发千余人来劫公，畏不敢发，乃以逆流无风为辞。公密祷于舟中，誓死报国。无何，北风大作。舟人犹不肯行；拔剑撼其耳，遂发舟。薄暮，度势不可前，潜觅小渔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人服己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杀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舍之。故追不及。”（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17页）按：当时阳明自赣州往福建勘处叛军，夫人诸氏及子正宪均同行。钱德洪曰：“尝闻幕士龙光云：时师（在丰城）闻变，返风回舟。濠追兵将及，师欲易舟潜遁，顾夫人诸、公子正宪在舟。夫人手提剑别师曰：‘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忧！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及退还吉安，将发兵，命积薪围公署，戒守者曰：‘倘前报不利，即举火熏公署。’时邹谦之（守益）在中军，闻之，亦取其夫人来吉城，同誓国难。”（《上海日翁书》）钱德洪跋，《全集》卷二六，985~986页）可知当时情急，阳明受迫而潜入小渔船以摆脱宸濠的追击，夫人诸氏及正宪则仍在官船，后亦至吉安。诸氏夫人提剑与阳明作别，甚显其英豪之气。邹守益亦取其夫人至吉安，同誓国难，则甚有豪杰之概也。又按：赣江水流自南而北，注入鄱阳湖，返回吉安而值“南风急”，则逆水逆风，故“舟弗能前”，祷而“反风”，则虽逆水而顺风也。

朱宸濠于弘治十年（1496）嗣位为宁王。传谓：“其母，故娼也。始生，靖王梦蛇啖其室，旦日鸛鸣，恶之。及长，轻佻无威仪，而善以文行自饰。术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异表，又谓城东南有天子气。宸濠喜，时时诇中朝事，闻谤言辄喜。或言帝明圣，朝廷治，即怒。”^①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因宁王府行不法之事，英宗下诏革去其护卫，改为南昌左卫。正德二年夏，宸濠以2万金贿赂用事太监刘瑾，刘瑾遂矫诏擅自恢复了宁藩的护卫屯田，宸濠愈纵恣其意，树立党羽，侵夺民产，略无顾忌。正德五年秋八月，刘瑾伏诛，兵部奏革去宁王宸濠护卫，仍为南昌左卫。正德八年夏，宸濠始有不轨之图，术士李自然言“城东南有天子气”，遂建“阳春书院”以当之，称为“离宫”。正德九年春，复宁王宸濠护卫屯田，这是由陆完^②促成的。陆完官江西按察使时，尝为宸濠所重，至此官兵部尚书，宸濠窃喜，谓：“全卿为司马，护卫可复得矣。”时武宗宠幸伶人臧贤，宸濠阴与深相交纳，“每手书寄贤，字贤为‘良之’。至是乞护卫，輶载金宝于贤家，分馈诸权要。大学士费宏知之，宣言曰：‘今宁王以金宝巨万复护卫，苟听其所为，吾江西无噍类矣！’”陆完首疏复宁王护卫，又知费宏必力阻之，遂与杨廷和等设谋，令费宏致仕。“宏南归，舟至清源，濠党阴遣人入舟中纵火，行李皆为煨烬。”由是宸濠终得复其护卫，遂自称“国主”，称“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③。

① 《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传》二。

② 陆完，字全卿，长洲人。正德初官江西按察使，与宸濠交好，“宁王宸濠雅重之，时召预曲宴，以金叠为赠”。后又贿赂刘瑾，得改为左佾都御史。正德五年，官兵部侍郎。刘瑾败，言者劾其为刘瑾党羽，但武宗不以为意。史称：“完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权势。刘晖、许泰、江彬皆其部将，后并宠幸用事，完遂行其力。”（《明史》卷一八七陆完本传）嘉靖元年，因附宸濠谋逆罪，遣戍福建靖海卫，死之。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费宏（1468—1535），字子充，江西铅山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第一。正德中，累迁至户部尚书。因受宸濠之党的排挤，乞休归。嘉靖初，朝士争荐，起加少保，入阁辅政。费宏为人持重，识大体，明习国家故事。及杨廷和去位，遂为首相，委任甚大。后又为张璁、桂萼所排，致仕去。著有《鹅湖摘稿》，今存《费文宪集选要》七卷。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为人美风仪，性沉静详审，有文名，好考究掌故、边事及法家之言。正德中，累官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初，因议“大礼”拂世宗意，削职为民。所著《杨文忠公三录》，是其奏疏稿。

正德十年，宸濠谋反之心已炽，其迹大显。江西举人刘养正，有才名，颇习兵法，宸濠将他请到府中，相与讲论宋太祖“陈桥之变”的故事，养正竭力称赞宸濠有拨乱反正之才，密约待时举事。江西副使胡世宁^①上疏，被诬陷下狱。“当是时，宁王宸濠骄横有异志，人莫敢言，世宁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盗，剿抚二说相持，臣愚以为无难决也。已抚者不诛，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顾江西患，非止盗贼。宁府威日张，不逞之徒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承奉太过。数假火灾夺民廛地，采办扰旁郡，蹂籍遍穷乡。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②宸濠闻知，初有惧意，旋即深文周纳，竭尽诬陷之能事，必欲置胡世宁于死地。自是遂无敢言者。

正德十二年，宸濠为谋反而积极进行军事准备，招募剧盗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等500余人，四集亡命之徒，劫掠官军民财商货，又厚结广西土官狼兵及南、赣、汀、漳诸处土兵，遣人往广东购买皮革，制作皮甲，打造刀枪盔甲及“佛郎机铳”等兵器，日夜不息。又遣其党羽分布水陆要道，侦察朝廷动静，万里传报，旬日即能往返。巡抚都御史孙燧^③尝七上章疏，发宸濠逆谋，然皆为诸权奸所阻。

① 胡世宁（？—1514），字永清，仁和（今杭州）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性刚直不阿，居官廉洁，疾恶如仇，又谙于兵法。弘治中，官南京刑部主事，与李承勋、魏校、余祐善，称为“南都四君子”。因上书劾宸濠，宸濠大怒，妄列世宁之罪，遍赂权幸，必杀世宁。朝廷命锦衣卫逮捕世宁。时世宁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乡。宸濠遂诬世宁逃遁，令浙江巡按潘鹏执送江西。潘鹏乃尽系世宁家人。世宁亡命抵京师，自投锦衣狱。在狱中犹三次上书，陈述宸濠忤逆之罪。系狱中岁余，当时言官程启充、徐文华、萧鸣凤、邢寰等皆交章论救，乃滴戍辽东沈阳卫。世宗即位，官至兵部尚书。卒于嘉靖九年。

② 《明史》卷一九九《胡世宁传》。按：世宁上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系于十年冬十月；《胡世宁传》谓“居四年，宸濠果反”，则似当以谷氏之说为正。

③ 孙燧（？—1519），字德成，余姚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历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正德十年十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燧闻命叹曰：“是当死生以之矣！”遣妻子还乡，独携二僮以行。时宸濠逆状已大露，南昌人汹汹，谓宸濠旦暮得天子。孙燧知左右尽为宸濠耳目，遂严加防察，并时时为宸濠陈说大义，却终究不能挽其谋逆之心。胡世宁以上疏得罪，燧知权奸当道，徒言无益，遂增筑进贤、南康、瑞州三城，以固其守。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孙燧、许逵并为所杀。世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忠烈，与许逵并祀于南昌，赐祠名“旌忠”，各荫一子。

正德十四年，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确信宸濠已有谋反之心，遂欲再次革去宸濠护卫，以免后患。于是御史萧淮上疏，称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之徒，反迹已经十分明显。疏入，遂使太监赖义等往南昌，奉命禁革宸濠护卫。六月十三日，赖义等至江西，正值宸濠生日，宴百官，宸濠闻报，大惊。遂密与刘养正等谋，养正曰：“事急矣！明早镇巡三司官人谢宴，可就擒之，杀其不附己者，因而举事。”六月十四日，各官入谢，拜毕，宸濠出立露台，左右带甲携兵刃侍卫数百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孙燧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宸濠大怒，命缚孙燧，按察副使许逵大呼曰：“孙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贼敢擅杀耶？”宸濠命并绑许逵，杀二人于惠民门外。当时不从宸濠反叛的官员，如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参议黄宏、许效廉，布政使胡廉，参政陈杲、刘棐，佥事赖凤，指挥许金、白昂等，皆被逮系下狱。参政王纶、季教，佥事潘鹏、师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等，皆从其反。宸濠遂以李士实为左丞相，以刘养正为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传檄远近，革去“正德”年号，集兵号称10万，大举进兵，攻克九江、南康（今星子）诸城。^①

阳明既与谋士雷济等潜入小渔船而摆脱了宸濠的追击，遂在渔船中相与商议对策。基于各方形势的判断，阳明认为宸濠所出，必不出于三种情况：“濠若出上策，直捣京师，出其不意，则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则趋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据江西省城，则勤王之事尚易为也。”^②出于这一基本判断，阳明认为“勤王”的最上之策，就是要拖住宸濠，使他不至于过快地越过江西省境，北上进攻南京、北京。为此，他首用反间之谋，假托朝廷早已

①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明史·诸王传二》及《王阳明年谱二》等相关记载。

②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17页。

知道宸濠谋反的事实，先已差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颜某进行查勘，并已密谕两广都御史杨旦起调兵马，而杨旦将率狼达官兵 48 万至江西公干。使人故意散布，宸濠得知，心生恐惧，遂不敢轻易进兵。^①这一虚张声势的缓兵之计，实于剿平宸濠的叛乱至关重要，它既为阳明稍后至吉安调集军队赢得了时间，亦为南北两京的备防赢得了时间。因此当时有人认为：“当时若使不行间计迟留宁王，宁王必即时拥兵前进，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两京各路何恃为备？所以破败宁王，使之坐失事机，全是迟留宁王一着。所以迟留宁王，全是谋行反间一事。今人读奏册所报，皆是可书之功，而不知书不能尽者十倍于奏册。”^②

六月十八日，阳明返回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谓：“地方无主，乞留暂为区画。”而“远近军民，亦皆遮拥呼号”^③。当时的局势实已相当严峻，宸濠派其亲信至江西各地收取府县的印信，而各地方官员亦纷纷归附宸濠，阳明用反间之谋，虽暂时收到了阻挠宸濠拥兵北上之效，但并非长久之计。当此之时，事变仓卒而危机四伏，

① 钱德洪尝记阳明反间事，并载其假托的两广都御史杨旦的火牌内容：“提督两广军务都御史杨为机密军务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颜咨，俱为前事，本院带领狼达官兵四十八万，齐往江西公干。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广州府起马前进，仰沿途军卫有司等衙门，即便照数预备粮草，伺候官兵到日支应。若临期缺乏误事，定行照依军法斩首。”其目的：“恐宸濠径袭南京，遂犯北京，两京仓卒无备。图欲阻挠，使迟留半月，远近闻知，自然有备无患。”（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九，1468 页）黄绾则载其故意使宸濠见到此牌的办法：“（阳明）行至中途，恐其（宸濠）速出，乃为间谍，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宁府将反，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杨旦、秦金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暗伏要害地方，以公俟宁府兵至袭杀。复取仇人数辈，各与数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处所飞报窃发日期，将公文各缝置袷衣絮中。将发间，又捕捉伪太师李士实家属至舟尾，令其觐知。公（阳明）即佯怒，牵之上岸处斩，已而故纵之，令其奔报。宸濠逻获仇人，果于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发（兵）。”（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17 页）德洪所载反间之事，闻诸吉水县丞龙光，龙光又谓当时阳明假写杨旦火牌，雷济尝曰：“宁王见此，恐未必信。”阳明日：“不信，可疑否？”雷济曰：“疑则不免。”阳明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叹曰：“宸濠素行无道，残害百姓，今虽一时从逆者众，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诱，苟一时之合耳。纵使奋兵前去，我以问罪之师徐蹶其后，顺逆之势既判，胜负预可知也。但贼兵早越一方，遂破残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难。为今之计，只是迟留宸濠一日不出，则天下实受一日之福。”（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九，1471 页）

② 钱德洪载龙光语，见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九，1471 页。所谓“奏册所报”者，指后来阳明上于朝廷的平叛捷报，即《江西捷音疏》。

③ 《咨两广总制都御史杨共勤国难》，《全集》卷一七，572 页。

但阳明却仍能处变不惊，运筹帷幄。他运用提督四省军务并得以便宜从事的权力，迅速行文赣州等府，调集军队，招募四方义勇，起兵讨伐宸濠。要求赣州府并附近卫所，各行其所属官吏，“起集父子乡兵军余人等，昼夜加谨，固守城池，以保不测”；要求知府邢珣将“贮库钱粮尽数开具”呈报，“毋得隐匿”；各官兵“各备锋利器械，通到教场逐日操练”^①，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以备调动。又移文两广总制都御史杨旦，请其“选取骁勇精壮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约四五千名，各备锋利器械，选委谋勇胆略官员，或就委岭南兵备佥事王大用监统，给与各兵行粮，不分雨夜，兼程前来，共勤国难”^②。又与吉安知府伍文定、谋士雷济等协谋，进一步运用反间之计，以瓦解宸濠之兵的斗志并离间其智囊人物。他假写迎接朝廷官军的机密文书，称奉圣旨，兵部已遣“许泰、郤永分领边军四万，从凤阳等处陆路径扑南昌；刘晖、桂勇分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州、淮安等处水陆并进，分袭南昌；王守仁领兵二万，杨旦等领兵八万，秦金等领兵六万，各从信地（指定地点）分道并进，刻期夹攻南昌”。其中还提到：“以本职计之，若宁王坚守南昌，拥兵不出，京边官军远来，天时、地利，两皆不便，一时恐亦难图。须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宁王已离江西，然后或遮其前，或击其后，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又谓：“今宁王主谋李士实、刘养正等，各有书密寄本职，其贼凌十一、闵廿四，亦各有密差心腹前来本职递状，皆要反戈报效。可见宁王已是众叛亲离之人，其败必不久矣。”又谓两广起兵48万，其先锋8万，已到赣州；湖广起兵20万，其先锋6万，已到黄州；其本人起兵10万，先锋2万，屯驻吉安。“但得宁王早离江西，其中必有内变，因而乘机夹攻，为力甚易。”^③这一假造的“机密文书”，其用意显然仍在阻挠宸濠领兵北上，使其留居于南昌城内，以利于对其实施围歼。同时又离间宸濠与其核心

① 《牌行赣州府集兵策应》，《全集》卷一七，571页。

② 《咨两广总制都御史杨共勤国难》，《全集》卷一七，573页。

③ 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九，1468~1469页。

人物李士实、刘养正的关系，使其互不信任。宸濠得到阳明故意使人通报给他的这一“机密文书”，果然心下愈生疑虑，“又疑李士实、刘养正，不信其谋”。而此同时，阳明又分别给李士实、刘养正假写回信，赞赏其“身虽陷于罗网，乃心罔不在王室”，且谓“所喻密谋，非老先生断不能及此”，“况今兵势四路已合，只待此公（暗指宸濠）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轻出耳”等等，“宸濠由是愈疑刘（养正）、李（士实），刘、李亦各自相疑惧，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惧，兵势日衰”。而此同时，阳明又令人“多写告示及招降旗号，开谕逆顺祸福，及写木牌等项，动以千计，……潜地将告示粘贴，及旗号木牌四路标插”^①。

阳明的这一系列反间之谋、攻心之策，实际上已经收到未战而折人之兵的效果。^②六月十九日，阳明遂上疏朝廷，通报宸濠谋反实况，希望朝廷派兵平叛。在疏文中，阳明表露了他当时的心迹，略陈其设谋调兵之事，并再次表达了欲便道归乡省亲的意愿。略曰：

臣奉前旨，欲遂径往福建（勘处进贵叛军）。但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指宸濠）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吉安）抚慰军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调集兵粮，号召义勇；又约会致仕乡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养病评事罗侨等，与之定谋设策，收合涣散之心，作起忠义之气，相机乘间，务为蹶后之图，共成犄角之势。牵其举动，而使进不得前；捣其巢穴，而使退无所据。日望天兵

① 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九，1470页。

② 钱德洪曰：“初时宸濠谋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于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马，径趋南京，谒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闻前项反间疑沮之谋，遂不敢轻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攻南康（今星子县）、九江，而自留省城（南昌）。贼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惧退沮，久驻江湖之上，师老气衰；又见四路所巾告示及插旗号木牌，人人解体，日渐散离，以故无心攻斗。”（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九，1471页）

之速至，庶解东南之倒悬。伏望皇上省愆咎己，命将出师。因难兴邦，未必非此。

臣以弱劣多病，屡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责，本亦非臣之任。今兹扶病赴闽，实亦意图便道归省。临发之前，已具哀恳。賫奏之人去才数日，适当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机，姑复暂留，期纾国难。候区画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师一临，亦遂遵照前旨，入闽了事，就彼归看父疾。进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臣之心也。直行其报国之诚而忘其缓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弃职之诛，臣之罪也。^①

六月二十一日，阳明因“叛党方盛，恐中途为所拦截”，遂再次将《飞报宁王谋反疏》遣人速递朝廷。^②同时，上《乞便道省葬疏》，略曰：

臣以父老祖丧，屡疏乞休，未蒙怜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闽，意图了事，即从此地冒罪逃归。旬日之前，亦已俱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宁府反叛。此系国家大变，臣子之义不容舍之而去。又阖省抚巡方面等官，无一人见在者。天下事机间不容发，故复忍死暂留于此，为牵制攻讨之图。俟命师之至，即从初心，死无所避。

臣思祖母鞠育之恩，不及一面为诀，每一号恸，割裂昏

① 《飞报宁王谋反疏》，《全集》卷一二，392页。《年谱》云：“是时巡抚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飞章告变，（王）琼请会议左顺门。众观望，犹不敢斥言（宸）濠反。琼独曰：‘竖子素行不义，今仓卒举乱，殆不足虑。都御史王守仁据上游蹶之，成擒必矣。’乃从直房顷刻覆十三疏，首请下诏削（宸）濠属籍，正贼名。次请命将出师，趋南都，命伯方寿祥防江都，御史俞谏率淮兵翊南都，尚书王鸿儒主给饷。次请命守仁率南赣兵由临、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会南昌。克嗣镇镇江，许廷光镇浙江，丛兰镇仪真，遏贼冲。传檄江西诸路，但有忠臣义士，能倡义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请南京守备操江武职并五府掌印金书官各自陈取上裁，务在得人，以固根本。诏悉从之。”（《全集》卷三四，1262～1263页）据此，则大概在阳明的《飞报宁王谋反疏》到达之前，朝廷即已从李克嗣的告变章疏中了解到了宁王谋反之事，并在尚书王琼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保卫南京的必要的军事部署，但并没有派遣军队直接进入江西，而秦金所率湖广之军，亦迟迟未现身，平定宸濠之叛的主力军队，仅仅是阳明在仓卒之际临时调集的江西境内各府县之兵及乡兵义勇而已。

② 参见《再报谋反疏》，《全集》卷一二，393页。

殒，日加尪瘠，仅存残喘。母丧权厝祖墓之侧，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丧，哭泣过节，见亦病卧苦庐。臣今扶病驱驰兵革，往来于广信、南昌之间。广信去家不数日，欲从其地不时乘间抵家一哭，略为经画葬事，一省父病。

臣区区报国血诚上通于天，不辞灭宗之祸，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国难，亦望朝廷鉴臣之心，不以法例绳缚，使臣得少伸乌鸟之痛。^①

由此可以知道，此时阳明的祖母岑氏已经病故，其父王华亦日就衰老，“病卧苦庐”，他为自己因羁縻于国事而无法亲临凭吊祖母之丧、省视父疾而感到极度哀伤，他原本不甚强健的体质，因驱驰于兵革，更兼内心之忧悒，而显得每况愈下，“每一号恸，割裂昏殒，日加尪瘠，仅存残喘”，并非过度夸张之辞。他于此时再次提出省亲请求，既真诚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允许而少慰其心中的惓惓孝思，又包含着基于当时朝政的了解而产生的某种难以言说明白的内心忧虑，但朝廷对阳明便道省葬的请求仍然不允，其答复是：“著督兵讨贼，所奏省亲事，待贼平之日来说。”^②

六月二十二日，宸濠遣南昌府学教授赵承芳及原南安知府季敦携带讨伐朝廷的檄文，告谕丰城、吉安、赣州、南安等府县，在南安府墨池地方被阳明的哨兵捉住，截获了宸濠的檄文。阳明“看得檄榜妄言惑众，讥讪主上，当即毁裂”，又以“事合闻奏”，遂将原

① 《乞便道省葬疏》，《全集》卷一二，394页。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3页。按：正当宸濠气焰方炽之际，“勤王”之兵尚未完全结集，朝廷所遣官兵亦尚未至，而阳明提出省亲之请，似乎是不和谐的，钱德洪在当时整理阳明遗著时即曾有疑惑：“（德）洪昔茸师疏，《便道归省》与《再报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岂当国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当是时，倡义兴师，濠且旦夕擒矣，犹疏请命将出师，若身不与其事者。至《谏止亲征疏》，乃叹古人处成功之际难矣哉！”（《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4页）详德洪之意，盖谓阳明设谋定策，剿平宸濠之叛早已成竹在胸，然其兴师起兵，未奉成命，故其于此时请求归省，正欲推功于朝廷，以免滥冒之嫌。然宸濠平定之后，阳明仍因宵小谗构而谤言沸腾，诬以滥冒军功，其视阳明磊落之心，真若萤火之于日光矣。

檄文固封，于七月初五日遣人赍送朝廷。在上疏中，有曰：

臣闻多难兴邦，殷忧启圣。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覬觐，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汉武帝有轮台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诏，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①

《明史·佞倖传》曰：“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事，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江彬、许泰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宸濠的谋反，原为皇室内部的一大丑闻，在阳明看来，其根源正在于武宗不理朝政，亲近群小，虽民心骚动，犹巡游不已，致使宇内之区，盗贼不息；宗室之内，谋动干戈。因此他希望武宗能“痛自刻责，易辙改弦”，“定立国本，励精求治”，以回天下豪杰之心，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对武宗本人的这种直言斥责，不仅体现了阳明的凛然正义之心，而且亦直接表露了他对当时朝政的批判态度。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阳明为剿平宸濠而四处调集军队，请邻省湖广、福建、广东等处出兵，同时在江西省境内进行一系列的军事布防。他于六月二十六日行文南安等十二府，令其招募军队，准备应战；要求各府及所属各县，“各起调官军乡兵，固守城池，保障

① 《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全集》卷一二，396页。按：南安府知府季教，在征剿横水、桶冈、洴头诸役中，均与阳明共同作战，立有战功，正德十四年升任广西参政。他是在由水路赴任广西经过南昌时被宸濠截留的。当时正值宸濠生辰，宁府传令进府庆贺，次日随众谢宴，因宸濠叛，遂被拘禁。季教“自分死国，因妻女在船，写书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后因看守愈严，求死不遂”。六月二十一日，季教被放回船，昏死良久方醒。次日，宸濠拘禁了季教的妻女，将其急呼进府，令其携带檄文告谕各府，并差旗校12人督押。季教携带宸濠伪檄，原为迫不得已，且其本有设法脱身以投赴阳明之意，故阳明认为，虽其“义未决于舍生”，“但暴虐之威恐动于中，鹰犬之徒矜制于外，在法固所当罪，据情亦有可悯”。尽管如此，他仍然监禁了季教（参见《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全集》卷一二，395～396页）。

地方”，“散布关隘，严加把截”，同时“选募骁勇精兵，大县约四五千名，小县约二三千名上，各备锋利器械，供给粮草，择委能干勇力官管领操练”；“其滨江去处，多备船只”^①，听候调遣。因丰城邻近南昌，地位重要，丰城知县顾佖告本县兵力不足，恐不足防，阳明遂行文龙泉、安福、永新诸县，请其调拨官兵，前往协防丰城，并要求顾佖等须“计议攻守方略，相度险夷要害，远斥堠以防奸，勤训练以齐众，探知敌人入境，即便设奇布伏，以逸待劳，击其不意，务在先发制人，毋令乘间抵隙。军兵人等务要严为约束，毋令侵扰，敢有违犯退缩，许以军法从事”^②。他又行文吉水县，调取该县所辖八都、九都民兵，由退休县丞龙光前去“将各户义兵，照数调集，各备锋利器械，编成行伍”^③，集中于该县操演武艺，以备随军进剿。他同时要求，各府县“凡一应不急词讼工役，俱各停止”，各官员不得因兵事而严科百姓，“及听信下人受财作弊”^④。

阳明非常清楚，他为拖住宸濠而使用的反间之计，仅为权宜，而必不可久。到七月初二，宸濠因并未发现有官兵大规模来袭，遂知原先所截获的阳明的“机密文书”所言并非实情，于是留兵1万余人防守南昌，亲自统率军队6万人，号称10万，总140余队，分为5哨，出鄱阳湖，过九江，北上直趋安庆（在今安徽省），围安庆城。安庆知府张文锦、守备都指挥杨锐、指挥使崔文竭力守城，宸濠攻旬日不下。^⑤按照阳明的预料，宸濠若攻克安庆，则必将沿长江顺流而东，袭击南京。但他认为，此时南京必已有防备，宸濠未必能克，这样他又必退守九江，若是如此，则水战便必不可免。为此，他移文福建布政司，请其选募善于水战的打手1万名，“动支官库不拘何项银两，从厚给与衣装行粮，各备锋利器械；就仰左布政

①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县募兵策应》，《全集》卷一七，573～574页。

② 《策应丰城牌》，《全集》卷一七，575页。

③ 《调取吉水县八九等都民兵牌》，《全集》卷一七，576页。

④ 《宽恤禁约》，《全集》卷一七，574页。

⑤ 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2页。

使席书、兵备佥事周期雍自行统领，星夜前赴军门，相机前进，并力擒剿。”^①同时，将宸濠可能进攻南京的情况上报都察院，以为“南畿系朝廷根本重地，今宁王谋逆构乱，举兵北行，图据南都”，为不使宸濠进攻南京的图谋得逞，“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济”，因此他请求都察院派兵，“选取骁勇精兵及民间忠义约二三万名，选委谋勇官员分领，会约邻近省郡，合势刻期进讨，……共勤国难”^②。因获悉宸濠在南京伏有奸细以为内应，遂要求南京各衙门及时备战，“会谋集议，作急缮完城守，简练舟师，设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袭；传檄傍郡，以张必讨之威；先发操江之兵，声义而西；约会湖湘，互为犄角”^③。

但在此时，不但朝廷方面未见一卒，且阳明行各府县所调兵马亦仍未齐集。迫于当时的军事形势，他一方面力促江西境内各府县迅速派兵，要求必须于七月十五日抵达临江府樟树镇（今属宜春市）会师；另一方面，他督同吉安知府伍文定、通判谭储、推官王晔，先期于七月十三日从吉安发兵，直趋樟树。因吉安府县正官皆统兵前往，守城之事，唯委诸贰职，因此在临行之前，他牌行吉安府及各县，要求敦请乡夫共同防守城池。^④十五日，临江府知府戴德孺、袁州府知府徐琰、赣州府知府邢珣、瑞州府通判胡尧元、童琦，以及南安府推官徐文英、赣州府都指挥余恩、新淦知县李美、泰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亦皆率兵先后赶到樟树。

七月十八日，阳明誓师于樟树，旋即北进，屯于丰城。当此之时，宸濠兵围安庆，阳明与众将商议进兵方略，众以为宜急速引兵

① 《预备水战牌》，《全集》卷一七，577页。因当时征用的大多为民船，不利军用。七月十二日，阳明牌行余干县知县马津，令其准备战船。“照得本院调集各处官军前去追剿逆贼，所有装兵船只，止顾有民船，缘狭小，不堪水战。本院不久沿江前进，惟恐临期有误，访得余干县所属龙津驿河埠湾泊，俱系运粮及民间大船，约有六七百号，在彼空闲，俱应起拨。为此仰知县马津等，即便亲至前项河埠，尽将官民船只责令各船运军船户装载调到军兵，跟随本院前往剿贼。”（王阳明：《牌行余干县知县马津预备战船》，《阳明先生别录》卷一〇《公移三》）按：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南州人。

② 《咨都察院都御史颜权宜进剿》，《全集》卷一七，557页。

③ 《预行南京各衙门勤王咨》，《全集》卷三一，1127页。

④ 参见《牌行吉安府敦请乡土夫共守城池》，《全集》卷一七，578页。

解安庆之围，而阳明认为，九江、南康（今星子）皆已为宸濠占领，而南昌城中拥兵数万之众，且多精锐，粮食积蓄充足，若挥师越过南昌、南康、九江而直趋安庆，则宸濠必回军抵死反击，因安庆城中之兵，仅仅可以自守，必无富余兵力可以增援我兵。而这样一来，南昌之兵可出而绝我粮道，南康、九江之兵可以合势而追击，宸濠围安庆之兵则形成对我军的正面进攻。安庆之围虽暂时可解，但必使我师陷入敌人的围困，孤军作战，必非上策，且亦终究不能解安庆之围。另一方面，我兵誓师樟树，声势浩大，南昌城中必已有所闻知，其心中亦必感震慑，若趁此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南昌，必能攻克，因南昌为宸濠根本重地，他必回师救援，这样，不但安庆之围可解，而且可以据守南昌，以逸待劳，最终达到歼灭宸濠之兵的目的。^①按照这一方略，他对各部进行了合围攻克南昌的严密军事部署：

1.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统部下官军 4 421 名，进攻广润门，进城后留兵防守该门，屯兵于布政司，分兵把守宁王府内门；

2. 赣州府知府邢珣，统部下官军 3 130 余名，进攻顺化门，进城后留兵防守该门，屯兵于镇守府；

3. 袁州府知府徐琰，统部下官军 3 530 名，进攻惠民门，进城后留兵防守该门，屯兵于按察司、按察院；

4. 临江府知府戴德孺，统部下官军 3 675 名，进攻永和门，进城后留兵防守该门，屯兵于都察院提学分司；

5. 瑞州府通判胡尧元、童琦，统部下官军 4 000 名，进攻章江门，进城后留兵防守该门，屯兵于南昌前卫；

6. 泰和县知县李楫，统部下官军 1 492 名，夹攻广润门，直入宁王府西门屯兵把守；

7. 新淦县知县李美，统部下官军 2 000 名，进攻德胜门，进城后留兵防守该门，直入宁王府东门屯兵把守；

8. 中军营统兵赣州卫都指挥余恩，统部下官军 4 670 名，进攻

^① 参见《擒获宸濠捷音疏》，《全集》卷一二，401 页。

进贤门，进城后屯兵于都司；

9. 宁都县知县王天与，统部下官军 1 000 余名，夹攻进贤门，进城后屯兵于钟楼下；

10. 吉安府通判谭储，统部下官军 1 576 名，夹攻德胜门，进城后屯兵于南昌左卫；

11. 万安县知县王冕，统部下官军 1 257 名，夹攻进贤门，进城后留兵把守该门，屯兵于阳春书院；

12. 吉安府推官王晔，统部下官军 1 000 余名，夹攻顺化门，屯兵于南、新二县儒学；

13. 抚州通判邹琥、知县傅南乔，统部下官军 3 000 余名，夹攻德胜门，留兵把守该门，屯兵于城外天宁寺。

阳明同时传令：“承委官员务要竭忠奋勇，擒剿叛逆，以靖国难。如或退缩观望，违犯节制，定以军法论处。军兵人等敢有临阵退缩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钦奉敕谕事理，就于军前斩首示众。”^①

进军南昌之前，阳明先对南昌城中居民发出告示，曝宁王之恶，明胁从无罪，令其不须惊恐，谓：“本院仰仗朝廷威灵，调集两广并本省狼达汉土官兵二十余万，即日临城，亦无非因民之怨，惟首恶是问。告示至日，（宁王）宗支、郡王、仪宾，各闭门自保，商贾买卖如故，军民弃甲投戈，各归生理，无得惊疑。该府（宁府）内臣校尉把守人员开门出首，或反兵助顺，擒斩首恶，一体奏闻升赏。其有怀奸稔恶、从逆不悛者，必杀不赦。凡我军民，即便去恶从善，毋陷族灭。”^②又告谕江西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三司从逆官员，责以大义，令其悔恶从新，“兵临之日，仰各开门出首，仍一面将本院发去告示给散张挂，抚谕良善百姓；宗支、仪宾人等，各闭门自保，

① 《牌行各哨统兵官进攻屯守》，《全集》卷一七，579～581 页。按：明代南昌有七座城门：东为永和门（又名坛头门），东南为顺化门（又名琉璃门），南为进贤门（又为抚州门、望仙门），南偏西为惠民门（又名寺步门），西南为广润门（又名柴步门），西为章江门，北为德胜门（又名望云门）。

② 《告示在城官兵》，《全集》卷一七，581 页。

毋轻出街市，横遭杀戮。该府（宁府）把守内臣校尉人等，亦各谕以大义，俾知背逆向顺，尚可免死；投甲释戈，蓬头面缚，候本院临审定夺。敢有从恶不悛，执迷不悟，拒敌官兵者，必杀无赦”^①。这些告谕，在攻克南昌的战斗中，起到了实际效果。

七月十九日，阳明师次市汊，“大誓各军，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宁王之恶，约诸将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而不克诛伍，四鼓而不克斩将。已誓，莫不切齿痛心，踊跃激愤”^②。傍晚，诸路官兵齐发于市汊，依各自的进军路线分别行进。二十日黎明，各军到达指定地点，对南昌发起进攻，遂克南昌。南昌之役，占领了宸濠的根本重地，使其失去据依之所，为最终剿平宸濠之乱奠定了稳固基础。战争的具体过程，阳明曾有轻描淡写的叙述：

先是，城中为备甚严，滚木、灰瓶、火炮、石弩、机毒之械，无不毕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旧坟厂，败溃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惊惧。至是，复闻我师四面骤集，皆震惊夺气。我师乘其动摇，呼噪并进，梯垣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伪太监万锐等千有余人。宁王官中眷属闻变，纵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当令各官分道救火，抚定居民，散释胁从，封府库，谨关防，搜获原被劫收大小衙门印信九十六颗。三司胁从官布政使胡濂、参政刘斐、参议许效廉、副使唐锦、佥事赖凤、都指挥王玘等，皆自首投罪。^③

① 《示谕江西布按三司从逆官员》，《全集》卷一七，582页。

② 《江西捷音疏》，《全集》卷一二，398页。

③ 同上书，398～399页。所谓“遣兵已破新旧坟厂”，是发生于十八日的一次规模不算太大的战斗。十八日夜，宸濠谍知阳明驻兵丰城，遂遣兵3000余人埋伏于老坟厂、新坟厂诸处，以策应南昌。阳明知后，认为必须将宸濠于新旧坟厂的伏兵先行扑灭，否则我兵攻城之日，其或来袭，则未免为所牵制。因此他于七月十三日遣奉新县知县刘守绪、靖安县知县万士贤，各统精兵3000，从间道乘夜进发，约会刻期袭破之（王阳明：《行知县刘守绪等袭剿坟厂牌》，《全集》卷三一，1129页）。此后，阳明又命将新旧坟厂“藏贼房屋树木等项用火焚烧，以免逆贼复据”（王阳明：《牌行安义靖安二县焚烧坟厂》，《阳明先生别录》卷一〇《公移三》）。坟厂之战，是阳明兴师以来与宸濠之兵的第一次正面交战。南昌既破之后，阳明又命奉新县知县刘守绪统领民兵把守武宁渡口，“不许一人一马擅自渡江入城，敢有潜躲在城，并一应违犯军令者，斩首示众”（王阳明：《牌行刘守绪把守武宁渡》，《阳明先生别录》卷一〇《公移三》）。

南昌既破，阳明首先安抚城中居民，发布告示，声明其“原被宁府胁迫，伪授指挥、千百户、校尉、护卫及南昌前卫一应从乱杂色人役家属在省城者，仰各安居乐业，毋得逃窜；有能寄声父兄子弟改过迁善、擒获首恶，诣军门报捷者，一体论功给赏，逃回报首者，免其本罪”^①。对宁府自焚、自缢而死的宫眷，阳明令江西布政司、按察司会同南昌府等有关方面措置棺木，依礼给予安葬，毋得违错。^②

宸濠于七月十六日兵围安庆，数日不下，遂亲自督率兵夫运土填堑，期在必克。十八日，南昌守城官员差人通报，谓“赣州王都堂已引兵至丰城，城中军民震骇，乞作急分兵归援”。宸濠闻知，心下甚为恐惧，即欲回军救援南昌。李士实等竭力劝阻，以为必须径直东下攻取南京，既即皇帝之位，则南昌自然宾服，宸濠不听。次日，宸濠遂解安庆之围，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2万归援南昌，其本人则自后督兵随来。

阳明既率军攻陷南昌，二十二日，谍知宸濠已解安庆之围，且已率军大举回援。而此时，阳明所请求的四方援军却仍未见一卒。六月十八日，阳明曾移文两广都御史杨旦，请其调集土汉“狼兵”前来策应，“共勤国难”。当此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悬殊之时，阳明无疑是亟须兵力援助的，但当他了解到江西人民都畏惧“狼兵”，而且“狼兵”有可能成为宸濠内应的情况下，便立即再次移文杨旦，请其停止调集“狼兵”，“原调广东土汉狼兵人等未审曾否齐集？但今南赣、吉安、南昌等处沿江人民，俱各畏惧狼兵，悉皆惊惶。及又访得狼达土兵，曾受宁王赃物，私许助谋效力。今调各兵，本以为国除害，惟恐返为民害，不无有误大事，拟合停止”^③。针对兵力不足而又缺乏外援的实际军事形势，阳明督同各领兵知府会集监军等官进行商议，应如何制定抵御宸濠的策略。人们普遍认为，“宁王兵势众盛，气焰所及，有如燎毛”，而已方兵力不足，且援兵亦不见踪影，若宸濠集中其优势兵力，全力拼斗，则势必难以支撑。因此，

① 《告示七门从逆军民》，《全集》卷一七，582页。

② 参见《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宁府宫眷》，《全集》卷一七，583页。

③ 《咨两广总督都御史杨旦停止调集狼兵》，《全集》卷一七，584页。

“宜敛兵入城，坚壁自守，以待四邻之援，然后徐图进止”。但阳明以为：“宁王兵力虽强，军锋虽锐，然其所过，徒恃焚掠屠戮之惨，以威劫远近，未尝逢大敌与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动扇惑其下者，全以进取封爵之利为说。”其于道义既未占得地步，且其围攻安庆数日不下，退回南昌又无归所，军心必已呈涣散之态，故“我若先出锐卒，乘其惰归，要迎掩击，一挫其锋，众将不战自溃。所谓‘先人有夺人之气，攻瑕则坚者瑕’也”^①。这一主动出击以攻其不备的策略，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亦正在此时，抚州知府陈槐、进贤县知县刘源清皆领兵赶到。

于是，阳明遂分布哨道，“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珪、戴德孺各领兵五百，分道并进，击其不意。又遣都指挥余恩以兵四百往来湖上，以诱致贼兵。知府陈槐，通判胡尧元、童琦、谭储，推官王晔、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楫、王冕、王轼、刘守绪、刘源清等，使各领兵百余，四面张疑设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后四起合击”^②。

二十三日，宸濠的先锋部队已至樵舍（位于南昌城北约30公里，滨赣江），“风帆蔽江，前后数十里，不能计其数”^③，气势甚壮。阳明督促各兵乘夜急速前进，令伍文定率正兵从正面发起对敌攻击，余恩率兵继后，作为援军；邢珣引兵绕道奔袭敌军背后，徐珪、戴德孺分别为左右两翼，以分散敌军的兵力。二十四日清晨，敌军战船乘风而前，兵士鼓噪，逼近王家渡，气焰甚为嚣张。担当正面进

① 《擒获宸濠捷音疏》，《全集》卷一二，400~401页。

② 同上书，401~402页。按：阳明布授方略，当在二十二日，《年谱》所载相同，且谓：“甲寅始接战”，甲寅即二十三日。但据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则在二十三日之前，伍文定等已与宸濠的一支奇兵相遇，双方交战，伍文定等失利。谓：“公（阳明）遣伍文定、邢珣、徐珪、戴德孺共领精兵五百，分道并进，击其不意。（宸）濠亦先使精悍千余人从间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处，遂交战。我兵失利。报至，公（阳明）怒甚，欲以军法斩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珪等首。（阳明）乃自帅兵亲战。或以敌锋方交，若即斩其（伍文定等）首，兵无统领而乱，俟各奋励，以图后效。明日，各帅兵奋死以战，大败之。”（《全集》卷三八，1420页）阳明曾于七月二十五日发《督责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剿贼牌》，其中曰：“今访得各官各持己见，自为异同，累有事机可乘，坐视辄致违错，本当拿究，治以军法，但以用人之际，姑且容恕。”现因“逆贼归援声息已逼，虑恐各官仍蹈覆辙”，故督责伍文定等“毋为观望苟生之谋，敢有仍前人怀一心，互有异同，以致误事，定行罪坐所由，断依军法斩首，的不食言”（《全集》卷三一，1129~1130页）。则伍文定等曾出兵受挫，断为事实，唯是否在二十三日之前，难以断定。

③ 《擒获宸濠捷音疏》，《全集》卷一二，402页。

攻任务的伍文定、余恩，佯装败阵，而实为诱敌深入。敌军争相进趋，前后不相顾及，此时，邢珣之兵横击敌阵，直贯其中，敌军溃败。伍文定、余恩率兵乘机回戈反击，徐珪、戴德孺则左右夹攻，四面伏兵亦呼声震天，四处出击，敌军不知所措，阵势大乱，溃败而逃。阳明令各军乘胜追击十余里，擒斩敌首2000余级，其落水死者以万数。敌军士气沮丧，宸濠则惊惧交加，引兵退保八字脑。宸濠亲自激励将士，对奋勇当先者赏以千金，被伤者人各百两，欲与阳明决一死战，遂尽发九江、南康守城兵士，以补充兵员。

此时，恰好建昌府知府曾珣率兵到来。阳明认为，宸濠既发南康、九江守城之兵，则二城兵力必虚，而九江不破，则湖广军队便不敢越过九江以增援南昌；南康不破，则自己的军队亦无法越过南康而实施对敌追击，因此，应当乘此机会收复九江、南康二城。他遣抚州府知府陈槐领兵400人，会同饶州府知府林城，乘机攻取九江；令建昌府知府曾珣领兵400人，协同广信府知府周朝佐，乘机攻取南康。^①

二十五日，宸濠之兵又大举来攻，“并力盛气挑战”。“时风势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数十人。”阳明急令将率先退却者斩首，以励士气。于是，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铳炮之间，虽火燎其须发而不敢退，奋力督促各兵，殊死并进。宸濠所乘战船被炮火击中，退走，遂大败。擒斩敌军2000余人，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宸濠率军退往樵舍，结船连为方阵，尽出其金银以赏士，鼓励兵士殊死抵御。宸濠将各船连为整体，阳明遂打算用火攻之策，他督促伍文定预备火攻的器具，令邢珣从敌军左侧进行袭击，徐珪、戴德孺从右侧进行袭击，余恩等人则分兵四处设伏，一等火发，即四方合击。

二十六日，阳明与宸濠大战于鄱阳湖，生擒宸濠。其过程为：

二十六日，宁王方朝群臣，拘集所执三司各官，责其间以不致死力，坐观成败者，将引出斩之。争论未决，而我兵已奋

^① 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牌行抚州府知府陈槐等收复南康九江》，《全集》卷一七，585页。

击，四面而集，火及宁王副舟，众遂奔散。宁王与妃嫔泣别。妃嫔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执宁王，并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卢珩、罗璜、丁馈、王春、吴十三、凌十一、秦荣、葛江、刘勋、何镗、王信、吴国七、火信等数百余人。被执胁从官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璋、金事王畴、潘鹏，参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挥郑文、马骥、白昂等。擒斩贼党三千余级，落水死者约三万余。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焉。于是余贼数百艘四散逃溃，臣（阳明）复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为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又破之于吴城，擒斩复千余级，落水死者殆尽。二十八日，得知府陈槐等报，亦各与贼战于沿湖诸处，擒斩各千余级。^①

至此，宸濠谋反这一震动朝野的严重事件已经全面平息。宸濠就擒，“众执见公（阳明），（濠）呼曰：‘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所有，请降为庶民，可乎？’（阳明）对曰：‘有国法在。’遂令送至囚所”^②。可见其骄横傲慢之态。其乘马入南昌城，望见远近阳明的军队部伍整肃，笑曰：“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③可见其气焰仍然嚣张。而既见阳明，则嘱以安葬他的妃子姜氏，谓：“姜妃，贤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谏未纳，适投水死，望遣葬之。”则亦可见虽万恶丛萃之人，其一点良知亦终究未泯。阳明使人往，果得姜妃之尸，“盖

① 《擒获宸濠捷音疏》，《全集》卷一二，403页。以上所述及引文亦并见该文。按：在二十五日的战斗中，宸濠先胜而后败，据钱德洪所述，其原因除了伍文定等殊死拼搏以外，更在于阳明的奇谋：“二十五日，贼势尚锐，值风不便，我兵少挫。夫子（阳明）急令斩取先却者头。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铳炮之间，方奋督各兵殊死抵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忧，遂大溃。”而宸濠的最终被擒，竟亦颇有喜剧性：“次日（二十六日），贼兵既穷促，宸濠思欲潜遁，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宸濠大声叫渡，渔人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其（阳明）神运每如此。”（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九，1472页）

②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2页。

③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7页。

周身皆纸绳内结，极易辨”^①，阳明遂依礼予以安葬。《年谱》云：“先生入城（南昌），日坐都察院，开中门，令可见前后，对士友论学不辍。报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须状，暂如侧席，遣牌斩之；还坐，众咸色怖惊问。先生曰：‘适闻对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闻（宸）濠已擒，问故行赏乞，还坐，（众）咸色喜惊问。先生曰：‘适闻宁王已擒，想不伪，但伤死者众耳。’理前语如常。傍观者服其学。”^②处矢石炮火之间，当兵战激烈之际，阳明犹能讲论学术而气定神闲，指挥前线军务而不失常态，胜负似若不挂其心，其儒将大雅风范，非但当时见者心服，虽后世思之，亦油然而生景慕之心。阳明既擒宸濠，率部进入南昌城，“阖城内外军民聚观者以数万，欢呼之声震动天地，莫不举首加额，真若解倒悬之苦而出于水火之中也”^③。

宁王朱宸濠自六月十四日（1519年7月10日）起兵，至七月二十六日（1519年8月20日）被擒，前后不过41天；距其全军覆没的七月二十八日，亦不过43天。阳明自七月二十日（1519年8月14日）发起对南昌的攻击，到二十八日平叛战争全面结束，总共还不足10天。七月三十日，阳明遂上《擒获宸濠捷音疏》，详细通报了与宸濠作战并将其生擒的全部过程，对伍文定、邢珣、徐珪、戴德孺等各领兵官员“争赴国难，协谋并力”并能“冒险冲锋”的忠勇进行表彰，请求朝廷予以嘉奖。在上疏中，阳明对当时形势及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有过概括性的描述：

窃照宁王烝淫奸暴，腥秽彰闻，贼杀善类，剥害细民，数其罪恶，世所未有。不轨之谋，已逾一纪；积威所劫，远被四方。士夫虽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摇手，莫敢论其是非；小人虽

①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7页。宁王娄妃为娄谅之女，有家学。阳明早年曾向娄谅问学。传曰：“初，宸濠谋反，妃娄氏泣谏，不听。及宸濠被擒，于槛车中泣语人曰：‘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181页；《明史》宸濠传所载略同。）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7页。类似的记载亦见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

③ 《擒获宸濠捷音疏》，《全集》卷一二，403页。“举首加额”，“首”疑当作“手”。

在幽僻之中，且吞声饮恨，不敢诉其冤抑。兼又招纳叛亡，诱致剧贼渠魁如吴十三、凌十一之属，牵引数千余众，召募四方武艺骁勇、力能拔树排关者，亦万有余徒。又使其党王春等，分赍金银数万，阴置奸徒于沧州、淮阳、山东、河南之间，亦各数十。比其起事之日，从其护卫姻族，连其党与朋私，驱胁商旅军民，分遣其官属亲昵，使各募兵从行，多者数千，少者数百，帆檣蔽江，众号一十八万。其从之东下者，实亦不下八九万余。且又矫称密旨，以胁制远近；伪传檄谕，以摇惑人心。故其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义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①

当宸濠举兵之时，气焰极度嚣张，境内各官或从其叛逆，或被其胁迫，或被其拘禁，皆丧气夺魄，莫知所措，而朝廷即使在得知宁王已反之后，竟亦未对江西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几有置若罔闻之嫌。②阳明以一过境官员的身份，一闻非常变故，便即奋励于危难之

① 《擒获宸濠捷音疏》，《全集》卷一二，404~405页。

② 前面曾提及尚书王琼得都御史李克嗣的告变章疏后，曾对南京的防卫作过必要的军事部署，但并未按照阳明所请而“命将出师”江西。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朝廷之所以不出兵江西，是出于王琼对阳明的信任，以为他必能平叛，所以不必出师。何良俊记云：“宸濠谋逆时，王晋溪（琼）在本兵。时王阳明差南赣都御史，方赴任，至丰城闻变，即走吉安，与太守伍文定檄会袁州、临江、赣州四郡兵讨之。（阳明）报至京师，人情汹汹，且外议籍籍，皆云阳明任数，其去留不可必。晋溪力主其说，以为阳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将出师。时晋溪之婿侯莎亭为某部主事，人告晋溪曰：‘外间人言若此，而老爷坚持此议，倘事有不测，则灭族之祸不远，不若别有处分以为身家计。’晋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无他。且其谋略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虑为？’既而阳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报捷。”又谓：“方阳明先生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请旗牌以行，而晋溪即给以旗牌，阳明又取道丰城。盖此时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之方略已定。人疑阳明之去留者，何耶？”（《四友斋丛说》卷六，50页）按：良俊谓宸濠反时，阳明差南赣都御史，方赴任，误甚；其谓阳明请旗牌时尚未用兵，即已与王琼商定平宸濠反叛之策，尤为讹误。详阳明事迹，此二事前后甚不相属。然则其所谓王琼“以为阳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将出师”之说，其果是欤非欤？姑耶备一说而已。

时，起兵于仓卒之际，设谋运筹，纠集义勇，曾不旬日，而竟能以万余“乌合之兵”扫荡其十万坚甲锐士如摧枯拉朽，履险若夷，举重若轻，克收不世之伟绩。其胆魄之雄浑，胸襟之宏阔，谋略之深邃，真若匪夷所思，动乎九天之上，而其心地之磊落，气度之高远，仁义之充沛，则又若明月平湖，表里俱彻。但是，迅速平定宁王叛乱这一重大事件，却并没有给阳明带来好运，而只给他带来了宵小之辈无端的谗言诟詈与诬陷毁谤。

战前阳明所请四方援兵，一直未见踪影，只有福建方面有积极响应，兵备金事周期雍“起取上杭等处军兵共五千余名”，“起取漳州府海沧打手三千余名”，亲自率领，日夜兼程，前来支援。但宸濠既已成擒，余党悉渐殄灭，阳明遂一面犒赏福建官军，一面将其遣回。^①

正当阳明已经生擒宸濠、平定江西、遣散军队、抚慰军民，竭力恢复民众的生活秩序，并已上书告捷，且将宸濠等俘虏登记造册即将遣送京城之际，朝廷却开始商讨要对江西“命将讨贼”。八月，兵部会议征剿宸濠方略，武宗朱厚照下诏曰：“这江西南

① 参见《犒赏福建官军》，《全集》卷一七，585页。福建按察司兵备兼管分巡漳南道金事周期雍应阳明的呼吁，立即率兵前来，成为各省能够出兵加入平定宸濠反叛的一个特例，阳明对此是颇为感动的。在发出请福建出兵的公文以后，阳明曾给福建巡按周鹓（字文仪，号适斋，华亭人，正德九年进士）等写信，谓：“切望急促金事周期雍，公文内示坐定名字者。未审周今安在？且欲二公坐名促之来也。区区已先将弱卒牵制其后，使不得安意前进（按：此指阳明用计迟留宁王），但迟留半月，南都有备，四方勤王之师渐集，必成擒矣。百冗中，言不能悉。”（王阳明：《与二位周侍郎》，载《阳明学》（日本）第163号）按：阳明与周期雍对宸濠之叛已先有预感，且有预备，正德十五年，阳明曾回忆道：“正德戊寅（十三年）之冬，福建巡按金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赣。时逆濠奸谋日稔，远近汹汹。予思预为之备，而濠党伺视左右，摇手动足，朝闻暮达；因期雍官异省，当非濠所计及，因屏左右，语之故，遂与定议。期雍归，即阴募骁勇，具械束装，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发。故当濠之变，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书佛郎机遗事》，《全集》卷二十四，921页）正因有此先谋，所以阳明在给周鹓的信中才有“未审周今安在”的急切询问，而周期雍亦才可能闻檄即发。战争结束后，阳明在给友人的信中，再次提及“宁贼之变，远近震慑，阅月余旬，四方之援无一人至者，独闽兵闻难即赴”（王阳明：《与世亨侍御》，载《阳明学》（日本）第163号）。在给周鹓的致谢信中，又说：“所调兵快，即蒙督发；忠义激烈，乃能若此。四邻之援，至今尚未有一人应者。人之相去，岂不远哉！”（《与周文仪手札》，《全集》卷三二，1204页）

王谋为不法，事情重大，你部里既会官议处停当，朕当亲率六师，奉天征讨，不必命将。”^①于是，“下诏暴其（宸濠）罪，告宗庙，废为庶人。逮系尚书陆完，嬖人钱宁、臧贤等，籍其家”^②。自命为“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命太监张永、张忠及安边伯许泰、都督刘晖等，率京师官军1万余人，浩浩荡荡，出师南征。行到良乡（在今北京市西南，属房山区）地方，阳明《擒获宸濠捷音疏》送达，但武宗仍然坚持要御驾亲征，以为“元恶虽擒，逆党未尽，不捕必遗后患”^③。八月十七日，阳明得知武宗率师“亲征”南来，遂上疏竭力劝阻，并谓将亲自押解宸濠赴京献于阙下。略曰：

宁王宸濠杀害守臣，举兵谋逆，臣于六月十九日具本奏闻之后，调集军兵，择委官属，激励士气，振扬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阳湖，与贼连日大战。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谋党李士实等，贼首凌十一等，俱已擒获。贼从俱已扫荡，闽、广赴调兵士俱已散还，地方惊扰之民俱已抚帖。……（宸濠）发谋之始，逆料大驾必将亲征，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阙门，式昭天讨。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诚恐（宸濠）旧所潜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窃发，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憾。况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

① 《请止亲征疏》，《全集》卷一二，408页。

② 《明史·诸王传二》。

③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7页。武宗“御驾亲征”事件，发生在宁王之叛已经平定之后，实为昏聩滑稽的莫名其妙之举，它亦是阳明此后蒙受种种诬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亲征”是在用事太监张忠及许泰等人的竭力怂恿之下发生的，谷应泰记曰：“八月，上（武宗）下诏亲征。时王守仁擒宸濠捷书未至，诸边将在豹房者各献擒濠之策，上亦欲假亲征南游，太监张永等见钱宁、臧贤事败，又欲因此邀功。于是，上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边将江彬、许泰、刘晖，中贵张永、张忠等俱称将军，所下玺书改称‘军门檄’。”（《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如果在阳明擒获宸濠的捷报未至之前而有亲征的决定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既知宸濠已擒，江西已定之后仍坚持亲征，便不能不说是一种颠倒错乱之极的行为。实则武宗欲假“亲征”之名而南游，诸佞幸欲假此以足其私欲，才是其真实目的。亦因此故，“亲征”事件成为武宗本人的最大丑闻之一。

臣子之职分。臣谨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将宸濠并逆贼情重人犯督解赴阙……^①

疏入，武宗非但不听，且屡次以“军门檄”令阳明停止献俘，等候御驾。大学士梁储、蒋冕等则屡请武宗回銮，返回北京，亦不听，继续南下。十月，武宗率军驻蹕南京。^②

九月十一日，阳明押解宸濠等俘虏，从南昌启程，准备献于朝

① 《请止亲征疏》，《全集》卷一二，408~409页。

②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按：武宗南巡至南京的日期，谷氏谓在“九月”，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亦谓：“九月，上至南京。先生（阳明）虑沿途奸党潜伏，欲自献俘阙下。是月，发南昌。”（《思复堂文集》卷一，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明史·武宗本纪》记武宗南巡行程，谓：“八月癸未，车驾发京师。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发。冬十一月乙巳，渔于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贺于太监张阳第。十二月辛酉，次扬州。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恐皆未确。今以阳明集考之，疑当在十月。又按：武宗驻南京时，乔宇为南京参赞机务，寇天叙（字子惇，山西榆次人）为应天府丞。二人皆机智善度，虽不敢拂逆武宗之意，但对江彬等人心怀叵测则已有觉察，对其大肆骚扰百姓、搜括民财的行为极为不满，力与抗衡周旋，南京百姓得苏其息。有数事可略见其概。“武宗在南京，江提督（彬）所领边卒，躯干颀硕，膂力拳勇，皆西北劲兵也。白岩（乔宇）命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提督相期至校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矫，行走如飞，而北人粗笨。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胁肋，或触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时。江提督大为之沮丧。而所蓄异谋，亦已潜折其二三矣。”“寇（天叙）亦山西人，与白岩同乡。躯体颀硕，搭眼微近视。每日带小帽穿一撤坐堂。自供应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来，寇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语，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没钱粮，无可措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耳。’差人无可奈何，径去回话。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动，后亦不复来索矣。”“江彬所领边卒，骄悍之极，行游市中，强买货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选矮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宫祇候，必命以自随。若遇此辈，即与相搏，边卒大为所挫。后遂敛迹。亦所以折江彬之谋也。”当时因“御驾亲征”，在南京一带对百姓生活造成严重骚扰，江彬等人挟势擅威，穷索民财，丑态百出，而能力与周旋者，亦尚有他人，如扬州太守蒋瑶即为一例。“武宗驾至淮安，太守薛赞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纤皆索民间绢帛，两淮为之大扰。过扬州，蒋瑶为扬州太守，独不拆房。曰：‘沿河非圣驾临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毁坏民居？有罪，知府自当之。’江彬传旨，要扬州报大户。蒋曰：‘扬州止有四个大户。其一，是两淮盐运司；其二，是扬州府；其三，是扬州钞关主事；其四，是江都县。扬州百姓穷，别无大户。’江又传旨云：‘朝廷要选绣女。’蒋曰：‘扬州止有三个绣女。’江问：‘今在何处？’蒋曰：‘民间并无。知府有亲女三人，朝廷必欲选时，可以备数。’江语塞，其事遂寝。扬州安堵如故。”（均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六，53~55页）泗州太守汪应轸（字子宿，浙江山阴人，著有《清湖文集》）又为一例：“车驾驻南京，命州进美妇善歌吹者数十人。应轸言：‘州子女荒陋，无以应敕旨。臣向募有桑妇，请纳之宫中，传受蚕事。’事遂寝。”（《明史》卷二〇八《汪应轸传》）

廷。在此之前，阳明处理了一系列的地方军政事务。^①因献俘要路过浙江，所以在八月二十五，阳明上《二乞便道省葬疏》，希望朝廷能允许他顺路回家祭奠祖母，探视病重的老父：

近照宁王逆党皆已仰赖皇上神武、庙堂神算，悉就擒获，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庆，得免征调之苦，复有更生之乐，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泽。独臣以父病日深，母丧未葬之故，日夜哀苦，忧疾转剧。犬马驱驰之劳，不足齿录，而乌鸟迫切之情，实可矜悯。已蒙前旨，许“待贼平之日来说”，故敢不避斧钺，复伸前请。^②

在阳明看来，朝廷对他归乡省葬的请求原有“待贼平之日来说”的承诺，现在宸濠已经就擒，地方已经安定，当前必要的地方军政事务已经处理完毕，而且献俘是要经过浙江的，真正是顺路，朝廷应该没有理由不同意他的这一请求，但事实却是朝廷“不允”。^③

① 七月三十日，因江西吉安等十三府所属各县遭受严重旱灾，自三月至七月不雨，禾苗尽行枯死，阳明上疏朝廷，请求将本年江西税粮通行优免，以救残伤之民，以防变乱之阶（参见《旱灾疏》，《全集》卷一二，407页）。七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七日，阳明分别上《奏闻益王助军饷疏》、《奏闻淮王助军饷疏》，对益王、淮王在平定宁王之战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参见《全集》卷二，406、410页）。因伍文定、邢珣、徐珪、戴德孺等，依例应于正德十五年正月进京朝觐，但因江西新经变乱，官府缺人，各官无法按期朝觐，阳明于八月十七日上疏，请留各官在省供职，暂缓赴京（见《奏留朝觐官疏》，《全集》卷一二，409页）。八月二十五日，阳明上疏请恤参与宁王谋反的重刑人犯，免其死罪，以充实军伍（参见《恤重刑以实军伍疏》，《全集》卷一二，411页）。宁王反时，曾派亲信到各府县衙门劫夺印信，共计有106颗，战后，政治秩序亟待恢复，然原掌印官员俱为从逆人等，阳明遂分别给予恰当处置，或使其戴罪管护，或委新任官员（参见《处置官员署印疏》，《全集》卷一二，413页）。八月二十三日，阳明与知府伍文定等研究如何处置或顺从、或被迫参与宸濠谋反的各级官员，二十五日，分别上《处置从逆官员疏》、《处置府县从逆官员疏》（参见《全集》卷一二，415、418页），具疏各官从逆情状，分别轻重，要求朝廷“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以存罪疑惟轻之仁”。九月初十日，具疏九江、南康二府各官失职之罪，上《收复九江南康参失事官员疏》（参见《全集》卷一二，419页）。阳明工作之勤勉，于此可略见一斑。

② 《二乞便道省葬疏》，《全集》卷一二，415页。

③ 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8页。阳明当时是十分期盼朝廷能恪守承诺，允许他回乡探亲的。他曾写信给其门人朱守忠（名节，号白浦，山阴人），谓：“宁贼之起，震动海内，即其气焰事势，岂区区知谋才力所能办此哉？……但其（阳明自谓）弃九族之诛，强扶床席，捐躯以徇，此情则诚有令（按：疑当作可）悯者，不知庙堂诸公能哀念及此，使得苟存余息，即赐归全林下否？此者，守忠亦当为区区致力者，前此已尝屡渎，今益不俟言矣，渴望渴望！老父因闻变，惊忧成疾，妻孥皆坐此病留吉安，至今生死未定。始以国难，不暇顾此，此事势稍靖，念之百忧前集，恨不能即时逃去。奈何奈何！”（王阳明：《与朱守忠》，钱明据计文渊《王阳明法书集》移录）信中所述，应是阳明当时的实际心情，因此朝廷不许他便道归省，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又按：《年谱二》在“再乞便道省葬，不允”下系阳明与王琼的信，误。阳明与王琼书，当作于次年，即正德十五年三月三乞省葬未允之后。

此时，武宗佖臣张忠、许泰虽已得知阳明将亲自献俘于京师，仍竭力怂恿武宗继续“御驾亲征”，勒令阳明停止献俘，捏造军情，认为“奔溃党恶，见该各属日报啸聚流劫，亦非已靖”，苛责阳明“当此新乱之余”，不曾“留心抚绥地方”，而是“固执一见，辄要自行获解（俘虏），私请回师”；又以为“妃媵系宗藩眷属，外官押解，恐有妨碍，设或越分擅为，咎归何人？”要求阳明将“已获贼犯”仍留江西，“听候明旨”^① 审验。事实上，阳明按原定计划已于九月十一日从南昌启程，亲自押解宸濠等人，量带官兵，从水路而东，在接到由江西按察司转来的张忠的公文之时，他已经到达广信（今上饶）。阳明接到张忠以“钦差提督军务御马监太监”的名义发出的公文以后，立即回复江西按察司，表明“逆党俱已擒获，其余胁从，遵照钦降黄榜事例，俱已许令投首解散；宗藩眷属，俱系取到各将军府内使管伴监守，保无他嫌。”而张忠等既奉命前往江西戡乱，有关事情请江西按察司径自查照施行，他自己“纵使复回省城，亦安能效一筹？不过往返道途，违误奏过程期，有损无益”^②。所以没有必要返回南昌。同时，他又行文兵部，要求查验张忠等所携公文是否确实，以为“本职缪当军旅重寄，地方安危所关，三军死生攸系，一应事机，若非奉有御宝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轻易凭信？今前项各官文移，既非祖宗旧章成宪，就使果皆出于上（皇帝）意，亦须贵部（兵部）行有知会公文。万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间作弊，致有不测变乱，本职虽死，亦何所及？”况且“宸濠并各重犯宫眷人等，见（现）解广信地方，设若往返，恐致疏虞，及违误本职奏报原拟日期”，因此他并没有按照张忠的要求，重新返回南昌，而是“照旧督押（宸濠等人）前赴阙下献俘，以照圣武”^③。九月二十六日，阳明书《献俘揭帖》，说明了俘虏在押解途中已有相继死亡的情况，不能再行耽搁，至于江西方面，“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

①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献俘呈》，《全集》卷一七，588页。

② 同上书，588～589页。

③ 《咨兵部查验文移》，《全集》卷一七，590页。

官、领兵知府等官，俱各见在，封识明白，别无可疑”^①。但张忠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连遣人追至广信”，要阳明将宸濠等犯重新带回江西，释放到鄱阳湖一带，“俟武宗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②。

对于这一有背常情、违越正理的荒唐要求，阳明自然不听，遂乘夜从广信过玉山，经草萍驿，到达杭州。^③此时太监张永率军已先到杭州。张永赍武宗“总督军门”钧帖，称“宸濠等待亲临地方，覆审明白，具奉军门定夺。”阳明认为，“既奉总督军门钧帖，自合解（宸濠）赴（军门）面受节制。（但）若复退还省城，坐待驾临，恐涉迟慢，且误奏过程期。又（阳明本人）复扶病日夜前进，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本职自度病势日重，猝未易愈，前进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迟延，必成两误”，于是请求自己留在杭州养病，而将宸濠等交付给张永。^④阳明之所以置武宗屡屡发出的“军门檄”于不顾，不奉其将宸濠等带回江西之命，其目的原是为了使江西人民少受南下军队的蹂躏之苦，因此当阳明在杭州面见张永的时候，曾向他表达了自己内心真正的忧虑。“先生见（张）永，谓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昔助濠尚为胁从，今为穷迫所激，奸党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势。至是兴兵定乱，

① 《献俘揭帖》，《全集》卷三一，1140页。据此文，知宸濠谋党李士实、王春、刘养正等已在押解途中死亡，其余人犯亦多染病，所以阳明认为：“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狈，相继死亡，终无解京人犯，抑恐惊摇远近，变起不测。”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8页。事实上，这才是张忠等人追阳明返回南昌的本意。当时虽已无贼可征，但御驾既已亲征，自然不能无功而返，军情既可捏造，御驾亲征而擒获宸濠这样的事情自然亦是捏造的。张忠之虚伪卑劣，武宗之昏庸至于必与臣下争功，以及阳明当时所处之艰难，于此亦可略见其一斑。

③ 阳明过草萍驿，作诗二首并序，其序云：“九月献俘北上，驻草萍，时已暮。忽传王师已及徐淮，遂乘夜速发。次壁间韵纪之二首。”其一云：“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师。”（《全集》卷二〇，754页）可知此时阳明的心情是非常急迫的。他日夜兼程前往，意在“欲请回銮罢六师”，因江西数经战乱，民力凋敝已甚，再经不起折腾了。但武宗及张忠、许泰、江彬等等，却并不体恤“民力东南已尽疲”的苦况，阳明终究亦未能达到“请回銮”而“罢六师”的目的。

④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暂留养病》，《全集》卷一七，590～591页。

不亦难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为群小在君侧,欲调护左右,以默辅圣躬,非为掩功来也。但皇上顺其意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于是先生(阳明)信其无他,以濠付之,称病西湖净慈寺。”^①

阳明“称病西湖净慈寺”,时间已在十月中旬。^②早在弘治十六年(1503)的时候,阳明即曾在西湖养病,故地重游,情景似犹依稀可忆,然物是人非,心态尤非当年可比:

①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8页。按:张永,保定新城人,宦官。初与刘瑾为党,后与瑾有隙,发瑾之罪,有功。《明史·宦官传》:“宁王宸濠反,帝南征,(张)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檻车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战。守仁不可,至杭州,诣永,永拒不见。守仁叱门者,径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永为气慑。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檻车(宸濠的囚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与永偕还江西。”据此,则知张永初亦主张将宸濠等放回鄱阳湖,待武宗亲征,且有意傲慢阳明,只是在阳明为江西百姓考虑的坦诚相告之下,方始“大悟”。然阳明将宸濠付与张永以后,并未与永“偕还江西”。何良俊曰:“阳明自言:与宁藩战于鄱阳湖,部署已定,初亦不甚誇張(惆悵)。但罪人斯得,而圣驾忽复巡游,上意叵测,为之目不交睫者数夕。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谦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篋示之,皆此辈交遇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四友斋丛说》卷六,55页)此“二中贵”者,其一即为张永无疑,然是否有所谓宴于镇海楼之事,则未可知也。《年谱》又曰:“武宗尝以威武大将军牌遣锦衣千户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劝。先生曰:‘人子于父母乱命,若可告语,当涕泣以从,忍从谀乎?’不得已,令参随侍负敕同迎(锦衣千户)以入。有司问(慰)劳锦衣礼,先生曰:‘止可五金。’锦衣怒,不纳。次日来辞,先生执其手曰:‘我在正德间下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区区意,只求备礼,闻公不纳,令我惶愧。我无他长,止善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锦衣知有公也。’于是复再拜以谢。其人竟不能出他语而别。”(《全集》卷三四,1269页)按:此事当发生在杭州,时间则当在阳明付宸濠于张永之前,于斯可见武宗行事之乖戾,锦衣卫急财之丑态,而尤可见阳明处事之风范,文明以止,刚柔有度。

② 阳明《宿净慈寺四首》自注曰:“十月至杭,王师遣人追宸濠复还江西。是日,遂谢病,退居西湖。”(《全集》卷二〇,755页)阳明向张永交割宸濠等犯的日期,则是十月初九日。十月十一日,阳明行文新任江西按察司副使陈槐,请其一同押解宸濠等逆犯回江西省城,其中提到:“当职督解宁王等犯行至杭州地方,适遇钦差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御用监太监张(永)奉命前来江西体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库藏官眷等事”,“原解前项逆犯,虽经按仰浙江按察司备呈太监张(永)会同监军御史公同该省都、布、按三司,将宸濠并其党类及各官眷马匹等项查交明白,别委相应官员管押,带回省城,听候驾临之日转解军门审处”。而他本从则因病在杭州调治,“本职因疾从便在于杭州城内请医调治,候稍痊愈,仍回江西省城,或仍前进,沿途迎驾”(王阳明:《牌行副使陈槐督解逆犯》,《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一《公移四》)。

老屋深松覆古藤，羁栖犹记昔年曾。棋声竹里消闲昼，药裹窗前对病僧。烟艇避人长晓出，高峰望远亦时登。而今更是多牵系，欲似当时又不能。

常苦人间不尽愁，每拼须是入山休。若为此夜山中宿，犹自中宵煎百忧。百战西江方底定，六飞南向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诸老能无取日谋？^①

诗中所表现的情怀是悒郁而无奈的。深松古藤，竹里棋声，并没有唤起他忘情江湖的潇洒脱落；身罹百难，犹可淡然处之，而民遭荼毒，却使他夜不成寐，忧心如焚；群奸当道，国是日非，他虽洞若观火，却又无力回天。他虽置身于湖光山景，却无法融情于风物旖旎，“一日复一日，中夜坐叹息”^②。他虽暂时离开了江西，却深切怀念着江西人民。自己四年以来的兵革驱驰，呕心沥血，虽荡平贼巢，平定宸濠，但前途却反而变得愈加茫然堪忧，人民亦没有因此而脱离困厄，人祸天灾，频仍相续，民命竟未知抵于何所。他已将江西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为自己无能解除其人民的苦痛而深感惭愧：

甲马驱驰已四年，秋风归路更茫然。惭无国手医民病，空有官衙糜俸钱。湖海风尘虽暂息，江湘水旱尚相沿。题诗忽忆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园。^③

阳明一边养病，一边等待着武宗撤兵返回京师。按照他的理解，武宗亲征，毕竟只为宸濠而来，现在宸濠既已交付张永，“王师”便没有理由继续南下。但他不曾料到，武宗并没有罢师之意，而仍继续南游。阳明原有继续留在西湖养病的想法，但得知武宗南巡已至扬州，“群奸在侧，人情汹汹”，他已顾不得自己的病体，遂从杭州起程，从运河往镇江，欲面见武宗，大学士杨一清竭力予以劝阻，

① 《宿净慈寺四首》一、二，《全集》卷二〇，755页。

② 《太息》，《全集》卷二〇，755页。

③ 《寄江西诸士夫》，《全集》卷二〇，754页。

时在十月。^①亦恰在此时，朝廷命阳明兼巡抚江西，他遂泝长江，过湖口（属今九江市），于十一月返回南昌。^②

此时的南昌，因张忠、许泰等所率北军的进驻，重又陷入一片混乱。“江彬、许泰、刘鞏、张忠、张永、魏彬等先领兵由大江至，人居（南昌）城中，人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③非但军马屯驻，靡

① 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9页。按：阳明《泊金山寺二首》自注曰：“十月将趋行在。”则其过京口欲面见武宗，当在十月无疑。武宗由北南来，当先过扬州，再至南京，因此怀疑《明史纪事本末》所载“九月，上至南京”有误，应在十月。

② 在由京口返回南昌的途中，阳明曾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又字子西，号六如居士，江苏吴县人）有过一段书画之缘。《贵阳阳明祠·阳明洞碑刻拓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载阳明《书唐寅十二景文》一篇，文曰：“唐子西云：山静（疑有缺字）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随意读《周易》、《国风》、《离骚》，太史公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出步溪上，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称雨，探寻数时，相与剧谈一晌。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麋狝，共偃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昧子西此句，可谓妙绝。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话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不得（按：不得，疑误倒）已多乎？正德己卯冬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寥寥数行，极见阳明对故乡怀恋之情，而其闲雅洒落之态，则跃然文字间，实为一绝妙小品。文末有华补庵居士的题识：“中秋凉霁，偶邀唐子畏先生过剑光阁玩月，诗酒盘桓将浹旬。案上适有玉露‘山静日长’一则，因请子畏约略其景为十二幅寄兴。点染三阅月始毕。而王伯安先生来访山庄，一见叹赏，乃复怂恿伯安为书其文，竟蒙慨许，即归舟中书寄，作竟日喜。急装潢成帙，时出把玩。夫子畏得辋川之奥妙，而伯安行书，磊砢有奇气。况二公人品才地，皆天下士也。一旦得成合璧，岂非子孙世世什袭之宝耶？是岁嘉平月（腊月）十日补庵居士识。”（见上书，31页）华补庵者，无锡华云也。周道振、张月尊《唐伯虎年表》载，正德十四年己卯中秋，“无锡华云邀过剑光阁玩月，诗酒盘桓浹旬，为约略‘山静日长’一则为十二幅，三月始毕。王守仁为按图书文于对页。云字从龙，号补庵，师事邵宝，游王守仁门。官刑部郎中乞休。富收藏，与文徵明交往颇密”（《唐伯虎全集》，656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据此，则华云亦为阳明弟子。钱明云：“王阳明与唐寅之交往，从未见文献记载，而《年谱》对阳明自杭州返南昌的事迹亦记载甚简，故此书可作为这一史实的重要补充。”诚然。唐寅书画皆绝，风流倜傥，曾甚为宸濠所仰慕。何良俊曰：“宸濠甚慕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有余，见其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差人来馈物，则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遂遣之归。不久而告变矣。盖六如于大节能了了如此。”（《四友斋丛说》卷一五，133页）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2页。

费不堪，且忠、泰等假剿捕余贼之名，枉杀平民以冒军功，人民困苦已极，对北军遂有普遍的反感抵触情绪。而尤令阳明意想不到的，是张忠、许泰等人为达到其卑鄙目的，不但全然无视阳明最早倡议讨伐宸濠的事实及其实际功绩，而且竟公然对阳明大肆诬陷，谓阳明原是宸濠反叛的同谋，因见朝廷出师，天兵降临，才不得已而将宸濠抓获。忠、泰等甚至欲以此莫须有之罪名拘捕阳明，以请功于武宗，舆论为之不平。^①阳明“既还南昌，北军肆坐慢骂，或故冲导起衅，先生（阳明）一不为动，务待以礼”^②。忠、泰等人率北军驻南昌，挟天子之令，肆意妄为，其对江西人民的荼毒残害，实更甚于宸濠，而对阳明而言，这无疑为又一突起的变故。当此非常变故之时，他不仅要强抑内心的愤懑，而且还须为人民少受其苦而尽力斡旋。他令巡捕官告谕南昌市民移家于乡间，只留老弱在家应门，以免无故惨遭枉杀。十二月十五日，阳明对南昌军民发布告谕，曰：

告谕军民人等：尔等困苦已极，本院才短知穷，坐视而不能救，徒含羞负愧，言之实切痛心！今京边官军，驱驰道路，万里远来，皆无非为朝廷之事。抛父母，弃妻子，被风霜，冒寒暑，颠顿道路，经年不得一顾其家，其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岂其心之乐居于此哉？况南方卑湿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气渐动，瘴疫将兴，久客思归，情怀益有不堪。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家弃室之苦，

① 参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及《年谱二》。按：忠、泰等非但肆为飞语，厚诬阳明，且曾拘押与阳明共同平叛、功绩最著的伍文定。平定宸濠反后，伍文定升为江西按察使，“张忠、许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俘宸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恨。文定出谒，（忠）遂缚之。文定骂曰：‘吾不恤九族，为国家平大贼，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义，为逆贼报仇，法当斩。’忠益怒，推文定仆地。”嘉靖初，文定上疏论张忠等罪，曰：“曩忠、泰与刘晖至江西，忠自称‘天子弟’，晖称‘天子儿’，泰称‘威武将军’，与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谋害良民，需求万端，渔猎盈百万，至饿殍遍野，盗贼纵横。虽寸斩三人，不足谢江西百姓！”（《明史》卷二〇〇《伍文定传》）由此约略可见张忠、许泰等人在江西擅作威福、倒行逆施之劣迹。伍文定（？—1530），字时泰，湖北松滋人，登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第。有膂力，善骑射，尚忠义，为人慷慨，行事敢为。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9页。

务敦主客之情，勿怀怨恨之意，亮事宁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优恤。今军马塞城，有司供应日不暇给，一应争斗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尔百姓，其各体悉无怨。^①

体味文告的语意，我们至今仍能体会到阳明当时忍辱负重的“苦切之情”及其对南昌人民所受苦难的怜悯之意。张忠、许泰等所率京师军队，最终于十二月撤出南昌北旋。《年谱》曰：

（阳明）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故，厚与之槩，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服。会冬至节近，（阳明）预令城市举奠。时新经濠乱，哭亡酹酒者声闻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先生与（张）忠等语，不稍徇，渐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长，与先生较射于教场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强应之。（阳明）三发三中，每一中，北军在傍哄然，举手啧啧。忠、泰大惧，曰：“我军皆附王都耶！”遂班师。^②

阳明的豁达大度及其仁义之举，赢得了北军的敬重，遏制了忠、泰等人对南昌百姓的进一步祸害，亦正是在阳明的竭力斡旋之下，忠、泰等才不得不率军撤离南昌。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充分体现了阳明高超的处事智慧、凛然的正义之气及其精湛的武艺。

张忠、许泰等离开南昌，往南京。“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

① 《告谕军民》，《全集》卷一七，592页。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69页。亦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在“遂班师”后，谷氏继曰：“时江西已宁，忠等搜求微隐，罗织平民，妄诛戮以为功，而没其货财。军马驻省城五阅月，糜费浩烦，江西骚然，不胜其扰。”阳明曰：“大驾亲征，京边官军前后数万，沓至并临（南昌），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锋镝之余，未及息肩弛担，又复救死扶伤，呻吟奔走，以给厮养，一应诛求。妻孥鬻于草料，骨髓竭于征输。当是之时，鸟惊鱼散；贫民老弱，流离弃委沟壑；狡健者逃窜山泽，群聚为盗；独遗其稍有家业与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颠顿号呼于挺刃捶挞之下。郡县官吏，咸赴省城与兵马住屯之所，奔命听役，不复得亲民事。上下汹汹，如驾漏船于风涛颠沛之中，惟惧覆溺之不暇，岂遑复顾其他，为日后之虑？”（《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全集》卷一三，427页）则忠、泰等驻军南昌对江西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真正令人触目惊心！

(武宗)欲自以为功,乃与诸近侍戎服,飭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既入,囚之。”^①而此同时,张忠、许泰、江彬等则在武宗面前大肆谗言,诬陷阳明必将举兵谋反。在这一点上,张永尚能主持正义,谓阳明必无谋反之意。武宗曾问张忠:“以何验(阳明)反?”忠曰:“召必不至。”于是在正德十五年正月,武宗下诏,要面见阳明。阳明闻命,便即从南昌起程。张忠等又深恐阳明到南京面见武宗而败其阴谋,遂遣人到芜湖拦截,“拒之芜湖半月”^②。

阳明既被阻于芜湖,进退不得,遂纶巾野服,遁入九华山。虽蒙受诽谤,时势方艰,阳明并不是带着闲情逸致来重游九华的,但山景的幽邃,峰峦的清奇,仍使他感到了无限喜悦。“九十九峰如梦醒,群峦踊跃争献奇”,几乎又重新唤回他早年曾经有过的“遗世入山之意”:“蓬瀛海上浮拳石,举足可到虹可梁;仙人为我启阊阖,鸾骖鹤驾纷翱翔。从兹脱屣谢尘世,飘然拂袖凌苍苍。”^③时张永闻知阳明入九华山,又力言于武宗,曰:“王守仁实忠臣,今闻众欲争功,欲并弃其官,入山修道。”^④武宗使人往窥阳明动静,来人见阳明“每日宴坐草庵中”,言于武宗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武宗遂下诏使阳明重返江西。^⑤

正月末,阳明重访庐山开先寺,留石刻于“读书台”,其词曰: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182页。按:阳明将宸濠交付张永,乃在九月;张永既得宸濠,乃复押往江西,故至十二月方随北军被解到南京。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0页。谷应泰谓张永既得宸濠,“先见上,备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意。初,江彬、张忠等谋欲夺功,诬守仁初附宸濠,及知其势败,然后擒濠攘功。张永知其谋,语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为国,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乃先见上,备言其事。彬等毁遂不入。”(《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182页)《年谱》曰:“江彬欲不利于先生。先生私计,(若)彬有他,即计执彬武宗前,数其图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偿天下之忿。徐得(张)永解。”又曰:“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汨汨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全集》卷三四,1270页)

③ 《弘治壬戌尝游九华值时阴雾竟无所睹至是正德庚辰复往游之风日晴朗尽得其胜喜而作歌》,《全集》卷二〇,774页。

④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3页。

⑤ 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0页。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

并列从征官属姓名于左。次日，阳明游白鹿洞等处，“徘徊久之，多所题识”^①。当时因武宗仍在南京，而张忠、许泰、江彬等心怀异谋，阳明内心忧惶，于十五年二月至九江阅兵，得便游历东林寺、天池、讲经台等名胜。

回到南昌以后，阳明旋即致力于地方事务的处理，尽可能减轻因连年战争，尤其是因张忠、许泰等驻军南昌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殚精竭虑，稳定社会，尽快恢复当地的政治秩序以及人民的生活与生产秩序。三月二十五日，他上书朝廷，请求豁免江西地方税粮，以救民困。正德十四年七月，江西吉安等十三府所属各县遭受严重的旱灾，自三月至七月不雨，夏税秋粮，无从办纳。阳明曾于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上疏朝廷，请优免本年江西税粮，以救伤残之民，以防变乱之阶，但一直未曾得到朝廷的同意。江西连年征战，又因张忠、许泰等驻兵数月，财用枯竭，人民疲敝已极，辗转流离，无以堪命，但朝廷却全无体恤下民之心，忠、泰等甫一撤兵，“而户部岁额之征已下，漕运交兑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责之檄，已交驰四集矣！流移之民闻官军（指忠、泰之兵）之将去，稍稍胁息延望，归寻其故业，足未入境，而颈已系于追求者之手矣！”对这种朘削百姓至于竭泽而渔的行为，阳明提出了严厉斥责：“夫荒旱极矣，而又因之以变乱；变乱极矣，而又竭之以师旅；师旅极矣，而又竭之以供馈、益之以诛求、亟之以征敛，当是之时，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闻，又从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为之乎？”对朝廷假

^①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0页。

“宽恤”之名而行剥肤敲骨之实的虚伪，阳明进行了深刻批判：“今朝廷亦尝有宽恤之令矣，亦尝有赈济之典矣。然宽恤赈济，内无帑藏之发，外无官府之储，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岂能神输而鬼运？必将取诸富民。今富民则又皆贫民矣！削贫以济贫，犹割心膂以啖口，口未饮而身先毙。……故宽恤之虚文，不若蠲租之实惠；赈济之难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曰宽恤赈济，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剥其腹肾之肉，而曰‘吾将救汝之死’。凡有血气，皆将不信之矣！”因此，他乞皇上敕户部“速将正德十四、十五年该省（江西）钱粮悉行宽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残破尤甚者，重加宽贷，使得渐回喘息，修复生理”，以“解江西一省之倒悬”。当宸濠叛时，其檄文布于四方，承诺尽行蠲免江西各府县租税，以纳人心，因此阳明在集兵起义之际，亦曾以优免全省税粮为号召，由是而得人心稍安，“背逆趋顺，老弱居守，丁壮出征，团保馈饷，邑无遗户，家无遗夫”^①。而今战争结束，继以天灾人祸，非但税粮不曾优免，且又加以重科，在阳明看来，斯乃无异于必置人民于死地而后快。故其疏文，实本于公义之心而为民请命，其态度严正，措词激烈，迸涌出一股慷慨踔厉之气。仅从文章而言，它亦明显体现了阳明文风的别一种格调。然而，朝廷并没有因阳明的这一上疏而将江西全省税粮尽行宽免。阳明认为：“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则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故（汉）文帝赐租以致富乐之效，（唐）太宗以裕民成给足之风。君民一体，古今同符。”^②因此到了五月十五日，他会同江西监察御史唐龙、朱节等，再次上疏，请以宁王朱宸濠的田产房屋等项折抵官银，代民上纳租税；江西敝极之民，由是而少得苏息。^③

三月二十五日，阳明第三次上疏乞归省葬，朝廷仍然不允。^④这

① 《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全集》卷一三，426～428页。

② 《计处地方疏》，《全集》卷一三，429页。

③ 参见上书，429～431页。

④ 阳明三乞省葬的疏文不见于《全集》，但其上疏时间则可从《四乞省葬疏》中看出。

一次，阳明给王琼写了一封长信，简要回顾了他在江西数年讨贼的过程及对地方军政事务的措置，陈述了其身体的病况确实亟须医治，更坦率表达了他对朝政的忧虑，以为若朝廷不恤民命，则“地方事决知无能为，已闭门息念，袖手待尽矣”。“江西之民，困苦已极。其间情状，计已传闻，无俟复喋。今骚求既未有艾（盖谓忠、泰等驻军南昌及户部催粮之事），钱粮又不得免，其变可立待。去岁首为控奏（指十四年为旱灾上疏优免税粮事），既未蒙旨，继为申请（指十五年三月请蠲免税粮事），又不得达，今兹事穷势极，只得冒罪复请。伏望悯地方之涂炭，为朝廷深忧远虑，得与速免（江西税粮），以救燃眉，幸甚幸甚！”至于他乞归省葬事，“去秋已蒙‘贼平来说’之旨，冬底复请，至今未奉允报。生（阳明自谓）之汲汲为此，非独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盖指忠、泰等嫉其功而肆为诬陷事）。素蒙老先生（谓王琼）道谊骨肉之爱无所不至，于此独忍不一举手投足，为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残破惫极，其间宜修举者百端，去岁尝缪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归。……贱恙日尪瘠，又以父老忧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终日如在梦寐中。今虽复还省城，不过闭门昏卧，服药喘息而已。……所以复有蠲租之请，正如梦中人被锥刺，未能不知疼痛，纵其手足扑疗不及，亦复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怜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悬；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归全首领于牖下，则阖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举舍刻于无涯矣”^①。在给其门人朱守忠的信中，阳明又表达了完全同样的意思，只是语意显得更为坦白而已：

欲投劾往去，虑恐祸出不测，益重老父之忧。不去即心事已乱，不复可强留。神志恍恍，终日如梦寐中。省〔葬〕之乞，去秋尝已得旨，贼平来说。及冬底复请，而吏部至今不为一覆。

^① 《与王晋溪司马》，《全集》卷二七，1009～1010页。按：本文未注明撰写日期，据其所述，则当作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阳明上疏请免租税及乞归省葬之后不久。

岂必欲置人于死地，然后已耶？仆之困苦危疑，当道计亦闻之，略不为一动心，何也？望守忠与诸公相见，为我备言此情，得早一日归，即如早出一日火炕，即受诸公更生之赐矣！至祷至祷！

宸濠叛时，尝以伪檄免江西各郡租税，以要人心。仆时亦从权宜蠲免，随为奏请，至今不得旨。江西之民重惟兵革诛求之苦，无复生意，急赈救之，尚恐不逮，又加征科以速之！不得已复为申请，正如梦中人被锥，不能不知疼痛，聊复一呻吟耳。^①

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了阳明为民请命的真情实意。他确乎对当时朝廷的政治局势感到无奈的悲哀，确乎病体日趋羸瘠，亟须调养，他亦确乎想以养病为理由来作暂时的逃避。但是，朝廷既不恤江西百姓之命，更不恤阳明之病，他仍需动心忍性，继续隐忍宵小之辈无根的飞短流长，继续尽他的职责而为民命呼吁。

当时的江西全省，“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财日益匮，灾变日兴，祸患日促”。去年全省遭受严重旱灾，而今年“自春入夏，雨水连绵”，酿成数十年未见之洪灾。“江湖涨溢，经月不退。自赣（州）、吉（安）、临（江）、瑞（州）、广（信）、抚（州）、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诸郡，无不被害，黍苗沦没，室庐漂荡，鱼鳖之民聚栖于木杪，商旅之舟经行于闾巷，溃城决限，千里为壑，烟火断绝，惟闻哭声。询诸父老，皆谓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虽当此非常灾变之时，而“部使之催征益急，意外之诛求未已”，况“湖、湘连岁兵荒，闽、浙频年旱潦，两广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饷日穷，淮、徐以北，山东、河南之间，闻亦饥谨相属”。江西之民“脂膏已竭”，四邻之济则又无望，当此之时，阳明认为虽起圣人于地下，“亦恐计

① 王阳明：《与朱守忠》第三书，钱明据计文渊《王阳明法书集》移录，标点稍有不同。钱明谓此书当作于十五年八月四乞省葬前，盖大抵得之。敝以为此书当作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稍后，盖与《与王晋溪司马》大抵同时。

未有措”。五月十五日，他上疏自劾已罪，“伏惟皇上轸灾恤变，别选贤能，代臣巡抚。即以臣为显戮，彰大罚于天下，臣虽陨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为显戮，削其禄秩，黜还田里，以为人臣不职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变可弭，而臣亦死无所憾！”^①从阳明的疏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当时的悲愤情怀。武宗日沉溺于宴乐嬉戏，人民则辗转呻吟于沟壑，奸人怀叵测之心而肆意横行，忠鲠正直之士则颠蹶困顿于道路，朝政荒芜，社稷丘墟，虽圣人长起于九原，国是亦难以商略。而张忠、许泰、江彬之流对阳明的构陷并未停止，妄加罗织，深文周纳。御驾仍留南京，虽距平藩战争的实际结束已九阅月，而“亲征”犹自未已，灾难日益深重。阳明不为己忧，然国家人民堪忧；不为己虑，然国家前途堪虑。既求退不能，他便亦不再“避嫌”，他自信己心的通体莹彻，更何况原亦无“嫌”可避。

六月十四日，阳明离开南昌前往赣州。他首从漳口入玉笥大秀宫；十五日，宿云储；十八日，至吉安，游青原山，和黄庭坚诗；至泰和，与罗钦顺论学。^②到达赣州以后，“大阅士卒，教战法。”阳明的这一行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之下，尤其是关于其本人“附濠谋反”的诬陷未白之际，无疑会引起更多的猜忌。“江彬遣人来观动静”，意欲藉此以加害，便不足为怪；而阳明的相知者亦纷纷劝说，请他返回省城，“无蹈危疑”，便更在情理之中。然对于这一切，阳明皆不为所动，且曰：“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其门人陈九川^③等亦力为劝说，请其返回南昌，阳明日：“公等何不讲学？”

① 《水灾自劾疏》，《全集》卷一三，431～433页。钱德洪曰：“按：是时武宗犹羁南畿，进谏无由，姑叙地方灾异以自劾，冀君心开悟而加意黎元也。”（《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2页）

② 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2页。阳明与罗钦顺论学的主要内容，即今《传习录》卷二的《与罗整庵少宰书》，以论《大学》古本之义及“朱子晚年定论”为主。

③ 陈九川，字惟濬，江西临川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太常博士，为阳明弟子。因同夏良胜等上疏对武宗实施切谏，请罢南巡，被削籍为民。嘉靖初，复故官，迁主客郎中。又为张璁、桂萼所陷，下诏狱，遣戍镇海卫。后遇赦放还，卒（参见《明史》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

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①

此时的政治局面愈趋恶化。自十四年八月武宗“御驾亲征”以来，至十五年七月，已近一整年。武宗居留南京虽久，然“亲征”之绩尤未彰显，故张忠、许泰、江彬之徒欲“自献俘袭功。张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阳明）献俘北上，过玉山，渡钱塘，经人耳目，不可袭也。’于是，（武宗）以大将军钧帖令（阳明）重上捷音”^②。七月十七日，阳明遂将原先的《擒获宸濠捷音疏》略加修改，将张永、张忠、许泰、江彬、刘晖等人的名字加入其中，作《重上江西捷音疏》。疏入，武宗始议返回北京。十五年闰八月丁酉（十二日），武宗从南京出发。九月己巳（十五日），渔于积水池，舟覆溺水，遂得疾。冬十月庚戌（二十六日），次通州。十一月庚申（初六日），治交通宸濠者罪，执吏部尚书陆完赴行在。十二月己丑（初五），宸濠伏诛。甲午（初十日），还京师。^③

①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2~1274页。读《年谱》至此，阳明何故于此时不顾一身安危，敢冒佞倖之讥，离南昌而往赣州观兵士、教战法，虽尝深思其故，仍多所不解。而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或因朝廷不恤江西民命，政事有不可为者，阳明乃以此示其政治抗议；另一方面，或因江彬等环伺于武宗左右，日进谗言，且欲图谋不轨，阳明因而预为之备，其所谓“有深虑焉耳”者，或许与此相关。江彬尝欲在牛首山谋杀武宗，《明史·佞倖传》云：“十五年六月，（武宗）幸牛首山。诸军夜惊，言彬欲为逆，久之乃定。”故《年谱》引刑部对江彬的判词，有“虎旅夜警，已幸寝谋于牛首”之句。何良俊曰：“武皇在牛首山经宿，江彬欲行异志，而山神震吼达曙。彬惧慑，不敢举事。”（《四友斋丛说》卷六，54页）阳明因洞察到江彬等欲为乱，因而再至赣州阅兵，教其战法，以应缓急之用，并非没有可能。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4页。

③ 参见《明史·武宗本纪》。谷应泰曰：“冬十月，上自南京班师还京。十二月，上至通州，赐宸濠死，燔其尸。余党至京师磔诛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按：武宗自南京班师不在冬十月，而在闰八月，《江彬传》等所载相同，谷氏盖误。武宗因在积水池翻船而得疾，至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1511年4月20日）驾崩，年三十一岁。四月，世宗朱厚熜即位，次年改元“嘉靖”。诛逆党首恶江彬，抄其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其他珍瑶不计其数。许泰下狱论死，后免死遣戍边。张忠，发孝陵卫充军。江彬是武将，拥劲卒数千，恐生变，杨廷和设计擒之。何良俊曰：“武宗末年，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廷和）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猝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于王晋溪（琼）。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而江彬遂成擒矣。”（《四友斋丛说》卷六，53页）此说与《明史·佞倖传》所载江彬事大抵符合，当为可信。

阳明重上《江西捷音疏》，终于促成武宗于十五年闰八月班师返回北京，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政治局势的作用。^①“亲征”事件虽因武宗的回京而告结束，但其恶劣影响并未消除，尤其是张忠、许泰等人为攘夺功绩而对阳明的大肆诬陷，其真相仍未大白。忠、泰等在江西时，为罗织阳明所谓交通宸濠之罪，曾逮捕阳明弟子冀元亨，将其押赴京师，投入锦衣狱，严刑逼供，备受折磨，元亨不屈而死。八月，阳明咨院部雪冀元亨冤狱。^②

① 《明史》阳明本传云：“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东南事几殆。”而钱德洪曰：“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盖忠、泰挟天子以偕乱，莫敢谁何。豹房之谋，无日不在畏，即据上游，不敢骋。卒能保乘舆还宫，以起世宗之正始。”忠、泰之奸，挟武宗以为乱，则奸谋虽出于忠、泰，而武宗实乱之首也。正因如此，虽据高位者皆知忠、泰之奸，亦莫敢谁何。若无阳明忍辱负重，居公义之心而以国家大局为重，周旋于众佞倖之间，尽其心力于江西地方政务，竭力稳定政治局势，则东南之事，几殆矣。

② 此据《年谱》，见《全集》卷三四，1275页。按：阳明为元亨雪冤，恐在八月之前，疑《年谱》有误。查阳明公移，有《仰湖广布按二司优恤冀元亨家属》一道，《全集》本未署日期，而《阳明先生别录》本则署为“五月二十日”，该文谓：“湖广常德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于远迩云云，已经备咨六部院寺等衙门详辨去后。……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时未知详悉，仍将家属羁监，未免枉受淹禁。……为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常德府速将举人冀元亨家属通行释放，财产等项，亦就查明给还收管。仍将本生妻子特加优恤，使奸人知事久论定之公，而善类无作德降殃之惑；其于民风土习，不为无补矣。”（《全集》卷一七，617～618页）《明史》阳明本传附元亨传，略记元亨被冤之始末：“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笃信守仁学，举正德十一年乡试。从守仁于赣，守仁属以教子。宸濠怀不轨，而外务名高，贻书守仁问学。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语挑之，佯不喻，独与之论学。宸濠目为痴。他日，讲《西铭》，反覆君臣义甚悉，宸濠亦服，厚赠遣之，元亨反其赠于官。已，宸濠败，张忠、许泰诬守仁与通，诘宸濠，言无有。忠等诘不已，曰：‘独尝遣冀元亨论学。’忠等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终不承，械系京师诏狱。”元亨为人忠信可托，其学以务实不欺为主，故阳明使教其子正宪。阳明使元亨与宸濠讲学，盖欲示之以君臣大义，潜消其谋逆之志。阳明曰：“初，予尝使门人冀元亨者因讲学说濠以君臣大义，或格其奸。濠不悛，已而滋怒，遣人阴购害之。冀辞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计。’遂遁归。”（《书佛郎机遗事》，《全集》卷二四，921～922页）然元亨终因此而得祸，实为忠、泰等故为冤狱，以讪阳明。元亨在狱中虽备受拷掠，然无片语阿顺。世宗嗣位，论者交章白其冤，出狱五日而卒。同门陆澄、应典等备棺殓。阳明为位痛哭之（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5～1276页）。嘉靖元年正月，阳明上疏辞封爵，犹曰：“复有举人冀元亨者，为臣劝说宁濠，反为奸党构陷，竟死狱中。以忠受祸，为贼报仇。抱冤赍恨，实由于臣。虽尽削臣职，移报元亨，亦无以赎此痛！此尤伤心惨目，负之于冥冥之中者。”（《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一三，544页）至嘉靖三年，阳明与陆澄书，犹对元亨之死耿耿于怀：“惟乾之事将申而遂没，痛哉！冤乎！不如是无以明区区罪恶之重至于貽累朋友，不如是无以彰诸君之笃于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诸君在，则其身没之后，将莫知所在矣，况有为之衣衾棺殓者乎？是则犹可以见惟乾平日为善之报，于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呜呼痛哉！”（《与陆清伯》，《全集》卷二一，824页）足见阳明对元亨冤死之痛及其情谊之笃。

闰八月二十日，阳明第四次上疏请求省葬并视父疾。这一次，他甚至明确表示了若朝廷仍然不允，他必冒死逃归之意。略曰：

夫虎狼恶兽，尚知父子；鸟鸟微禽，犹怀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归，而臣乃依依贪恋官爵，未能决然逃去，是禽兽之不若，何以立身于天地乎！夫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为天下之大戮。……今国难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抚，不过素餐尸位，以苟岁月。……臣今待罪巡抚，若不请而逃，窃恐传闻远迩，惊骇视听。夫人臣死君之难，则捐其九族之诛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则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顾。今复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归。^①

对阳明的这一请求，朝廷仍然不予允许。尽管阳明的内心充满回乡的渴望，对朝廷根本不恤其哀苦的做法亦怀有不悛，但江西百姓的生活现状却无时不牵其心，因此他并未“冒死逃归”，而仍忠其职守。九月，他从赣州返回南昌，尽心处理江西地方事务，尽量缓解人民的困苦，尽力重建生活的秩序，人民亦因此而沾受其惠。“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驾尚未还宫，百姓嗷嗷。乃兴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宸）濠废地逆产，改造贸易，以济饥代税，境内稍苏。尝遗（邹）守益书曰：‘自到省城，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者。’”^②

- ① 《四乞省葬疏》，《全集》卷一三，438页。《年谱》云：“一日，（阳明）问诸友曰：‘我欲逃回，何无一人赞行？’门人周仲曰：‘先生思归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7页）阳明因思亲而欲弃官逃归的想法，并非此时才有。正德十四年，他在写信给湛若水时，即谓：“仆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归阳明，为夕死之图。疏三上而未遂，欲弃印长往，以从大夫之后，恐形迹大骇；必俟允报，则须冬尽春初乃可遂也。”因该书中提到：“祖母益耄，思一见，老父亦书来促归，于是情思愈恶。”（《答甘泉》一，《全集》卷四，174页）则可明此书乃写于征宸濠之前。
-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7页。虔，赣州旧名。黄绾曰：“江西兵残之余，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门居民房屋烧毁殆尽。公（阳明）为之赈恤，缓劳抚定，奏免租税。又将城中没官房屋，及（宸）濠违制官室，与革毁一应衙门，皆修改为公廨。濠占夺民间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诏书，给还原主管业。其余照依时估变卖，价银入官”（《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3~1424页），以代租税。此可稍补《年谱》“兴新府工役”之义。

从正德十五年九月以后一直到正德十六年六月以前，阳明一直在江西，一边处理地方事务，一边从事讲学活动。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随着武宗车驾的返回北京以及十二月宸濠被诛，稍趋平稳。而随着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世宗即位，以及江彬等奸党的瓦解，则似有正气稍回之象。但是，阳明倡导义兵平定宸濠之叛，这一原本非常清楚的事实，却因武宗的荒唐以及张忠、许泰、江彬等人的奸狡作祟，无端构陷，肆为飞语，混淆视听，竟变得不清不楚，以至于白圭被玷，忠贞受辱。当世宗新政之初、奸党被斥之际，阳明的忠义之举宜当受到褒扬，对他的无端诬陷宜当得到昭雪，但实际情形却并不完全如此。世宗即位，杨廷和为顾命大臣，“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①。正源于朝廷高层人物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以及妒能嫉贤之辈的刚愎自用，阳明并未得到公正的待遇。

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世宗召阳明赴内廷，谓“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阳明便即于六月二十日从南昌起程。然行到半路，又得旨令阳明不必进京，其原因是出于辅政大臣的暗中阻挠，“潜讽科道建言，以为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②。阳明行至杭州，遂上疏第五次请便道归省，谓：“臣自两年以来，四上归省之奏，皆以亲老多病，恳乞暂归省视，实皆出于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时复以权奸当事，谗嫉交兴，非独臣之愚悃无由自明，且虑变起不测，身罹暧昧之祸，冀得因事退归，父子苟全首领于牖下，故其时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宗社有灵，天启神圣，人承大统，革故鼎新，亲贤任旧，向之为谗嫉者皆已诛斥略尽，阳德兴而公道显。臣于斯时，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臣取道钱塘，迂程乡土，止有一日，此在亲交之厚，将不

① 《明史·王守仁传》。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81页。

能已于情，而况父子天性之爱，重以连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归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①阳明的这一次请求，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同时下旨升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八月，阳明回到绍兴故里；九月，归余姚祖茔祭扫。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因平定宸濠叛乱，世宗下诏封阳明为“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贼剿平，地方安定，各该官员功绩显著，你部里既会官集议，分别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照旧参赞机务，钦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钦此。”^②朝廷差行人赍白金文绮慰问，赐以羊酒。使者至时，正值阳明之父王华生日，“亲朋咸集，先生（阳明）捧觞为寿。翁（王华）蹙然曰：‘宁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谗构朋兴，祸机四发，前后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开日月，显忠遂良，穹官高爵，滥冒封赏，父子复相见于一堂，兹非其幸欤！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幸，又以为惧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闻者皆叹会遇之隆，感盈盛之戒”^③。

正德十六年岁末的这一幕，似乎给了阳明二年多来所蒙诬陷的一个澄清，他似乎得到了应有的公正，似乎表明了正义已随朝廷的“新政”而回归，但事实并不如此。不过在此时，阳明的心情或许仍然是愉快的，最起码他遂了久萦心怀的回乡省葬省亲的愿望，他未能在祖母岑氏去世时亲临一诀，但终能在老父病重时侍于榻前。赐封伯爵，毕竟亦能给老父的迟暮心怀带来些许慰藉，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与弟子们商略学术心得，继续拓展他的思想世界，进一步完善他的哲学体系建构。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正德十五年左右，阳明思想的发展进入了

① 《乞便道归省疏》，《全集》卷一三，451~452页。

② 《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一三，452页。

③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83页。

一个新的阶段，他提出了良知学说，从而标志着其思想世界之建构的完成。按照《年谱》的记载，阳明于正德十六年“始揭良知之教”^①，为其全部哲学思想确立了最为根本的核心理念。在阳明那里，良知即是心之本体，是个体原本于天地之性而获得其自身存在的终极本质，亦是个体藉以确立其全部主体世界的本质基础。良知不仅是存在之源，同时亦是德性之源。正因存在的本体即是价值的本体，存在的真实才可能通过德性的实践来展现，德性的实践亦才可能成为还原存在之真实的切实途径。作为先天本体，良知的自身存在是绝对的，它绝不会因为个体后天的经验状态而发生其存在性的失落，但却很可能因为后天的习染而导致其存在性的障蔽。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存亦就疏离于他的本质，而流于某种非本质的纯粹现象的蝉联了。因此，致良知的工夫对于人的现存而言，就显示出了它的极端重要性。只有致良知，人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致良知工夫做得尽，做得充分完善，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便即做到了“圣人”。阳明对于良知的揭示，使他早先关于“心即理”的论断获

①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8页。按：阳明于何时始倡良知之教，似有异说。黄绾谓阳明在正德九年官南京时“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10页），但钱德洪曾多次提到阳明提倡“良知之教”是在征藩以后，如说：“辛巳以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钱德洪：《论年谱书》，《全集》卷三七，1378页），“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一，1574页）。邹守益曰：“逆濂构难，公趋吉，号召以集群策，平大憝，为圣天子扫除欃枪，以基嘉靖之休。至倡明绝学，揭良知于中天，一洗支离影响之病”（《怀德祠记》，《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四，光绪三十年江西刻本）。王宗沐亦曰：“而其晚岁，始专揭‘致良知’为圣学大端，良有功于圣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全集》卷三七，1364页）故阳明倡良知之教的时间，宜以钱德洪所说为是，但似亦不必执定于正德十六年。事实上，“良知”概念源于孟子，阳明早在与徐爱的讲学中，就已经用过“良知”一词，如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全集》卷一，6页）《传习录下》载陈九川于庚辰（十五年）往虔州问学，阳明便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全集》卷三，92页）。盖阳明在征藩以后，尤其是当正德十五年在赣州讲学期间，始特为揭示良知之说，将它作为教门宗旨，故在正德十六年之后，则专讲“致良知”，或大抵不错。《传习录下》：“（陈九川）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云：‘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先生曰：‘若未来讲此学，不知好恶从之从个甚么。’”（《全集》卷三，95页）正可见赣州讲学是以阐明“良知”为核心内容的。

得了进一步的理论拓展，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至于心外无物的无限阔大境界获得了根本的理论支撑，主体的精神世界与事物世界之间的联结有了一个根本的关键性环节，存在的本质实在性的还原与经验生存过程中道德践履的必要性之间则获得了逻辑的一贯，他原先关于“格物致知”、“已发未发”、“体用一原”等命题的理解与领会，亦更因良知的建立而成为一个完善的理论系统。然良知概念的揭示，一方面固然是阳明长久以来沉潜于其思想世界的一种逻辑结果，另一方面却亦是他历经磨难，时时处于困厄艰危之中对于生命本质及其真实相状的一种切身体悟，是他在历尽艰险之后对自己思想精粹的独特提炼，所以阳明自谓：“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①《年谱》则云：“自经宸濠、（张）忠、（许）泰之变，（阳明）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正因如此，阳明确信：“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髓也。”“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②阳明对自己这一关于“良知”的体悟，更有一种心接古圣先贤的自得之乐，并因此而表现出了极大的欣慰之意，尝谓：“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直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③其喜悦之情真溢于言表矣！

良知说的提出，实质上是“阳明学”真正成立的标志。阳明的心学系统是在对朱熹理学不断的批评性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良知说的最终揭示，在某种意义上显然可以视为他与朱熹

①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一，1575页。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79页。

③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一，1575页。

学说决裂以后在理论上独辟天地并最终成果。而就思想的历史发展而言，阐明本心以为宇宙全体的运行核心，以心体的自觉开显作为优入圣域的根本途径，陆象山实走在阳明的历史前列。或正以此故，阳明在揭示了良知之说以后，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情感上亦更多地倾向于对陆象山的同情。正德十五年正月，他特为褒崇陆氏子孙，以为“宋儒陆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传，为吾道之宗派，学术久晦，致使湮而未显，庙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沾褒崇之泽”^①，乃牌行抚州金溪县，要求将陆氏嫡派子孙，依照各处圣贤子孙事例，俱优免其差役，其间有聪明俊秀堪以入学者，具名送提学官，选送学校肄业。同在是年，抚州太守李茂元刻《象山文集》，阳明为之序，力为表彰象山之学，极辩世人以陆氏之学为禅之非，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孟子力驳告子“义外”之说，而以“仁，人心也”一语提挈纲领，最得圣人心学宗旨，而“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象山之学，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周、程诸子，然“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②。同年，时任湖广巡抚的右副都御史席书，以为象山与朱熹同时讲学，然天下泛然尊崇朱说，而陆氏之学遂泯，于是作《鸣冤录》，竭力表彰陆学。阳明于次年写信给席书，称赞其：“卓然斯道之任，庶几乎天下非之而不顾，非独与世之附和雷同从人非笑者相去万万而已。喜幸何极！”同时再次表明了他对陆氏之学的态度：“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辩、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③阳明在正德十五、十六年间对陆象山学术的明确表态，尽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于陆氏学术的基本认同，但实质上却仍然是关于其本人学术思想的一种自我肯定。

① 《褒崇陆氏子孙》，《全集》卷一七，595页。按：《年谱》将“录陆象山子孙”系于正德十六年下，似不确。

② 《象山文集序》，《全集》卷七，245页。

③ 《与席元山》，《全集》卷五，180页。

圣人之学，决无越于心之本体，故圣人之学即是心学。陆氏接孟子之传，以明心为要，乃圣学无疑，而阳明本人之学，以良知为心体的本真实性，最得“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则其为圣学之嫡派，岂有可疑？就此而言，世以“陆王”并称，非为无据，但却不能由此而认为阳明与陆氏在学术上没有差异。^①

阳明自弘治十六年“归正于圣学”，至正德十五年阐明“良知”，18年间，其生活经历多种磨难，冲瘴疠，冒矢石，亲身驱驰于兵革战阵之间，不辞体疲力竭而玄黄虺隤于道途；被流言，遭诬陷，唯确信其良知自体的光明，主公义之心而周旋于巨奸大憝之际，不辞颠越殒首之艰危。他的心志因现实生活的锻炼而益为坚强，他的思想因现实的困厄而益为开廓。他以“良知”为核心的心学思想体系建设的完成，正是他在生活世界中动心忍性，不断自觉体认其生命本质的思想成果。而良知本体的悟入，则为他展现了一片无限开朗莹彻的光明天地。他确信自己对于良知的洞达，已然直契于千古圣人之心，是“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

① 阳明对陆学的基本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对其“大本大原”之得圣学嫡传则予以明确肯定，但同时亦认为象山仍未脱“沿袭之累”，其学显得“粗”了。在虔州，陈九川尝问：“陆子之学何如？”阳明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针膏肓，却不见他粗。”阳明曰：“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摩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传习录下》，《全集》卷三，92页）阳明所谓象山之学的“粗”，大概主要是指他在格物致知之说上未免有“沿袭之累”。象山虽竭力阐明“心即理”，必以发明本心为根本，此已“在头脑上见得分明”，但他却未能纯然将本心的开明贯彻于身心意知物的全部世界，而仍以“格物致知”为“讲明之事”，而不是从心体流出，所以阳明说：“致知格物，自来儒者皆相沿如此说，故象山亦遂相沿得来，不复致疑耳。然此毕竟亦是象山见得未精一处，不可掩也。”（《答友人问》，《全集》卷六，210页）这或许可以提示陆、王之间的最大差异。盖象山之论心理合一，实承接朱子“性即理”说而破之，故虽立“心即理”以为宗旨，但除以“顿悟”心原为根本以外，却未及充分展开由经验而上传天德的实践系统，故其论“理气”，论“格物致知”，在阳明看来便亦未免义理夹杂之嫌。而在阳明的体系中，他有一个以“知行合一”为核心而展开的强大的“致良知”的实践系统，因知行在本原上的合一，则有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身心意知物的全部世界，遂无不体现为良知本体的自我发越，“心即理”的立言宗旨亦因此而获得了彻上彻下的普遍贯彻。阳明尝谓：“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答友人问》，《全集》卷六，209页）唯真理之是求，唯门户之是破，大抵可见阳明论学的实诚态度。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天地之道之所以可能博厚高明、悠久无疆，其本原正在于良知本体的明白纯诚。“心之良知是谓圣”^①，人是天地万物之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故工夫必须要在心上做，唯是知得本体莹彻，方能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他一再断言“圣人之学，心学也”。他对象山之学的积极肯定，断之为圣学无疑，以为孟子以后一人，实质上是为他自己的心学系统确立了一种圣人传统的“历史感”，深刻地体现了他自觉担当起圣人之道脉慧命的历史主体意识。

我们都还记得，弘治十八年的时候，阳明曾与湛若水一见定交，相互期许，共以发明圣学为己任。至正德十五年，阳明开始阐明良知学说，其思想体系几于完成；而湛若水亦在此前后对圣学有独特体悟，提倡“随处体认天理”，成为其思想的根本特色。《年谱》记正德十五年春，“甘泉湛先生避地发履塚下，与霍兀厓韬、方叔贤同时家居为会。先生闻之，曰：‘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失此机会耶？’”^②他对湛若水的讲学是怀抱着热烈情怀的，但他随即发现，他的学说与湛若水已经发生了分歧。还在正德十年的时候，阳明即曾与湛若水一起讨论过“格物致知之说”，若水持朱子以来的旧说，阳明以为如此论格物，“是求之于外了”，而若水认为：“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③可见当时王、湛二人对“格物”之义即持有不同观点。此后阳明对《大学》一文继续作深入研究，

① 《孔丛子》卷二《记问第五》载：“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与《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合刊本，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杨简曾将“心之精神是乎圣”修改为“心之精神是谓圣”，竭力发挥其义，以为其心学观念重要的理论根据之一。阳明谓“心之良知是谓圣”，盖亦可以看作是对杨简观点的一种修正性诠释（参见王阳明：《答季明德》，《全集》卷六，214页）。

② 《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80页。按：霍韬（1487—1540），字渭先，号兀厓，后更号渭厓，南海人。其学问博洽经史，嘉靖初除职方主事，累官至礼部尚书。其性情谬戾，多与人争，为世宗所不喜。著有《渭厓文集》10卷等。方献夫（？—1544），字叔贤，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史部员外郎，嘉靖初，进少詹事，累迁吏部尚书，入阁辅政。著有《西樵遗稿》8卷、《周易传义约说》等。

③ 《传习录下》，《全集》卷三，90页。

于正德十三年刊印《大学古本》，对朱子以来的格物旧说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与诤难，在理论上妥善处置了“格物”与“诚意”之间的关系，成为他提出“良知说”的理论前奏。他自信自己关于《大学》古本的心得，已是将格物致知之义说得十分妥帖，因此他在主观上大概期望正德十五年春天湛若水与霍韬、方献夫的论学，能够脱离朱子以来旧说的藩篱，但在同年的秋天，霍韬至南昌访问阳明，相与讲论《大学》之义，霍韬却仍持旧见。正德十六年五月，阳明集门人于白鹿洞，相与讲论，“共明此学”，而湛若水亦在此时寄书阳明，且示以《学庸测》，阐明“随处体认天理”之义，阳明曾回信阐明他自己关于“致良知”的观点，同时对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之说提出非常委婉的批评，认为“良知说”与“随处体认天理”虽然大同小异，但亦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一情况表明，正是在正德十五、十六年间，阳明与湛若水在学术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重要分歧。^①

正德十六年，阳明弟子陆澄因身体多病之故，致书阳明，向阳明请教“养生”之说。阳明回信云：

① 参见《年谱二》，《全集》卷三四，1280页。按：阳明与甘泉学术思想的差异，阳明自己尝多有说及。正德十六年阳明答书甘泉，谓：“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似有毫厘未协，然亦终当殊途同归也。”（《答甘泉》，《全集》卷五，181页）其答方献夫，亦谓：“致知格物，甘泉之说与仆尚微有异，然不害其为大同。”（《答方叔贤》，《全集》卷五，184页）又曰：“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因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与毛古庵宪副》，《全集》卷六，219页）由这些论述可见，阳明对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虽不认同，但并不夸大其与“良知说”之间的差异。究实说来，“随处体认天理”是由外向内收敛，走的仍然是朱子以来格物以正心诚意的路线；“致良知”则强调由内向外推致，是端本澄源、内外俱透之途。阳明的“根本”、“枝叶”之喻，正可明二者实存在着逻辑行程上的差异。亦正因有这种差异的存在，阳明认为二者虽可能“殊途同归”，但“随处体认天理”却更容易引人误入歧途，所以他寄书邹守益曰：“‘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寄邹谦之》，《全集》卷六，201页）此说可视为阳明本人关于“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之间差异的一种基本界定。

闻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后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复一意于圣贤之学。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原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学与圣人异，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入于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谓“黄老悲其贪着，乃以神仙之术渐次导之”者，原静试取而观之，其微旨亦自可识。自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周公、孔子，其仁民爱物之心，盖无所不至，苟有可以长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篴之徒，乃其稟赋有若此者，非可以学而至。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属，皆是彼学中所称述以为祖师者，其得寿皆不过五六十，则所谓长生之说，当必有所指矣。原静气弱多病，但遗弃声名，清心寡欲，一意圣贤，如前所谓“真我”之说。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弊精劳神，废靡岁月。久而不返，将遂为病狂丧心之人，不难矣。昔人谓“三折肱为良医”，区区非良医，盖尝“三折肱”者。原静其慎听毋忽！^①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一事情并引述阳明《与陆原静》，是因为藉此可以进一步清楚地看出阳明既悟良知之后对于道教神仙之说的态度。尽管他“悟仙释之非”是早在弘治十六年的事情，但或许因他有种类于传奇的经历，时人或仍视之为有得于道术之精微，因此陆澄向他请教长生之术，便亦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这通书中，阳明却异常清晰地表达了他对自己过去尝弊力于道教之术的批评性反思，对道教长生之说提出了尖锐批评，并规劝陆澄“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弊精劳神，废靡岁月”，如耽于此道，“久而不返”，则将“为病狂丧心之人”。所谓“真我”，在阳明看来，原即是自我本有的良知，致此良知，即得“真我”。在阳明思想的发育与成长过程中，道教（包括佛教）的某些理念确曾起到重要的助缘作用，他的“良

^① 《与陆原静》，《全集》卷二，187页。

知说”，是一种基于儒学传统而又在某种意义上容纳、涵摄、同化了佛道诸说之精义的新型理论形态。正由于这种整合性的传统之创新，“良知说”才成为“阳明学”的基本理论面貌。^①而在提出“良知说”之后，他对佛、道之说的态度则已完全是疏离的。

如前所述，从正德十四年到正德十六年，实为阳明一生自龙场以后最为不同寻常的三年。在这三年中，他以非凡的果勇之气与军事才能，迅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挽救明王朝于颠危覆败之中；他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动心忍性，谨处张忠、许泰之变，化解了王朝内部的政治危机；他本于公天下之心与万物一体之仁，忍辱负重，收拾残局，竭力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使江西的政治与生活秩序得以渐次恢复；他不计个人恩怨，不顾飞短流长，不戚戚于功成而受无根之冤屈，不汲汲于辩解诬枉与澄清诽谤，而唯自信其本然心体的光明廓落，尽忠于职事，推恩于人民，彰显其本心，风励于道德。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磨难与逆境，使他再一次对生命存在的本然真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切身体悟，使他对思想世界的整体建构有了更为深邃缜密的细致思考，从而不仅为其全部学说寻得了终极根基，完成了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宏观建设，而且其生活的精神世界亦

① 随着阳明学研究的深入，亦或由于各种“后现代”的观念、理论与方法的输入，部分学人似乎表现出某种浓厚的“解构”兴趣，要从“良知说”中还原出佛教的内容、道教的内容等等。我个人认为，思想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原其大要，实不出于二途：一是原创性的新义之提出；二是整合性的传统之创新。就中国思想史的实际情形而论，原创性的新义之提出时代，大抵属于先秦；而此后时代新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则大抵属于整合性的传统之创新。整合的内容，则既源于固有传统本身的不同思想系统，亦源于固有传统之外的思想资源。佛教自输入中国以后，经与固有传统的长期互动，已成为固有传统的有机构成，并因此而成为思想学说之整合性创新的可取资源。东汉以后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原本亦体现为一种整合性创新的历史形态。发端于中唐、初成于宋初、大成于南宋的“理学”，则是中国思想史上此种整合性创新之最为巨大的成就之一；而阳明的“良知说”，则为理学传统本身又一富有整合性创新特色的思想成果。因此就研究而论，“良知说”的整合性创新原应成为研究的起点。若必欲对其实施细致的理论解构，还原其说为佛教、道教之说等等，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其解构的结果却必将导致“良知说”或“阳明学”的整体消亡，虽然此种解构性的研究本身可视为“阳明学”研究的某种深化，但基于既已解构的前提，却似乎无法详论此种学说在全部思想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对于理学的一般研究亦然。

因此而转入更为阔大高明的境域。《传习录》云：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诸友请问。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尚谦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①

自信良知真是真非，摆脱世情物累的纠缠与羁縻，便自有潇洒磊落气象；“狂者的胸次”，正是良知自体的自然发越，一切本于天真，原亦无需有任何覆藏；而“圣人的血脉”，则无疑为文化的慧命，唯独契本体之真际，明白纯诚而洞达无隐，敢于直下承当“圣人的真血脉”，方能信道而直行，将天命之性贯彻于日常生活的实际践履。诚然，阳明对良知的悟入，已然是其生命境界的深一层转进。他自觉地担当起了传承“圣人的真血脉”的历史使命，以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豪迈心态，开启了其生命的新历程。

① 《传习录下》，《全集》卷三，116页。按：正德十五年阳明在赣州的讲学活动，实际上标志着“江右王门学派”的真正成立，邹守益等江右王学中坚，每每追思阳明的虔州讲学，给予极高评价，以为前所未有之事，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证明这一点。良知之说，不脛而走，负笈来学之士益伙，因此正德十五年，实际上亦是各“王门学派”相继形成的开始时期。泰州王艮于正德十五年九月从学阳明于南昌，“泰州学派”盖亦因此而成立。《年谱》载：“泰州王银服古冠服，执木简，以二诗为贄，请见（阳明）。先生异其人，降阶迎之。既上坐，问：‘何冠？’曰：‘有虞氏冠。’问：‘何服？’曰：‘老莱子服。’曰：‘学老莱子乎？’曰：‘然。’曰：‘将止学服其服，未学上堂诈跌掩面啼哭也？’（王）银色动，坐渐侧。及论致知格物，（王银）悟曰：‘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阳明）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执弟子礼。先生易其名为‘艮’，字以‘汝止’。”（《全集》卷三四，1277~1278页）

讲学越城 心目俱醒

(嘉靖元年至嘉靖五年，1522—1526)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朝廷封阳明“新建伯”。这一封爵的结果，并不表示阳明三年来所蒙受的无端构陷已经昭雪，更不表示正义与公平已经随着朝廷的“新政”而回归。事实上，朝廷对阳明的赐封拜爵，仅仅是某种舆论上的搪塞，是不得已而作出的一种“姿态”，亦是朝中权臣的一种政治权谋——藉着对阳明的封爵而“搁置”了正义。宵小的谗谤仍在沸腾，正义未伸；其协力平藩的同僚诸官陟黜不定，公正未张。封爵的结果，实际上反而表明阳明再一次成为王朝内部权臣之间勾心斗角的牺牲品。他所期待的并不是一己的高爵，而是正义与公平能够体现为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嘉靖元年（1522）的正月初十，阳明上疏辞封爵，陈述了“不敢受封”的四项理由：

1. 宁藩不轨之谋，积十数年之久，及其一旦举事，则不旬月而败，“此非人力所及也”，乃“上天之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

2. 宁藩之谋，朝廷早已觉察，“当时帷幄谋议之臣，则有若大学士杨廷和等，该部调度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等”，“今诸臣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①。

3. 宁藩变起仓猝，“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诸人之外，又有知府陈槐、曾珙、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修倬、刘守绪、王轼

^① 以上均见《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一三，452～454页。

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诸人臣今不能悉数，其间或催锋陷阵，或遮邀伏击，或赞画谋议，监录经纪。虽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浊高下，然就兹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躯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绩，所谓同功一体者也。今赏当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劳之人尚多也。……今闻纪功文册，复为改造者多所删削。其余或力战而死于锋镝，或犯难而委于沟渠，陈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举。是皆一时号召之人，臣于颠沛抢攘之际，今已多不能记忆其姓名籍贯。……今乃诸将士之赏尚多未称，而臣独蒙冒重爵，是袭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

4. 效劳以报朝廷，乃为臣之职分，不足以为功。且近年来，忧病相仍，神昏志散，已不复可用于世。若不度量德分，“乃冒昧贪进，据非其有，忘己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也”。

阳明谓：“夫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甚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辞荣也，避祸焉尔已。”^①而详其所述的四项理由，显然只有第三项才是他辞去封爵的真正原因。《年谱》载阳明辞封爵事，曰：“先是，先生平贼擒（宸）濠，俱（王）琼先事为谋，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归本兵，宰辅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进，乃抑同事诸人，将纪功册改造，务为删削。”^②这一记载尽管有些语焉不详，但仍透露出当时朝廷内部高层斗争的一些消息。武宗后期，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为首辅大臣，而在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以后、世宗继位之前的近40天当中，廷和实总揽内外朝政。在此期间，逮系江彬、许泰等奸党、迎世宗即位等一系列大事，皆仗廷和力为主持，对稳定当时朝廷的政治局势关系至重。然廷和与兵部尚书王琼向来不睦，十六年六月，“给事、御史交章论王琼罪状，下诏狱。琼

① 以上均见《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一三，452~454页。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84页。

迫，疏讦廷和以自解。法司当琼奸党律，论死，琼力自辨，得减戍边。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①。正因有王琼失势、廷和柄国，而阳明又曾极受王琼赏识，其每奏捷多归功“本兵”的前因，朝廷在论平藩功绩之时，乃故意删改当时的纪功册，故意贬抑与阳明协力起义的同僚诸官的功绩^②，故意搁置别有用心者对阳明的诬陷而不予澄清，仅为搪塞舆论而在名义上将阳明封为新建伯，岁支禄米一千石，给与诰券，而实际却又是“铁券未给，禄米未颁，朝事无与，迹比樵渔”^③。在这整个事件的处置当中，杨廷和显然是起到某种关键作

① 《明史》卷一九〇《杨廷和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〇八载正德十六年五月王琼以罪戍边，曰：“初，琼在兵部，凡所诛赏，悉听中旨。至是，给事中张允叙劾琼滥鬻将官，依阿权倖，……下琼都察院鞠治，论死，琼疏辨，乃减死，戍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与《明史·杨廷和传》所载相合。《明史》卷一九〇方炜考证曰：“琼初在兵部，凡所诛赏，悉听中旨。至是，给事张九叙劾琼滥鬻将官，依阿权倖；又台省交章劾琼于哈密一事，挟私忌公。见《明实录》。传所云‘罪状’，即指此。”又曰：“是时琼疏讦廷和揽权专擅，擢其子慎及第第一，改其弟廷仪吏部侍郎，又庇其所厚都御史彭泽、御史赵春。劾不当罪，请罢之。上怒，并下所司。见《明实录》。”按：谓王琼“依阿权倖”，实指其为宸濠之党。杨廷和尝记述云：“正德十四年，南京内外守备等官黄伟等奏报江西宸濠反逆，一本内称：‘宸濠杀害巡抚方面等官，占拟九江等处城池。其为反逆，昭彰明甚’。本年七月十三日，已奏抄到部。自有此奏到京，人谁不知宸濠反逆？无可疑者。又何待体勘哉？本月十五日，王琼乃按住此本，不行覆奏，却将黄伟等并巡抚等官李克嗣等前此所奏题覆。乃云‘事有可疑’，又云‘尤为可疑’，又云‘中间恐有别情’，又云‘合无本部差官前去，沿途直抵江西探听体访。差去官员体勘的报，取具本处官司印信文书回奏，不许止凭传闻轻信忽略’。又云‘不必张皇失措’。其本内并不及黄伟等‘反逆昭彰明甚’一言。又彼时江西各衙门印信皆为宸濠夺去，乃欲取具印信文书，其意皆出回护蒙蔽。其前项奏本覆本，月日前后，一一见在兵科，可查。”（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四《视草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因如此，法司才可能将王琼律以“奸党”而“论死”；《明史》谓“或疑法司承廷和指（旨）者”，亦并非不可能。当时虽奸如张忠、许泰，法司之审犹“久而不决”（《明史·杨廷和传》），王琼“为人有心计，善钩校”，又“才高，善结纳”（《明史》本传），其与江彬等人有染，未为清白，当为事实，然其奸恶毕竟与张忠等人尚隔一尘。

② 当时与阳明一道举义平藩的诸有功之官，“惟（伍）文定得升副都御史，荫一子千户。邢珣、徐珪、戴德孺升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珪亦被斥。陈槐削籍。纪功御史伍希儒、谢源，以考察去。”（项笃寿：《王阳明传》，《今献备遗》卷三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实际上亦即是阳明所谓“虽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浊高下，然就兹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躯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绩，所谓同功一体者也。今赏当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劳之人尚多也”所针对的事实，亦是《年谱》所谓宰辅“欲阻先生之进，乃抑同事诸人”所指的事实。

③ 黄绾：《明军功以励忠勤疏》，《全集》卷三九，1462页。

用的，而他出于某种私意的夹杂，其处置偏离了基本的公正原则亦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阳明上疏辞去封爵，并非为他自己鸣不平，而是对朝廷政治太失于公允的抗议。

不久以后，到了二月，阳明之父王华逝世。《年谱》云：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时朝廷推论征藩之功，进封翁及竹轩、槐里公俱为新建伯。是日，部客适至，翁闻使者已在门，促先生及诸弟出迎，曰：“虽仓遽，乌可以废礼？”问已成礼，然后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绅，饬内外含襚诸具，始举哀，一哭顿绝，病不能胜。门人子弟纪丧，因才任使。^①

阳明因父丧而丁忧在家，又因“病不能胜”而须养病，虽门生弟子闻而日至者众，然阳明一概予以谢绝，揭帖于壁，曰：

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缪乎？^②

阳明正月所上的辞爵疏文，朝廷于七月十九日作了批复：“该臣奏前事，节奉圣旨：‘论功行赏，古今令典，诗书所载，具可考见。卿倡义督兵，剿除大患，尽忠报国，劳绩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义。宜勉承恩命，所辞不允。该部知道，钦此。’”^③这一批复，并未

①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84~1285页。竹轩，阳明祖父王伦之号；槐里，阳明曾祖父王杰之号。阳明举父丧，进行了丧俗的改革。《年谱》云：“越俗宴吊，客必列饼糖，设文绮，烹鲜割肥，以竞丰侈，先生尽革之。惟遇高年远客，素食中间肉二器，曰：‘斋素行于幕内，若使吊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宾旅也。’”后甘泉先生来吊，见肉食，不喜，遣书致责，先生引罪不辩。”（《全集》卷三五，1285页）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85页。

③ 《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一三，455页。由此知《年谱》于“正月辞封爵”下云“疏上，不报”，盖误。其不报者，当是再辞封爵疏。

解决阳明所期待的对其同事诸人的公正待遇问题，“公义”并未得到彰显，故虽在丁忧病苦之中，他仍力疾作疏，再请辞去封爵。其中有曰：

圣旨殷优，独加于臣，余皆未蒙采录者，岂江西之功劳臣一人之所能独办乎？朝廷爵赏，本以公于天下，而臣以一身掠众美而独承之，是臣拥阂朝廷之大泽，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庙堂之赏，朝廷之议也，臣不敢僭及，至于臣所相与协力同事之人，则有不得不为一申白者。……今效忠赴义之士，延颈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远，而意日已衰，谁复有为之论列者。……窃惟宸濠之变，实起仓卒，……当此之时，臣以逆旅孤身，举事其间，虽仰仗威灵以号召远近，然而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若使其时郡县各官果怀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为辞，则臣亦可何如哉？然而闻臣之调，即皆感激奋励，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来，是非真有捐躯赴难之义，戮力报主之忠，孰肯甘粉齑之祸，从赤族之诛，蹈必死之地，以希万一难冀之功乎？然则凡在与臣共事者，皆有忠义之诚者也。……今臣独崇爵，而此同事诸人者，乃或赏或否，或不行其赏而并削其绩，或赏未及播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义，以来此嗷嗷之口，而自求无实之殃乎？乃不若退缩引避，反可以全身远害，安处富贵，而遁于众口之诽也。……夫考课之典，军旅之政，固并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录之功，吾且遂行其赏矣；纵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赎。……今也将明军旅之赏，而阴以考课之意行于其间，人但见其赏未施而罚已及，功不录而罪有加，不能创奸警恶，而徒以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顾臣与之同事同功，今赏积于臣，而彼有未逮，臣复抗颜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独归于臣，而此诸人者之绩，因臣之为蔽而卒无以自显于世也。且自平难以来，此同事诸人者，非独为已斥诸权奸之所诬构挫辱而已也，群憎众嫉，惟事指摘搜罗以为快，

曾未见有鸣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故臣敢不避矜夸僭妄之戮，而辄为诸臣者一诉其艰难抑郁之情。^①

从疏文的语气中，我们确乎可以读出阳明当时的一种愤激不平之气，亦可以进一步清楚他之所以辞去封爵的真正原因。但他这次语气更为坦率激烈的上疏，其结果却是“疏上不报”^②。

阳明在上疏中极为其同事诸人“非独为已斥诸权奸（指江彬、许泰等人）之所诬构挫辱而已也，群憎众嫉，惟事指摘搜罗以为快”而鸣不平，但实际上，这种情形却更为明显地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年谱》载：“时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倡议论劾，以遏正学，承宰辅意也。”^③说明当时朝廷对阳明同事诸人功绩的故意贬抑，其真实用意确乎在阻阳明之进，程启充等人“承宰辅意”而仍在继续着对阳明的中伤。《明史·程启充传》：

（启充）寻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萧敬、张锐、陆完等私书，欲亟去孙燧，云“代者汤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论敬、锐等罪，并言守仁党逆，宜追夺（封爵）。给事中汪应轸讼守仁功，言逆濠私书，有诏焚毁，启充轻信被黜知县章立梅摺摭之辞，复有此奏，非所以劝有功。主事陆澄亦为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应轸与澄。帝曰：“守仁一闻宸濠变，仗义兴兵，裁定大难，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议。”

由此可知，程启充奏劾阳明的罪名是“党逆”，即依附宸濠逆党，其根据则是他从被黜知县章立梅那里得到了宸濠的一封书信，其中提到取代孙燧的人，“王守仁亦可”^④。启充之论既出，舆论不平，除汪应轸

① 《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一三，455～458页。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86页。

③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86页。按：程启充，字以道，嘉定人。正德三年进士。尝官三原知县，有政绩，入为御史，嘉靖初巡按江西。毛玉，字国珍，更字用成，云南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初，负责审讯宸濠戚属，后因议礼不合，下狱死。《年谱》所谓“承宰辅意”，盖谓杨廷和也。

④ 此事在前曾有所叙述。正德十年，孙燧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江西，曾章疏七上，发宸濠逆谋，故深为宸濠所恨，尝谋于陆完等人，必欲去孙燧，以为代之者汤沐等可，其次王守仁亦可。至此，启充等以此为阳明“党逆”的证据，罗织其罪，且欲夺其封爵。

外，邢部主事陆澄、光禄寺少卿黄绾等均上书为辩。^①“陆澄时为刑部主事，上疏为六辩以折之。先生闻而止之，曰：‘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之故，议论方兴，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所未信欤，则当务求其是，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既已自信欤，则当益致其践履之实，以务求于自谦，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②在阳明看来，辩解并不能起到止谤的实际效用。天下之事，是即是，非即非，人人自有一个良知在，良知自会知得，原亦无须多辩；公义自在人心，良知即是公义。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要自信良知本体的光明莹彻，反求诸己，实落致良知的工夫，而将一切诽谤与谗言、一切生活中的磨难与艰险，都转换为自己藉以开显本心的切磋砥砺之地，动心忍性，以致集义而广大之功。“君子不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③正是这种唯良知之是信是求的“狂者的胸次”，使阳明不屑于无根诬陷的辩白，超出了世情物累的羁縻。嘉靖二年会试，考试官故意以“心学”为问，力诋阳明学术为伪学，阳明亦仍然保持了“无辩”的心态。^④他的精神气象，真有若凤凰于飞，振翻千仞。

① 陆澄上《辨忠谗以定国是疏》、黄绾上《明军功以励忠勤疏》，均载《全集》卷三九。陆澄就程启充等奏劾阳明“党逆”的六条理由，逐一予以驳斥，甚为有理有据有力；黄绾则略述阳明平藩之事，又略叙其剿灭江西各处贼巢之功，并亦为阳明同事诸官之废黜大鸣不平，以为皆“邪比蔽贤嫉功之所为也”。然黄绾之疏当上于嘉靖三年阳明丁忧服除之后，由此亦可见当时对阳明的诬陷实一直未得澄清。

② 《与陆原静》第二书，《全集》卷五，188页。

③ 《答舒国用》，《全集》卷五，191页。

④ 《年谱三》：嘉靖二年二月，“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阴以辟先生。门人徐珊读《策问》，叹曰：‘吾恶能昧吾知以倖时好耶！’不答而出。闻者难之，曰：‘尹彦明后一人也。’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直接发师旨不讳，亦在取列，识者以为进退有命。德洪下第归，深恨时事之乖，见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曰：‘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先生曰：‘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全集》卷三五，1287页）此可见阳明坦诚的洒落心态。《明史》卷二〇七《黄直传》：“黄直，字以方，金溪人。受业于王守仁。嘉靖二年会试，主司发策，极诋守仁之学。直与同门欧阳德不阿主司意，编修马汝骥奇之，两人遂中式。”此可知当时阳明之学曾被诋为“伪学”的事实。

嘉靖元年至二年，阳明除两次上疏辞去封爵以外，大抵在丁忧与养病之中度过，间或亦与门人相聚及作书以答其问。虽然谗谤并未止息，但他确乎已不再挂怀于世间的得失荣辱。故乡山水的万千气象，既堪慰他日渐增多的白发，足以涤去他心中的尘坌，亦使他心体的莹明透彻获得了自然的升华而充塞于天地，尽管山间的风起云动还会使他联想到战场的征尘：“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峰攒尚忆冲蛮阵，云起犹疑见虏尘。”叠嶂清嘉，曲水如蓝，他在自然世界的清灵秀韵当中感悟到了主体世界的阔大与圆成，“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良知本自圆成而无间于内外，山水的清韵却原本于心体的澄明，他涌动出了源于生命本真的闲雅与洒落，“青山待我长为主，白发从他自满头。种果移花新事业，茂林修竹旧风流”^①。自然的清韵与心体的澄明圆融无间，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亦原本浑成，心灵既在自然之镜当中显现其天真的圆满，自然亦在心灵之镜当中获得其天真秀发。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但源于这种心灵境界的超越性转进，山却不是山，水亦不是水，而已为主体精神的纯粹对象化的显现。

嘉靖三年，阳明丁忧即将服满，门人弟子因此日进。其良知之说，发人人心中所本具而未显之天真，闻者虽初或未免于疑惧相半，但最终却无不心目俱醒，踊跃称快。其影响所被，大有风吹草偃之势，四方一时负笈来学之士竟若雾拥云屯；远近僧舍，皆成讲学之所；山阴禹穴，无非弦歌之地。其空前盛况，令人叹为观止。钱德洪记云：

先生自辛巳年（正德十六年）初归越，明年居考丧，德洪辈侍者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者日众，癸未（嘉靖二年）已后，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

① 以上引文见《归兴二首》、《次谦之韵》，《全集》卷二〇，784~785页。

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悒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后。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尝闻之同门，南都以前，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益进，感召之机，亦自不同也。^①

正因弟子日众，至于无所容身，虽藉僧舍以设讲席，然亦因“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讲者三百余人”。于是阳明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1487—1541）督同山阴县令吴瀛扩建了原来的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②，门人由是益众。

可以想见，在与众弟子的讲学之中，在田园林壑的优游之中，阳明所体会到的讲习之乐，那种驰骋于思想的自由之境所产生的恬淡旷远之趣、意满乾坤之怀，大概是任何俗缘的乐趣都无法比拟的。或许正因如此，当嘉靖三年四月阳明丁忧服阙以后，朝中虽有大臣

①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一，1576页；亦略见《传习录下》，《全集》卷三，118页。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90页。稽山书院在绍兴府城内，张元忭撰《绍兴府志》卷一八：“府城内稽山书院，在卧龙山西冈山阴地。宋朱晦庵氏尝司本郡常平事，讲学倡多士，三衢马天骥建祠祀之，其后九江吴革因请为稽山书院。岁久湮废。明正德间，知县张焕改建于故址之西。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经阁，后为瑞泉精舍，斋、庐、庖、湄咸备，时试八邑诸生，选其尤者，升于书院，月给廪饩。”嘉靖四年，阳明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曰：“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全集》卷七，255页）当阳明讲学时，绍兴知府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对本地学风的倡导盖有促成之功。既新稽山书院，则来学之士非但本郡八邑而已，更有湖广、广东、直隶、江西、福建等士，绍兴遂为阳明学传播的中心地。在阳明诸弟子当中，年龄最高者为海盐董澐（字复宗，一字子寿，号萝石，1457—1533），以能诗闻于时，嘉靖三年，已68岁，“来游会稽，闻（阳明）先生讲学，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入门，长揖上坐。先生异其气貌，礼敬之，与之语连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强纳拜。先生与之徜徉山水间。澐日有闻，忻然乐而忘归也。其乡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髻于渤澥而振羽于云霄之上，安能复投网罟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90页）遂自号为“从吾道人”，阳明为《从吾道人记》以记之（见《全集》卷七，248～250页）。由董澐之事，可概见阳明当时讲学的影响之巨。

屡疏引荐，而阳明仍被闲置未加起复之时，我们竟亦无法找到阳明对此事的任何评论。当时朝廷“大礼之议”纷起^①，朝中大员几无不卷入，阳明友人席书、霍韬及其弟子黄绾等亦皆曾以“大礼”为问，阳明竟亦不作任何答复。是年秋天，他曾独坐碧霞池上，做诗一首：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②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阳明当时对“无端礼乐纷纷议”的淡然心态。他更倾心于鸢飞鱼跃的活泼天真，那既是自然生命的

① 所谓“大礼之议”，乃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武宗朱厚照去世，因无子，所以遗诏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世宗是兴献王朱祐杭之子，朱祐杭与孝宗朱祐樞是亲兄弟。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世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伯父，即孝宗的问题，以及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母兴献王、王妃的问题。从皇位传统来看，他应该称孝宗为“皇考”，称孝宗之后为“皇后”，这些名称是不能用于世宗的亲生父母的，如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廷和即坚持认为，世宗“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明史·杨廷和传》）。但从血统来看，这样一来，世宗就等于被“过继”给了孝宗当儿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不能得到荣耀，他心里自然不悦。所以他下旨朝臣更议，一时议论纷纷，各种意见迭出，称为“大礼之议”。嘉靖元年，世宗不得已，尝“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孝宗之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明史·杨廷和传》），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直至嘉靖三年八月，席书上奏，以为世宗即皇帝位，实继大统而非继嗣，因此称孝宗为“皇考”是不恰当的，“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奉（兴献）神主而别立祔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世宗大悦，“诏布告天下，尊称遂定”（《明史·席书传》），“大礼之议”遂告止息。

② 《碧霞池夜坐》，《全集》卷二〇，786页。就此诗来看，阳明当时对“大礼之议”的态度确是相当疏淡的，或许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心态使然。霍韬、席书、黄绾等对“大礼”所持观点一致，亦因“议礼”而得贵，在阳明诸弟子中，唯邹守益于嘉靖三年二月因议礼不合而被责落职，谪广德州判官。霍韬曾撰《大礼议》，反对“考孝宗”之说，并曾寄阳明请教，阳明当时未答。嘉靖六年，阳明寄书霍韬，谓：“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席书）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按：阳明复席书书，只寥寥数行，根本未及大礼事，见《全集》卷二一，822页。）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与霍兀崖宫端》，《全集》卷二一，834页）这是阳明事后对“大礼之议”的较明确表态，从中可见他对霍韬、席书的观点是基本赞同的，其当时之无言，盖亦正因“身居有言不信之地”的缘故。章太炎曾对席书、霍韬等的议礼态度提出批评，且认为阳明“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全集》，1360页），是亦其蔽，然以其友朋弟子之所为，终归于阳明本人之病，且以论其学术之弊，其结论恐终究亦显得稍欠公允。

发越，亦是主体生命的呈露，他在这种内外融彻的生命太和境界中感受着自然的完美，“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①。他亦在与弟子的讲论弦歌之中体悟着当年孔子“吾与点也”的浩浩情怀：

（嘉靖三年）八月，宴门人于天泉桥。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②

这一情景是动人的，亦是令人神往的。月明如水，水明如月，澄天如洗，碧池如练，竟是一片表里俱彻洁莹剔透的净明世界。“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撓？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③他的心情是畅快的，他的意态是洒落的，他的情怀是浩荡的，良知的明莹与月夜的洁净已全然融为一体，诸生的“狂态”与他的浩然胸次交感相融，转化为充塞宇宙的为天地立心的英迈卓犖之气。然而，他似乎又从诸生的“狂态”之中觉察到了某种可能的偏向，他并不希望“狂者的胸次”被诸生误会而“终止于狂”，以至转入于一味高蹈而忽略伦物之途。他告语弟子曰：

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④

① 《夜坐》，《全集》卷二〇，787页。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91页。

③ 《月夜二首》之一，《全集》卷二〇，787页。

④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91页。

由此可以知道，阳明“狂者的胸次”实为一种有见于良知之本身澄明的精神状态，是对“一切俗缘皆非性体”的如实体悟，这种体悟经由主体的内在超越而转为主体的一种精神主导，成就一种超拔高逸的峻伟人格，但如果仅仅停留于表象的超越与性体的自觉，而不能经由主体的实践工夫将性体的本真实性切实地展布于自己的生活世界，那么“狂者的胸次”便有可能成为“轻灭世故、阔略伦物”的借口，“终止于狂”，反而养成某种蹈空之弊。良知自是完满而圆成的，但我们的生活世界却并不完满而圆成，所以良知本体的开显本身并不是圣学的最终目的，我们更是要实实在在地“致”那良知，将良知本身的完满与圆成着实地推致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宜，由此而实现出生活世界的完满与圆成。这既是内外交相成之道，亦是知行合一之道。

嘉靖三年十月，阳明弟子南大吉增刻《传习录》于绍兴。^①

嘉靖四年正月，阳明夫人诸氏卒。阳明与诸氏夫人数十年相濡以沫，一旦云亡，不免伤怀。丧妻的苦痛，很影响了阳明当时的情绪。^②三四年来，先遭父丧，后罹妻亡，中间谗言百端，毁谤叠出，他自己的身体亦一直并不强健，各种疾病时有发作，就阳明的个人生活而言，是亦真可谓命途多舛，病苦相续。^③

按照惯例，阳明丁忧服阙，当起复委以职事。先前虽有朝臣如御史石金等上疏引荐，皆不报，到这年的六月，时任礼部尚书的席书又特上疏推荐，且谓：“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且使亲领诰券，趋阙谢恩。”但结果仍只是杨

① 《年谱三》：“《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全集》卷三五，1292页）

② 王阳明《与王公弼》书：“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丧中，草草未能作书。”（《全集》卷五，197页）可见妻丧对他的精神打击是重大的。

③ 阳明在与朋友弟子书中曾多处提到其身体的疾病。如嘉靖二年，“贱躯入夏来，山中感暑痢，归卧两月余，变成痰咳。今虽稍平，然咳尚未已也”（《与黄宗贤》，《全集》卷五，199页）。嘉靖三年，“勉之别去后，家人病益狼狈，贱躯亦咳逆泄泻相仍，曾无间日，人事纷沓未论也”（《与黄勉之》二，《全集》卷五，193页）。嘉靖四年，提到“腹疾”（《答刘内重》，《全集》卷五，196页）。

一清入阁辅政，阳明虽有领券谢恩之召，终究不果。^①

嘉靖四年九月，阳明回余姚祭扫祖茔。趁此机会，他在余姚创立了学术讲会，要求诸弟子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规定以每月朔望初八、廿三为期。亲书揭帖以勉励诸生，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或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②讲会的形式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它旨在促进会友之间的学术交流，以相互切磋砥砺而增益其学，博其闻见，厚其道德，增其友谊。就阳明学说的传播而言，这种讲会的形式尤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同年十月，阳明的门人在绍兴创设了阳明书院，对阳明学说的传播起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作用。^③

嘉靖五年，按照《年谱》的记载，阳明盖唯以讲学为事，答书解疑而已。然十一月幼子正億的出生，却使他有了一份意外的惊喜。^④

从嘉靖元年到五年，是阳明集中讲学的时期。在这五年当中，

① 参见《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93页。《明史·席书传》：“（书）乃力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且曰：‘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以计天下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帝曰：‘书为大臣，当抒猷略，共济时艰，何以中材自诿？’守仁迄不获柄用。”《明史·王守仁传》：“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294页。

③ 《年谱》曰：“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后十二年丁酉（嘉靖十六年，1537），巡按御史门人周汝员建祠于楼前，匾曰‘阳明先生祠’。”（《全集》卷三五，1297页）

④ 阳明之子正億，继室张氏所生。史料似未载阳明续娶张氏夫人之事，或可能在嘉靖四年年底前后。正億出生，阳明颇为高兴，尝谓：“老年得子，实出望外。”（《与王公弼》二，《全集》卷六，215页）阳明初为取名正聰，嘉靖十一年（1532）秋，张璁为避世宗讳改名孚敬，因此黄绾亦将正聰更名为正億（世宗名厚熜，读音相近）。阳明去世以后，正億尚幼，正宪遂与产生矛盾。黄绾以女妻正億，善为抚养。阳明诸弟子则与其家庭财产的分割及后来世袭伯爵等事。诸弟子尽力于阳明寡妻弱息的抚育，甚见其师生情谊之笃厚（参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及《世德纪附录》、《处分家务题册》、《同门轮年抚孤题单》等文）。

他基本上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只是赋闲在家，潜心于其思想学术体系的完善，致力于良知之说的扩展与传播。尽管自征宸濠以来即蒙受各种诽谤与谗言，尽管朝廷内阁有人欲阻其仕进而忠奸莫辨，尽管封新建伯仅成为一种舆论的装饰与搪塞，但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已经与他自己没有了关系，他几乎搁置了全部世俗的繁冗与纷杂，超然于得失荣辱之表，脱略于世累物情的葛藤缠缚，而沉浸于一个心体光明的世界。他在讲学中体味着思想自由的乐趣，在山水间感悟着生命的自然天真，在与诸生的宴乐弦歌之中抒发他无古无今浑然天地万物一体的浩瀚情怀，同时亦在因他的良知之教而带来的诸生心灵门户洞开的喜悦之中享受着思想启迪的欢欣。嘉靖五年，他致书门人邹守益，谓：“某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缘此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故说此两字，穷劫不能尽。……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①在阳明的全部学说之中，良知乃为会归之极，是撑起他思想世界的根本支柱。人的存在仅仅被表达为物质的存在是非常不够的，因为物质的存在方式总是受到精神世界的主导，在相当程度上，精神世界的状态反而是物质世界得以实现出来的基本前提，所以说心是身的主宰。心体的本然存在属于先天范畴，但心体具有向经验世界表达它自身的必然性，心体的经验表达即是意，所以意是心之所发；意念的产生与落实必然会牵涉到某种对象，这种被意念所关涉的对象即是“物”。因此“物”的存在状态本质上便是意念的一种对象性存在，所以阳明强调，就它的本来意义来说，“物”并不是外在的，而是永远处于主体意念的涵摄之下的，心外无物。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的经验生存处境本身的制约，我们往往不能确保心体必定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本来样式呈现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因为如此，意

^① 《寄邹谦之》三，《全集》卷六，204页。

就往往不“诚”；意不诚，便即直接导致心与身家国天下万物的疏离间隔，原本应居于主宰地位的心便离了它的正位，生存便陷于“无主”的漂浮状态。所以“诚意”是极为重要的，而所谓“诚意”，就是要保证“意”能够成为心体自身本然真实的表达。如果意是诚的，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形上与形下合一，先天与后天合一，心与身家国天下合一。浩浩宇宙，唯心主之，天下万物与我同为一体。若意不诚，则身亦不得修，以至于“物”亦不得正，更不可能会有止于至善，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不诚无物。意的不诚，实质是良知本体在发用过程中因受到某种阻遏不能按照它自己的原本状态来表达而产生的一种结果，正因如此，人的存在遂走向其本质的异化，或者说，经验的生存状态与他的本质实在状态发生了疏离。流而不返，则必将导致生存不断地流于表象化而造成人的物化。人而化为物，那便无疑是人的存在本质的沉沦与失落，无疑是生命价值的沉沦与失落。阳明强调“致良知”，正是对治这种本质与价值之失落的有效途径。在存在的世界，良知的存在性是绝对的，它即是天命之性，即是天道在主体的实存，即是宇宙人生的本体，即是涵具万理的未发之中。因此在价值的世界，良知即是价值之至善的本体，既是价值的终极确立者亦是价值的终极判断者。就个体的经验生存来说，尽管良知的存在性无论如何都是绝对的，但这种存在性却往往处于未开显的幽昧不明状态，没有获得它的自觉显扬。原于此故，生存才处于暗昧的沉沦当中，生存的价值才潜消于物的世界而无法获得它的自觉高扬。要消除生存的异化从而使生命还原于它的本质真实，就必须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致良知”的工夫。阳明的所谓“致良知”，其实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内在超越而自觉转进以切入于本体自存实性的层面；一是由主体世界之“内”向经验世界之“外”不断推衍扩展以至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层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结果；前者是阶段性目的，后者是终极目的；前者是人格的涵养与确立，后者是人格的成就与完满；前者是主体的道德本体世界，后者是主体的道德生活世界。两相圆融，立天下之大

本而弥纶天下之大经；内外俱彻，涵盖乾坤而参赞天地之化育。

阳明自正德十五年开始提倡良知之教，此后即专讲致良知；而在嘉靖元年五年，实际上便是阳明以良知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最后完成时期，同时亦是他亲自对其成熟的思想学说进行最为集中的传播时期。其影响之广大与学人之众多，在阳明一生的讲学生涯中是无前的。亦因此故，绍兴成为当时阳明学对外扩散的中心地。良知说的传播，不胫而走，疾于迅雷，若黄钟大吕之音，足以振聋发聩；若草上疾行之风，所过无有不化。它几乎掀翻天地，不仅突破了思想界所固有的僵化格局，并且亦引领了一种时代新风。诚若后来顾宪成所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①

^①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62页，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光绪丁丑涇里宋祠藏本），1975。

总督两广 恩威兼行

（嘉靖六年至嘉靖七年九月底，1527—1528.10.12）

虽然宵小之流的无端诬陷朝廷一直未予昭雪，封爵的恤典实际亦一直未予颁行，但“良知”学说的迅速传播及其直达生命实相之终极开显的现实效用，却使阳明体会到了心与古先圣人相接相契的无限欢悦。“老年得子”的欣喜，亦堪稍慰他因命途多舛、病苦相续而过早产生的迟暮心态。然而，王朝政治局势的再度逆转，却再度剥夺了他与诸生商略圣学而优游于思想之博大世界的旷放自由，再度剥夺了他与家人妻子栖身山水安处田园的天伦之乐。他仍需用他孱弱的身躯去再度支起明王朝这座行将倾覆的大厦，用他卓越的智慧去再度挽救这条巨大的破败之舟，倾其全部的生命使它再度归于顺风安流。

嘉靖六年的上半年，阳明仍承续了他近些年来赋闲的常态，与诸生讲论“良知”之学，或商略心得，或作书讨论，相互警励策发，必以自明心体而跻于圣域为期。四月，弟子邹守益将阳明的文章汇编为《阳明先生文录》，曾由阳明亲自标注各篇的撰写年月，由钱德洪分类编次，刻于广德州（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凡四册。这是阳明的著述除《传习录》以外的首次汇辑刊刻。^①

① 参见《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04页。钱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时邹谦之谪广德，以所录先生文稿请刻。”（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一，1573页）按：“大礼”议起，时邹守益为翰林院编修，因上疏忤旨，下诏狱，寻谪广德州判官，其事实嘉靖三年。嘉靖六年，邹守益被谪期满，升南京主客郎中。由此知守益盖在广德刻《阳明文录》不久，即离开了广德州判官的任所。德洪谓“时邹谦之谪广德”，恐误以为守益谪广德在嘉靖六年，故附数语于此。

六年五月，广西田州岑猛为乱，数剿不效，朝廷遂命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督同都御史姚镛勘处思恩、田州事宜。

思恩、田州皆广西土司，其知府皆姓岑氏，二府首领既为同族，而长久以来，亦积有恩怨。今据有关史料，略述其事之本末如下：

田州，古百粤地。汉属交趾郡，唐隶属于邕州都督府。宋始置田州府，元改为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洪武元年，明军下广西，田州总管府总管岑伯颜以田州归附明朝，朱元璋嘉其诚，于洪武二年设田州府，令岑伯颜为知府，子孙世袭。因岑氏祖上有此功德，所以谓：“土官岑氏在田州，世有功德，以为国家不侵不叛之臣，边疆倚赖焉。”^①岑伯颜三传至岑溥，溥有二子，长曰岑獠，次曰岑猛。弘治十二年（1499），岑獠因失父爱，弑其父溥。土目黄骥、李蛮发兵杀獠^②，时岑猛年方4岁。已而黄骥、李蛮构衅，李蛮据田州，而黄骥及岑猛祖母岑氏携岑猛奔南宁督府，请求以岑猛袭田州知府。督府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护卫岑猛入田州。岑濬本为岑猛族人，及岑濬至田州，李蛮拒不纳岑猛入城，黄骥遂再携岑猛奔思恩。^③岑猛

又：守益请刻阳明文录，阳明开始并不同意，以为“不可”，曰：“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守益仍请不已。阳明乃取近稿三分之一，亲为标揭年月，命德洪编次；又致书德洪：“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又谓：“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德洪又请将其余部分一同刊刻，阳明不允，以为此是“爱惜文辞之心”，“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德洪仍请不已，阳明方允将其中的数篇作为“附录”刊刻（参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一，1573～1574页）。在某种意义上，嘉靖六年阳明对其文稿的亲自整理，可视为他对自己毕生思想的学术总结，而他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则亦极可令人深思。

① 《田州事实记》，《季彭山先生文集》（稿本）卷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876页（上）。

② 岑溥为獠所弑的时间，《明史·广西土司列传二》谓在弘治十二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诛岑猛》谓在弘治六年；又岑獠之死，《明史》谓“自杀”，谷应泰谓为黄骥、李蛮所杀。

③ 据《明史·广西土司列传二》，李蛮并无窃据田州之意，岑猛至南宁，李蛮曾遣使来迎，但黄骥恐李蛮夺其权，遂杀其使。李蛮怒，率兵至旧田州，黄骥惧，诬蛮将为兵变，乞督府以兵护岑猛，因此方有岑濬率兵护岑猛入田州之事。

既至思恩，黄骥遂厚赂岑濬，且献其女，岑濬乃胁迫岑猛分割其地，并将岑猛幽禁。及事发，都御史邓廷瓚檄副总兵欧磐等，要岑濬将岑猛放回，命猛袭田州知府。濬不从，廷瓚以兵征之，濬始释放岑猛。弘治十五年，黄骥、岑濬联合泗城土官岑接、东兰土官韦祖铤等，各起兵攻李蛮。岑接兵2万先入田州，杀掠男女800余人，驱之溺水死者无算，搜括府库，放兵大掠，城郭为墟。岑濬兵2万攻旧田州，破城据之，杀掠男女5300余人，李蛮逃去。濬以其族子岑洪为田州守，岑猛逃亡。副总兵欧磐、参政武清等，至田州府勘治，遣兵送岑猛还府。黄骥惧罪，藏匿于岑濬家，有司请治岑濬罪。然参政武清受岑濬贿赂，袒护岑濬，田州事并未妥善解决。邓廷瓚乃上疏朝廷，言思恩岑濬罪恶，正在逐捕，而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加以处置，降府为州，以免将来之患，朝廷从之。弘治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请发兵讨岑濬，诛岑濬及岑洪，遂行“改土归流”之策，改思恩为流官知府，兼摄田州。同时以平乐府知府谢湖为参政，掌田州府事，而降岑猛为福建平海卫千户。

朝廷的这一处置，岑猛不心服，遂不赴福建平海卫千户之任，谢湖至，岑猛拥兵拒之。正德初，岑猛厚赂刘瑾，谋复旧官，终得复为田州府同知、领府事。岑猛抚辑遗民，兵势稍稍振起，渐以称雄。时江西盗起，都御史陈金檄岑猛发兵征讨，有功，迁田州府指挥同知。但岑猛的目的是在恢复田州知府的旧秩，对“指挥同知”的官秩并不满意，于是渐有怨气。

嘉靖二年，岑猛发兵攻泗城，拔其六寨，陷州府，土官岑接告急于军门，谓岑猛无故攻寨，而岑猛则以为岑接侵占其祖业，此举仅在复还其故地而已。时岑猛兵强，或言其有反叛之意，都御史盛应期既担心岑猛真的举兵反叛，同时又希望能得到岑猛的重贿，岑猛不与，且出言不逊，于是盛应期怒，乃于嘉靖四年与巡按谢汝仪上疏，言岑猛谋反，请兵征讨。书上未报，而盛应期以他事去职，朝廷诏姚模代。然姚模知岑猛其实并无反心，岑猛既上奏自辩，姚

模亦欲缓师。而巡按谢汝仪与姚模有隙，乃谓姚模之子姚涑曾受岑猛巨贿，并已查访到姚涑写给岑猛的书信。姚模因此惶恐，乃再疏请征，朝廷许可，遂命姚模克期征讨岑猛。

嘉靖五年夏四月，姚模遣都指挥沈希仪、张经、李璋、张佑、程鉴等五将，率兵8万，分道并入田州。岑猛闻大兵至，令其下属毋交兵，裂帛书冤状，陈军门乞怜察。姚模不听，督兵益急，而沈希仪则在工尧隘地方将岑猛长子邦彦杀死。于是岑猛惧，谋出奔，而归顺州知州岑璋乃引诱岑猛逃往归顺，遂用计将岑猛毒杀，斩其首以献。^①姚模于是上疏朝廷告捷，请改田州为流官，朝廷从之。

嘉靖六年五月，田州土目卢苏约同思恩土目王受，共同举兵，以图各复田州、思恩土司。卢苏扬言岑猛其实并未死，以此为号令，迅速纠集地方乡勇数万之众，兵临田州府城。官兵出击，不敌，欲退，而城中内应呼噪四出，官军腹背受敌，力战不支，遂突围渡江，而溺死甚众。卢苏既攻占田州府，同时又表示愿意听抚。在此同时，王受亦纠集数万之众，攻克思恩城，执知府吴期英、守备指挥门祖荫等，已而又将吴期英释放，投牒上官，亦表示愿听招抚。但对他们的招抚意愿，都御史姚模却不予理睬，乃遣使者檄东兰、归顺、镇安、泗城、向武诸土官，要求各出兵效力，又上疏请调湖广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在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兵及江西汀州、赣州诸处畚兵，俱会于南宁，并力进剿。当此之时，“巡按御史石金劾（姚）模失策罔上，并论前总督盛应期，帝以模有功，许便宜抚剿，（卢）苏、（王）受数求赦，模不许，将大讨之。会廷议，起王守仁督两广军，令模与同事；模引疾乞罢，许驰驿归”^②。

① 岑璋之女嫁岑猛之子，故岑璋与岑猛为亲家翁，然岑猛不喜岑璋之女，故璋素与岑猛有憾。岑猛出奔归顺，既为仓促之间的不得已之举，又念岑璋毕竟为亲家，不意竟为所害。详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三《诛岑猛》。

② 《明史·姚模传》。

以上所简述的，乃为阳明奉命征思、田的基本背景。^①当嘉靖六年五月卢苏、王受用兵，姚镔虽合四省之兵大加进剿而不克成功之际，“张公孚敬（即璉）拉桂公萼同荐（阳明），桂公不得已，勉从荐公（阳明）。得俞旨，兵部奉钦依，差官持檄，授公（阳明）总制

① 上述思田之事，主要据《明史·广西土司列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诛岑猛》以及《明史·姚镔传》等史料。这些史料基本上代表了官方的立场与态度，季本撰《田州事实记》，则颇为岑猛鸣屈，提供了事实的另一面。现据季本所述，补充有关情况于后：

关于弘治十八年以田州并入思恩，“改土归流”，降岑猛为福建平海卫千户以后，“猛恐自此遂失田州，累乞贬秩，以为其府幕，不许，遂留不赴任（平海卫千户）。而流官知府始代猛者，不为土人所附，退居南宁，与猛终不相得”。此明“改土归流”之策未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流官知府对岑猛的态度及公正性有待商榷，流官亦并未实际负起田州之责。

关于岑氏父子的为人：“猛既失故物（指田州及泗城的唐兴等地），又颇好文墨，耻与武臣颉颃。先是，藉猛功（指岑猛平江西诸盗）而起身者多为都司参将，而猛乃以指挥为之属，或至受其侮，供应其所需，少有不尽，则从而媒孽之。猛意颇不平，不欲以功名自竞，于是传其子邦彦，而吟诗饮酒弹雀捕鱼，招延方外之士，讲养生术，将自为其身矣。邦彦膂力绝人，智谋不在猛下，调征新宁，既亲破剿思恩刘绍之乱，复讨平之，战无不胜，功无不成，于是田州之兵雄两广，而邦彦因有骄豪之志矣。重以一二监守兹土者有所诛求，搜剔其隐过，既不足以服其心，而反为所轻，猛亦时有讥诋上司之言，荐闻于远，当道无不领之，惟恐不得其隙。又田州地当数州冲要，军门使者过之，或有所调发，率倚势取索，欲踰其常。猛既以谢事避去，而邦彦亦不礼焉。使者归，则造危言以谤猛。”此明朝廷对岑猛的待遇不公，且搜求过度，引起其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又招致关于岑氏父子谋反的诽谤。

关于嘉靖二年岑猛攻泗城：“会泗城有乱，那地、东兰诸州素为所侮，欲因而甘心焉。以田州唐兴等地，亦旧为泗城所侵夺，积有深怨，约猛共报之，而泗城土官岑接实为那地兵所杀，以诉于当道。在猛自谓争复故地，土俗之常耳，而杀（岑）接者又那地也，（猛）不以为意。当道因欲以罪诛猛，不为辨曲直，猛怨，……出慢语以挟当道，当道益深恶之，而谤猛者日甚，遂加以叛逆之罪，请兵征讨。”此明岑猛攻泗城，意在夺回故地，“土俗之常耳”，非为叛逆，而当道以此征讨，实别有原因。

关于嘉靖五年大兵临田州：“乃大合四省之兵于南宁，以伐田。邦彦闻之，欲出拒战，猛曰：‘我未尝得罪朝廷，必无伐我理，万一有之，岂可□官兵□自取□，力止勿□。乃遣人进表，则不得达；遣人诉冤，则不得行；遣人求立功以赎罪，则不得请；于是邦彦率其所亲陆寿、韦好等至公，要战师而官兵猝至，杀韦好等，邦（按：“奇”字恐误，当作“彦”）遁走，寻病死。猛知事急，窜死归顺，其民乃溃。”此明岑猛原本既无叛逆之心，亦无叛逆之举，大兵临境，尤自进表诉冤，以求立功，然则朝廷之剿，实乃非义。

关于嘉靖六年卢苏、王受举兵事：“土目卢苏以岑氏世有功德于田，不忍其嗣绝，欲求一抚定以维之，惧不可得，乃扬言（岑）猛尚存，而众累集，誓以一心；复遣人说思恩土目王受，使率众来复土俗。初，思恩之改设流官也，并土俗也去之，而为里甲，民皆不便，往往以其情鸣官，不得复，反复未宁。……（王）受至思恩，果率其众，以里甲之不便告于知府吴期英，而惧有患，每旦则叩头听命，而于上下之礼、仓库之防，严不敢犯焉。期英未为施行，受乃出至武缘，将求贤以自达于上，官兵以

军务，督同都御史姚镛勘处彼中事情”^①。兵部的这一任命于六月六日送达阳明，阳明随即于同日上疏力辞，略曰：

臣闻命惊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于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矧兹军旅，何敢言辞？顾臣病患久积，潮热痰嗽，日甚月深，每一发咳，必至顿绝，久始渐苏。乃者谢恩之行，轻舟安卧，尚未敢强，又况兵甲驱劳，岂复堪任？夫委身以图报，本臣心也，若冒病轻出，至于僨事，死无及矣！臣又伏思两广之役，起于土官仇杀，比之寇贼之攻劫郡县、荼毒生灵者，势尚差缓。若处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镛平日素称老成慎重，一时利钝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责成，难拘速效。御史石金据事论奏，是盖忠于陛下，将为国家宏仁，覆久远之图，所以激励镛等，使之集谋决策，收之桑榆也。……臣以为两广今日之事，宜专责镛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权，略其小过，假以岁月，而要其成功。至于终无底绩，然后别选才能，兼于民情土俗素相谙悉，如南京工部尚书胡世宁、刑部尚书李承勋者往

为（王）受反而击之，厄于途。不得已，则相格斗，而受实非有反心也。……当时执事者例以大义责之，而不复少原其情，必欲穷诛二目，以深绝其党。思田由是久不得靖。”此明卢苏、王受实皆未有反叛之举。卢苏意为为岑氏存孤，王受意为为复其土俗，而当道不察，以为谋逆，大举用兵，反至思田久不得宁。

季本关于思田之事的总观点：“自猛袭□以来，砥砺名节，思自树立，亲贤友士，务本恤民，闺门有礼，国俗有条，民有罪者，不忍见其箠楚，使人杖之门外；至于妄杀戮人，则尤所未有。以是民心悦服，累立战功，而不得志，遂托于养生，以示无争名意。比官兵以反叛加之，人且料猛兵事素练，号令素行，用其富强之力，而使邦彦将之，奋臂一呼，郡蛮响应，足以基两广数年难拔之患，必非甘于受死者，然猛终守臣节，不敢有异谋，岂非土官中之最贤者乎？”“又猛自先世有功国家，苟罪有可戮，犹将十世宥之，况实无反心乎？虽其一时忿争诋傲，若无忌惮，然亦在我者处之未尽，当自反者也，乃必欲加猛大恶，使其父子抱忿遭以死。呜呼！邦彦且未足论，猛深可惜也！已无益于事，而失蛮夷之心，得非执事者之过计邪？”“若夫卢苏之志，欲为其主存孤；王受之情，欲为其土复俗；虽不无阻兵拒敌之罪，要之，蛮夷小人不谙礼法，集党自防，势所必至，亦未可尽以大义责之，而处以必死也。”

以上摘自季本《田州事实记》，详见《季彭山先生文集》（稿本）卷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876～877页。季本的叙述，至少反映了田州之事的另一方面事实，既可与正史相参，又体现了与正史颇不相同的另一种观点。考史者宜当重视焉。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5页。

代其任。^①

书既上，朝廷不允。七月初七，敕谕再下，特命阳明：“提督两广及江西、湖广等处地方军务。星驰前去彼处，即查前项夷情，田州因何复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镛等斟酌事势，将各夷叛乱未形者可抚则抚，反形已露者当剿则剿，一应主客官军，从宜调遣，主副将官及三司等官，悉听节制。”^②据黄绾的记述，当时世宗曾与杨一清曰：“若姚镛不去，王守仁决不肯来。”遂令姚镛致仕。九月初，遂又降旨于阳明，曰：“卿识敏才高，忠诚体国，今两广多事，方藉卿威望抚定地方，用纾朕南顾之怀。姚镛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节制诸司，调度军马，抚剿贼寇，安戢兵民，勿再迟疑推诿，以负朕望。还差官铺马裹赍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该部知道。钦此。”^③

① 《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全集》卷一四，460～461页。按：阳明力辞新任，除去确乎身罹病患、体质羸弱的原因以外，盖平藩战争结束以来，冤屈未白，论功未定，当时江西从义将士的嘉赏未行，实为更重要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阳明辞去新任，正为对朝廷之无义的抗议。在给诸友人的书信中，阳明曾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这两方面原因。“病躯赖放日久，已成废人；尚可勉强者，惟宜山林之下读书讲学而已。两广之任断非所堪，已具疏恳辞；必不得请，恐异日终为知己之忧也。”（《与郑启范侍御》，《全集》卷二一，728页）“仆积衰之余，病废日甚，岂复更堪兵甲驱驰之劳？况谗构未息，又可复出而冒为之乎？”（《答方叔贤》，《全集》卷二一，828页）“仆多病积衰，潮热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岂复能堪戎马之役者？况谗构未息，而往年江西从义将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废业倾家，身死牢狱，言之实为痛心，又何面目见之！”（《与黄宗贤》第一书，《全集》卷二一，829页）“朽才病废，百念俱息，忽承重寄，岂复能堪？若恳辞不获，自此将为知己之忧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余矣，尚尔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义之士废产失业，身死道途。纵使江西之功尽出冒滥，独不可比于留都、湖、浙之赏乎？此事终须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挟而要者，奈何奈何！”（《与黄宗贤》第二书，《全集》卷二一，829～830页）“宁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升赏，独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尔查勘未息。今复欲使之荷戈从役，仆将何辞以出号令？亦何面目见之？赏罚，国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仆一人不足惜，其如国事何！”（《答潘直卿》，《全集》卷二一，835页）这些书信之语，正可见阳明当时之心迹。本年十一月，阳明行至江西，曾对安远县旧从征义官叶芳等人进行犒赏（见《牌谕安远县旧从征义官叶芳等》，《全集》卷一八，623页），盖亦略存其安慰之意云。

② 《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全集》卷一四，469页。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5页；王阳明：《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全集》卷一四，462页；《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全集》卷一四，469页。按：黄绾盖于此时又荐阳明入阁，然为杨一清、桂萼等所阻。黄绾云：“时予为光禄寺少卿，具疏论江西军功，及荐公（阳明）才德堪任辅弼。上喜，亲书御劄，并疏付内阁议。杨公一清忌公入阁与之同列，乃与张公孚敬具揭帖，对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新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但可用为兵部尚书。’桂公知，遂大怒置予，潜进揭帖毁公，上意遂止。公（阳明）遂扶病莅任，沿途历访诸士夫，询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诛之罪，然所以为乱者，皆当事诸人不能推诚抚安以致之。上疏谢恩，极言致乱之由、平复之策。”（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5页）

在朝廷的敦促之下，阳明遂开始准备启程前往广西。

这一新的任命，并不意味着朝廷对阳明多年来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已给予澄清，甚至并不意味着对阳明的重用，而只是因前度官员对地方事务处置失当从而使地方陷于混乱，而需要借助他的才能去进行善后而已。这时的阳明，身体确乎已显得相当虚弱，缠绵日久的喘咳之疾尤见深重，而越城去思田数千里之遥，且不说路途劳顿，更兼以甲兵驱驰，他几乎预感到了前路的某种不祥。数十年来东奔西走，历险无算，虽颠蹶困顿，隤颓玄黄，却历练得良知精明而心体通透莹彻，开拓得思想世界的博大无边；数年来越城讲学，良知之说胥而走，士林兴起，人心振奋，则使他益信良知的本然灵明，足以慰藉他从百死千难中经磨历劫而愈显沧桑的心怀。而在这即将远征之际，他最为担心的却原亦是后辈晚生因汨没于俗习而忘却对本然良知的时时提撕。本年八月，在他即将入广之时，他撰写了《客坐私祝》，留下了他对子弟士友的谆谆之嘱：

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不愿狂悖隋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黷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将有两广之行，书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临于斯者，请一览教之。^①

诚如后来孙奇逢所说：“《私祝》数语，严切简明，直令宵人辈立脚不住。”^②而在这寥寥数语之中，我们便亦可以体会到阳明那种耿介磊落的胸怀及其必欲引领子弟士友入于光大高明之途的拳拳厚望。

嘉靖六年九月壬午（初八，1527年10月2日），阳明离开绍兴，启程前往广西，他的两名大弟子钱德洪与王畿一路相送，直至富阳。

① 《客坐私祝》，《全集》卷二四，926页。

② 孙奇逢：《客坐私祝跋》，《全集》卷四一，1616页。

而在前一天的晚上，他们师徒之间曾有过一场重要的思想论证，被称为“天泉证道”^①。在某种意义上，“天泉证道”既是阳明对他以良知说为核心的毕生思想所作的最后总结，亦是当他觉察到其学说可能在其弟子那里发生分裂之时，为匡正其各自理解上的偏弊所作的

- ① “天泉证道”是阳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阳明的所谓“四句教”。“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王畿：《天泉证道纪》，《王龙溪全书》东京三省堂明治三十六年印本，1页）王畿认为阳明的“四句教”“恐未是究竟话头”，因为“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王畿的这一观点，称为“四无说”。而钱德洪则认为：“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因此他坚持“四句教”为“定本”，一毫不可移易。钱、王既相持不决，遂约定去请教阳明。当天晚上，阳明设宴与诸门人弟子作别，至“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德）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畿）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用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他既肯定了王畿“四无说”即本体即工夫的观点是卓有见地的，同时又肯定了钱德洪的观点与他历来讲学之旨不相违背，所以二者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堂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已而又重申了“四句教”，以为是“彻上彻下功夫”（《语录三》，《全集》卷三，117~118页；《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06~1307页）。邹守益对此事亦有简单记述：“阳明夫子之平两广也，钱、王二子送于富阳。夫子曰：‘予别矣，盍各言所学？’德洪对曰：‘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畿对曰：‘心无善而无恶，意无善而无恶，知无善而无恶，物无善而无恶。’夫子笑曰：‘洪甫须识汝中本体，汝中须识洪甫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逾年，先师薨于南安，不及稽二子之成也，而二子交砥互砺，以求不坠遗绪。”（邹守益：《青原赠处》，《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二，四库存目丛书本）但这一对话的地点不应是在富阳。

“天泉证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明阳明的学说在当时已经潜存了分化的契机，阳明不仅对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已有敏锐觉察，而且就此作出了明确的衡定。但事实表明，钱、王二子并未完全如阳明所告诫的那样就对对方的观点各相取以为用，而仍在相当程度上“各执一边”，因此在阳明去世以后，其学说分化的潜在性乃迅即显化出来。因后世“四无说”的流行呈现出蹈空之弊，学者遂往往归咎阳明，“四句教”亦成为王学中的一大“公案”。王畿的天资颖悟，使他觉察到了“四句教”在纯粹逻辑层面的可能矛盾，因而欲据了义而将“无善无恶之心体”之说贯彻到底。古今以来学者亦多认为“四句教”确有矛盾。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撰《王阳明“四句教”义蕴发微》，发表于台湾《孔孟月刊》，认为“四句教”实际上并不存在“矛盾”（参见董平：《浙江思想学术史》第四章第二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最后一次思想努力。

九月初十，阳明渡过钱塘江，乘船入富春江，到达严子陵钓台。正德十四年，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阳明为押解宸濠等逆犯至南京，曾过钓台，当时事急，未及登临，至今复来，首尾竟然已隔十年，而欲一登高俯瞰，却非但“以兵革之役”，更“兼肺病足疮”，力亦已有不能。“仰望台上云，俯濯台下水”，他不禁有“往迹如梦里”^①之感，遂于二十二日赋诗，使桐庐县尹沈元材刻于亭壁。亦是在富春江畔的严子陵钓台，他与钱德洪、王畿作别，师徒之间再次讨论了“心之本体”的问题。^②

阳明从富春江溯流而上，过衢州、常山，一路多有题咏。入江西境，再从广信（今上饶）乘船，沿信江经贵溪、鹰潭而入鄱阳湖，于十月至南昌。故地重来，他受到了南昌人民的热烈欢迎。《年谱》云：

明日至南浦，父老军民俱顶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顶舆传递入都司。先生命父老军民就谒，东入西出，有不不舍者，出且复入。自辰至未而散，始举有司常仪。^③

江西父老顶香参谒的质朴真情，使阳明深受感动。回想十年前的平

① 《复过钓台》，《全集》卷二〇，794页。

② 这次对话，被称为“严滩问答”。《传习录》：“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德）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全集》卷三，124页）阳明当时未对“有心无心”四句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因此“严滩问答”亦成为王门一重公案。在现象作为本体之真实的自然呈现的意义上而言，现象便是“实”而非“幻”；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因良知之“有”而表达出来的一切变化云为，便亦为“实”而非“幻”，故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但另一方面，良知本体作为终极实相，它本身却原只是一个“虚体”，只是一个虚灵明觉，是不可执著的；若执著良知之“有”，则反有可能触途成滞，失却本体，故又曰“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王畿以为前者是“本体上说工夫”，后者是“工夫上说本体”，在将良知作为某种修证的对象并且就这种修证的态度来说，大抵得之，因此亦大抵受到了阳明的首肯。

③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08页。

藩之战，虽往事如烟，江山依旧，而鼓角铙铎之鸣犹似萦绕耳畔；虽事随人转，战争的硝烟已悄然淡去，但人民的困苦却仍在继续。一种既感且愧的情愫，油然升腾于他的心间。^①在南昌，他参谒了文庙，并在明伦堂开讲《大学》，盛况空前。^②离开南昌，再溯赣江南下，至丰城，重登黄土脑，追忆当年闻宸濠之变时的急迫情景，目睹人民仍处于横征暴敛的艰难贫困，又不禁感慨系之。^③及至吉安，弟子士友 300 余人迎入螺川驿，他在这里作了或许是平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讲学。^④

十一月十八日，阳明抵达广东肇庆。这里已接境广西，沿西江溯流而上，不三四日即可抵达梧州府。去家日远，不禁有些许挂怀；王事靡盬，他不得不黽勉从事。而家乡的弟子士友，是否仍能孜孜矻矻，相切相磨，不倦于心体之开明的践履？他对此极为眷怀，遂寄书钱德洪、王畿，表达了他对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的深切关怀，勉励盼望其志于圣学的拳拳情意，溢于言表。^⑤

十一月二十日，阳明抵达广西梧州府，旋即于梧州开府，切实着手处理为平定思田之乱的各项军政事务。事实上，阳明在到达广西之前，即早已就思田之事的平息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十月初三，

① 阳明尝赋《南浦道中》：“南浦重来梦里行，当年铙铎尚心惊。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已喜闻闾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全集》卷二〇，796 页）

② 《年谱三》载：“明日，谒文庙，讲《大学》于明伦堂，诸生屏拥，多不得闻。唐尧臣献茶，得上堂旁听。初，尧臣不信学，闻先生至，自乡出迎，心已内动。比见拥谒，惊曰：‘三代后安得有此气象耶！’及闻讲，沛然无疑。同门有黄文明、魏良器辈笑曰：‘逋逃主亦来投降乎？’尧臣曰：‘须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尔辈安能？’”（《全集》卷三五，1308~1309 页）

③ 阳明赋《重登黄土脑》一首：“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无穷。前途且与停西日，此地曾经拜北风。剑气晚横秋色净，兵声寒带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全集》卷二〇，796 页）

④ 《年谱三》：“至吉安，大会士友螺川。诸生彭簪、王钊、刘阳、欧阳瑜等偕旧游三百余，迎入螺川驿中。先生立谈不倦，曰：‘尧舜生知安行的圣人，犹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吾侪以困勉的资质，而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临别嘱曰：‘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全集》卷三五，1309 页）

⑤ 参见《与钱德洪王畿》，《全集》卷六，223 页。

当他甫一进入江西地界，便立即行文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各省镇、守、抚、按各衙门，要求就卢苏、王受反叛之事的实际情由及当如何处置各陈己见，“凡有所见，勿惮开陈；其间或抚或剿，孰为得宜；设土（司）设流（官），孰为便利；与凡积弊宿蠹之宜改于目前，远虑深谋之可行于久远者，备写揭帖，各另呈来，以凭采择”^①。为备战的需要，他又行文江西都司操阅军马，亲临阅兵；行文江西布政、按察二司备办钱粮。^②前任都御史姚镛曾调湖广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土兵来集南宁，八月，6 000 余名土兵从辰州府（治在黔南县，今怀化市安江镇）出发，向广西调集，原计划径趋与思、田二府接境的宾州（今宾阳，在南宁东北）待命；十月，阳明沿途查访得卢苏、王受起兵实别有原因，且“闻诸道路，传诸商旅，皆谓各目投抚之诚，今已甚切”，遂行文广西布政使林富及右江、桂林道守备巡检等官，要求命土兵暂于梧州屯札，候其督临，乃决进止。^③十一月十二日，阳明行文韶州、南雄二府招集民兵，在“机兵打手各色人内，访求武艺骁勇，胆力之士，超群出众，以一当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县二名或三名，无者于别县通融取补”，“限一月内送赴军门应用”^④。十一月二十一日，亦即阳明到达梧州的第二天，他即行文两广各道，要求厉行他往年在江西曾收到确切效用的“十家牌法”。按照他的观点：“御外之策，必以治内为先；安民之术，须以化俗为本。”而在非常之时，为治内安民，实施“十家牌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不论在城在乡军民，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日轮一家，沿门晓谕，因而审察各家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及违犯教条不听劝谕者，即行报官究理。”并

① 《钦奉敕谕通行》，《全集》卷一〇，621 页。

② 参见王阳明：《牌行江西都司操阅军马》、《牌行江西布政司备办钱粮》、《牌行江西按察司监视行罚》等公移，《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

③ 《湖兵进止事宜》，《全集》卷一八，622～623 页。

④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全集》卷三〇，1095 页。

要求此项事宜须在一个月內完成，“各道亦要严加省察，期于着实施行，毋得虚应故事”^①。

抵达梧州以后，阳明在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同时，又对思田之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卢苏、王受用兵的实际缘由进行了细致查访。既得知卢苏、王受已有招抚之意，他又着重查明其确有投诚之心还是假投诚之名而实施诡诈。他要求各有关府道的守巡参将及各领兵督哨等官，务要相度机宜，明其真相，“若各叛目诚心投抚，中间尚有可怜之情，朝廷岂以必杀为事？且宜从权抚插，听候本爵督临查处；若是阳投阴叛，谲诈反复，度其事势，终难曲全，则宜密切相机乘间行事，务在获厥渠魁，不得滥加无罪。各官务要协和行事，既无参错牴牾，有乖共济之义；亦无贪功轻率，仰戾好生之仁”^②。经过包括“沿途涉历，访诸士夫之论，询诸行旅之口”的细致查证之后，他形成了处理思田事件的基本思想，遂于十二月初一日上书朝廷，表明了以下观点：

1. 岑猛父子虽有可诛之罪，但导致其举兵的原因，却在朝廷处置不当，“前此当事诸人亦宜分受其责”。两广军门，事专权重，“然而因循怠弛，军政日坏，上无可任之将，下无可任之兵，一有惊急，必须倚调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属者，而后行事。故此辈得以凭恃兵力，日增其桀骜。今夫父兄之于子弟，苟役使频劳，亦且不能无倦，况于此辈夷犷之性，岁岁调发，奔走道路，不得顾其家室，其能以无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则又功归于上，而彼无所与。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诱，与之为奸，其能以无怒且慢乎？”然则岑氏举兵，实朝廷举措失宜有以致之，而今欲加以叛逆之罪，兴大兵之役以大肆征剿，则尤为非宜，“且当反思其咎，姑务自责自励，修我军政，布我威德，抚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余力，则近悦远怀而彼将自服”。

① 王阳明：《案仰广东岭东岭南岭西海南海北及广西桂林苍梧左江右江等道行十家牌法》，《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

② 《湖兵进止事宜》，《全集》卷一八，622页。

2. 前地方当事官员所愤怒的，“不过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而已，其下属万余之众，固皆无罪之人也”。而岑氏父子既死，已然足以暴恶，卢苏、王受二人，“原非有名恶目，自可宽宥者也”。而前当事官员不胜卢、王之愤，至“不顾万余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数千里内骚然涂炭者两年于兹”，“徒尔兵连祸结，征发益多，财馈益殫，民困益深，无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而犹非但未能雪卢、王之愤，且已激民变之忧；然则大举用兵进剿卢、王，实际上并无必要，只不过为“当事者之过计”而已。原卢、王阻兵拒险之意，“亦不过畏罪逃死，苟为自全之计”，二人并未为患地方，因此亦并无民众公愤，“今驱困急之民，使裹粮荷戈，以征不为民患、素无仇怨之虏”，实际上乃是不得民心的，而这亦正是“人心之所以不奋，而事之所以难济”，以至于虽调“狼达土汉官兵”不下数万，对峙三月有余而犹“未能一决”的根本原因。

3. 从军事上来考虑，如果朝廷决意要对卢、王实施征剿，亦并非不可以侥幸成功，“然此必多调军兵，多伤士卒，多杀无辜，多费粮饷”。而这样的战争，实“不足以振扬威武，信服诸夷，仅能取快于二酋（指卢、王）之愤，而忘其遗患于两省之民；但知徼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艰于日后。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国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更何况“自用兵以来，所费银两已不下数十万，梧州库藏所遗，不满五万之数矣；所食粮米已不下数十万，梧州仓廩所存，不满一万之数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后之图乎？”

基于以上观点，阳明提出两点建议：

1. 赦免卢苏、王受二人之罪，开其自新之路。如卢、王二人犹自冥顽不化，谋叛滋事，然后从而杀之不迟。就目前而论，则宜“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以绝觊觎之奸，以弭不测之变”。

2. 思恩、田州不宜尽行改土归流之策，而应仍设土官，实行民族自治。“闻诸两省土民之言，皆谓流官之设，亦徒有虚名而反受实

祸。诘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土兵三千以听官府之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之反覆。”“且思恩自设流官以来，十八九年之间，反者五六起，前后征剿，曾无休息，不知调集军兵若干，费用粮饷若干，杀伤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为之忧劳征发。浚良民之膏血而涂诸无用地，此流官之无益，亦断然可睹矣。”“田州切邻交趾，其间深山绝谷，皆瑶、僮之所盘据，动以千百，必须仍存土官，则可藉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若尽杀其人，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自撤藩篱，非久安之计，后必有悔。”至于已设流官，而又改为土司，有人认为乃有政策改张之嫌，恐遭物议，阳明认为，存此观点的人，实为不忠之甚，“苟利于国而庇于民，死且为之矣，而何人言物议之足计乎！”^①

显而易见，阳明对思田之乱的原因及当时局势的分析，主要是从朝廷的政策及当事官员对事件处置的失误等方面来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省的。自十月以来，他对思田事实的多方调查与实地考察，使他更能贴近事实的真相，从而确信朝廷对岑猛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一概改土归流，未能顺应民心土俗，因此而激起民怨，自然错在朝廷，须予匡正；而所谓卢苏、王受之反，则尤非实情，其所以有用兵之举，正为政府官员因私心夹杂而未能出以公正廉明之心，夸张其事，举措过激，至动三省之兵大举征剿，正所谓：“思、田之事，本亦无大紧要，只为从前张皇太过，后来遂不可轻易收拾。所谓天下本无事，在人自扰之耳。”^②他在上书中的态度，因此亦就明确地包含了对于莅事官员之处事张皇失措以及朝廷民族政策之失当的严厉批评。

阳明上书之时，曾明言“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会同各官查审区处”，其书中所言，乃是其本人基于事实调查而形成的“肤见”，所以其疏既上，曾下兵部复议。兵部认为，“守仁之疏，是或一见。

① 《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全集》卷一四，462～466页。

② 《与黄宗贤》第三书，《全集》卷二一，831页。

以臣等观之，窃恐目前之效，片檄可收，事后之机，他时难将。且中途询访，未经会议，亦非的然处置之方。臣等因发其语意，所当审处者有五：田州既改土为流，因其叛乱而尽易之，朝令夕改，无以示信，须查照别府州事例，土流兼设而后可，一也。岑猛父子职级，因罪降革，不当仍复府制，宜降五品衔，用□人分管，庶法纪不致陵夷，二也。卢、王二酋，有名首恶，不应独使幸免；若果□□□□□□，投赴军门乃可行以不死藉候安置，三也。思恩府弘治末年建治，安定已久，非田州比，似未可一概改易，倘虑流官增□里甲，妄肆科罚，岂无法制可禁防乎？四也。本部题准事例，坐擒岑猛并斩首来献者，赏银有差，仍分给罪人财产，量授地方官职；今银两虽尝给赏，而财产未见议拨，无以激励有功，必照依功力轻重，分割地产给赏，一以杀雄据之势，一以藉忠勇之心，散财辑众，示兵家财急，五也。宜令守仁会同总领太监张赐、总兵官李旻、新旧巡按纪功御史，据理审明，详情度势，应抚应剿，或剿抚并行，不宜偏执；应土应流，与土流兼设，尤在得人。并将臣等所陈五事，酌量采行，务使德威相济，庶国体无损。”^①可见当时兵部对阳明关于思、田事件之处理的基本建议是持有异议的，兵部的批复得到了世宗的首肯，要求阳明与诸巡守等官公同会议，“奏下，尚书王时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优，所议必自有见。事难遥度，俟其会议熟处，要须情法得中，经久无患。事有宜亟行者，听其便宜，勿怀顾忌，以貽后患。’”^②同时，朝廷于十二月初二再命阳明兼理巡抚两广。^③

① 唐鹤徵：《王守仁》，《皇明辅世编》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524册，698页（上）。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10～1311页。

③ 十二月初二，奉圣旨：“王守仁暂令兼理巡抚两广等处地方，写敕与他，钦此。”阳明于嘉靖七年正月初二上疏，辞兼理巡抚两广之职，并举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南赣副都御史汪铤自代，朝廷不允（参见王阳明：《辞巡抚兼任举能自代疏》，《全集》卷一四，466页；《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12页）。按：朝廷于此时命阳明兼任两广巡抚，并非寄重之意，而实为杨一清与桂萼嫉妒阳明之才的一种手段。黄绾曰：“十二月，杨公一清与桂公萼谋，恐（阳明思、田）事完回京，复命见上，予与张公（孚敬）又荐之，上必留用，又题命公兼理巡抚。”（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5页）

十二月初五日，阳明到达平南县，与前都御史姚镛进行了公务交接。十七日，阳明差千户梅元辅、舍人王义、百户邓瓚、舍人赵楠等，捧令旗令牌及军门牌谕，前往田州、思恩地方，交与土目卢苏、王受，令其开读，与部下各兵夫知会。他交代梅元辅等“一到地方，交付牌谕讫，当时即回，毋得在彼迟留，生事扰人”^①。与此同时，约在二十二日前后，阳明与巡按纪功御史石金，广西右布政使林富，参政汪必东、邹轭，副使祝品、林大辂，佥事汪濬、张邦信、申惠、吴天挺，参将李璋、沈希仪、张经及前任副总兵都指挥同知张祐，并各军前用事等官，就思、田事件的最终处理方略公同会议，各官达成共识，认为：“思恩、田州之役，兵连祸结，两省荼毒，已逾二年。兵力尽于哨守，民脂竭于转输，官吏罢于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坏之舟，漂泊于颠风巨浪中，覆溺之患，汹汹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若必欲为战，且不论其是否能够成功，即便成功，亦有“十患”；而若罢兵以行招抚，则有“十善”。^②至于前当事

① 王阳明：《牌差千户梅元辅省谕田州思恩》，《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按：阳明牌谕的具体内容不详，但照前后情形来看，盖以达其招抚之意为主。

② 所谓“十患”：（1）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惟恐天下有一物不得其所，而于数万无辜之赤子，必欲穷搜极捕，使之噍类不遗，乃一伤天地之和，亏损好生之德，其患一也；（2）屯兵十万，日费千金，自始事以来，所费银米各已数十万，今若复欲进兵，至少须数月方能济事，即便约省其数，亦须银米各十余万，今梧州仓库所余银不满五万，米不满一万，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其患二也；（3）远近调集之兵数万，屯戍日久，人心思归，兼之水土不服，疫病死者一二万人，日有溃散逃亡之卒，今若复驱之锋镝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势，其患三也；（4）自用兵以来，两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衣食之道日穷，老稚辗转沟壑，若复进兵，又将废一年之耕，百姓饥寒切身，恐群起而为盗，其祸将有甚于思田之乱，其患四也；（5）如若进兵，须赖狼达士兵，而官军曾无一旅可恃之卒，是必长彼桀骜轻慢之态，益增其狂诞无忌之心，岑猛之僭妄，原由此积渐而成，是无异为诛一二逃死之遗孽，而养成十数岑猛，其患五也；（6）两广盗贼，其巢穴动以数千百计，军卫有司营堡关隘之兵，平常犹且不敷，若尽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其他巢穴若有动静，相煽蜂起，则必救之不能，其患六也；（7）军旅一动，馈运之夫，骑征之马，各以千计，皆取办于南宁诸属县，今百姓连年兵疲，困苦已极，而复以此重征，民命无以可堪，其不亡而不为盗者，则亦必死填沟壑而已，其患七也；（8）两省土官于岑猛之灭，皆有唇亡齿寒之感，故于卢、王之征剿，皆迟疑观望而莫肯效力，所恃惟湖广土兵，然湖广之兵，略顿道途，弃其家室，亦已三年，其劳苦怨郁，潜逃而归者相望于道路，是因一隅之小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且有忧祸隐伏其间，其患八也；（9）田州外捍交趾，内屏各郡，若必尽诛其人，则虽欲改土设流，亦已无民可

往往以进兵为利，阳明以为其间又有“二幸四毁”存焉。^①正是基于“十患十善”之洞察、“二幸四毁”之剖析，阳明认为：“今日之抚，利害较然，事在必行，断无可疑者矣。”^②因此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阳明至南宁府，旋即行文广西右布政使林富，下令将原先所调集的各处官军尽行解散，“放回休息，及时农种，防守城池”，“惟湖广永（顺）、保（靖）二司土兵，姑留听候，俟沿途夫马粮草完备，然后发回”^③。数日之内，解散各处军队数万余人。因归农各军兵士盘费缺乏，要将马匹、刀枪出卖，阳明又命动支军饷，将其尽数收回，既可补军队之需，又稍解回兵之乏，可谓军民两便。^④

卢苏、王受二人原无反叛之心，其四散逃窜、屯聚山林，本意

守，是无异于自撤藩篱，其患九也；（10）既以兵克，必以兵守，如是岁岁调拨，劳费无已，且一失制驭，变乱随生，反复相寻，祸将无极，其患十也。

其罢兵而行抚之“十善”：（1）活数万无辜之命，昭皇上好生之仁，荒鄙之民，无不感恩怀德，是为国家培养元气，其善一也；（2）息财省费，既可备他虞之需，而百姓无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3）久戍之兵得遂其思归之愿，而免于疾病锋镝之惨，无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4）散兵回农，尚得及时耕作，不废农时，其既获顾其家室，亦有更生之望，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其善四也；（5）罢散土官之兵，各归守其境，使其知朝廷有神武不杀之威，无所恃赖于彼，从而潜消其桀骜僭妄之心，其善五也；（6）远近之兵，各归旧守，虽穷边沿海之地，皆得修其备御，盗贼有所惮而不敢肆，无顾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7）息馈运之劳，省夫马之役，贫民解倒悬之苦，其善七也；（8）土民释免死狐悲之憾，土官无唇亡齿寒之危，湖兵遂全师早归之愿，其将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感慕德化，其善八也；（9）思、田遗民得还旧土，招集散亡，复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长，其将各保其境土而人自为守，捍外御内，中土得以安枕，其善九也；（10）土民既皆诚心悦服，不须复以兵守，而省调发之费，免军旅之劳，商旅得以通行，农夫得安其业，其善十也。详见《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全集》卷一四，470～473页。

① “下之人幸有数级之获，以要将来之赏；上之人幸成一时之捷，以盖日前之愆；是谓二幸。始谋请兵而终鲜成效，则有轻举妄动之毁；顿兵竭饷而得不偿失，则有浪费财力之毁；聚数万之众，而竟无一战之克，则有退缩畏避之毁；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议，则有形迹嫌疑之毁；是谓四毁。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毁惕于其外，是以宁犯十患而不顾，弃十善而不为。夫人臣之事君也，杀其身而苟利于国，灭其族而有裨于上，皆甘心焉；岂以侥幸之私、毁誉之末，而足以挠乱其志者！”（《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全集》卷一四，473～474页）

② 同上书，474页。

③ 《放回各处官军牌》，《全集》卷一八，624页。

④ 参见王阳明：《牌行南康府收买回军马匹》、《牌行南宁府收买回军刀枪》，《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

只在躲避官军的围剿而自保性命，阳明这一系列的果敢举措，尤其是尽数撤走各处防守之兵，无疑使他们看到了更生的希望。嘉靖七年正月初七，卢苏、王受遂遣其头目黄富等十余人前来军门，表达了接受招抚的愿望。阳明既对其表示抚慰，言明若能诚心投顺，则可免其一死，同时对卢、王发出告谕，敦促其率部投降。大意谓：

岑猛父子纵无叛逆之谋，即其凶残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诛之罪。今其父子党与俱已伏其辜，尔等原非有名恶目，本无大罪，至于部下数万之众，尤为无辜。今因尔等阻兵负险，致令数万无辜之民破家失业，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奔逃困苦，已将两年；又上烦朝廷兴师命将，劳扰三省之民，尔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尔等所以阻兵负险者，亦无他意，不过畏罪逃死，苟为自全之计，其情亦有可悯。……今特遣大臣前来查勘，开尔更生之路，非独救此数万无辜之民，亦使尔等得以改恶从善，舍死投生。牌至，尔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归复业安生。尔等即时出来投到，决当宥尔之死，全尔之家。若迟疑观望，则天讨遂行，后悔无及。限尔二十日内，尔若不至，是朝廷必欲开尔生路，而尔必欲自求死路，进兵杀尔，亦可以无憾矣。^①

卢苏、王受既得告谕，“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当即撤去守备之兵，尽率其众前来归降。阳明获悉以后，即于正月二十四日遣南宁府通判陈志敬前去省谕卢、王，“务要严束下人，经过地方，毋得侵犯人家一草一木。上紧星夜前赴军门，面听约束，毋得在途迟疑，心动远近，自取罪悔”^②。正月二十六日，卢苏率众4万余人，王受率众3万余人，俱至南宁府城之下，分为四营屯札。次日，卢、王皆囚首自缚，各与其头目数百人前赴军门，投表乞降。阳明善加抚

① 《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全集》卷一四，474～475页。

② 王阳明：《牌行通判陈志敬约束归顺目民》，《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

慰，同时认为：“苏、受二人拥众负险，虽由畏死，然此一方为尔之故，骚扰二年有余，至上烦九重之虑，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责罚，亦何以舒泄军民之愤？”于是下卢苏、王受于军门，各杖一百，以示惩罚。卢、王及其人众皆叩首悦服。二月初八日，阳明遣右布政使林富、前任总兵张祐等，分别督令卢、王各归其居，各复其业，“仍将该府城池廨宇等项，通行查估，堪修缉者即便修缉，应改移者即便改移，须创建者即便创建。合用木石砖瓦钉灰等项，各速买办措备”^①。至是，喧闹一时，震动朝野，迁延三年之久，调集四省之兵，虽屡次征剿而不效的思田之乱，阳明不折一矢、未伤一卒，而终告平息。二月十三日，阳明具《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将其辑抚平定思田之乱的前后始末上报朝廷。^②

思、田之事既已平息，对湖广永顺、保靖二宣慰司的土兵，阳明遂一面善加犒赏，一面将其遣回。考虑到“兵众在途，约束不严，未免骚扰”，遂行文沿途各府，要求对湖广回兵接程督押出境，并令二司领兵头目对其部属“在途各要严加铃束，各兵经过城市乡村，遵守朝廷法度、军门号令，不许纤毫骚扰人民”^③。事实上，自前都御史姚镛奏请调集三省之兵以来，大量军兵屯驻南宁府周围，已经严重干扰了当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军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

① 王阳明：《案行广西布政林富安插归顺目民》，《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按：该公移所署日期为“二月二十五日”，阳明《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则谓“二月初八”。

② 思、田平后，阳明曾在田州立碑刻石，以为纪念。其《田州立碑》与《田州石刻》当大抵为同时所作，《田州石刻》曰：“田石平，田州宁（民谣如此）；田水紫，田山迎（府治新向）；千万世，巩皇明。嘉靖岁，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后人。”戊子，即嘉靖七年。由此知《全集》将《田州立碑》一文系年于“丙戌”（五年），误。按：至嘉靖十三年（1534）秋九月，卢苏杀田州判官岑邦相，再叛，“乱复大作，两江震骇”。当时张璁、桂萼即谓阳明处理思、田之事不恰当，至是卢苏复叛，朝议汹汹再起，虽平情论史者，亦曰：“新建（阳明）寄托不终，识者微有憾焉。”（谷应泰：《诛岑猛》，《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三）然唐鹤徵曰：“世以文成（阳明）之处卢苏、王受为失策，不知文成无恙，则蠢兹小丑，必不复叛也。”（唐鹤徵：《王守仁》，《皇明辅世编》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524册，703页）

③ 王阳明：《牌委该道沿途督发湖广回兵》，《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参见《犒送湖兵》，《全集》卷一八，628页。

织，而湖兵安歇之家，骚扰尤甚。今虽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疮痍未起，困苦未苏，况自三月以来，天道亢旱，种未入土，民多缺食，诚可悯念！”阳明遂根据实际情况，对湖广土兵停歇之家，给予适当的实物补偿。^①

思恩、田州之乱，实际上原由朝廷对民族地区尽行改土归流之策所引起，而前诸当事官员不能对当地少数民族待以平等之心，平时既过度搜求盘剥，及至事起，则又举止张皇，夸大其事，措置失宜，致使事态愈演愈烈。今卢苏、王受虽已接受招抚，但要永保地方的长久安定，还必须要能够确保长治久安的政策。在正月二十七日的降表中，卢苏曾申明岑猛原无反叛情罪，故乞存其一脉，俯顺地方民情；而王受则称“自改立流官，开图立里，土俗不便，奈缘小人冥顽，不谙汉法，屡次攘乱不定”。因此阳明认为，要使思恩、田州得到长久的安定，便须顺应地方特殊的乡风民情，仍然实行民族自治。“自臣奉命而来，沿途询诸商贾行旅，访诸士夫军民，莫不以为宜从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无变；不然，反覆之患，终恐不免。及臣至此（指南宁），又公同大小各官审度事势，屡经酌量议处，亦皆以为治夷之道，宜顺其情。”^②思、田平复以后，阳明根据朝廷关于思、田“应设土官、流官，何者经久利便”的旨意，公同总镇、镇巡、副参、三司等官以及太监张赐、御史石金等，再次就应设土官、流官何者更能“经久利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仍宜设立土官以顺应当地之民情。正是出于思、田长久安定的考虑，阳明提出了“仍土官以顺其情，分土目以散其党，设流官以制其势”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不仅得到了当时各位议

① 参见《赈给思田二府》，《全集》卷一八，632页。其补偿的具体措施：凡停歇湖兵十名以上之家，各给米二石、咸鱼二十斤；停歇五名以上之家，各给米一石三斗，咸鱼十三斤；停歇五名以下之家，各给米一石，咸鱼十斤。至七月，广西大旱，青黄不接，阳明对宾州停歇湖兵之家给予赈济，“大家给米一石，小家给米六斗”；八月，赈济南宁府停歇湖兵之家，“乡官举人监生之家三石，生员每家二石”（王阳明：《告谕宾州军民》、《牌行广西左江道》，《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

② 《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全集》卷一四，745～746页。

事官员的一致赞同，并且亦获得了当地各阶层人民的普遍认可，阳明曾“备历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经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处之之道询诸其目长，率皆以为善；又以询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为善；又以询诸其顽钝无耻、厮役下贱之徒，则又亦皆以为善”。正是民众的这种广泛支持，使阳明确信其关于思、田之治的方针是得民心、顺民情的，亦是付诸实施并收到长久治效的，因此在嘉靖七年的四月初六日，他上书朝廷，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

1. “特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 阳明认为，今思、田已经抚平，为顺其土俗民情而设土官以为治，则在近数年内可保无患，但若长久以往，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强大，却亦难保其必无纵肆以至侵凌旁郡之患，所以必须特设流官知府，以在政治上给土官以必要的节制，并通过这种节制来逐渐化导其心。“其御之之道，则虽不治以中土之经界，而纳其岁办租税之人，使之知有所归效；虽不莅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袭授调发之权，使之知有所统摄；虽不绳以中土之礼教，而制其朝会贡献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虽不严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鸣，使之知有所赴诉；因其岁时伏腊之请，庆贺参谒之来，而宣其间隔之情，通其上下之义，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于温恤之中，消倔强于涵濡之内，使之日驯月习，忽不知其为善良之归。” 总之，对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管理，在实行民族自治的同时，又必须要体现出朝廷对它所拥有的政治统治权，并确保朝廷的政治监督能够有效施行。“至于思恩，旧已设有流官，但因开图立里，绳以郡县之法，是以其民遂乱。今宜照旧仍设流官知府，听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制御之道，亦如前论。

2. “仍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 田州原为岑氏世袭之地，长期以来，岑氏既有恩于当地人民，因此在岑猛既死之后，当地“无贤愚老少，莫不悲怆怀思，愿得复立其后”，而这亦正是当卢苏、王受登高一呼，当地人民便即“翕然蜂起，不约而同”而为之响应，

以至于“自兴兵以来，远近军民往往亦有哀怜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为”的根本原因。今田州既已平靖，为收到长久的治效，便须遂顺当地人民的这种意愿，仍设立田州土官知州，顺其民情而治以土俗，而“今日土官之立，必须岑氏子孙而后可”。阳明认为，田州土官知州的设立，对朝廷只会带来好处，“远近蛮夷见朝廷之所以处岑氏者若此，莫不曰（岑）猛肆其恶而举兵加诛，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录其先忠而不绝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复与其民，义之尽也；矜其冥顽而曲加生全，恩之极也。即此一举，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怀德，心悦诚服，信义昭布，而蛮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设，所以异于昔日之土官，而为久安长治之策也。”他同时提出，请以岑猛幼子岑邦相来担任田州的土官知州，从旧属于田州府的四十八甲之内割出八甲之地，作为田州的自治区域，“听以其土俗自治”。而在行政上，则隶属于田州的流官知府管辖。但这一土官知州的设立，只适用于田州，“至于思恩，则岑濬之后已绝，自不必复有土官之设矣”。

3. “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既立土官知州，若仍以各土目之兵尽属于知州，则长此以往，便难保其不生骄恣之态，“数年之后，必有报仇复怨、吞弱暴寡之事”，并且亦难以确保流官知府在政治上对它的控制权，“虽欲行其控御节制之道，施其绥怀抚恤之仁，亦无因而与各土目者相接矣”。因此，阳明认为，在田州设立土官知州以后，必须同时分设土官巡检司，以分散土官知州的势力。就田州而论，除以八甲之地属于土官知州以外，其余四十甲，每三甲或二甲立一巡检司，直接隶属于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检一员，听其各以土俗为治，世袭其职；凡赋税之征、力役之输，皆直接听命于流官知府，而不必经由土官知州。“如此，则土官既无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纵肆于为恶；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党比以为乱。此今日巡检之设，所以异于昔日之土目，而为久安长治之策也。”至于思恩，虽无土官知州之设，但亦须分设巡检司，既听其以土俗自治，又直接隶属于流官知府，以防其党比连属。这样，“则流

官之设，既不失朝廷之旧，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党，而土俗之治，复可以顺远人之情，一举而两得矣”。

阳明同时建议，由于田州既立土官，又设流官知府，所以应将田州府改名为“田宁府”。基于以上观点，他同时还举荐了田州、思恩流官知府可任知府的官员，并详细开列了思、田各土巡检司的所辖范围及其土目的姓名。^①

思、田的事态虽告平息，但因政事弊坏所导致的民生之凋敝，竟至于伤心惨目，不可忍睹。“思恩、田州连年兵火杀戮之余，官府民居悉已烧毁破荡，虽葺屋寻丈之庐，亦遭翻空发掘，曾无完土；荒村僻坞，不遗片瓦尺椽，伤心惨目，诚不忍见。各夷近已诚心投服，毁弃兵戈，卖刀买牛，见已各事田作；自后反侧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风景凄戚，生意萧条，忧惶困苦之余，无以自存。”^②面对这一触目荒凉的民生情景，阳明一方面惮其心力而竭尽安

① 以上详见《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全集》卷一四，479～491页。按：当时侍郎方献夫建言，宜于田州特设都御史一人，圣旨以为“田州是否设都御史在彼住札，还着王守仁议处，具奏守夺”。阳明曾于二月十五日上疏，认为：“思、田地方原系蛮夷瑶、僮之区，不可治以中土礼法，虽流官之设，尚且不可，又况常设重臣，住札彼地，岂其所堪？则其供馈之费，送迎之劳，必且重贻地方异日之扰，斯亦不可不预言之者。”但就目前形势而论，“暂设”是可以的，且主张将都台迁于田州，以监理思、田二府，但一切廩饩舆马之属，却只应俱于南宁府取办，银两于库贮内支給，而不一取于思、田二府。他同时举荐广西右布政使林富担当此职，认为他“慈祥恺悌，识达行坚，素立信义”，足以担此职责（参见《地方紧急用人疏》，《全集》卷一四，476～477页）。但从四月初六阳明《处置地方平复以图久安疏》中可知，朝廷并未采纳阳明的建议，而是升陈能为广西布政司右参政，掌田州府事，但陈能因与左参政严纘有隙，拒不到任。因此阳明又举荐广东化州知州林宽任田州知府，而朝廷仍不予理会。至五月二十二日，朝廷下旨，升林富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鄖阳等处，而思、田二府缉理官员，仍未确定。因此在五月二十五日，阳明又上《举能抚治疏》，再举广东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广按察使周期雍，以为皆才识过人，可以任重致远，但据《年谱》，阳明的这些建议乃“俱未果行”（参见《全集》卷三五，1314～1315页）。

阳明关于设立田州土官，以八甲属之，使岑氏世袭其职的主张，因未得到朝廷批复，他当时曾委田州土目黄宝、罗愿，将八甲兵粮等项暂行管理，要求依期完纳，并详细开列各甲兵粮之数。思恩府旧甲分各城头，阳明划定了各土巡检司所辖城头之数，亦委该府土目韦贤等人暂行分管，将每年兵粮照数完纳，亦详细开列各巡检司所应完纳的兵粮之数（参见王阳明：《牌行田州土目暂管岑氏八甲》、《牌仰思恩府土目分管各城头》，《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

② 《地方紧急用人疏》，《全集》卷一四，477页。

抚之能事，同时坚持认为，必须与民休息，不事干扰，使人民逐渐恢复其生产与生活的正常秩序，而收与时更化之益。唯其如此，地方才有可能保持其长久稳定与安宁。因此自二月思、田平复以来，阳明在对与政事民生相关的各种事务采取应对性措施的同时，又对地方的长久安定进行了细致的深入思考。特定的地域环境造成特定的生活方式，特定的生活方式则形成特定的文化传统。一种恰当而有效的政治管理体制，必须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情态相适应。阳明关于思、田的政治管理设计，是以民族地区必须“听其以土俗自治”的观念为核心的，这一观点较之朝廷不顾民族特性与乡俗之情而一概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无疑更具有政治上的前瞻性与进步性。

政治管理的无效，往往源于政府本身的弊病，而政弊则首在于人弊。因此阳明认为，“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幸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是以荡弛日甚”^①。为此，他利用他的职权，实行了各项肃清吏治的措施，对擅离职守、为奉承上司而靡费骚扰道路的各级官员，要求广西布政司一律禁革究治；对各级官僚不肯承担责任，事无巨细一律以公文上报，且浮华粉饰、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的文牍主义作风，阳明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裁革公文，“自今事关本院，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②。

现实主导思想，而思想则主导行为。就思、田的地域环境而言，其地处稍为偏僻，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风乡俗与汉族地区不同，阳明在强调政治管理必须因地制宜，以遂顺民情而维系民心为要义

① 《禁革轻委职官》，《全集》卷一八，630页。

② 《裁革文移》，《全集》卷一八，636页。

的同时，又认为教育的缺乏乃是人心之所以未醇的根源。“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①教育未遍，王化未洽，人心未启，良知未明，正是风俗浇薄、道德未厚而难以收到长久治效的重要原因。从嘉靖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驻南宁以来，数月之间，阳明在为平息思田事件而辛勤处理各项军政事务的同时，又时时亲临讲坛，必欲讲明心学，开明人心，而使风俗道德一归于醇厚，“近该本院久驻南宁，该府及附近各学师生前来朝夕听讲，已觉渐有奋发之志”^②，讲学的实效更使他确信人心之同然，实无古今壤地之分别，人心一旦奋发兴起，翕然向善，便如江河之水，沛然莫之能御。因此在二月思、田平靖之后，阳明便即兴办思、田学校，委任教官，以启风化之原；又批准宾州创办书院，以为诸生藏修之地；在南宁府创建敷文书院，延请原任监察御史、时为广东揭阳县主簿季本为之主教，又亲与诸生朝夕开讲。他要求各处教官须要对诸生循循善诱，“勤勤开海，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大抵学绝道丧之余，未易解脱旧闻旧见，必须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渐次改化”^③。

照理说来，思、田已经平复，各项善后措施已经制定，思、田二府的地方官员朝廷亦已另行委任，阳明在广西的主要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可以堂皇地向朝廷复命了，更何况他的病患亦日见沉重。但当时断藤峡、八寨等处部分少数民族的暴力活动，在干扰当地居民正常生活的同时，亦正在成为一种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并逐渐显示出对朝廷的威胁。当得到各地方官员关于其活动愈趋猖獗的奏报以后，阳明遂决意对断藤峡、八寨等处实施征剿。

①② 《牌行灵山县延师设教》，《全集》卷一八，633页。

③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15～1317页；王阳明：《批宾州建立书院申》，《阳明先生别录》卷一三《公移六》；《案行广西提学道兴举思田学校》、《牌行南宁府延师设教》、《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牌行灵山县延师设教》、《牌行委官陈逅设教灵山》等文，《全集》卷一八，631～635页。《广西通志》卷三八《学校·南宁府》：“敷文书院在府城内北，即县学旧址。明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建。万历十一年，兵备道陈纪修。明末毁，基址为兵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断藤峡（即大藤峡）与八寨相勾连，互为唇齿，地处广西腹地，东连大瑶山，西屏大明山，中亘黔江诸水，山峦阻险，江流湍急，地形复杂险峻，当地居民多为瑶族、壮族，其土俗颇与汉族有异。^①自明初以来，山寨罗布其间，往往据险以为屏障，四处骚扰居民，朝廷对其用兵，几无间断。宪宗成化元年（1465），左佥都御史韩雍率军 16 万，平断藤峡，由是而得稍安者二十年。正德五年（1510）以后，渐又故态复萌，为乱如初，总制都御史陈金以为：“诸蛮不过利鱼盐耳，乃与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鱼盐与之，诸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不得为梗。蛮初获利，听约，道颇通。（陈）金亦谓此法可久，易峡名永通。亡何，诸蛮缘此益无忌，大肆掠夺，稍不惬，即杀之。因循猖獗，遂负固大为寇。”^②嘉靖五年以来，因思、田乱起，朝廷用兵不已，顾此尚且不暇，断藤峡、八寨诸处活

① 谷应泰：《平藤峡盗》：“广西浔州（按：治在今桂平县）境，万山盘亘。中有水曰浔江，发源柳岩，东绕至浔，带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乐诸郡县，夹江诸山，皆嵒研嵒嶂，其最险恶地为大藤峡。盖有孤藤度峡涧，如徒杠也。南截浔水为府江，自藤峡至府江约三百余里，地惟藤峡最高。登藤峡巅，数百里皆历历目前。军旅之聚散往来，可顾盼尽也。诸蛮以此为奥区，桂平、大宣、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陇山据其右，若两臂然。峡北岩峒以百计，如仙人关、九层崖，其极险厄者。峡以南有牛肠、大姑诸村，皆缘江立寨。藤峡、府江之间为力山。力山之险，倍藤峡焉。又南则为府江，周遭盖六百里，其中多冥岩隙谷，历磴绝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则陨身数百仞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九，149 页（中））《广西通志》卷一五《山川·浔州府·桂平县》：“大藤峡在城北隅三十里弘石矶之下，弩滩之上，北通罗渚三洞，紫荆、罗运等三十六巢，中有七层楼，下有三妹洞，武宣、象州、平南、藤县、永安之山，环绕其外。峡岸有藤，大十余围，横生过江，日沉水底，夜浮水面，渡贼而南，以通龙山、八寨。成化间，韩襄毅公雍统兵剿之，砍其藤，夜复生，用秽物制之方断，遂服其党，易为断藤峡，立武靖州、弩碧二堡以镇之，后又不靖。都御史陈金以鱼盐啖之，稍稍受约束，乃改为永通峡。至嘉靖间，诸僭又据险为乱，王文成公守仁合师征之，赖以安戢。”又卷九五《诸蛮》：“十寨，旧称八寨，曰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钵、都者、罗墨、剥丁，后益以龙哈、啼咳，为十。其地东接柳州，西连东兰，南界思恩，北抵庆远，周环五百里，故迁江八所屯及上林三里民地，贼寨各千余人，四山环合，共据一险，犷悍难制。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讨思田，以降贼卢苏、王受愿自效，遂潜师分道，进捣八寨诸巢，破石门，贼始惊觉，大奔溃；乘势追蹙，俘斩二千余级。因议移卫置寨，未果，而守仁卒，贼猖獗如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谷应泰：《平藤峡盗》，《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九，150 页。按：韩雍（1422—1478），字永熙，长洲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明史》卷一七八有传。

动遂愈趋频繁，有愈演愈烈之势。至嘉靖七年三月，各府呈报断藤、八寨相互勾连为害地方之状，谓：“八寨瑶贼，积年千百成徒，流劫州县乡村，杀害良民，虏掠子女生口财物，岁无虚月，月无虚旬。民遭荼毒冤苦，屡经奏告，乞要分兵剿灭者，已不知几百十番。……盖缘此贼有众数万，盘据山谷，凭恃险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云、贵诸蛮，东北与断藤、牛肠、仙台、花相、风门、佛子及柳（州）、庆（远）、府江、古田诸处瑶贼回旋连络，延袤周遭二千余里，东掠西窜，南漂北突。近因思、田扰攘，各贼乘机出攻州县乡村，远近相煽，几为地方大变。”“断藤峡牛肠、六寺、磨刀等处瑶贼，上连八寨诸蛮，下通白竹、古陶、罗凤、仙台、花相、风门、佛子等峒各贼，累年攻劫郡县乡村，杀人放火，虏掠子女财畜，民遭荼毒，逃窜死亡，抛弃田业，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内，皆已变为盗贼之区。各处被害军民累奏请兵诛剿，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隐忍招抚，期暂少息，而各贼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与八寨及白竹、古陶、罗凤等贼乘势朋比连结，杀虏抢劫，月无虚旬；扇惑摇动，将成大变。”^① 阳明认为，断藤峡、八寨诸处“巢穴连络，盘据千百余里，凶悍骁猛，酷虐万姓，流毒一方，自来征剿所不能克；果已贯盈罪极，神怒人怨，……是诚两广盗贼之渊藪根柢，此而不去，两广盗贼终未有衰息之渐也”^②。故在必剿之列。而实际上，当二月思、田之事平靖以后，阳明就已经开始在暗中对断藤峡、八寨的征剿事宜进行着周密部署了。

卢苏、王受既接受招抚，为表达感激之意，曾表示愿听调遣，出力效死，阳明当时曾请其先归，各复其业，休息三个月。至二月下旬，阳明公开将湖广永顺、保靖二宣慰司的土兵遣回，且行文沿途各府，务要分程督押，不得骚扰居民。而这一公开的撤军行动实际上却成为一次军队调动，他暗中分别行文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宣

① 《征剿稔恶瑶贼疏》，《全集》卷一五，492～493页。

② 《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8页。

慰使，令其乘撤军之便，协同官军，按其所授方略，对断藤峡各寨发起袭击；又行文土目卢苏、王受，令其做好对八寨等处进行袭击的准备。三月，阳明发出了对断藤峡、八寨进行征剿的军事动员令，命左参将署都指挥僉事张经、左江道参议汪必东、僉事吴天挺、湖广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挥谢珮，督湖广土兵对断藤峡诸寨实施征剿；命留抚思恩、田州等处的广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总兵都指挥同知张祐督土目卢苏、王受所领各军，对八寨等处实施征剿。于是而有断藤峡、八寨之役。

断藤峡之役。三月二十三日，阳明分别示谕永顺宣慰使、统兵彭明辅，保靖宣慰使、统兵彭九霄，以及张经等官，令其所率各部在到达指定地点三日之前，“停军中途，候约参将张经，与同守巡各官集议，先将进兵道路之险易远近、各巢贼徒之多寡强弱，及所过良民村分之经由往复，面同各乡道（向导）人等，逐一备细讲究明白，务要彼此习熟通晓，若出一人。然后克定日时，偃旗息鼓，寂若无人，密至信地，乘夜速发，务使迅雷不及掩耳，将各稔恶贼魁尽数擒剿，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临阵斩获外，其余胁从老弱，一切皆可宥免”。同时强调：“今兹之举，惟以定乱安民为事，不以多获首级为功。各官务要仰体朝廷忧悯困穷之心，俯念地方久罗荼毒之苦，仍要禁约军民人等，所过良民村分，毋得侵扰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当以军法斩首示众。”^①其具体军事任务，则由永顺土兵进剿牛肠等寨，由保靖土兵进剿六寺、磨刀等寨。具体哨道分布如次：

1. 永顺土兵一支 800 人，由彭明弼、彭杰率领，随同领哨指挥马文瑞等所率官兵 250 人，从龙村埠冲旧湾上岸 45 里，径冲牛肠寨，从该寨前路而入；

2. 永顺土兵一支 400 人，由向永寿、严谨率领，随同领哨指挥王勋等所率官兵 250 人，从龙村埠上岸 60 里，径冲牛肠寨，从该寨

^① 《牌行领兵官》，《全集》卷一八，644 页。

后路而入；

3. 保靖土兵一支 200 人，由彭志明率领，随同领哨指挥唐宏等所率官兵 250 人，至龙村埠上岸 50 里，径冲六寺寨，从该寨后路而入；

4. 保靖土兵一支 200 人，由彭九霄率领，随同领哨指挥卞琚等所率官兵 250 人，至龙村埠上岸 45 里，径冲六寺寨，从该寨前路而入；

5. 保靖土兵一支 200 人，由彭明辅率领，随同领哨指挥张缙等所率官兵 250 人，至龙村埠上岸 50 里，径冲磨刀寨，从该寨后路而入；

6. 保靖土兵一支 200 人，由李英率领，随同领哨指挥刘宗本等所率官兵 250 人，至龙村埠上岸 45 里，径冲磨刀寨，从该寨前路而入。^①

各路军兵既分配停当，明确了各自的军事任务及进兵路线以后，阳明命各领兵官率部于四月初二日秘密到达龙村埠各指定位置登岸，约定于四月初三日拂晓（寅时）一齐向各指定位置进军，对各寨发起进攻。为防止战斗过程中误杀无辜，阳明要求各哨军兵佩戴黄布，良民村分则以旗帜标明。为防止敌人四处奔逃，又命参将沈希仪等督率军兵于各路口冲要之处严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机捕获，无容逃遁”^②。

对断藤峡各寨的军事行动，阳明完全采取了一种突袭的方式，事先可谓毫无征兆。他本人仍驻于南宁，并未表现出有任何军事行动的迹象；驻南宁的永、保土兵要撤回湖广，原须经过桂平县，因此虽有较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但表面上只是撤军，且又都偃旗息鼓，

① 参见王阳明：《牌行永顺宣慰司统兵致仕宣慰使彭明辅进剿方略》、《牌行保靖宣慰司宣慰彭九霄进剿方略》，《阳明先生别录》卷一四《公移七》。按：在实际作战时，各路官兵的人数可能有所增加，每哨兵力均增加至 1 000 余人（详见《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0 页）。

② 王阳明：《牌行左江道守巡官布发旗号》、《牌行参将沈希仪督兵防捕》，《阳明先生别录》卷一四《公移七》。

并未引起断藤峡各寨的任何警觉；而所有官军的调动，亦都是秘密进行的。“各贼先防湖兵经过，各将家属生畜驱入巢后大山潜伏；贼首胡缘二等各率徒党团结防拒。然访知本院住札南宁，寂无征剿消息，又不见调兵集粮，而湖兵之归，又皆偃旗息鼓，略无警备，遂皆怠弛，不以为意。”正是在敌人这种毫无戒备的松懈状态之下，阳明对断藤峡的征剿进行得非常顺利。四月初三凌晨，当各路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之时，敌方各寨均毫无防备，措手不及，“突遇官兵四面攻围，各贼仓惶失措，然犹恃其骁悍，蜂拥来敌”。但这种毫无准备的抵抗略无成效，官兵首战告捷。“当阵生擒斩获首贼并次从贼徒、贼级六十九名颗，俘获男妇及夺回被虏人口、牛只、器械等项数多。余贼退败，复据仙女大山，凭险结寨”，试图依凭自然天险而作进一步的抵抗。“至初四日，（官兵）复破贼寨，当阵生擒斩获首贼并次从贼徒、贼级六十二名颗。初五日，复攻破油砢、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斩获首贼及次从贼徒、贼级七十九名颗，俘获男妇、牛只、器械等项数多。余贼奔至断藤峡、横石江边，因追兵紧急，争渡覆溺死者约有六百余徒。官兵复从后奋勇追杀，当阵生擒获斩首贼及次从贼徒、贼级六十五名颗，俘获男妇、牛畜、器械等项数多。各贼间有一二漏网，亦皆奔窜他境。至于本月（四月）初十日，遍搜山峒无遗。”^①各路军队遂撤回浔州府屯扎休整。

十一日深夜，阳明对各路军队进行重新部署，要求一鼓作气，连续作战，征剿仙台、花相等寨，以根绝断藤峡一带的多年匪患。^②他命永顺各土兵从盘石、大黄江登岸，进剿仙台、花相等处；保靖

① 《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0～501页。

② 阳明原已充分考虑到牛肠、六寺等寨既破以后的军事形势，因此对仙台、花相诸寨的征剿事宜，他实际上早在三月二十四日即已作出整体部署，尝示谕左江道守巡、守备等官，以及参将张经等领兵官，待牛肠等寨既已破荡之后，即督同湖兵进剿白竹、古陶、罗凤诸寨，分兵速进，“纵使诸贼先已闻风逃避，亦要严兵深入，捣其巢穴，以宣明本院声罪致讨之义。一剿不获，至于再；再剿不获，至于三，至四，至五，至绝终祸根”。但对于已经招安的山寨，则应区别对待，毋得滥杀，“不得以今次斩获之少，或遂滥及已招贼巢，亏失信义，所损反多。经过良善村分，尤要严禁官土军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军法斩首示众”（《行左江道剿抚仙台白竹诸瑶牌》，《全集》卷三〇，1104页）。

各土兵从乌江口、丹竹埠登岸，进剿白竹、古陶、罗凤等处。约定于十三日拂晓（寅时）各军一齐进击。对仙台等寨作战，因敌方已有所备，因此亦显得更为艰难，但在各路土兵官兵的强大攻势之下，各寨均迅速瓦解。“各贼闻知牛肠等巢破灭，方怀疑惧，谋欲据险自固。贼首黄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党，沿途设伏埋签，合势出拒。官兵聚进，翕如风雨。各贼虽已夺气，然犹舍死冲敌，比之牛肠等贼凶恶尤甚。各该官兵奋勇夹击，争先陷阵，生擒斩获首贼及次从贼徒、贼级四百九十名颗，俘获贼属男妇、牛畜、器械等项数多。各贼奔入永安边界，地名立山，恃险结寨。当蒙摘调指挥王良辅并目兵彭恺等，于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并进，奋勇争先，四面仰攻，贼乃败散，当阵生擒斩获首贼及次从贼徒、贼级一百七十二名颗，俘获男妇、牛畜、器械数多。余贼远窜，追杀无遗。”^① 而此同时，奉命于各交通要道把截奔逃之敌的沈希仪等，则将各逃窜之敌擒杀无遗。至此，断藤峡之役宣告基本结束。

八寨之役。八寨与断藤峡虽相互勾连，但地域更广，地形更为险要复杂，山寨更多，因此作战亦就更为艰难。八寨之役虽然是作为整体的八寨断藤峡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阳明是将它作为整体来设谋运筹的，但由于作战的主力军队以及征剿的对象均有不同，战略原则及用兵的方法亦有差异，因此在阳明的军事谋划之中，八寨之役实际上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役。是役始谋于三月下旬，实际部署于四月之初，实施于四月下旬，而基本结束于六月中旬。

阳明认为：“八寨之贼，既极骁猛，而石门天险，自来兵不能入，此可以计取，未易以兵力图者。”因此在思想上麻痹敌人，使其战斗意志处于松懈状态，再施以优势兵力予以突袭，乃是可能取胜的唯一方法。在此之前，湖广土兵屯驻南宁，八寨诸处已有所备，作战时机并不成熟；既而卢苏、王受接受招安，解散兵勇，各归务农，而湖广土兵亦尽数撤走，未显示出任何用兵的迹象，其战备遂

^① 《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1～502页。

转趋松弛懈怠；继又“复出剽掠”，实则试探官府对其举动的反应，而阳明则若视而不见，听其出没，其意态遂愈加“放纵懈怠，谓我不复能为”。至此，阳明的欲擒故纵之策已收到明显效果，因此他认为，对八寨实施征剿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正天亡之时，机不可失”^①。四月五日，阳明遂召集右布政使林富、副总兵张祐至南宁，对其面授机宜，令督卢苏、王受所领兵军，实施对八寨诸处的征剿。同时要求各府、州、县着实落实“十家牌法”，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清查，“不论军民，在城在乡，逐一挨查，务着实举行，仍须责令勤加操演”^②。

田州土目卢苏、思恩土目王受所率当地兵士，不仅熟悉当地的山川地形，且皆为骁勇惯战之人，构成了征剿八寨的主力。卢苏等率军3 000名，王受等率军2 000名，韦贵等率军1 100名，各于四月二十二日夜结集于新墟，听阳明密授方略，约定于次日清晨（卯时）按照各自的进军路线，同时对各寨发起攻击。当天夜里，各哨军队秘密运动至各指定位置，“乘夜衔枚速进，所过村寨，寂然不知有兵”。二十三日清晨，战斗开始，阳明的突击性战术明显奏效。当各军突破石门天险，杀入敌寨之时，“贼方惊觉，皆以为兵从天降，震骇溃窜，莫知所为。我兵乘胜追斩，各贼且奔且战。薄午，四远各寨骁贼聚众二千余徒，各执长标毒弩，并势呼拥来拒，极其强悍。我兵鼓噪奋击而前，声震岩谷，无不（以）一当十。贼既失险夺气，而我兵愈战益奋，贼不能支，遂大奔溃。当阵生擒斩获首贼及次从贼徒、贼级二百九十一名颗，俘获男妇、畜产、器械数多。贼皆分阵聚党，奔入极高大山，据险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蹙围剿，然岩壁峻绝，我兵自下仰攻，战势不便；贼从巅崖发石滚木，多为所伤。于是多方设策，夜发精锐，掩其不备。二十四日，我兵复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斩获首贼及次从贼徒、贼级共一百三名颗，俘获数多。二十八日，复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斩获首贼及次从贼徒、贼级共一

① 《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5页。

②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全集》卷三〇，1107页。

百四十六名颗，俘获数多。五月初一日，复攻破古钵等寨，生擒斩获首从贼徒、贼级一百二十七名颗，俘获数多。初十日，复攻破都者峒等寨，斩获首从贼徒、贼级一百四名颗，俘获数多”^①。

经过半个多月的一系列艰苦战斗，敌方各主要山寨已为破荡，八寨之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敌方各寨主要首领尚未擒获，四处溃奔之敌亟须追剿，官军日渐滋长的骄纵之气亟待遏制，士气亟须振作，军事形势仍然严峻。五月一日，阳明曾示谕副总兵张祐，谓：“今据头目卢苏、王受等禀报，皆已攻破各寨，斩获贼级，虽未日久，苦亦无多；且又未见获有真正首恶，中间恐有容隐脱放情弊，合行戒谕督促。”要求张祐：“上紧亲行督谕各头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协力齐心，竭忠报效，务图剿灭，以绝祸根。”^②对各处溃奔藏匿之敌，阳明行文思恩府同知桂鋈、南丹卫指挥程万全、指挥孙继武等人，要求必须乘胜务加清剿，“看得八寨瑶贼，稔恶多年，攻劫乡村，杀害人民，掳掠财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恶贯满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荡，分崩离析，如失林之梟，投置之兔，迷魄丧魂，正可搜猎而尽，是乃上天欲亡此贼之秋，若不乘此机会，奉行天讨，以雪百姓之冤，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祸，存其遗孽，复为他日根芽，此岂为民父母之心乎？”因此，务须“晓谕各良善向化村寨，务将逃避各贼，尽数擒斩，以泄军民之愤，获功解报，一体给赏；若是与贼通谋，容留隐蔽，访究得出，国宪难逃。如是各贼果有诚心悔罪，愿来投抚立功报效者，亦准免其一死，带来军门抚谕安插”^③。既“访得八寨后路潜通柳州，又有一路与韦召假贼巢相通，皆未委虚的，合行密切查处”。遂又密谕参将沈希仪，令其即行密访，若果有潜通贼路，则可相机行事，“或从彼地掩袭韦召假贼巢，就

① 《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2页。

② 《戒谕土目》，《全集》卷一八，645页。

③ 《追捕逋贼》，《全集》卷一八，646页；参见王阳明：《牌行南丹卫指挥程万全搜捕逋贼》、《牌行指挥孙继武搜捕逋贼》、《牌仰千户丁文盛等搜捕逋贼》等，《阳明先生别录》卷一四《公移七》。

从彼巢径趋八寨后路；或以迎候本院为名，径来宾州督调别项军兵，就从八寨取道。然须将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导，可以必胜”^①。由于初期战斗进展较为顺利，军队内部滋长骄淫之风，士气渐趋萎靡，阳明认为，各部“既已攻破贼巢，分屯其地，则其搜捕溃散之贼，当如探囊取物，数日可尽。今已半月有余，尚未见有成功，气势日见萎靡，此必军中收有贼巢妇女等项，贪恋女色财物，不肯割舍脱离，奋勇杀贼，苟且偷安，遂致兵气日衰，军威不振，若诸贼闻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袭不备，我军必致挠败”。为此，他又行文原任户部郎中、现降徐闻县县丞林应骢，令其携带令旗令牌，前往会同总兵监军等官及田州府知府林宽，监督卢苏等各部土目；令原任监察御史、今降揭阳县主簿季本，携带令旗令牌，前往会同总兵监军等官及思恩府同知桂鋈，监督王受等各部土目，分别对各兵营进行巡视检阅，务须严明军纪，“将各贪恋女色财物、不肯奋勇杀贼头目兵夫，姑且免其罚治，责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斩，旬日之内功成班师，仍将前项妇女财物照名给还，亦不追失前罪。若有贪恋女贼违犯军令，仍前不肯效力者，仰即遵照军门号令，当时斩首示众，断毋姑息容忍，致败三军大事”^②。

军事上的各项重新部署及整肃军纪的措施，简切严明，旋即奏效。五月十二日以后的数日当中，指挥孙继武等官率军追剿各寨逃奔之敌，“斩获首从贼徒、贼级九十八名颗”；指挥程万全等官率军搜剿截捕各寨奔敌，“斩获首从贼徒、贼级九十一名颗”；桂鋈督思恩土目分剿铜盆等寨，“斩获首从贼徒、贼级一百九十二名颗，俘获数多”；通判陈志敬等率军搜剿大明山等处奔敌，“斩获首从贼徒、贼级八十六名颗”。五月十七日，卢苏、王受等土目率军攻破黄田寨等处，“斩首从贼徒、贼级三百六十二名颗，俘获数多”；六月初七，卢、王又攻破铁坑等寨，“斩获首从贼徒、贼级二百五十三名颗，俘获数多”；指挥康寿等则于各处把隘搜截，“斩获首从贼徒、贼级四

① 《行参将沈希仪计剿八寨牌》，《全集》卷三〇，1108页。

② 《牌行委官林应骢督谕土目》，《全集》卷一八，647页；王阳明：《牌仰委官季本》，《阳明先生别录》卷一四《公移七》。

十八名颢”^①。至此，八寨诸处各寨尽皆荡灭，实已无巢可破；敌人早已溃不成军，四处奔突。阳明遂令各军追剿夹击，务必根绝。其最后一战，驱敌残余部众于横水江，景象极其惨烈：

各贼始虽败溃，然犹或散或合，至是见其渠魁骁悍，悉就擒斩，遂各深逃远窜。其稍有强力者尚一千余徒，将奔往柳（州）、庆（远）诸处贼巢。我兵四路夹追，及之于横水江。各贼皆已入舟离岸，兵不能及。然贼众船小，皆层叠而载，舟不可运；复因争渡，自相格斗，适遇飓风大作，各船尽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仅二十余徒而已。我兵既无舟渡，又风雨益甚，遂各归营。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剿，各贼茫无踪迹。又复深入，见崖谷之间颠堕而死者不可胜计，臭恶薰蒸，不可复前。远近岩峒之中，林木之下，堆叠死者男妇老少大约且四千有余。盖各贼皆仓卒奔逃，不曾赍有禾米，大雨之中，饥饿经旬，而既晴之后，烈日焚炙，瘴毒蒸炽，又且半月有余，故皆糜烂而死。^②

其惨相令人不忍细思。其时天气已趋炎热，尸体枕藉山间，溪水尽被污染，“暑毒日甚，山溪水涨，皆恶流臭秽，饮者皆成疫痢”。经此一役，阳明断定“八寨之贼略已荡尽，虽有脱网，亦不能满数十余徒矣”。“因见各贼既已扫荡，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师而出。”^③ 征剿八寨之役遂告基本结束，时当六月中旬。^④

断藤峡、八寨之役，共计“擒斩获三千五名颢，俘获贼属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夙称鸷猛强悍且屡剿不绝的断藤峡、八寨诸山寨，不数月间，竟归灰飞烟灭；朝廷百年之患，一朝铲除殆尽。阳明对此是颇感快慰的：

①② 《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3页。

③ 同上书，504页。

④ 征剿八寨的集中军事行动虽于六月中旬宣告结束，但对余敌的追剿则持续到了七月。六月十八日，阳明仍调发武缘县乡兵1000余人搜剿八寨余敌（参见王阳明：《调发武缘乡兵搜剿八寨残贼牌》，《全集》卷三〇，1116页）。后又调兵再加清剿（参见王阳明：《牌委指挥赵璇留剿余贼》（六月）、《牌行副总兵张祐搜剿余巢》（七月）等，《全集》卷一八，648页）。按：至嘉靖十五年（1536）夏六月，断藤峡盗贼再起，至十八年春，兵部侍郎蔡经率军平之（参见谷应泰：《平藤峡盗》，《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九）。

参照断藤峡诸贼，连络数十余巢，盘亘三百余里，彼此犄角结聚，慰险稔恶，流劫郡县乡村。自国初以来，屡征不服；至天顺年间，该都御史韩雍统兵二十余万来平两广，然后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贼复攻陷浔州，据城大乱。后复合兵攻剿，兼行招抚，然后退还巢穴。自是而后，官府曲加抚处，或时暂有数月之安，而肖不如意，辄复猖獗，杀掠愈毒。盖其祖父以来，狼戾相承，凶恶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来，官府剿抚之计益穷，各贼残毒之害日甚，盖已至于不可支持矣。至于八寨诸贼，尤为凶悍猛恶，利鏢毒弩，莫当其锋；且其寨壁天险，进兵无路。自国初韩都督（雍）尝以数万之众围困其地，亦不能破，竟从招抚；其后屡次合剿，一无所获，反多挠丧；惟成化年间，土官岑瑛能慑服诸瑶，尝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斩获二百余级；已而贼势大涌，力不能支当，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罢。自是而后，莫可谁何，流劫远近，岁无虚月，民遭荼毒，冤苦无所控吁。自思、田多事，两地之贼相连煽动，将有不可明言之变，千里之间，方尔汹汹朝夕。

今幸朝廷威德宣扬，军门方略密授，因湖广之回兵而利导其顺便之势，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报效之机，翕若雷霆，疾如风雨，事举而远近不知有兵兴之役，敌破而士卒莫测其举动之端。两地进兵，各不满八千之众，而三月报绩，共已逾三千之功。盖其劳费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斩获加于大征三之二。远近室家相庆，道路欢腾，皆以为数十年来未见其斯举也。^①

① 《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集》卷一五，506～507页。按：阳明对断藤峡、八寨的征剿，就他本人的观点而言，原只在为当地人民解倒悬之苦，是拯救生灵于痛苦困厄的不得已之举，他曾一再与友人道及：“近者八寨、断藤峡之役，实以一方涂炭既极，不得已而为救焚之举，乃不意遂获平靖。”（《与黄宗贤》第五书，《全集》卷二一，832页；《寄翟石门阁老》，《全集》卷二一，835页）八寨之役结束之后，阳明曾作诗云：“见说韩公（按指韩雍）破此蛮，貔貅十万骑连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尔收功一月间。岂是人谋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师还。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平八寨》，《全集》卷二〇，798页）从诗中不仅可见他当时因战争的胜利所带来的快慰心态，且亦可见他“穷搜极讨非长计”的基本观点。下文所述其《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中的建议，即是其“须有恩威化梗顽”的具体措施。

六月初十，阳明对永顺、保靖二司土兵赏银二千两，以嘉其征剿断藤峡的劳绩；又分别对前线督兵诸官以及永顺、保靖二司宣慰使彭明辅、彭九霄及各领兵土目进行了嘉奖；七月初三，对卢苏、王受进行犒赏。^①七月初十，阳明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向朝廷汇报了征剿八寨、断藤峡的实况，并为各有功官员、土目请功。

七月十二日，阳明又上《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提出了他对八寨、断藤峡一带保持长久安宁的基本设想。按照他的观点，思恩、田州“两府人民今皆复业安居，化为无事宁靖之地，自此可以永无反覆之患，而免于防守屯息之劳矣。惟是八寨及断藤峡诸贼，积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内，涂炭已极。……仰赖神武威德，幸已剪灭荡平；一方倒悬之苦，略已为之一解。但将来之患，不可以不预防，而事机之会，亦不可以轻失。臣因督兵，亲历诸巢，见其形势要害，各有宜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以断其脉络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渐复，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②。有鉴于此，他提出了五项建议：

第一，移筑南丹卫城于八寨。阳明认为：“八寨之贼实为柳（州）、庆（远）诸贼之根柢。盖其东连柳州陇蛤、三都岭、三北四等处，贼峒以数十；北连庆远忻城、东欧、莫往、八仙等处，贼峒亦以数十；西连东兰等州及夷江、土者等处，贼峒以十数；南接思恩及宾州上林县诸处，贼村亦以十数。各处贼巢虽多，其小者仅百数人，大者不过数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贼巢穴皆有山溪之限，险厄之守，不相通和。……惟八寨之贼，每寨有众千余，四山环合，同据一险；无事则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数千之众皆不纠而聚，不约而同，不谋而合。故名虽为八，实则一寨，此八寨之贼所以势众力大，而自来攻之有不能克者也。……故群贼之于八寨，犹车轮之有轴，树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则群贼决无衰息之期也。今幸

① 参见《行左江道犒赏湖兵牌》、《奖劳督兵诸官牌》、《奖劳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行右江道犒赏卢苏王受牌》等，《全集》卷三〇。

②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全集》卷一五，510页。

八寨悉已破荡，正宜乘此平靖之时，据其要害，建置卫所，以控馭群贼。”因“周安堡正当八寨之中，四方贼巢道路之所会”，故宜于此处筑城，移南丹卫于其中，“此镇一立，则各贼之脉络断，咽喉绝，自将沮丧震慑，其势莫敢轻动；稍有反侧者，据险出兵而扑之，夕发而旦至，……此真破车轮之轴，而诸辐自解；伐树木之本，而众干之枯。不过十年，柳（州）、庆（远）诸贼不必征剿，皆将效顺而服化矣”。

第二，改筑思恩府城于荒田。思恩府旧治在桥利，地处万山之中，峰峦阻隔，水道不通，居民所需鱼盐诸货，皆远出展转求买，往返旬月，十不致一，生资极为匮乏，而民心疏于官府。因此阳明认为，宜迁府治于荒田，此地距桥利 60 里，“其地四野宽衍，皆膏腴之田，而后山起伏蜿蜒，数为平原，环抱涵蓄，两水夹绕后山而出，合流于前，屈曲数十里，入武缘江，水达于南宁，四面山势重叠盘回，皆轩豁秀丽，真可以建立府治”。他确信该地为新府治的最佳选址，所以已“为之景定方向，创设规划。诸夷来集，莫不踊跃欢喜，争先趋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鋈督令各役择日兴工”。新府治之立，因其“既通江水，商货自集，诸夷所须，皆仰给于府，朝夕络绎，自然日加亲附归向”。就政治而言，“则该府之官自可因城头巡检之制，循土俗以顺各夷之情，又可开图立里，用汉法以治武缘之众”，是为“夷夏交和，公私两便”，故“改筑思恩府城于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势不容已之事”。

第三，改凤化县治于三里。凤化县属思恩府，然旧无城郭县治廨宇，故凤化之在思恩，徒寄虚名，而实无县治。上林县三里地方，乃在八寨之间，其地平广博衍，四山环合，中有两水，其间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阳明认为，是为创设县治的理想场所，既可据险以控扼四围交通，可因其良田以生聚居民，又可与思恩府治“有无相须，缓急相援，气势相倚；流官之体统益尊，则土俗之归向益谨；郡县之政化日新，则夷民之感发日易。固有不可尽言之益也”。

第四，添设流官县治于思龙。思龙属南宁府宣化县，自宣化

至田州，逆流需十日之程；自思龙至田州，亦尚有五六日之程。道远山长，颇不利政教之行，“其间错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穷乡小民畏见官府，故其粮差多在县之宿奸老蠹与之包团，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胜迫胁，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从而暴之，地日凋残，盗贼日起”。阳明认为，宜新设一县，以杜宿奸，以利民生，以制四围之交通。他寻得一村，名为那久，“其地亦宽平深厚，江水萦回环匝，傍有一江来会，亦正于此合流。沿江民居千余家，竹树森翳，烟火相接”，亦为四通之要道，所以宜割宣化县思龙等地，添设县治，非但“以便穷乡小民之粮差赋投，亦足以镇据要害，消沮盗贼”。新县即名为思龙，改属田州府，“平居无事，商货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经，皆流官衙门，从门庭中度兵，更无阻隔之患。此亦安民经国之事，势所当为者也”。

第五，增筑守镇城堡于五屯。断藤峡诸寨剿平以后，当时守巡各官认为应调土、汉官兵数千驻守浔州，以防不测之变。阳明认为，从政治的有效性而言，对各寨原应剿抚并行，恩威兼济。“盖破灭穷凶各贼者，所以惩恶，而抚恤向化诸瑶者，所以劝善。今惩恶之余，即宜急为劝善之政，使军卫有司各官，分投遍历向化村寨，慰劳而存恤之，给以告示，赐以鱼盐，因而为之选立酋长”，以坚其为善之志。今对向化村寨不加抚恤，而反屯兵以威胁，则民必心怀惊疑，若再惑于奸人之煽惑，则又必勾结相连而起，“近年以来所以始平而变复作，皆迷误于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贼新破，势决未敢轻出，虽屯数千之众，不过困顿坐食，徒秽扰民居，耗竭粮饷，而实无益于事”。因此，他认为“惟于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创立一镇以控制之，此则事理之所当行，亦正宜乘此扫荡之余而速图之者。”断藤峡周边各寨，“惟五屯正当风门、佛子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处瑶贼，最为紧要之区，宜设一镇，以控御远迩”。如此则既可以制御周围各寨，又可施以政教之化，善既劝而恶既惩，则政教通达而民人自化，“所谓谋成而敌自败，城完而寇自解，险设而敌自

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为之，而亦事势之不可已焉者也”^①。

从阳明的这些建议中可以看出，关于八寨、断藤峡一带如何才能保持其经久安宁的问题，他并不是纯粹从军事防御的维度来考虑的，而是同时亦考虑到了人民生活可供利用的环境资源是否丰厚及其交往的便利程度，他相信只要人民有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自然环境，那么其生活资料的来源就不会过于艰难，生产与产品交换的秩序就会自然地建立起来，生活系统就能够长久持续，人心亦就易于被导向善的路途。政府的职能根本不是要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并在这种对立之中体现其至上的权威，而更在于以诚信对待人民，为民众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与生产的环境，如此则民将怀德而自然向化。因此，当战争结束以后，广西地方各巡守诸官提出在浔州驻守重兵，对八寨、断藤峡一带实施军事威慑，阳明对此是竭力反对的。^②但因八寨的地理环境过于复杂，交通阻隔，政教难行，因此从

① 以上五项建议的引文详见《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全集》卷一五，510～519页。按：阳明该疏既达于朝廷，其所议五事，当时得到兵部的支持，而户部则申请复议。广西右布政使林富持议稍异，不同意阳明第一项关于“移筑南丹卫城于八寨”的建议。林富同样认为：“八寨贼巢实为柳（州）、庆（远）、思恩各贼渊藪。今幸征剿之，余党类衰息，正宜乘据要害，控扼吭背，诚有如王守仁所陈者。但动众设险，要合人情，尤先地利。”从地利方面来考虑，他认为于八寨筑城有数项不便：“八寨地方，顽山绝地，商贩不通，一也；瘴疠疫疾，人无固志，二也；生理无聊，易驱从恶，三也；凌险孤居，缓急无援，四也。”是故“迁南丹卫于八寨，非计之得也”。但另一方面，南丹卫设在宾州，实不足以控制八寨，所以迁移南丹卫又势在必行，若为地方长久考虑，“惟在迁南丹卫于三里耳。三里之地，即王守仁所议改设凤化县者也。地属宾州之上林县，平旷博衍，多良田茂林，南连八寨，西达思恩，形势险要，可耕可守。守仁已备言之矣。但设县则割宾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顾此而失彼也；迁卫则守宾州之险以制八寨，以援思恩，是一举而两得也”。故“迁南丹卫于三里，于事体最为得也”（林富：《覆议》，《广西通志》卷一〇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既平八寨、断藤峡之后，当时各官认为须在浔州屯驻重兵以为防守，阳明认为，这种观点，“始观论议，似亦区画经久之谋；徐考成功，终亦支吾目前之计。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蛮之道，攻心为上。今各瑶征剿之后，有司即宜诚心抚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调狼卒，凭借兵力以威劫把持，谓为可久之计，则亦未矣！殊不知远来客兵，怨愤不肯为用，一也；供馈之需稍不满意，求索訾讟，将无底极，二也；僦居民间，骚扰浊乱，易生仇隙，三也；困顿日久，资财耗竭，适以自敝，四也。欲借此以卫民，而反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贼，而反为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因此，他要求各官须“亲至已破贼巢各邻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抚恤，给以告示，犒以鱼盐，待以诚信，敷以德恩”。至于平时安民治盗之法，则莫善于“十家牌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虚文抵塞，莫肯实心推求举行。诚使此法一行，则不待调发而处处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养而人人皆兵。无馈运之劳而粮饷足，无关隘之设而守御固，习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弥广而功弥大。其视前项区处摘调之兵，有虚名而无实用，可张皇于暂时而不可施行于永久者，劳逸繁简，相去远矣”（王阳明：《答守道留兵防守议》，《广西通志》卷一〇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目前的情况来考虑，将南丹卫移于八寨，筑凤化城于三里，藉以制扼四围交通，阻断各寨的相互勾连，则又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制御各寨死灰复燃之可能性的有效措施。因此，尽管他的上疏尚未得到朝廷的肯定性批复，在当年的八月，他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两项工程了。他行文右江道，估算了建筑城垣、起造公廨等项的造价，移立南丹卫需银 3 645 两，筑凤化城需银 3 176 两；南丹卫需米 10 000 石，凤化县 8 000 石，每石银三钱，共需银 5 400 两。他批准从南宁府库贮军饷银内给付上项银两，先预支南丹卫 1 500 两，凤化县 1 200 两。同时要求该道守巡官要不时亲往调度督促，“工程务在精致坚牢，永久无坏”，而工期则需抓紧，“当兹盗贼荡灭之余，况又秋冬天气，正可及时工作。各官务在上紧催督，昼夜鸠工，不日而成，一则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则可以不妨来岁之农作”^①。

在八月份，阳明的主要精力仍耗费在战争之后当地人民生活秩序的恢复以及各项地方军政事务的处理方面，他量力对南宁府进行了赈济，批复了关于思恩府城的建筑以及五屯、周安堡的防守等事宜，又对归顺的新民发布了旨在劝善惩恶的告谕，鼓励他们安居乐业，并且亦犒赏了参与八寨之役的各有功官员。^②

九月初八，朝廷下旨对阳明平复思恩、田州之乱的功绩给予嘉奖：“王守仁受命提督军务，莅任未久，乃能开诚布恩，处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众归降，罢兵息民，其功可嘉。写敕差行人赍去奖励，还赏银五十两，纁丝四表里，布政司买办羊酒送用，钦此。”九月二十日，阳明上疏谢恩。从他的谢恩疏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正“卧病床褥，已余一月”，所以当敕书送达之时，他“扶疾兴伏，感激惶惧，颠顿昏眩，莫知攸措”。而在疏文的结尾，我们竟感受到了某种少有的萧瑟气象：“祇受之余，战悚惶惑，徒有感泣，惟

① 《批右江道移置凤化县南丹卫事宜呈》，《全集》卷三〇，1118 页。

② 参见《全集》卷三〇有关公移。

誓此生鞠躬尽瘁，竭犬马之劳，以图报称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复能奔走阙廷，一睹天颜，以少罄蝼蚁葵藿之诚，臣不胜刻心镂骨，感激恋慕之至！”^①这些措词，大抵不能视之为通常的官场客套，因为在一年前阳明奉命入两广之时，便已经病患日渐深重，他是“扶病起程，沿途就医、服药调理，昼夜前进”^②的。到达广西之后，因气候暑热，疾病益深，“贱躯患咳，原自南、赣蒸暑中得来，今地益南，气类感触，咳发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复可药。地方之事苟幸塞责，山林田野则惟其宜矣，他尚何说哉？”^③而一年多来，他奔走于道路，出入于军旅，昼筹夜度，设谋运策，不以病躯为念，而唯以安靖地方为务，既抚思恩、田州，又剿八寨、断藤，同时还需处理各种繁重而又纷杂的地方军政事务，真可谓呕心沥血，故其病患之渐深，原亦为势之所必然。另一方面，阳明之入两广，平藩之役的冤屈还未洗雪，他是以“不白”之身而奉命就道的，今虽思田早已抚平，且用之以剿平八寨，他自思以其“苟延残喘”之躯，为国家去百数十年未瘳之患，即便不说功高盖世，但心底的无私却总是可鉴天日，然朝廷仅就思田之事而略存抚慰之意，竟未有一语及其往昔之冤。如此想来，则我们从阳明的谢恩疏中，却亦可以读出他心底的些许怨愤。

当然，两广的大事毕竟已经完毕，他可以毫无愧疚地向朝廷复命了。他期待着仍然可以回到家乡，徜徉于池塘春草，体味着天心月圆，与众弟子商略心得，优游于宁静活泼而又高远浩瀚的思想世界，潇洒地享受着心灵自体之澄明的无限欣悦。一旦从战争的纷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他的心思便立即回到了故乡的讲堂。他致书钱德洪、王畿，表达了他热烈的期盼之意：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来不审同志叙会如何？

① 《奖励赏赉谢恩疏》，《全集》卷一五，521页。

② 《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全集》卷一四，462页。

③ 《与黄宗贤》第三书，《全集》卷二一，831页。

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犒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为寄声，益相与勉之。^①

他对家乡的眷恋、对同志的怀念、对后生晚辈的殷殷厚望、对其精进于道德之途的热切激励与拳拳期待，都尽情袒露于这寥寥数语之中。虽疾病缠身，但他仍感到快意。猜想阳明这时的心情，用黄庭坚的一首诗来表达也许是合适的：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②

然而，阳明的前路却仍然是一片迷雾。他此时毕竟尚不能逆料，他魂牵梦绕的稽山禹穴，竟真成他魂兮归来之所。而当黄钟已遭毁灭，瓦釜却依然雷鸣……

① 《与钱德洪王汝中》第二书，《全集》卷六，224页。

② 黄庭坚：《题快阁》，《黄庭坚全集·外集卷第十》，1100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夫复何言 此心光明

(嘉靖七年十月至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1528.10.13—1529.12.11)

广西战事结束以来, 阳明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他原先只是担心自己的喘咳之患会因水土气候的原因而终成痼疾, 不复可药, 不意一年多来, 非但冲冒炎暑, 而且劳心敝神于征剿之战, 出入于崇山峻岭之中, 至嘉靖七年十月, 其病况日益增剧, 竟真有不复可药之势。十月, 他从横州回南宁, 过乌蛮滩, 谒伏波庙。黄绾记曰: “病势日笃, 犹力惫视事。年十五时, 梦中尝得句云: ‘卷甲归来马伏波, 早年兵法鬓毛皤’, 莫知其谓。至是舟至乌蛮滩, 舟人指曰: ‘此伏波庙前滩也。’ 公(阳明)呀然登拜, 如梦中所见, 因诵梦中诗, 叹人生行止之不偶云。”^①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8页。按:伏波庙祀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横州(今横县)东北六十里。《广西通志》卷一五《山川·南宁府·横州》:“乌蛮山在城东北六十里,下为乌蛮滩,其麓有伏波庙。”马援(前14—公元49),字文渊,扶风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王莽末,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归刘秀,攻灭隗嚣。建武十一年(35),任陇西太守,率军击破先零羌。建武十七年,任伏波将军,讨平交趾徵侧、徵贰之反,封新息侯。后在进击武陵五溪蛮时,病死军中。死后犹被中伤,刘秀追夺其新息侯印绶。至章帝建初三年(78),追谥为忠成侯。《后汉书》卷五四有传。阳明过伏波庙,录其十五岁时梦中所吟绝句,并为之记,曰:“此予十五岁时梦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梦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识其事于此。”又作《谒伏波庙》二首:“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但征敢倚风云阵,所过须同时雨师。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从来胜算归廊庙,耻说兵戈定四夷。”“楼船金鼓宿乌蛮,鱼丽群舟夜上滩。月绕旌旗千嶂静,风传铃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声服,神武由来不杀难。想见虞廷新气象,两阶干羽五云端。”(《全集》卷二〇,797页)诗中所体现的感情颇为复杂,但仍是仁心充溢,为无术挽救人民于疮痍之中而感到惭愧。思恩、田州来服,八寨、断藤剿平,他不以为己功,只希望从此人民果能安居,王化真能普浃,朝廷真能德威四方而呈现出新的气象。阳明盖颇以马援自况,故谓“兹行殆有不偶然者”。然阳明之才既堪与马援相埒,智则远过之,慧则马援无敢望其项背,而其寿竟不及马援,亦悲矣夫!

回到南宁之后，他于十月初十向朝廷作了平生最后一次上疏，请求朝廷允许他回到原籍养病，其中曾谈到他当时的病况，曰：

臣自往年承乏南、赣，为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岁益滋甚。其后退伏林野，虽得稍就清凉，亲近医药，而病亦终不能止，但遇暑热，辄复大作。去岁奉命入广，与旧医偕行，未及中途，而医者先以水土不服，辞疾归去。是后，既不敢轻用医药，而风气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肿毒，喘嗽昼夜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当思思、田州之役，其时既已力疾从事，近者八寨既平，议于其中移卫设所，以控制诸蛮，必须身亲相度，方敢具奏；则又冒暑舆疾，上下岩谷，出入茅苇之中，竣事而出，遂尔不复能兴。今已舆至南宁，移卧舟次，将遂自梧（州）道广（东），待命于韶（州）、（南）雄之间。^①

在阳明想来，广西的形势已有根本好转，且“新任太监、总兵亦皆相继莅任，各能守法奉公，无地方骚扰之患。两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创涤往时烦苛搜刻之弊，方务安民。今日之两广，比之异时，庶可谓无事矣。臣虽病发而归，亦可以无去后之忧者”^②。正因为如此，他猜想朝廷一定能够爽快地应允他回乡养病的请求，并且重新派员来接替他的巡抚两广之任。但事实上，阳明这一充满哀恳之意的疏文，竟仍被留中不报。^③

当此之时，阳明疾病日深，他迫切地想要回到故乡去延医调治，因此，他不再等待朝廷的批复，而是将公事托付于右布政使林富，随即从南宁“移卧舟次”，顺水而东，打算边走边等待朝廷新任的两广巡抚，以完成公务的交接。按照他的估计，等他到达距粤、赣边界不远的韶州、南雄之间，新的巡抚官总该任命了，故谓“待命于

① 《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全集》卷一五，523页。

② 同上书，523页。

③ 参见《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21页。

韶、雄之间”，于此可见阳明当时必欲返乡的迫切心情。

舟至广州，阳明扶疾至增城，祭拜了祀其五世祖王纲的祖庙，并过访了湛若水，题诗其壁。^①旋即又登舟就道。在此同时，他的疾病进一步加重，除痰热喘咳、遍身肿毒之外，又增水泻，而他焦急等待的新任两广巡抚，却仍是毫无踪迹。他打算稍等数日，若朝廷仍未任命新的巡抚官员，便继续东行，“待罪于南（安）、赣（州）之间”。他曾寄书黄绾，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意：

病躯咳患日增，平生极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乡，遍身皆发肿毒，旦夕动履且有不能。若巡抚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为归休之图，待罪于南、赣之间耳。圣天子在上，贤公卿在朝，真所谓明良相遇，千载一时。鄙人世受国恩，从大臣之末，固非果于忘世者，平生亦不喜为尚节求名之事，何忍遽言归乎？自度病势，非还故土就旧医，决将日甚一日，难复疗治，不得不然耳。^②

过不多日，又寄书黄绾曰：

巡抚官久未见推，仆非厌外而希内者，实欲早还乡里耳。恐病势日深，归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龙（黄绾之号）其能为我惘然乎？身在而后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③

-
- ① 《年谱三》：“先生五世祖讳纲者，死苗难，庙祀增城。是月，有司复新祠宇，先生谒祠奉祀。过甘泉先生庐，题诗于壁，曰：‘我祖死国事，肇祿在增城。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寻。苍苍蒹葭色，宛隔环瀛深。入门散图史，想见抱膝吟。贤郎敬父执，童仆意相亲。病躯不遑宿，留诗慰殷勤。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道通著形迹，期不负初心！’又《题甘泉居》曰：‘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全集》卷三五，1323页；卷二〇，799页）从诗中可知，阳明祭祀祖庙、顺访甘泉，都是非常匆忙的，他大概并没有见到甘泉本人，又谢绝了甘泉之子的热情留宿，仅题诗于壁而去。
- ② 《与黄宗贤》第四书，《全集》卷二一，832页。该书似当作于阳明到达韶州、南雄一带时作。书中“巡抚官再候旬月不至”，“旬月”，恐为“旬日”之误。
- ③ 《与黄宗贤》第五书，《全集》卷二一，833页。味书中语气，盖阳明恐其东归之举，误被人认为“厌外而希内”，故有是语。所谓“身在而后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见他当时对自己病势的危重已是十分担心了。

在粤、赣边界，他又寄书友人：

区区病势日狼狈，自至广城，又增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今遂两足不能坐立。须稍定，即逾岭而东矣。^①

由阳明的这些自述可知，当他到达广东、江西接境之处，他仍未等到朝廷新命的两广巡抚。而实际上，他乞求养病的奏疏既被留中未报，则朝廷根本就不会派员来接替他的巡抚之职。他因疾病日甚一日，乃决意不再拖延，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境内，顺章水而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南安（今大余）。^②

然而，此时的阳明，病情已趋危殆。他终究没有等到朝廷对他自平定宸濠之战以来所受各种无端的诬陷作出昭雪，他终究没有等到他一直所期盼的公义在朝廷的回归，他当然亦根本不会想到，他一年多来在广西对思恩、田州的招抚以及对八寨、断藤峡的征剿，虽为之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会在他死后再次成为宵小对他实施攻讦的口实。他只确信自己的心体莹明，表里俱彻，这一点玉壶冰心，却是皇天后土可以共鉴，鬼神幽明皆以不欺，古圣先贤足以共明。他完全可以不再以任何俗世的得失荣辱为念，而带着他无私的心地、坦荡的胸襟、澄明的良知、纯粹的心体去会见往古的圣人。但亦正是圣学的这一丝念头，又使他产生了些许的遗憾：“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③因此虽在弥留之际，他仍在关心着后学的圣学工夫，用他生命的最后一点元气勉励着门人精进于圣学之道，他的临终遗言，则唯有“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字。方离开南宁之时，必欲回到故乡的信念支撑着他日益衰颓的病体，而越大庾岭之后，便即进入南、赣之境，那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他曾踏遍那里的山岭水道，

① 《答何廷仁》，《全集》卷六，225页。

② 按《年谱》谓十一月“廿五日逾梅岭至南安”，钱德洪《遇丧于贵溪书哀感》谓“二十一日逾大庾岭”，然则阳明越大庾岭当在二十一日，至南安当在二十五日。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8页。

在那里生活与战斗，付出他生命的智慧，绽放他思想的华彩。在他的心目之中，江西早就已经是他的故乡，他可以心安了。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元1529年1月9日）上午^①，阳明先生逝世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舟中，享年五十七岁。《年谱》云：

是月（十一月）廿五日，逾梅岭至南安。登舟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来见。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来进学如何？”（周）积以政对。遂问道体无恙。先生曰：“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积退而迎医诊药。廿八日晚泊，问：“何地？”侍者曰：“青龙铺。”明日，先生召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时也。^②

数日之前，当阳明即将离开广东省境的时候，广东布政使、阳明门人王大用就为阳明备办了制作棺木的材料，“先是，先生出广，布政使门人王大用备美材随舟”。至此，最早闻讣而来南安的江西省赣州府兵备张思聪，乃为“亲敦匠事，铺衲设褥，表里褐裘”，因有所备，所以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十二月三日庚午，张思聪、南安府推官周积、举人刘邦采与官属师生设祭，于南安府公馆将阳明的遗体入殓。“明日，與槨登舟。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③十二月五日，槨抵赣州府水西驿^④，“提督都御史汪铤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拥哭如南安”。十二月十日，槨抵吉安府螺川驿^⑤，佾事陈璧、知府张汉等率众官属哭奠；十二月二十四日，槨抵南昌府南浦驿，御史储良材等

① 《年谱》谓“十一月乙卯，先生卒于南安”。按：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是丁卯，作“乙卯”，误。钱德洪《遇丧于贵溪书哀感》谓“实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时也”，是；然其时辰一曰“辰时”，一曰“午时”，则未知孰是。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24页。

③ 同上。

④ 水西驿，旧在赣州府城西门外，见《江西通志》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螺川驿，旧在吉安府螺川递运所右，见《江西通志》卷三五；又见卷一二八《螺川重修马驿记》曰：“吉安螺川驿，实当江（西）、广（东）之正途，驿骑之要会。”

率众官属各就位哭奠。^①因时近岁末，而前来吊唁的民众又络绎不绝，“巡按御史储良材、提学副使门人赵渊等请改岁行，士民听夕哭奠”^②。“柩经南、赣，虽深山穷谷，男女老弱皆缟素，匍匐哀迎，若丧考妣。凡所过江西地方，行道之人无不流涕者。”^③

嘉靖八年正月初三（1529年2月11日），棹发南昌府。“自储（良材）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儿巷妇，哭而送者载道。风迅，不可帆，又不可缆而前也，储大夫抚之曰：‘先生岂有怀邪？越中子弟门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俟至者，盖有日矣！’须臾反风，若或使之，遂行。”^④正月丙午（初七），丧至贵溪，钱德洪、王畿及阳明之子正宪迎丧至，哭之几绝。^⑤正月十六日，丧至广

① 程辉《丧记》谓“辛卯，棹抵南昌府南浦驿”，则为十二月二十四日；钱德洪《遇丧于贵溪书哀感》曰：“十二月二十日，丧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储君良材、提学副使赵君渊哭，士民皆哭，声载于道。乃挽丧留于南浦，请改岁而行，以尽士民之哀。”（《全集》卷三八，1446页）然则阳明之丧至南昌，未知究在二十日还是二十四日。南浦驿，旧在南昌府西门广润门外。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24页；参见程辉：《丧记》，《全集》卷三八，1451页。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8页。

④ 程辉：《丧记》，《全集》卷三八，1454页。按：阳明之丧发南昌的日期，有异说。程辉谓“岁己丑正月庚子，棹发南昌府”，则为正月初三；《年谱》：“八年己丑正月，丧发南昌。是月连日逆风，舟不能行。赵渊祝于柩曰：‘公岂为南昌士民留邪？越中子弟门人候久矣。’忽变西风，六日直至弋阳。”（《全集》卷三五，1324页）未载明发丧的具体日期；钱德洪《遇丧于贵溪书哀感》则曰：“己丑改岁六日，将发舟，北风厉甚。储（良材）焚香虔祝于柩曰：‘公弗行，岂为士民留邪？公党有子嗣门人，亦望公久矣。’即时反风，不四日，直抵信州。”（《全集》卷三八，1446页）则又以为发丧日期在初六日。详各记载，当以《丧记》之说为是。《丧记》又谓丙午（初七）丧至贵溪，钱德洪、王畿及阳明嗣子正宪来迎，若是初六发丧，则虽风顺水，自南昌至于贵溪，一日之间亦必不可达，且又与“不四日直抵信州”之说合。

⑤ 嘉靖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钱德洪、王畿西渡钱塘江，将赴京师参加廷对，因闻阳明将回，遂至富阳严子陵滩迎候。至二十二日，“有人自广来，传夫子以病告，将还庾岭，闻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兰溪”。至兰溪后，得闻阳明病逝之讯，乃“相顾怖骇，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为吾道，必无此事。’兼程夜抵龙游驿，吏曰：‘信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终于江西之南安。’闻之昏殒愤绝，不知所答。及旦，反风，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极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于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赎，而顾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兴”。虽心情极度悲痛，且舟行不利，仍日夜兼程前趋，除夕至常山，嘉靖八年正月初三至信州（上饶），恰逢闻父丧而从绍兴前来迎丧的阳明继子正宪，钱、王遂成丧服，同时撰《讣告同门》，发布了阳明逝世的消息（参见钱德洪：《讣告同门》，《全集》卷三八，1444页；参见《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24~1325页；程辉：《丧记》，《全集》卷三八，1454页）。按：《年谱》：“（钱、王）闻讣，正月三日成丧于广信，讣告同门。是日，正宪至。初六日，会于弋阳。”据程辉《丧记》及钱德洪《遇丧于贵溪书哀感》文，则应以会于贵溪为是，其日期当为正月丙午（初七）。

信府。^①阳明诸弟及门人闻讣皆来迎。过玉山县，进入浙江省境，沿途各府县官员皆亲临吊唁。

二月初四（1529年3月13日），丧至绍兴。《年谱》载：

四日，子弟门人奠柩中堂，遂饰丧纪，妇人哭门内，孝子正宪携弟正億与亲族子弟哭门外，门人哭幕外，朝夕设奠如仪。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有自初丧至卒葬不归者。书院及诸寺院聚会如师存。^②

十一月十一日（1529年12月11日），阳明先生的灵柩被安葬于距离兰亭约五里之遥的高村，这是他生前自己选定的墓地。此地背负青山，树木蓊郁，俯瞰平野，境界开阔；山下有清流潺湲如带，名曰洪溪。《年谱》云：

是月十一日发引，门人会葬者千余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来观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先生所亲择也。先是，前溪入怀与左溪会，冲啮右麓，术者心嫌，欲弃之。有山翁梦神人绯袍玉带立于溪上，曰：“吾欲还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从南岸，明堂周阔数百尺，遂定穴。门人李珙等筑治，更番昼夜不息者月余，而墓成。^③

阳明的这一葬礼，既是隆重的，却又是凄凉的。他只有家人朋友弟子门人来为他隆重送行，却受到了朝廷的极度冷落，既无恤典，亦无谥号，似乎他原为一介平民，原无须引起朝廷的任何关注。但若果真如此，则阳明大概亦可以入土为安，一生功过不必再论，只留下他光明的本心去映照门人弟子的心灵，去撤除士人的冥顽懵懂而导其心体于澄明的境域，便亦已然足够。但事实却又并不如此。朝中权臣对他的嫉恨谗妒，非但构陷攻讦于其有生之年，且变本加厉于其既死之后。是非依旧淆乱，曲直依然倒置，白圭仍受玷污，公

① 程辉《丧记》：“癸丑，棹抵广信府葛阳驿。……夫子弟守俭、守文，门人栾惠、黄洪、李洪、范引年、柴凤会棹于玉山。”按：癸丑，为正月十六日。葛阳驿，在广信府城南1里（参见《江西通志》卷三五）。《年谱》谓：“初十日，过玉山，弟守俭、守文，门人栾惠、黄洪、李珙、范引年、柴凤至。”若癸丑丧至广信府，则过玉山必在此后，故《年谱》“初十日过玉山”之载疑有误。

② 《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25页。

③ 同上书，1327页。

义仍被掩覆。黄钟大吕之音，竟然潜消于瓦釜雷鸣之中。

嘉靖七年十月，阳明乞回归故里养病的奏疏送达朝廷之时，时任吏部尚书的桂萼不仅令该部留本不报，而且欲以此为借口，弹劾阳明擅离职守及其处置思、田事宜不当，征剿八寨、断藤峡未奉成命等罪，又诋其平宸濠之役滥冒军功。黄绾云：

（阳明）讬至，桂公萼欲因公乞养病疏参驳害公，令该司匿不举，乃参其擅离职役，及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思威倒置，又诋其擒（宸）濠军功冒滥，乞命多官会议。……上遂允命多官会议。^①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1428页。黄绾继云：“先此，张公孚敬见（阳明）公所处岑猛诸子及卢苏、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极口称叹，谓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时与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荐于朝，取来作辅，共成天下之治。桂公（萼）、杨公（一清）闻之皆不乐，及赅锦衣卫都指挥聂能迁诬奏公用金银百万，托余送与张公（孚敬），故荐公于两广。余疏辨其诬。奉旨：‘黄绾学行才识，众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舆论推重。聂能迁这厮捏词妄奏，伤害正类，都察院便照前旨严加审问。务要追究与他代做奏词并帮助奸恶人犯来说。黄绾安心供职，不必引嫌辞避。’下能迁于狱，杖之死。”（同上书，1428～1429页）按：嘉靖六年命阳明出征思、田，当时桂萼亦为举荐，但桂萼举荐阳明，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而是因受到张璁（即孚敬）的勉强。桂萼因“大礼之议”阿谀上意，极受世宗宠信，当时正为位高权重，炙手可热之时。嘉靖六年九月，桂萼为吏部左侍郎，同月拜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甫逾月，即迁吏部尚书，“赐银章二：曰忠诚静慎，曰绳愆匡违；令密封言事，与辅臣埒”。至七年正月，又加太子太保，寻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萼既得志，日以报怨为事”，“廷臣莫不畏其凶威”。“王守仁之起也，萼实荐之，已衔其不附己，力蹇屹。及守仁卒，极言丑诋，夺其世封，诸恤典皆不予。”（《明史》卷一九六《桂萼传》）张璁亦因议礼得宠，其始与桂萼深相结纳，后则明争暗斗，相互嫌隙，桂萼“性猜狠，好排异己，以故不为物论所容。始与璁相得欢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同上）时张璁、桂萼、杨一清皆为辅臣，又皆相互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张璁既自以荐阳明有功，以其阴排桂萼，而桂萼则原不喜阳明，因此遂更妄捏事实，至赅使锦衣卫千户聂能迁肆加构陷，并连及黄绾（时黄绾与张璁深相结），故黄绾有上疏为己辩诬之事。（《明史》阳明本传方炜考证曰：“按：萼又尝赅锦衣指挥聂能迁，诬守仁贿黄绾荐用两广，绾疏辨其诬。下能迁于狱，杖死之。”）七年十月，南京礼部侍郎位缺，桂萼荐黄绾补缺，黄绾认为，这亦是桂萼陷害阳明的手段之一，所以谓：“时予为詹事，桂公、杨公计欲害公（阳明），恐予在朝，适南礼侍缺，即推予补之。”（《阳明先生行状》）这一事件正当发生在阳明嘉靖七年十月上疏乞骸骨前后，故阳明之疏既至，遂被桂萼扣留，至八年春二月，桂萼密上揭帖，借故对阳明横加诬陷，要求众官对其所捏造的阳明的所谓罪名公同会议。《明史》阳明本传曰：“及（阳明）奏断藤峡捷，（世宗）则以手诏问阁臣杨一清等，谓守仁自夸大，且及其生平学术。一清等不知所对。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后萼长吏部，璁入内阁，积不相下。萼暴贵，喜功名，风守仁取交趾，守仁辞不应。一清雅知守仁，而黄绾尝上疏欲令守仁入辅，毁一清，一清亦不能无遗憾。萼遂显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然则世宗盖不信阳明能在短期内征平八寨、断藤峡，得其捷报，以为夸大其词，且亦不喜阳明生平学术，故桂萼既奏密本，遂能得到世宗的允许，令群臣会议（参见《明史》卷一九六张璁、桂萼、方献夫、夏言传，卷一九七黄绾传及卷一九五阳明本传）。

世宗既令群臣会议，一时间谤议汹汹，虽有大学士霍韬等上疏论持正议，详论阳明两广之功^①，然桂萼之论终究得大行其道。更有甚者，桂萼又上疏诋毁阳明之学，谓：“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相互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畚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②于是世宗大怒，下

① 霍韬之疏，详论阳明广西之功，反驳桂萼等论。其论阳明招抚思、田，谓前巡抚调三省之兵若干万，不知费银米若干万，而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费斗粮，只宣扬陛下圣德，遂至思恩、田州两府顽民稽首来服，其奉扬圣化以来远人，虽舜格有苗，何以过此！”其论八寨、断藤峡之征，谓：“天下十二省，惟广西独在万山之丛，其土险，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飞鸟不越者。……八寨者，实四方寇贼渊藪也，断藤峡又八寨羽翼也。广西有八寨诸贼，犹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则两广无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机不露，掩贼不备，一举而平之，百数十年豺虎窟穴，扫而清之，如拂尘然，非仰藉圣人神武不杀之威，何以致此！”又论列阳明征剿之成功，乃有八善：“乘湖兵归路之便，则兵不调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则劳而不怨，二也；机出意外，贼不及遁，所诛者真积年渠恶，非往年滥杀报功者比，三也；因归师讨逆贼，无粮运之费，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马，一举成功，民不知扰，五也；平八寨，平断藤峡，则极恶者先诛，其细小巢穴可渐施德化，使去贼从良，得抚剿之宜，六也；……今八寨平定，则（柳州、庆远）诸贼可以渐次抚剿，两广良民可渐安生业，纾圣明南顾之忧，七也；……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诛之剧贼，山川天险尤难为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镇定之，则恶贼失险，后日固不能为变，遁贼来归，不日且化为良民矣；诛恶绥良，得民父母之体，八也。”对于桂萼所谓阳明只奉命征思、田，未奉命征八寨、断藤峡，故为恩威倒置之说，霍韬以周亚夫不奉诏攻梁，反而率军破吴、楚，终致七国以平为说，“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怀也，遂约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诸贼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时仗义而讨平之；仁义之用，达天德者也；虽无诏命，先发后闻可也，况有便宜从事之旨乎？”对于桂萼等所论阳明改变广西城邑建置，不先奏闻而即兴工之罪，霍韬以既委任大臣，便不应事事牵制，而唯可责其成功为论，谓筑城以制御未来，实有时机存焉，过此以往，则虽严筑城垣，亦未必能收制御之效，更何况“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盖计之熟矣，钱粮夫役，固不仰足户部而后有处也。其以一肩而分圣明南顾之忧，可谓贤矣。不以为功，反以为过，可乎？”对于桂萼所谓阳明平宸濠滥冒军功之论，霍韬辨其诬妄，谓：“王守仁不辨之谤，至今未雪，可谓黯哑之冤矣。夫国家论功，有二道焉：有开国效功之臣焉，有定乱拯危之臣焉。……昔者王守仁之执宸濠也，可谓定乱拯危之功矣。奸人犹或忌之而谤其短，夫如是，则后有事变，谁肯效忠乎？”其最后谓：“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无以劝励忠之臣；若广西之功不白，又无以劝策勋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虑也。”（详见霍韬：《论新建伯剿抚地方功次疏》，《广西通志》卷一〇一；又见《全集》卷三九，1463页，题为《地方疏》）

② 《明史》卷一九五阳明本传。

诏剥夺阳明新建伯爵位，不准世袭，一切恤典俱不颁行，且又诏禁阳明之学，以为“伪学”。黄绾曾上疏力争^①，然疏入不报。给事中周延又上疏力谏，结果被逐，斥为太仓州判官。^②

终阳明一生，经磨历劫而气象愈加浩然洒落，踏遍青山而胸襟至于坦易如砥。以其宇宙豪杰之才、仁人精一之心，辛勤于国事，尽心于职守，冲冒矢石，出入险阻，慧勇果决，刚毅不拔，时运奇谋卓识，屡建非常之功，为国家力挽狂澜，定乱拯危，虽困顿于仕途，为小人所构陷，而略未计个人之恩怨得失，终至为国尽瘁，死而后已。他虽然没有能够得到他生前所曾期盼的那份公正与公平，甚至没有能够得到他所应有的那份哀荣，但这并非阳明的悲哀，而只是朝廷的耻辱。乾坤粹气，不以阴霾尘坌而失其精纯；河岳英灵，岂因谤言诟詈而夺其光辉。黄钟大吕，终究将大声镗镳，回荡于山川海岳，而惠迪天下士民的心灵。

① 黄绾疏略曰：“臣所以深知守仁者，盖以其功与学耳。然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盖其功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轨，谋非一日，……若非守仁忠义自许，身任讨贼之事，不顾赤族之祸，倡义以勤王，运筹以伐谋，则天下安危未可知。……其二，大帽、茶寮、涇头、桶冈诸贼寨，势连四省，兵连累岁，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临镇，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构衅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机，感以诚信，乃使卢、王之徒崩角来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难。其四，自来八寨为两广腹心之疾，其间守戍官军，与贼为党，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顺狼兵，卢、王降卒，并而袭之，遂去两广无穷之巨害，实得兵法便宜之算。……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此所据以从旧本之意，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是守仁之学，弗施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然以（桂）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获致君尧舜，谁之过与？……以守仁之功德，劳于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罚有加，废褒忠之典，倡党锢之禁，非所以辅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载骨，槁埋空山，鬼神有知，当为恻然！臣实不忍见圣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于异世，犹当追崇，况在今日哉？……伏愿扩一视之仁，特敕所司，优（阳明）以恤典赠溢，仍与世袭，并开学禁，以昭圣政。”（《年谱三》，《全集》卷三五，1325～1327页）

② 《明史》卷二〇二《周延传》：“周延字南乔，吉水人。嘉靖二年进士，除潜江知县，改新会，擢兵科给事中。时议新建伯王守仁罪，将夺其爵，（周）延抗疏为讼，坐谪太仓州判官。”

哲人往矣 尔思曷兴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朱厚熜逝世，其第三子朱载堉继位，诏以明年为隆庆元年（1567），“大赦天下，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①。隆庆元年五月，诏：“近年病故大臣有应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应得而得者，科道官举奏定夺。钦此。”^②于是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等，御史王好问、耿定向等皆上疏^③，谓：“原任新建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勋道德，宜膺殊恤。”吏部、礼部会议，认为：“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珰，甘受炎荒之谪。建台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亲收社稷之功。伟节奇勋，久见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遽夺于身终？”疏上，穆宗诏赠阳明为“新建侯”，追谥“文成”^④。“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赐造坟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参政与祭七坛。”^⑤隆庆二年六月，诏以阳明嗣子王正億世袭伯爵，岁食粮一千石。

在阳明去世四十年之后，尽管其墓木早拱，宿草已茂，但总算

① 《明史》卷一九《穆宗本纪》。

② 薛侃：《请恤典赠谥疏》，《全集》卷三九，1489页。

③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除海宁知县。时为吏科给事中。《明史》卷二二〇有传。岑用宾，字允穆，广东顺德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衡州府推官。时为南京户科给事中，敢上言论事。后尝为绍兴太守，为官廉洁（参见《广东通志》卷四五《人物志二》）。王好问，字裕卿，号西塘，直隶乐亭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八《南京户部尚书表》，《续文献通考》卷一九六）。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湖北黄安（一作麻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擢御史。因忤严嵩，出按甘肃。万历中，累官户部尚书，立朝有时望。晚年居天台山讲学，学宗阳明。卒时年七十三。《明史》卷二二一有传。

④ 《年谱附录一》，《全集》卷三六，1353页。

⑤ 同上书，1354页。

有了这份迟到的哀荣。封侯追谥、世袭爵位，想阳明有知，大概并不会十分在意，他一生之志，原只在于继往圣之绝学，开人心之光明，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措置于天下事业，使民生丰茂，道德谨厚，风俗淳朴。正义虽不在庙堂之上，却存乎天下之心。阳明去世以后，尽管朝廷仍有学禁，但天下士人对其良知学说的信奉，真若决江河而沛然莫之能御。他生前所过化之地，无论贵州、江西、安徽、两广还是浙江，各地多建祠堂书院，以缅怀其功烈，以讲论其学说，以承继其思想。良知之教遍满宇内，播流域外，终成显学。功业存乎山川，道德著于人心。文质炳然，若星汉之灿烂；心体光明，乃永烛乎青史。原阳明之心，当对其毕生智慧之所荟萃的良知学说仍能在其身后产生出巨大的思想效应而感到欣慰。

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当中，这一物质世界是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意识总是受到物质世界本身的制约，物质世界的现存状态决定了我们的精神意识，因此就存在性而言，精神总是被派生的，是属于第二性的。在一般意义上，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普遍的正确性。而阳明先生倡导良知之说，认为“无心外之物”，似乎显然就与我们的常识不相符合，正因为如此，他的观点便亦往往受到质疑与批评。

对于同一个物质对象，当从不同的层面或视角对它进行观察的时候，有可能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哲学问题更是如此。阳明的一般哲学观点，植根于丰厚的中国文化土壤。按照中国古代的观点，所谓现实或世界存在的当前状态，乃必然呈现为“三才”（天地人）的某种共构，只有这种“三才”的共相结构，才能表达“世界”的真实涵义。按照这一观点，“世界”实际上就不可能将人本身的存在排除在外。道是天地万物获得其现存的终极根据，亦是天地化生煦育万物之伟大美德的最终体现者，它既是存在的本体，亦是道德的本体，这种本体的实在性既普遍显现于万物，而尤为集中地显现于人本身的存在之中，所以《礼记》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作为“天地之心”的人，显然不可能是人的物质形式，而是人的存在本

质。人的这种存在本质，原本就是天道在人这一现象的特殊存在形式，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性便即是人的存在本质。按照孟子的观点，性是需要心来体现并表达的，心一方面通过“思”的功能将人的现存与他的本质实在性相互联结，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行为的制导将人的现存状态与事物现象的全体相互联结。因此在现实性上，“心”即成为人的存在实性的实际承担者，同时亦是作为先天道德原质之性的实际体现者。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以为“存心”即是“养性”，而“养性”则可以“知天”，以至于“上下与天地同流”，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这一观点表明，如果人在他的生存过程中确乎有必要将他真实的存在本质在经验领域中表达出来，那么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道德的实践，因为道德本身即是人的本质存在性，即是人的生命本质。生命的全部过程，不仅需要通过道德的践履来充分表达，而且需要在道德的实践中使它臻于完善。因此之故，道德的践履，既是生命存在的证明与显现方式，亦是使生命本身趋于完善的经验方式。在一般意义上，个体通过自身的经验实践活动将他的主体性表达于现实领域，将他的心灵状态与经验世界相互联结起来，由此而构成他本身的生活世界，而这一生活世界本身，又是他本身作为主体所开显出来的意义世界。

这样看来，个体的生活世界实质上便是个体本身之心灵状态或其精神世界的对象化开展形态。这一形态的实际内容是充分体现了个体的主体性的，或者说，是主客体充分交融的。我们在享有一个共相的、普遍的、一般的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享有一个特殊的、本质上不与他人共享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只是有一点，由于这种个体的生活世界是个体本身的主体性及其经验实践的实际产物，因此不管它的结果如何，个体都必须对它负完全的责任，承担它的一切后果。

按照我本人的理解，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实质上并不是关于事物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客观性的判断，而是关于天下事物如何

被个体的心灵状态所整合并由此而开展出其独特的生活世界的具体阐述。在他那里,“良知”即是人的存在本质,是生命的本体,就其存在性本身而言,它是先天的、固有的,并不是从经验获得的;就其存在的性质而言,它是“至善”的,但同时又是“无善无恶”的^①;就其自身的功能而言,它既是反思的、内敛的,同时又是开展的、外向发越的。良知在“未发”的状态,它本身的自我存在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按照它本身所自是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它是保持了自身的“正位”的。但“已发”的情况却可能有很大不同。“已发”实际上是良知由先天的纯粹存在向后天的经验存在转换,是良知在经验领域中的表达。关键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一经验表达的过程当中,因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良知是有可能无法按照它本身所自是的状态来表达它自身的。所谓“其他因素”,主要是指“意”。良知是心性的本体,“意”则是“心之所动”,是心体本身被表达于经验领域的必要中介。一方面,“意”与良知本体保持着内在的本质联系;但另一方面,“意”又通过官能感觉以及对行为的主导而与事物世界保持着经验联系。这样一来,“意”的实际内容就既来源于良知本体,但在经验中又往往不能确保它纯粹来源于良知本体,从而导致作为心本体的良知在向经验领域延展的过程当中发生某种歧变。这种歧变的出现,就现实的个体生活而言,实质上即意味着生命的现存状态疏离了它自身的本质,从而漂流于现象中间,使生命流于现象的蝉联;其极端形态,便即是“人”化为“物”,而不再能求之于人道的世界了。按照阳明的理解,人的经验生活之所以可能发生这种本质的歧变,根本原因即在于“意”之动未能保持它的纯粹性,亦即“意”未能按照良知本身所自是的状态去将它表达于经验世界之中,所以“诚意”便显示出了极端的重要性。“意”有不诚,将至

① “良知”本体的自身表达在经验的价值尺度中必然是善的,因此就其价值表现而作归源性判断,乃必谓“良知”本身是“至善”的。但就“良知”本身的自存相状而言,它作为一种“未发”的状态,却超越于善恶的经验价值,而只标志为一种超越性的价值中立,因此又谓它是“无善无恶”的。

于天地失位、人物倒错，人的本质便将潜消于万物，而人的存在亦将逆转为物化的形式；“意”诚则能保持良知本体向经验领域的纯粹贯彻，于是就天地清朗，人物光明，一切万物皆得其正，人为天地之心的终极意义亦就获得其最为充分的显扬。“诚意”既是内省的工夫，又是“必有事焉”的工夫，良知的自我反思与良知的经验表达在个体的实践当中是相互涵融而一体化的，所以说“诚意”即是“致良知”的工夫。

作为“致良知”的工夫，“诚意”便需要充分贯彻于个体的生活实践之中。按照阳明的观点，“物为意之所在”，所以他将“物”诠释为“事”，因为“事”总是包含了人的主体性活动的。“意”之所在的“事”，就“意”与“事”的关系而言，两者实是处于互动之中。“意”既主导着“事”，而“事”亦引导着“意”；正为“事”亦引导着“意”，所以“意”有可能不诚；“意”不诚则“事”亦不得其正，所以《中庸》就说“不诚无物”。但不管“意”是否诚，它与“事”的现实关联却是具有普遍性的。“物为意之所在”这一观点表明，事物是通过“意”的运用而被统摄于主体世界之中的，“事”作为一种主体的实践活动，则是将主体与事物世界联结起来的必要环节，正是通过这种实践环节的链接，个体才开展出属于他本身的生活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未曾被主体之“意”所涵摄、尚未进入主体之“事”的实践领域的客观事物存在，对主体而言是不“关心”的，亦是未曾进入到主体本身的生活世界的。正因“意”为心之所发，“物”为“意”之所在，天下事物在本质上是被心所整合而构成在个体那里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的，所以阳明才说“心外无物”。但就心的自身功能而言，对一切事物的普遍涵摄乃是其本身之用，它是遍行于一切万物的，所以“物外”亦无“心”。

按照以上观点，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它不仅是我们作为人而存在的先天本质，而且亦是我们在经验中实现人的生存、完善人的生命、成就生存之最高价值的终极根据。尽管良知作为我们生命本质的存在是确定的，作为我们先天道德原质的存在同样亦是确定的，

这种确定性不会由于我们经验的生存状态而发生任何改变，但是否能够将良知在我们的经验生活中实现出来，却必然导致全然不同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以诚意为契机而切实地去“致良知”，将导向心体本身的自觉与开明，生命将因其自体的澄明而优入于峻伟超拔、光大高明的神圣境域。不施反思之功，唯外物之是循，唯利欲之是用，则良知必被遮蔽而无由开显，生命便即漂移于暗昧的沉沦之中，流而不返，便终将不复能求之于人道之域。然则不甘于生命之堕落于幽昧之中的人们，对于阳明的“致良知”之说，曷兴乎来！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阳明.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 王阳明. 阳明先生别录.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嘉靖三十四年闰东序刻本
3.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 季本. 季彭山先生文集 (稿本).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第 106 册.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5. 邹守益. 邹东廓先生文集 (十二卷).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 邹守益. 东廓邹先生遗稿 (十三卷). 光绪三十年江西刻本
7. 王畿. 王龙溪全书. 东京三省堂明治三十六年印本
8. 杨廷和. 杨文忠公三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顾其言. 皇明百将列传评林. 四库禁毁书丛刊. 子部第 17 册
10. 项笃寿. 今献备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唐鹤徵. 皇明辅世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524 册
12. 张廷玉等. 明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3.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4. 邵廷采. 思复堂文集.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15. 傅恒等.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黄宗羲. 明儒学案. 沈善洪主编. 黄宗羲全集.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17. 陆九渊. 陆象山全集.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18. 朱熹. 朱文公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19. 秦家懿. 王阳明.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7
20. 陈来.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1. 钟彩钧. 王阳明思想之进展.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3
22. 钱明主编. 阳明学新探.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23. 钱明. 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24. 杨正泰. 明代驿站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25. [日] 今关寿麿. 宋元明清儒学年表.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26. 广东通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广西通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浙江通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 记

关于阳明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所以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先生委托我撰写一本关于王阳明的著作，作为由他所承担的国家课题“阳明学研究丛书”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考虑将主要内容集中于阳明生平行历的叙述，这一想法得到了吴光先生的首肯。

学术界对阳明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他的哲学思想，严肃而又比较全面地叙述其生平行履的著作似乎还不多见，而我觉得，了解阳明的生平事迹，会像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样，更有助于了解阳明的全部人格。从他生平所行之事当中，亦可以了解到通常读《传习录》及其论学书信之类的作品所不能发现的某些思想，从而不仅有利于对阳明学说的整体理解，而且亦可以对现有关于阳明思想研究的著作起到某种补充作用。我相信像阳明先生那样的一位思想家，他的人格的光明峻伟是在他现实的生活经验之中不断完善并显现出来的，他的胸怀的宏阔是在生活世界的开拓之中不断呈露并显现其博大的，他的思想世界的广远深邃是在生活实践境域的拓展之中而不断深化并获得其整体显现的。因此毫无疑问，对阳明生平事迹的叙述，就必然会涉及他的思想发展。生活世界的开展与思想世界的演进在阳明那里原本不相分离，生命的历程即是其思想的历程。虽然如此，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仍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生活事实的阐述，对其不同生活阶段所涉及的思想学说，只根据自己的浅见稍加阐发而已。读者诸君如欲更多、更深入地了解阳明的哲学思想，则当阅读其他学者的著作，如陈来先生的名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

精神》等。

本书的写作，除得到吴光先生的帮助以外，同时还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钱明兄的帮助，他为我提供了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阳明先生别录》以及其他的一些资料。

本书的基本目的，是尽量简洁明了地将阳明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讲清楚，所以各部分行文的详略亦就没有特别的预设，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作中我同时亦参考了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对某些不同的记载作了辨析，对某些有误的记载作了更正，对某些不详的记载作了补充。尽管如此，或因史料不足，或因视域有异，或因孤陋而未见某些已有的史料，错误与不足仍然难免，谨祈读者诸君发其罅漏而予以匡正为盼！

是为记。

董 平

2005 年 12 月 25 日于浙江大学哲学系

2009 年 3 月 5 日修改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王阳明的生活世界

董平著

浙中王学研究

钱明著

江右王学通论

徐儒宗著

泰州学派研究

吴震著

刘宗周与蕺山学派

何俊 尹晓宁著

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

吴光著

王阳明与道家道教

朱晓鹏著

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陈永革著

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

刘宗贤 蔡德贵著

东亚阳明学

[韩] 崔在穆著
朴姬福 靳煜译

阳明学综论

吴光主编

策划编辑 李艳辉 余海
责任编辑 徐飞 符爱霞
版式设计 赵星华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ISBN 978-7-300-11273-2

ISBN 978-7-300-11273-2



9 787300 112732 >

定价：32.00元